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

**HISTORY COMPIL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History Textbooks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

刘超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

**HISTORY COMPIL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History Textbooks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

刘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 / 刘超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ISBN 978-7-5097-9121-9

I. ①历…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史课-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①G63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6300号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

---

著 者 / 刘 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陆 彬 宋 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5 字 数：482千字

版 次 /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121-9

定 价 / 128.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章百家

副主任 牛大勇（常务） 徐思彦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 军	牛大勇	王奇生	王海光
邓小南	仲伟民	张 丽	张盛发
李丹慧	李剑鸣	杨奎松	汪朝光
沈志华	陈东林	徐 蓝	徐秀丽
徐思彦	章百家	彭 卫	韩 钢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6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作者提供完成的书稿，由专家推荐，采取匿名审稿，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在不断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 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 年 9 月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但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以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 目 录

导 论 .....	1
一 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研究：问题与方法 .....	2
二 学术史回顾 .....	9
三 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 .....	19
四 历史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 .....	27

## 上 编

第一章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	37
一 清政府教育宗旨与教科书编写 .....	38
二 救急之选：引译日本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	42
三 爱国教育：中国自编教科书之兴起 .....	49
四 教科书与清政府教育目标之分合 .....	65
小 结 .....	70
第二章 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	72
一 养成共和国民：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	72
二 1922 年新学制与教科书编写 .....	86
三 新学制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 .....	94
小 结 .....	102

<b>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b> .....	105
一 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	105
二 教科书编写的模式化与“国定本”的颁行 .....	116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改编本 .....	121
四 高扬民族主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 编写特点 .....	127
五 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之分合 .....	130
小 结 .....	136
<b>第四章 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b> .....	137
一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概况 .....	138
二 编者之构成：地缘与学缘 .....	145
三 编者的职业与专业：编辑与史家 .....	149
四 编者与政府之分合 .....	154
小 结 .....	158
<b>第五章 书局的权势网络与知识生产</b> .....	169
一 高集中度与高关联性：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出版业 .....	170
二 书局与课程标准的制订 .....	173
三 上层路线：书局与教育部之关系 .....	177
四 占领市场之一：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广告战 .....	181
五 占领市场之二：书局间的竞争与合作 .....	185
小 结 .....	188
<b>第六章 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b>	
——以孔子叙述为中心 .....	190
一 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 .....	191
二 民初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 .....	195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 .....	199
四	教科书叙述与国家、思想界之关联 .....	205
五	教科书叙述：孔子儒学在近代中国的难局 .....	210
小	结 .....	212

## 下 编

第七章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	217
一	历史分期与中国历史书写 .....	218
二	“近古”与中国古代史：发展或停滞 .....	221
三	中国近代史：“旧史结穴时代”或 “西力东渐时代” .....	225
四	中国现代史：史家与时代 .....	229
五	“共和”、“中华民族”与“世界化”： 中国近代之展开 .....	231
六	中国历史公式：普遍历史中的中国史 .....	234
余	论 .....	237
第八章	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 .....	246
一	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 .....	248
二	史前史的出现与中国历史的拉长 .....	252
三	商代的信史开端与中国历史期的缩短 .....	257
四	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社会进化阶段的象征 .....	265
五	考古学与民族认同：古史辨运动之参照 .....	270
小	结 .....	273
第九章	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起源说 .....	281
一	中国人种起源作为问题的出现与“西来说” .....	283



---

二	1930年代前教科书中的“中国人种西来说”	286
三	1930年代后教科书中的“中国人种土著说”	292
四	考古发现与“中国人种土著说”的兴起	297
五	“暂行断定”“土著说”：考古发现与民族情感	301
小 结		305
<b>第十章</b>	<b>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中国民族叙述</b>	<b>309</b>
一	清末引译教科书中的民族叙述	310
二	清末自编教科书中的民族叙述	313
三	民初的中华民族“一源说”	315
四	民族同化：部分民族之汉化	318
五	民族融合：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322
小 结		325
<b>第十一章</b>	<b>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民国教科书中的</b>	
	<b>清史叙述</b>	<b>330</b>
一	教科书中的清初内政措施叙述与清史	331
二	民初教科书中的清初内政叙述	333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清初内政叙述	336
四	共和政体与民初教科书中的共和立场	339
五	党国体制：政治认同与汉族立场	341
六	民国社会中汉族意识的参照	344
七	政治认同下的双重民族叙述	347
小 结		349
<b>第十二章</b>	<b>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新文化运动叙述</b>	<b>351</b>
一	民国教科书中的新文化运动叙述	352
二	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	360

---

三 整理国故与“反传统”：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	364
四 教科书中对五四运动及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叙述	367
五 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阐释	371
小 结	374
<b>第十三章 帝国主义话语与中国近代史书写</b>	<b>376</b>
一 帝国主义话语与历史教科书编写	377
二 帝国主义话语与历史书写：以鸦片战争为例	380
三 帝国主义侵略及其影响	384
四 军阀：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389
五 国民革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反封建与 合法性建构	392
六 光荣与苦难：民族史叙述与民族国家认同	396
小 结	400
<b>第十四章 教科书案（上）：《现代初中本国史》案</b>	<b>404</b>
一 《现代初中本国史》之编写	407
二 《现代初中本国史》中的“三皇五帝”叙述	411
三 黄帝始祖地位与“共信”之国本	413
四 传疑与象征：其他教科书黄帝叙述之参照	418
五 国民党的思想控制	422
小 结	426
<b>第十五章 教科书案（下）：《白话本国史》案</b>	<b>429</b>
一 《白话本国史》之编写	430
二 《白话本国史》中关于岳飞的叙述	434
三 《白话本国史》案	437

四 民族英雄叙述的尺度：南京国民政府对历史人物的扬抑 .....	441
余 论 .....	444
结 语 .....	448
一 教科书知识的性质：国家意志与个人观点 .....	448
二 历史教科书的功能：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 .....	453
三 历史教育的本义：个人与国家 .....	456
四 历史知识：建构与反建构 .....	460
附 录 清末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历史课程设置 .....	466
征引文献 .....	469
索 引 .....	506
后 记 .....	520



# Contents

<b>Introduction</b>	/ 1
1. History Textbooks and Nationalism Research: Question and Method	/ 2
2. Review of Academic History	/ 9
3. Thoughts, Method of Research and Structure	/ 19
4. The Influence of Textbooks to the Students	/ 27

## Part 1

<b>Chapter I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Compiling in Late Qing Period</b>	/ 37
1. The Educational Tenet of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Textbooks Compiling	/ 38
2. Emergency Choice: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Compiled by Japan	/ 42
3. Patriotic Education: the Rising of Textbooks Compiled by China	/ 49
4. The On-off Between Educational Purpose of Textbooks and Qing Government	/ 65
Epilogue	/ 70

<b>Chapter II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Compil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b>	/ 72
1. Developing the Republic; The Textbooks' Compil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 72
2. New School System in 1922 and Textbooks' Compiling	/ 86
3. The Features of the History Textbooks' Compiling During New School System Period	/ 94
Epilogue	/ 102
<b>Chapter III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Compil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Government</b>	/ 105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Education Policy	/ 105
2. The Patternization of the Textbooks' Compiling and the Publication of National Version	/ 116
3. Adapted Textbooks during Nanjing Government Period	/ 121
4. Uplifting Nationalism; the Feature of the Compiling of Textbooks during Nanjing Government Period	/ 127
5. The On-off Between Textbooks and Course Standard	/ 130
Epilogue	/ 136
<b>Chapter IV Compilers of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b>	/ 137
1. General Situ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Compilers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	/ 138
2. Composition of the Compilers; Geography and Learning	/ 145
3. The Occupation and Profession of the Compilers; Editors and Historians	/ 149

---

4. The On-off between Compilers and Government	/ 154
Epilogue	/ 158
<b>Chapter V Power Network of Publishing House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b>	<b>/ 169</b>
1. High Concentration Degree and Relevance: The Commercial Press-centered Publishing	/ 170
2. Publishing Houses and the Set-up of Course Standard	/ 173
3. Upper Cour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shing Houses and the Education Ministry	/ 177
4. Occupying the Market, 1: The Advertisement Campaign of the History Textbook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 181
5. Occupying the Market, 2: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Publishing Houses	/ 185
Epilogue	/ 188
<b>Chapter VI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Centered on Confucius Narration</b>	<b>/ 190</b>
1. Confucius Narration in the Textbooks of Late Qing Period	/ 191
2. Confucius Narration in the Textbooks of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 195
3. Confucius Narration in the Textbooks of Nanjing Government Period	/ 199
4. The Correlation in Textbook Narration, Nation and Academic Circles	/ 205

5. Textbooks Narration: The Impasse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China	/ 210
Epilogue	/ 212

## Part 2

<b>Chapter VII The Express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The Topic on the Staging of Chinese History</b>	/ 217
1. Historical Staging and Chinese History Compiling	/ 218
2. “Ancient Time Nearest to the Present” an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Development or Stagnation	/ 221
3.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ave Dwelling Time” or “Eastward of Western Culture Time”	/ 225
4. Chinese Modern History: Historians and Times	/ 229
5. “Republic”, “Chinese N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 Expansion of China Modern History	/ 231
6. Chinese History Formula: Chinese History in Common History	/ 234
Summary	/ 237
<b>Chapter VIII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b>	/ 246
1. Archaeology and the Compiling of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 248
2. The Appearance of Prehistoric History and the Extension of Chinese History Period	/ 252
3. Starting at Shang Dynasty in True History and the Shortening of China History Period	/ 257

4.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Ancient Legend: the Symbol of Social Evolution	/ 265
5.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n Ancient History	/ 270
Epilogue	/ 273
<b>Chapter IX Crisis and Identity: The Topic on Chinese National Origin</b>	<b>/ 281</b>
1. The Appearance of the Question about Chinese Origin and “The Version of Western Origin”	/ 283
2. “The Version of Chinese Race Originating from West” in Textbooks before 1930’s	/ 286
3. “The Version of Chinese Race are Natives” in Textbooks after 1930’s	/ 292
4.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Version of Chinese Race are Natives”	/ 297
5. “Provisionally Conclude” “The Version of Originating from Native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National Emotion	/ 301
Epilogue	/ 305
<b>Chapter X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 The Narration of Chinese Nation</b>	<b>/ 309</b>
1. Narration about Chinese Nation in Textbooks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 310
2. Narration about Chinese Nation in Textbooks Compiled by Chinese	/ 313
3. “The Version of One N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 315

4. National Assimilation; Hanization of Some Nations / 318
5. National Amalgamation; The Form of Concept about  
Modern Chinese Nation / 322
- Epilogue / 325

**Chapter XI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in  
Textbooks of Republic of China / 330**

1. The Narration about Internal Policy of Qing Dynasty  
in the Textbooks and Qing History / 331
2. The Narration about Internal Policy of Qing Dynasty  
in the Textbooks of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 333
3. The Narration about Internal Policy of Qing Dynasty  
in the Textbooks of Nanjing Government Period / 336
4. 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 and the Republic Standing  
of Textbooks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 339
5. Party-state System; Political Identify and Han Standpoint / 341
6. Reference of Consciousness of Han Nationality in  
Republic of China / 344
7. Dual Narration on Nation under Political Identify / 347
- Epilogue / 349

**Chapter XII Knowledge's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Narra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 351**

1. The Narration abou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extbooks / 352
2.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 360

3.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Anti-tradition” : the Critique of the Kuomintang to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 364
4. The Narra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 Textbooks	/ 367
5. The Explanation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371
Epilogue	/ 374

### **Chapter XIII Imperialism Discourse and Chinese Modern**

<b>History</b>	/ 376
1. Imperialism Discourse and History Textbooks’ Compiling	/ 377
2. Imperialism Discourse and History Writing; Taking the Opium War as an Example	/ 380
3.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nd Its Influence	/ 384
4. Warlords; The Tools of Imperialist Aggression	/ 389
5.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Abroga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Legitimacy	/ 392
6. Glory and suffering; The Narr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fy	/ 396
Epilogue	/ 400

### **Chapter XIV A Case of Textbooks (1) : *Modern Junior***

<b><i>School History</i></b>	/ 404
1. The Compiling of <i>Modern Junior School History</i>	/ 407



2. The Narration about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Sovereigns in <i>Modern Junior School History</i>	/ 411
3. The Ancestor Position of Huang Di and the Common-believed National Version	/ 413
4. Doubt and Symbol: The Narration about Huang Di in Other Textbooks	/ 418
5. The Thoughts Control of Kuomintang	/ 422
Epilogue	/ 426

**Chapter XV A Case of Textbooks (2): Vernacular**

<i>Chinese History</i>	/ 429
1. The Compiling of <i>Vernacular Chinese History</i>	/ 430
2. The Narration about Yue Fei in <i>Vernacular Chinese History</i>	/ 434
3. The Case of <i>Vernacular Chinese History</i>	/ 437
4. The Scale of National Heroes' Narration; The Prise and Suppress to Historical Characters	/ 441
Summary	/ 444

**Conclusion** / 448

1. The Nature of the Textbooks; States Will and Personal Standpoint	/ 448
2. The Function of the History Textbook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 453
3.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Education; Individual and Country	/ 456
4. Historic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Anti-construction	/ 460

<b>Appendix History Course Setting Table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b>	/ 466
<b>Bibliography</b>	/ 469
<b>Index</b>	/ 506
<b>Postscript</b>	/ 520

## 表格目录

表 1-1	清末引译自日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44
表 1-2	清末国人自编或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小学(含蒙学)部分]	52
表 1-3	清末国人自编或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学部分)	56
表 2-1	民初改编自清末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75
表 2-2	章嵒《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8 年版与 1913 年版 比较	76
表 2-3	《普通新历史》1906 年版与 1913 年版比较	77
表 2-4	民初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小学部分)	78
表 2-5	民初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学部分)	79
表 2-6	新学制时期(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小学部分)	88
表 2-7	新学制时期(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学部分)	89
表 3-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小学部分)	108
表 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学部分)	110
表 3-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五大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的主要编者与版次	122

表 3-4	朱翊新等三种教科书上古史目录比较 .....	131
表 3-5	傅纬平等五种教科书上古史目录比较 .....	132
表 4-1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概况 .....	138
表 4-2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的历史专业 著述 .....	152
表 5-1	1923 年课程标准起草、制订者名单 .....	174
表 5-2	1929 年课程标准起草人或审查人名单 .....	174
表 5-3	1923 年、1929 年小学、初中课程标准部分起草、 制订者编校的教科书 .....	175
表 5-4	民国教育部职员与书局之关系 .....	177
表 8-1	1920 年代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信史起点 .....	260
表 8-2	史前史分期、社会进化阶段与中国上古帝王时代 对照 .....	269
表 9-1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种起源说 .....	290
表 9-2	1930 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种起源说 .....	295
表 13-1	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中关于帝国主义侵略 影响的叙述 .....	386
附表 4-1	中国历史教科书部分编者编校的教科书 (教授书) .....	160
附表 7-1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 分期 .....	239
附表 8-1	1920 年代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史前史与考古 发现 .....	275

## 导 论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sup>①</sup> 教科书在民众知识观念与社会意识的形成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知识载体，传授的是经过选择的特定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观的系统，渗透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制度中，对大多数人产生影响与控制。<sup>②</sup> 而历史教科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或认可而颁行的教科书，是政府向其人民宣示其统治正当性及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sup>③</sup> 历史教科书“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的历史’”，<sup>④</sup> 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

- 
- ① 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载《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第114页。
  - ② 参阅 M. 阿普尔、L.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主编《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
  - ③ 戴振丰：《战后日本的反思——以日本“制定之会”所编历史教科书的“战争观”为中心》，载《第五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2004，第165~166页。
  - ④ 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载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217页。

## 一 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研究：问题与方法

近代中国教科书的产生，正是中国民族主义与新史学兴起之时。新史学与近代国家建设基本上是在“共时态”的空间里发生的，新史学发展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叙事主导新史学的“现代史”。<sup>①</sup> 塑造新式国民而建立富强国家，成为新史学的主要目的，也渗透到中国历史教学和教科书编写中。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新史学一部分，凭借其特殊的历史教育功用，担负了拯救民族国家的任务。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民族国家问题尤为关切，这决定了其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地位。<sup>②</sup>

### （一）历史教科书：联结国家、学界与民众的纽带

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是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sup>③</sup> 民族主义产生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中，“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过程中，所谓的民族共同体一定会按角色分解为两种人：一种是精英，另一种是大众”。普遍民众提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与土壤；民族文化的制造者——通常是知识分子，从历史文本的记录中发掘出往往是乌托邦式的文化梦想；政治家把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结合为政治运动。<sup>④</sup> 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将知识精英的思想传达给民众，进行社会动员，

① 参阅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和中国语境》，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第20、18~19页。

② 关于教科书研究的重要性，参阅纪奚《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石鸥《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③ 徐迅：《民族主义》（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1页。民族主义含义较多，参阅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6~20页。

④ 徐迅：《民族主义》（修订版），第77~78页。

形成一般的社会意识与民族主义运动，这样才可以实现精英的政治诉求。<sup>①</sup>如何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结，换言之，精英的思想如何才能成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成普遍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民族主义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目前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较多的关注。一些研究从思想人物与“关键词”入手，考察精英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及“关键词”意义的变迁，这对认识中国民族主义有重要意义。<sup>②</sup>但需注意的是，有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在某一时期内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对普遍民众的影响程度不高。目前的研究没有充分关注到精英思想的社会影响，以致将精英民族思想简单地等同于现实中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民众的民族情绪，忽略了从精英思想到民众观念和社会意识的转化。如清末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清政府倡扬的道德标准在教科书中出现，但其在新式教科书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内涵发生了改变。<sup>③</sup>清政府的教育目标通过教科书而实现的程度尚可讨论。如“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有不同的含义，也主要限于部分知识分子言论中；民国成立后精英的一系列努力，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无疑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从一开始出现到普遍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间也充满了变化。这提醒我们，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要区分精英思想与一般的社会意识，

---

① 关于精英的概念讨论，参阅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32~36页。作者认为，一般来说，精英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精英是被“选择”出来的；第二，精英常常要求具有卓越的人格魅力特征和高尚的道德素养，这是精英区别于大众的本质特征，也是被“选择”的重要理由；第三，精英必须存在于有一定共同体诉求的组织中。就精英群体来说，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统治阶级、权力精英以及群体精英或社会精英。本文的“精英”概念是在最一般意义上使用的，与大众相对应，不包含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相类似。

② 关于人物思想的研究颇多，这里不再列举。关于“关键词”（观念）的研究，参阅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

③ 参阅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2期，2001年6月。

关注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路径及其转化。

教科书是联结政府（国家）、编者（学界）与学生（民众）的纽带，对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起到重要作用。<sup>①</sup> 民族主义思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达给普遍民众，就实际影响而言，利用国民教育对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是社会动员最有效的途径。统治集团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等意识形态一致化的方法实现其精神和道德领导。<sup>②</sup> 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在推行官方民族主义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sup>③</sup> 在资讯与传媒尚不发达的近代中国，学校教育是民众获取知识与形成民族意识的重要渠道，学校是培养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场所。在近代中国，在塑造社会舆论方面，教科书的作用比报刊更为重要。<sup>④</sup> 因此，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工具，在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中的作用值得关注。

教科书的桥梁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政府或编者的意图全盘照搬，它会有一定的选择。“知识是由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认知的功能是适应，它应有助于主体对经验世界的组织。”<sup>⑤</sup>

- 
- ① “学界”或“思想界”有不同的定义，本书将“学界”或“思想界”视为“场域”，“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参阅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33～134、133页。“学界”或“思想界”作为“文化场域”与“知识场域”，涉及多个要素，参阅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48页。教科书编者与学界以及思想界有所关联，属于“学界”或“思想界”的一部分，本书为了表述方便，有时候用“编者”来指代学界或思想界。
  - ② 何增科：《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4期，1993年8月，转引自方成智《艰难的规整——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5页。
  - ③ 参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15页。
  - ④ 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张志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7页。
  - ⑤ 莱斯利·P. 斯特弗、杰里·盖尔主编《教育中的建构主义》，高文、徐斌艳、程可拉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总序第9页。



这里尤需注意民族主义通过教科书传播的具体情况。一方面，政府与编者的意图经由教科书传达给学生（民众），使得学生对国家政策与编者（精英）思想有所了解，可能会认同政府与精英，因而能够配合他们的要求，形成民族主义运动，以实现其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在经由教科书传达的过程中，政府与编者试图表达的意思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生（民众）在接受过程中会有自己的取舍，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政府与编者的期许。这使得民族主义的传布情况变得复杂，结果也难以确定。因此，对教科书桥梁作用及其在民族主义传布中的效果要具体分析。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在通过教科书的传播过程中会发生何种变化，产生何种影响，这实与教科书的编写密切相连。

## （二）历史教科书编写：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

教科书编写涉及多个方面，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教科书知识生产的状况，反映了教科书功能，关系到对教育本义的认识，是教科书研究的重要环节。

教科书编写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教科书是国家教育制度与教育目的的承载物。政府通过颁行教育宗旨，制定教育政策与课程标准，加强教科书审定，来指导和规范教科书，这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编写。从清末到民国，先后有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sup>①</sup>除南京临时政府外，各政府都颁布教育宗旨，学制也不断发生变动，教育宗旨与学制的变化，相应地会引起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的调整，从而影响到教科书编写。<sup>②</sup>这是影响教科书编写的主要因素。教科书体现了国家意志，这是历史教科书与一般历史著作的重要

<sup>①</sup> 本书使用的“南京国民政府”，是指国民党1927年成立于南京、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叙述方便，有时也用“南京政府”来表述。

<sup>②</sup>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短暂，没有出版历史教科书，但一些政策在北京政府时期产生影响。

区别。

二是编者的素养。编者的专业和政治素养，与单种教科书的质量关系最大，是影响教科书编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学制与课程设置对教科书编写的影响，主要在外在形式方面；教育宗旨与编者素养则影响到教科书的内在质量，对教科书的编写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编者是构成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联结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许多政治与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与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与民众。<sup>①</sup> 由于编者对国家教育目的的理解以及知识水平不同，不同的教科书对历史的阐释有所不同，所表达的知识观念有一定的差异，其结果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教科书往往成为政治与文化冲突的一个核心。<sup>②</sup> 教科书编写的实践说明，政府审定或认可颁行的教科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政府教育要求还需要具体分析，即便是在同一课程标准指导下编写的教科书，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可能有所不同。教科书对历史知识的释读是多样的，编者的个人意志或隐或现，这使得它与一般历史著作又有很大的相似性。

教科书编写过程即政府和编者联合生产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群体的知识被官方裁定为面向所有人的知识，社会秩序因而获得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sup>③</sup> 政府作为特殊的政治组织，会利用自己掌控的教育资源将其统治合法化；编者作为教科书编写的实际完成人，往往将历史知识选择与过滤后写入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编者与政府有所分合：当编者认同政府的教育目标时，会遵循政府的要求；反之，编者就会与政府的要求有所疏离，影响教育目标的实现。编者与政府的分合，使不同教科书之间存在

①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清末民国时期发生的多起教科书案，大致反映了这种情况。不唯近代如此，现今国家之间也经常因为教科书编写问题而发生争执，影响到国家关系。

③ M. 阿普尔、L. 克利斯蒂安-史密斯主编《教科书政治学》，第134~135页。

差异，学生接收到的知识可能不同，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不确定性。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教科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对民族主义的形成会产生何种影响。实际上，相对于政府和编者的要求来说，教科书的意味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以自己的方式来影响学生和民众。

### （三）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关注民族主义内部因素

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功能除了传授历史知识，还有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确立当前政权的合法性，而后者往往居于主要地位。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本诉求是国家政权问题。所谓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主要是围绕政权展开的，其中统治合法性是重要因素。确立合法性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诉求，也会对民族主义产生重要影响。<sup>①</sup>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研究，一般都注意到外国侵略的影响。外国侵略是激发中国民族意识、形成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诱因。但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仅仅着眼于外国侵略的一面，恐怕不足以理解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近代中国对外国侵略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就可能犯“时代误置”的错误。再如，1930年代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要求联合中国各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汉族意识也在此时兴起。仅从日本侵略方面很难对此加以解释。因此，研究民族主义，不仅要注意到外部因素，也要关注内部因素。

关于统治合法性对民族主义的影响，首先，政权更迭可能会改变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形式。近代中国经历了清朝和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变更较为频繁。如何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是各个政权需要面对的问题，教育往往成

<sup>①</sup> 关于本书使用的“认同”“合法性”及其相关词语的含义，详见第三节。

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清政府、民初袁世凯政府以及南京政府都是如此，尤其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使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不同的是，1922年新学制表现出对教育的全新理解。其次，民族主义内部不同权力结构之间政治诉求的差异也对民族主义产生影响。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但这种诉求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意味是不同的。讨论民族国家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谁之认同？认同什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民族主义精英知识分子有不同派别；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所谓民族、国家认同或许有不同意指。政府、精英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民族主义演变的一个因素。

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途径是什么？合法性的确立高度依赖于共同体和民众的社会记忆，<sup>①</sup> 历史教育是确立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民族主义者会采取多种叙述策略，把民众的民族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杜赞奇指出，民族主义者为了动员民众，不仅仅依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依靠大量权威性的历史词汇来作为新思想的联结点，使之作为对传承的优先叙述。<sup>②</sup> 在历史教科书编写时，政府会要求运用一些诸如“民族”与“国家”等“历史词汇”以达到确立政治认同的目的。编者安排叙述要素如选题和选材、叙述的类型、叙述的结构模式、叙述的语言等的过程，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以实现其政治诉求。

这在关于中国民族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在多民族的现实中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形成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确立政治认同。晚清时民族主义者

①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第19页。

② 参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7页。

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上有很大的分歧，在该采取何种方式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民国时期，为应对国内民族分裂的危险以及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民国政府不断调整民族政策；而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政权更迭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清朝和民国政府采取何种方式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自身统治，直接影响到民族主义的演变。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第一，把确立统治合法性作为认同中心会对民族主义产生何种影响；第二，从历史来建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其效果如何。研究中国民族主义，要关注其内部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历史的反建构特征。

基于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情况和历史教科书基本功能的思考，本书拟对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以这一时期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探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本研究将尝试说明：政府与编者（知识界）共同促成了教科书知识生产，二者有所分合，从而构成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政治认同优先于甚至替代民族国家认同，真正的民族国家认同很难建构起来，研究民族主义，要关注其内部因素；利用历史来建构认同，要注意到历史的反建构特征：历史会给通过历史建构的认同带来冲击，甚至动摇认同。

民国时期，政治不统一，除了南京国民政府外，先后与之并存的有中共政权、伪满洲政府和汪伪南京政府。这些政权都在统治区内实行自己的教育，发行自编的教科书。一些地方和学校也使用自编教材。这些教科书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使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写呈现“多样化”状态。本书讨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是指经中央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 二 学术史回顾

教科书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课题并

未引起应有的关注。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教科书研究才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sup>①</sup>

### （一）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

近年来，在近代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等研究中或有论及教科书，把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来讨论。<sup>②</sup>把教科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有三部著作。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是较早出版的教科书研究专著，对清末西方教科书的传入、清末自编教科书、民初自编教科书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本质是文化选择。<sup>③</sup>该书讨论的范围是清末到1930年代，主要关注教科书编写与审定制度，讨论相对简单。

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讨论了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晚清教科书部分讨论了教会等非学制教育课本与壬寅学制以来的基础教育课本，民国时期教科书部分讨论了常识、语文以及其他各科教科书。该研究的特点有：<sup>④</sup>①从教科书实物出发，介绍了大量教科书内容，归纳出其编写特点；②对晚清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几种教科书专门进行了讨论；③对教科书编写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进行了研究。<sup>④</sup>

① 关于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情况，有几篇综述可资参考，参阅倪文君《清末教科书研究综述》，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吴小鸥《近年来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综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朱煜《六十年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1期。

② 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2007；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汪家熔《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册，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等等。

③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④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

石鸥的《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是近年来出版的研究中国教科书历史的一部力作，该书讨论了1840~2010年中国教科书历史，有以下特点。一是比较全面。从时间上看，介绍了清代、民国和新中国教科书的百年历史。从种类上看，介绍了各种教科书，不仅讲述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也分类介绍一些特色教科书和校编教科书，还介绍了南京政府时期沦陷区与共产党根据地的教科书。二是对各时期重要教科书进行了介绍，并概括了各时期教科书的特点。三是以教科书实物为依据，结合教科书内容来讨论，史料翔实。<sup>①</sup>石鸥重视教科书研究，主张教科书研究要以教科书实物为支撑，带动了一批人从事教科书研究。<sup>②</sup>

此外，吴科达、张运君对教科书审定情况进行了研究，<sup>③</sup>毕苑、吴小鸥等人对教科书与文化转型进行了讨论，<sup>④</sup>张仲民、王兴亮等人研究卫生与乡土教材，特别是张仲民的研究，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讨论深入，值得关注。<sup>⑤</sup>

教科书与近代新观念、新教育的萌生与发展密切相关，从教科书来讨论新观念、新教育取得了一些成果。季家珍分析晚清部分修身教科书与国民读本，认为传统的儒家理想在晚清教科书这种新文

① 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② 如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石鸥主编了一套《教科书研究丛书》，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的晚清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主要有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史论》（2013）、吴驰《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2014）、刘斌《清末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研究》（2014）。石鸥还主编了“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主要有刘景超《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特性》（2015）、李新《百年中国乡土教材研究》（2015）、石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2015）等。

③ 吴科达：《臣民还是公民——教科书审定制度和思想道德教科书（190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④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⑤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另外，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是一部教科书研究论文集。

体中被改造和赋予了新的含义。<sup>①</sup> 黄兴涛讨论了清末伦理教科书，指出其编写有一个“开明化”过程，基本固守儒道伦常，但有些宣扬新的价值观念；同时，伦理教科书为现代伦理学科的兴起打下了重要基础。<sup>②</sup> 程美宝研究清末广东部分乡土教科书，指出地方读书人运用了一套新的话语，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sup>③</sup> 周婉窈比较了日据时期台湾公立学校国语读本中的插图所呈现的台湾人形象，从早期的较为写实到最后的完全日本化，反映了日本推行殖民统治的变化。<sup>④</sup> 黄东兰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揭示其在中国人“近代意识”形成中的意义。<sup>⑤</sup> 刘龙心讨论了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与近代历史知识的转型，认为在近代学科意识冲击下，中国传统地理知识被分解，这影响到史学空间概念。<sup>⑥</sup> 章清讨论了“自由”作为学科术语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呈现，“自由”在不同教科书中表述不同，给国人理解与接受“自由”概念带来了困扰。<sup>⑦</sup> 夏晓虹探讨了《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认为《蒙学课本》中新的伦理道德对新道德观的建构和现代国民基本品格的塑造意义重大。<sup>⑧</sup> 这些研究以问题

- ① 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12期，2001年6月。
- ② 黄兴涛、曾建立：《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 ③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④ 周婉窈：《写实与规范之间——公学校国语读本插画中的台湾人形象》，《台大历史学报》第34期，2004年12月。
- ⑤ 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表象》，载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另外，黄东兰在讨论近代中国语境中的“亚洲”概念时，注意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里的“亚洲”论述，参阅黄东兰《“亚洲”的诞生——近代中国语境中的“亚洲”概念》，载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8。
- ⑥ 刘龙心：《从历史出走——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与近代历史知识的转型》，载《近代以降的历史教学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上海，2015。
- ⑦ 章清：《“自由”的界限——“自由”作为学科术语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呈现”》，载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
- ⑧ 夏晓虹：《〈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



为中心，对教科书内容进行细致分析，是教科书研究深入的表现。

上述研究虽不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专题研究，但对认识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一定助益，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发行等问题，与其他门类教科书基本一致，通过这些研究，大致可以了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些情况。另外，关于教科书与新观念的研究，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提供了参考。

## （二）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专题研究

### 1. 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

教科书编写是教科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较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目前相当多的研究也集中于此。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受到日本的很大影响，清末引译的日本教科书引起研究者重视。李庆介绍了日本史家那珂通世、市村瓊次郎、桑原鹭藏等人的学术历程，对他们的著作如《支那通史》、《支那史》与《东洋史要》的成书过程及影响做了述评，对了解这些书的编纂情况有所帮助。<sup>①</sup> 黄东兰探讨了明治时期日本的中国史、东洋史教科书，对日本东洋史学如何表述中国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对了解《支那史要》《中等东洋史》等日本教科书很有助益。<sup>②</sup>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考察了清季对日本中国史、东洋史与文明史教科书的译介，认为汉译日本教科书的编撰形式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重要意义，也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③</sup> 该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将教科书内容与政府政策相结合，材料丰富，论说明晰。

在单种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中，张耕华对《白话本国史》的研

①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② 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叙述》，载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中华书局，2010。

③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83页。另参阅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1~56页。

究值得关注。张耕华讨论了《白话本国史》编写情况，对前后修订版本进行了比较，这对认识吕思勉史学思想及当时的教科书编写有一定意义。<sup>①</sup>此外，一些研究者讨论了部分单种教科书或某一时期教科书的编写情况。<sup>②</sup>

## 2. 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

历史教科书是新史学的重要实践形式，其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变迁。教科书与新史学的关系及其对新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正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周朝民较早注意到教科书的学术价值，指出在新思潮影响下，戊戌变法后的自编教科书在编写思想、内容及体例上开始向新史学转变。<sup>③</sup>陈其泰从编写体例与内容方面对《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进行了讨论，认为该书采用进化论、章节体等，为中国近代史学创立时期的拓荒之作，代表了通史撰著的新方向。<sup>④</sup>对中国史学的讨论与反思往往会关注到线性历史观，线性历史观是近代史学的一个特点，李帆以清季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进行讨论，认为线性历史观有多种表现形式，这里有日本史学的影响，但也不能忽略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线性历史观因素的考索。<sup>⑤</sup>

① 张耕华、朱伟明：《〈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

② 关于单种教科书的研究，参阅康桂英《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李波《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孙文阁《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0年第7期；马执斌《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江南大学学报》（人社版）2014年第4期；王正瀚《简论我国第一部中外史合编课本——〈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4期；张汉林《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等等。关于某一时期教科书的研究，参阅富兵《1927~1937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1997年第1期；臧嵘《抗日战争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及启示》，《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11期；等等。

③ 周朝民：《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④ 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⑤ 李帆：《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

近代新史学相较于传统史学有多个不同，首先体现在体裁体例上。新史学采用了章节体等新编写方式。邹振环以清季引译的部分外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指出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的变化中，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的转变过程。<sup>①</sup>王晴佳从历史观改变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sup>②</sup>此外，有研究讨论历史教科书与史学观念的变迁。<sup>③</sup>

### 3. 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

教科书编写研究也往往会涉及教科书内容，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教科书内容应该是教科书研究的着力点，目前这方面的专题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也出现了一些佳作。袁英光与仲伟民研究了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刘师培运用历史进化论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嬗变、君主制起源及其权力衍化，对先秦社会的礼俗亦颇有研究和创见，但有不少谬误。<sup>④</sup>孙江讨论了清末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认为虽然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还是古代黄帝知识的再生产，近代的黄帝形象与古

- 
- ① 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 ②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与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
- ③ 参阅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麦田出版社，2002；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储著武、汤城《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的探讨》，《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李孝迁《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张越《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舒习龙《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改革与传统编纂优势的发扬》，《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等等。
- ④ 袁英光、仲伟民：《刘师培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

代既有断裂，也有一定的连续性。<sup>①</sup> 该文还对教科书中的黄帝图片进行了讨论。张国荣讨论了民国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叙述，指出其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的教科书中，在1930年代后成为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是出于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sup>②</sup>

清末中国一些教科书改编自日本教科书，因此，比较中日改编与被改编本的内容，有助于较好地认识中国编者的史观以及近代史学的发展特点。区志坚通过比较柳诒徵《历代史略》对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内容的去取，指出《历代史略》构建了一幅满汉种族合为一体、满汉共同统治的中国国族图像。<sup>③</sup> 黄东兰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与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做比较，指出陈庆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和正统观念来重构中国史，考察了日本东洋史转变为中国史的过程。<sup>④</sup>

这些研究对教科书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此外，也有研究者对教科书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讨论。<sup>⑤</sup>

#### 4. 中国历史教科书案

民国时期，发生了几次教科书案，涉及中日关系以及政府查禁教科书，其中，《现代初中本国史》案、《白话本国史》案有较大影响。张耕华在吕思勉研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白话本国史》编写

- 
- ① 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载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
  - ② 张国荣：《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5期。
  - ③ 区志坚：《历史教科书与民族国家形象的营造：柳诒徵〈历代史略〉去取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内容》，载冬青书屋同学会编《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 ④ 黄东兰：《“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载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三联书店，2013。
  - ⑤ 参阅何成刚、李美《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运动”》，《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张国荣《“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生成与传播——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

及《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的经过。<sup>①</sup>王萌考察了《白话本国史》案的经过以及学界就此展开的讨论,认为该案的发生不仅有民族情绪的因素,也有国民党党化政策的原因。<sup>②</sup>李长银讨论了《现代初中本国史》案,认为该案发生的主因是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之间的纷争,还牵涉到国民党当局与学界的争锋、政治内部的争斗以及商业竞争等复杂因素。<sup>③</sup>徐冰讨论了民国时期几起中日教科书冲突,指出日本以教科书冲突为借口,影响国内舆论,推卸战争责任。<sup>④</sup>

### (三) 小结

上述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回顾,肯定还有遗漏之处。目前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第一,在教科书编写上研究较多,在政府教育政策与出版机构措施对教科书编写的影响上成果丰富。第二,某些单种教科书的研究较多,如对夏曾佑、吕思勉等人编写的教科书的讨论较多。第三,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在教科书与新史学的关系讨论中,既注意到教科书采用新的体裁体例的影响,也注意到叙述内容变化的意义;一些概念史、思想史等研究也注意到教科书材料,从中来讨论新观念的生成与变迁;教科书发行问题也为研究者所关注,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书局间发行教科书时的商业竞争等。现有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清

- 
- ① 参阅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② 王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
  - ③ 李长银:《一件关乎民国年间政、学、高三界的重大事件——1929年〈本国史〉教科书案新探》,《历史教学》2014年第5期下半月刊。何成刚也简要讨论了《现代初中本国史》案、《白话本国史》案情况,参阅何成刚、李杰《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风波述论》,《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
  - ④ 徐冰:《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冲突的轨迹》,商务印书馆,2014。另外,彭雷霆的《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也简要述及民初中日教科书冲突的情况。

末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情况，对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教育、社会意识等情况也有所助益，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但是，相对于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地位，目前的研究仍显得不足，主要是对历史教科书一般性介绍多，深入性研究少，缺乏标志性成果。具体表现为：第一，相当多的研究侧重于教科书编写，对教科书内容研究不够，其中一些研究仅是从政府教育政策入手，没有联系到教科书内容，是脱离教科书的教科书研究；第二，一些近代教育史、史学史等研究，使用了一些教科书，这种教科书材料似可为其研究“增色”，但由于缺乏对教科书整体的研究和把握，一些论断往往有失公允；第三，很多研究大多仅限于某一时期的某几种教科书，如对清末教科书研究较多，而对新学制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相对较少。

近年来教科书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变化。首先是新研究力量的增长。一批研究生选择以历史教科书做学位论文的题目，他们的研究在资料使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但他们是教科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将会有力地促进教科书研究。<sup>①</sup> 其次，研究

① 根据中国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主要有施继辉《清末国史教科书中的上古史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王友军《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林旦旦《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探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韩立萍《伪满洲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华晨《民国时期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研究（1920~1936）》，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李波《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王双钰《清末民初（1902~1919）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侯羿君《杨东莼与〈高中本国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蔡诗慧《百年史学经典的价值——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章莹《塑造“国民”：清末民初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国民教育》，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徐佳银《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陈一丁《课程理论与清末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张静静《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文化取向研究》，信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魏艳峰《吕思勉高级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的编纂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等。

资料的整理取得进展。一是网络资源的开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的一个难处是资料收集问题，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些单位正在积极努力开展“文献上网”工程，近代教科书正在数字化。<sup>①</sup>二是教科书书目的整理出版。201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王有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教科书书目9100多种，比1995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多了将近一倍，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sup>②</sup>最后，有学术期刊开辟教科书研究专栏，<sup>③</sup>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学术会议也陆续召开。这都推进了教科书研究。

### 三 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

#### （一）研究思路

本书把中国历史教科书看作一种历史叙述和一整套历史记忆，是根据时代需要制作的一种“文本”或“表述”，从中可以看出政府与编者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民族的共同传统，形成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经由政府与编者共同生产的“历史知识”，会给认同建构带来何种影响。前者研究教科书的编写，讨论教科书知识生产；后者研究教科书的内容，讨论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

这里，对上面提及的几个词语略做说明，它们在本书中经常使用。教科书有多个定义，有的认为教科书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和不同级别学生的认知特征而编写的

① 如CADAL数字图书馆就有不少近代教科书，一些单位也建立了教科书数据库，希望这些单位能够开放网络资源，嘉惠学林。

② 另外，石鸥、吴小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以图说方式，介绍了石鸥收集的近代教科书，该书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直观性强。

③ 如《课程·教材·教法》《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等刊物。

各门学科供教学之用的学生用书。<sup>①</sup> 这概括了教科书的基本特征。但晚清引译的外国教科书不符合这一要求。在晚清，教科书是一个泛称，不仅包括现在所理解的课堂教材，举凡具有启蒙性质，能够供教学参考，以及许多介绍新知的书籍，都被称为“教科书”。<sup>②</sup> 清末民国时期，像“教科书”“课本”“教本”等词同时使用，含义基本相同。因此，本书使用的“教科书”，采其一般意义，即指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教学和学生用书。<sup>③</sup> 但晚清有所不同，凡用于学堂教学的，都属于讨论范围。

“叙述”作为一种叙事表达，使历史意识表现出来，并且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有效的评价，其内在导向即为历史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事件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以一种方式被回忆和再现，通过这种方式，由事件构成的认同得以保持，获得了它特殊的意义。<sup>④</sup> “记忆”如一般“集体记忆”研究者所指出的，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种社会群体都有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和延续。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错误的。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sup>⑤</sup> “民族”不是由血缘、语言、文化等自然衍生或客观形成

- 
- ①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480页。石鸥对教科书做了进一步规定，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要符合三个标准：第一，它们是根据学制，依学年而编写使用的，即有年级之分；第二，它们应该整体上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对教师的教学有具体建议，也考虑了学生的学习使用；第三，它们应该依据教学或课程计划按学科课程分门别类的编写使用，即分科成书。参阅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论》，第2页。
  - ② 张运君：《京师大学堂与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 ③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819页。
  - ④ 参阅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69、157页。
  - ⑤ 参阅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晨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第50~51页。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参阅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第59页。该书指出，“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sup>①</sup>

“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等词都有多个含义。“认同”有三种含义：同一与等同、确认与归属、同意与赞同，其中以确认与归属为最重要。<sup>②</sup>本书是在后两种含义上使用“认同”一词的。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包括对本族群的认同和对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本书使用的“民族认同”一般是指后者。“国家认同”或认为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的国家”的心灵性活动，它包括三个主要层面：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其中制度认同就是所谓政治认同，<sup>③</sup>而族群认同相当于一般而言的民族认同。可见，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几个概念的含义有重叠部分，给这些概念的使用带来了困扰。本书使用的“国家认同”主要是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不包括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定义众说纷纭，往往与“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或把“政治认同”界定为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认同，即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并且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sup>④</sup>这种“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相近。“合法性”指正当性或正统性，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表示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第5页。

② “确认”是指知道自己与他者的不同，肯定自己的个体性；“归属”是指辨识自己与他者的共同特征，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自己的群体性。参阅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8~11页。泰勒认为，认同有三个主要侧面：“首先，现代的内在性，即作为带有内部深度存在的我们自身的感受，以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联结性概念；其次，由现代早期发展而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作为内在道德根源的表现主义本性概念。”参阅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前言第2页。

③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第12、15页。

④ 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

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sup>①</sup> 本书使用的“政治认同”主要是指在国家中执政的政治权力如何获得所需要的认同，主要是指“统治合法性”。上述两个概念有时候互用，都是指维护统治以及对政府的认同。

## （二）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问题为中心，将政府、编者、教科书内容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首先，把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对同一问题的叙述，放在“清末民国”这个时段里，考察其变化过程，从中分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化。其次，把教科书表述与当时的思想和社会相结合，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分析问题，从中讨论政府、编者如何利用历史资源来建构认同及其影响。再次，贯穿本研究始终的方法，是一个“整体”的态度，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看作一个整体，考察一些事件（问题）在清末民国这一时段中的叙述变化；二是对教科书进行全面考察，关注不同教科书中的不同叙述，即既注意到不同教科书中的相同叙述，也注意到不同叙述，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

## （三）结构

本书除导论、结语外，有十五章，分两个部分，前六章为上编，主要以教科书的编写为中心讨论知识生产；后九章为下编，以教科书的内容为中心讨论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第一、二、三章分别讨论清末、民初、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清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国民；学界（编者）希望传播新知识，塑造新

---

①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第4页。“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承认，同时证明权力与服从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旨。参阅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10页。

国民，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民初基本秉持共和教育方针，发扬共和精神成为这一时期教科书编写的指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确立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加强对教科书的管理，教科书编写逐渐模式化。此间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编写。新学制教科书与其前后的教科书都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为认识近代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这三章讨论教科书编写，关注的是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之符合。教科书是遵循政府的教育要求来编写的，但是其中编者的认识也有所体现，这使得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一定的疏离。另外，这部分对教科书文献进行整理，希望达到的目标是：①较为全面地列举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书目；②对清末、民初、新学制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各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特点予以初步总结；③对各时期有较大影响或有特点的单种教科书予以简要介绍。这三章是全书的基础，也希望对后来的研究提供帮助。

教科书编写的讨论离不开编者与书局，他们是教科书编写与发行的实际完成人，直接关系到单种教科书的质量、发行数量与影响。第四章是教科书编者研究。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大多有着地缘与学缘的关系，他们或是职业编辑，或是史学专家，对政府的教育政策或有不同看法，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差别较大，有的带有个人研究与地方特色。第五章讨论书局。教科书是一种商品，要能给书局带来利润，因此，书局很重视教科书的发行，努力将之推销出去，这样教科书才能真正产生影响。清末民国时期，书局具有很高的集中度，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商务印书馆为龙头的出版格局。大书局控制教科书的发行，使得原本具有个人研究与地方特色的知识，成为全国性与一个时代的知识。

教科书是一定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的反映，那么，它与社会意识有何关联？第六章即以孔子叙述为中心略做讨论。清末民国时期，孔子儒学成为思想论争的一个焦点，政府与思想界对孔子的不同态度，在教科书中都有所反映。学生所接收的孔子知识，

只是其中的一种，它一方面是政府与思想界某种认识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又与其他认识不同，造成学生和政府与思想界的疏离。学生间接接收的知识或有差异，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

前六章是本书的上编，研究教科书的编写，讨论的是教科书知识的性质。一般认为，教科书传授的是社会公认的知识，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教科书中的知识只是某些人的知识，通过国民教育这个特殊渠道而被放大，成为所谓的“经典”知识。这部分研究提醒我们，从事教科书研究时，要关注编者与政府对教育认识的异同，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有所合离，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教科书能够完全体现政府的目标与要求。教科书研究要以教科书内容为中心，结合政府、编者、书局、思想界等几个方面来进行。

第七至十五章为本书下编。从第七章开始进入教科书内容研究，选取与民族认同有密切关系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七章以历史分期为中心，讨论近代中国如何利用历史来建构认同。清末民初，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多个标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不相同，中国历史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

今天中国历史研究中各种分期方式的讨论，基本未超出清末民国时期的范围。这里要思考的是：第一，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转变，从“革命史”向“现代化”范式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西方”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第二，中国历史研究能否跳出“普遍历史”的框架，如何在普遍历史中来安置中国历史。

第八、九章讨论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1920年代兴起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给古史建设带来了希望，国家也希望通过考古发现来增强民族信心。第八章讨论近代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考古发现使中国历史书写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架构下，历史教科书对古史传说重新进行了解释。考古学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

心，但也会削弱民族自豪感。

民族史叙述中，民族起源说有重要地位，关系到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第九章考察教科书中关于民族起源的叙述。清末民初教科书中一般坚持西来说，1930年代后转而坚持土著说。导致这一转变的是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但民族情感也起了重要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认同西来说还是土著说，都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而抛弃西来说认同土著说，说明了民族认同中正向认同的重要性。

这两章的研究提醒我们要关注考古发现对建构民族认同的多种影响，希望引起讨论的是，第一，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会产生何种影响；第二，历史知识的反建构特征，即已有的历史知识对新知识建构会有何种制约。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者尤为致意之处。第十章考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在中国民族问题上，清末存在“大民族主义”和“汉族”的认识。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在中国民族起源、民族关系等方面，采用多种叙述方式，建构起一个包融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从清末“中华民族”一词的最初提出，到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思想与思想史的关系。某种思想萌生较早，但在现实中影响不大，不能以之说明当时社会的一般思想状况。在考察知识分子思想与民众观念之间的关系时，需要注意两者的差异。

第七至十章主要讨论民族认同建构的情况。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功能，不唯建构民族认同，还在于确立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之关涉严重影响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化。接下来的五章讨论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这也是民族认同讨论的继续与深入。

前朝历史是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民国如何书写清史，对认识合法性的确立有重要意义。第十一章以民国教科书中清史为

中心，讨论清史与政治认同。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重视清史书写，对清朝都是持批判态度，但二者批判的内容不同，其中差异主要缘于政权性质的变更。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使民族主义诉求与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影响到民族认同的建构。政权更迭深刻影响到民族主义的演化。

第十二章以新文化运动叙述为中心，讨论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民国教科书中有多种叙述。国共两党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态度不同，但都利用这一资源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两党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叙述的取舍，共同促成今天的五四观念的形成，也使得“五四”这一名词本身充满不同内涵。

晚清以来，对中国历史书写产生重大影响的，除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考古发现外，还有帝国主义话语。第十三章讨论帝国主义话语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中，帝国主义话语成为近现代史的一条线索，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提供正当性，有助于确立国民党政府政治认同。不唯如此，整个中国历史编写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其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书写。

清末民国时期发生了数次教科书案，如中日教科书交涉、书局之间诉讼、查禁教科书等，其中历史教科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1929年顾颉刚与王钟麒《现代初中本国史》<sup>①</sup>案和1935年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案。第十四、十五章分别讨论这两个事件。第十四章探讨《现代初中本国史》案，通过围绕该案中的学术著作—教科书、疑古思想—“黄金世界”观念、新文化人物—国民党等学术与政治方面诸关系的考察，认为查禁《现代初中本国史》实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第十五章考察《白话本国史》案。《白话本国史》

<sup>①</sup> 《现代初中本国史》由顾颉刚、王钟麒合编，以下述及该书作者时，为叙述方便，一般只提顾颉刚。其他合编的教科书，也只提及排名第一的作者。特此说明。

因为岳飞叙述而被政府责令删改，同时也被人起诉。对该案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于民族英雄叙述的尺度，体现了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缠结。

以上五章的讨论，希望能够关注民族主义内部因素的影响。第一，要注意民族主义内部结构及其诉求差异：建立何种认同，如何来建立认同，其效果如何；第二，历史的反建构：历史本身是一种叙述和建构，但这种建构的历史本身有种反建构特质，会反过来影响到历史与认同。

#### 四 历史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

在本书的讨论开始之前，需要正视一个时刻存在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即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的一些读者在阅读相关教科书研究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笔者在教科书研究中，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思考。所以说，这个问题时刻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又难以回答，因为缺乏足够多的证据来建立学生受到教科书影响的直接联系。

笔者认为，近代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本书开始所讨论的教科书重要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拟从两个方面对教科书影响问题略做探讨：一是我们的常识；二是现存材料中留下的一些记载。

就常识而言，从我们自身的经验与感受中可以说明教科书影响。经历过中小学学习的人都知道，中小学教科书知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甚至会影响一生。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的途径增多，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历史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确实降低。但在近代中国，教科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这在报刊等新式传媒尚未普及的时代与地区尤为明显。有论者指出，相较于名家著述，晚清教科书是传播、普及民主思想的重要工具：“真正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普及到‘寻常百姓家’者，既不是各种高深的理论著作，也不是众多的报刊，而是

当时编译的各种地理、历史教科书。”<sup>①</sup>“学校教育对于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塑造有重要影响，少年儿童更易于接受意识形态教化。”<sup>②</sup>尽管我们没有或者很少谈及它们给我们的具体影响，但很多人可能不会否认，它们是我们知识观念的重要来源，对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存材料中有一些记载，试举数例。中小学学习和教科书情况，多年后一些人依然记得。周汝昌在回忆其小学学习生活时写道：“课本是采用上海世界书局的一整套教科书（包括教师用的教学本），编印质量很高。我自幼受益于这种课本者实在是并非浅鲜。”<sup>③</sup>胡伯威回忆抗战前的小学读本时满怀赞赏：“战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读本都很精致讲究，用的是厚实的铅画纸，有很精美的彩色插图，和糖果饼干一样吸引人。”<sup>④</sup>冰心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川水土’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sup>⑤</sup>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当年在上海时的读书情况，列举了梅溪学堂使用的几种课本，如《蒙学读本》《华英初阶》《笔算数学》等。<sup>⑥</sup>

历史教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后，历史教育与教科书中突出民族主义教育。乡村小学也积极实行国难教育。一位乡村小学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就多次记载了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地方举行抗日大会的情况。该乡村学校在“设备”“训练”“教

①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14页。

②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10页。

③ 周汝昌：《咸水沽的小学》，载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同心出版社，2012，第23页。

④ 胡伯威：《背起书包上学堂》，载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第174页。

⑤ 冰心：《我和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第312页。

⑥ 胡适：《四十自述》，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53页。



育”“课外作业”等方面都突出抗日救国内容。<sup>①</sup> 范用在回忆小学情况时写道：“老师教我们唱《苏武牧羊》、《满江红》，歌词文绉绉的，不大好懂，但从历史课里我们已经知道苏武和岳飞，他们讲气节，一个做了俘虏不屈服，一个英勇抗敌。这两首歌唱起来，有种悲壮的味道。”<sup>②</sup> 汪曾祺回忆 1930 年代初中情况时说，学校明伦堂的东西两壁挂了 16 条彩印的条幅，都是民族英雄，有《苏武牧羊》《闻鸡起舞》《班超投笔》《木兰从军》等，“为什么要挂这样的画？这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全国上下抗战情绪高涨。我们的国文、历史课都增加了培养民族意识的内容，作文也多出这方面的题目”。<sup>③</sup> 一位老人还清楚地记得 1930 年代历史课内容，认为那时的历史课“颇有时代特点”。<sup>④</sup> 1930~1940 年代贵阳中学历史课堂的情形，几十年后，对一些学生来说还历历在目：“在讲中国史时，老师也善于借古喻今。如讲唐史时他说，唐之所以能兴盛 200 多年，归功于唐太宗，而唐太宗知人善任，豁达大度，对于反对他和给他提意见的人，不是一关二杀。”<sup>⑤</sup> 一位老人回忆 40 多年前的中学历史学习时写道：“历史老师陆人骥，是位地地道道的好教员，教起历史来像讲故事，头头是道，最得学生们的信赖。教我们这一班，他认为

① 如“教育”方面，各门课程都增加反日材料：“（1）常识课等，先生都取抗日救国的材料教授我们；（2）美术课，都画反日图画；（3）音乐课，都教前进、爱国、反日等歌曲；（4）体育课，现在非常注意，每日都有，我们高级还教了简易兵式操。”《小学生周建中的日记》，载吴珮瑛等《民国乡村小学生的日记》，华文出版社，2012，第 32 页。该日记由儿童书局于 1933 年出版。

② 范用：《我爱穆源》，载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第 55 页。

③ 汪曾祺：《我的初中》，载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增订本），同心出版社，2012，第 49~50 页。

④ 赵晓玲：《兼善中学的前尘往事》，载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增订本），第 157 页。文中写道：“如初二年级的历史课内容：近代史就偏重‘自清代之勃兴到清末’历史；现代史偏重‘自辛亥革命至国际现势下之吾国地位’。到初三年级，历史课要讲‘外国史’，上古史自亚非之远古文明至印度与佛教，中古史自朝鲜日本之开化至蒙古之西征，近世史自欧洲之文艺复兴至日本之维新，现代史自世界大战前之国际形势至战后之世界。”

⑤ 殷以柔：《回忆刘方岳老师二三事》，载刘莹等编著《我们的父亲刘方岳教授》，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第 145 页。

最得意。我们个个用功，考历史大部分人都会在九十分以上。不是题目容易，实在是我们知道得太多了。”<sup>①</sup>由此可见，中小学历史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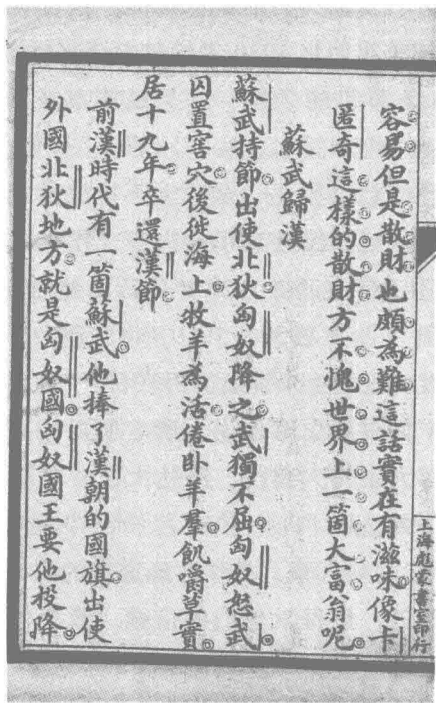


图 0-1 彪蒙书室出版的《中外豪杰史读本》内“苏武归汉”一课

① 程月初：《怀念尚文路》，载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增订本），第 212 页。

② 关于历史教学的效果，民国时期一项对中学生历史知识现状的调查可供参考。1925 年，有人对该年度东南大学招生中 20 则中国史试题答题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该年东南大学入学考试中，是否参加历史科考试，由考生自己决定。当年投考为 884 人，其中参加历史科（即史地公民科）考试者 574 人，占总数的 65%，录取者共 202 人，其中参加历史考试而录取者 167 人，占录取生总数的 84%。参加历史科考试以及最后被录取的人数都占有较大的比例。就学生答题情况来看，中学生对于史事的因果关系颇能明了，对史事轻重亦多能识别，历史常识与经济演进情况也多能了解。东南大学的历史考试有一定难度，学生大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张闻祖：《中学毕业生历史知识之现状》（1925 年），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第 635～641 页。

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影响，考古学家李济的一位朋友曾说，1920年代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讲石器时代，遭到学生们大笑，而十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这一转变很可以代表“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观念的变迁。社会上对于三皇五帝的忆念，虽仍觉得恋恋不舍，然究竟敌不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所代表的观念的实在；石器铜器时代的史实一天一天地增加，现在差不多可以自成一卷历史。至于三皇五帝是否完全为一个神话，自然另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仍旧相信这些古圣人的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内容也变更了许多。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全是考古学发生出来的影响”。<sup>①</sup>从李济这段话可见，考古学知识可能通过小学教科书普及到一般学生中，以至于中学生对石器时代的说法已习以为常。顾颉刚在回忆当年在北京大学听胡适讲述中国哲学史时说，胡适“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打击，吓得一堂中舌拚而不能下”。<sup>②</sup>顾颉刚是说大学听课的情况，没有说到中小学教科书的影响，但顾颉刚大学课堂上的惊异，恰是因为中小学文史的学习与大学讲授的知识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把冯玉祥作为军阀写进中国历史课本“军阀混战”一章里，引起冯玉祥强烈不满。他说：“什么叫‘军阀’？依我说，一是封建主义的；二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三是压迫剥削人民大众的。”冯玉祥说，他一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打内战，要求教育部修改这一写法：“你去找教育部长王世杰问问，为什么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印在历史教科书里教育子孙后代，真是荒唐极了。这些人究竟有没有一点历史知

①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载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5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2~53页。

识？有没有一点分析能力？”<sup>①</sup>从冯玉祥得知其被写进教科书以及要求修改教科书，可见教科书的影响不只限于学生，也有很大的社会效应。

历史课对学生的人生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萨孟武回忆小学读书时写道：“担任历史课的为黄季芳老师，历史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共计四册，内容虽然简单，而比之今日高中，甚至大学的课本，也许还详细一点。黄老师常摘要《通鉴》，写在黑板之上，令学生抄在书上，以补充课本之不足。这不但增加我对历史的知识，且又培养我对历史的兴趣。”<sup>②</sup>焦菊隐回忆小学历史课时说：“历史课着重讲近百年史。历史老师是一位当时的‘维新派’，我们每个学生都能深刻地记得：在他讲到义和团的时候，他咬牙切齿地说：‘李鸿章这个王八蛋（原词一字不错），借来了外国的洋枪队，打了我们中国人。’”<sup>③</sup>著名律师张思之回忆抗战期间中学生活时说道：“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那时正主持东大历史系教务。他没有时间到中学兼课，但能听到他的专题演说。关键是他从东大输送给十八中的历史老师教学得法，点拨学子往往恰到好处。讲日本怎样威逼清政府割让台湾，签《马关条约》，说旧恨直指新仇。讲《尼布楚条约》则着重阐释那是康熙大帝国力强大的结果，从而使初学者茅塞顿开，憬然有悟。我当年有志于研读外交，发源于此。”<sup>④</sup>金庸在回忆60年前的小学学习时指出，有一堂历史课让他铭记终生：“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

① 王倬如：《冯玉祥将军谈军阀问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等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98页。

② 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载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第87~88页。

③ 焦菊隐：《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载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第111页。

④ 张思之：《绵绵师魂谁继？——追忆战时中学生生活片断》，载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增订本），第228页。

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sup>①</sup>

---

<sup>①</sup> 傅国涌：《金庸主编级刊〈喔喔啼〉》，载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第153页。



# 上 编

---





# 第一章

##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我国早在周代就出现了作为教材的典籍，如孔子编订的六经，儿童识字课本《史籀篇》等。唐宋以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成为流传很广的儿童教材。《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龙文鞭影》《史学提要》是重要的儿童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sup>①</sup> 明清时期，历代正史、《通鉴纲目》等都是通用的历史教材。<sup>②</sup> 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首先出现于教会学校。鸦片战争以前，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传教士已用西方教科书教育中国学生。鸦片战争后，开设于中国各地的教会学校，很多是中西教科书并用。<sup>③</sup> 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曾翻译一些外国图书，包括各科教科书，这对新式教科书的引进和普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教会学校编写的教材重在传教，洋务派主导编译的教材重在西方的工艺技术，他

---

① 熊承涂：《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5页。

② 李良玉：《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第163、174页。

③ 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64页。1876年，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决议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编辑教科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见《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开明出版社，1934，第115页。

们“编写的教材都不可能发展成为用于国民普通教育的基础教材”。<sup>①</sup> 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编纂《蒙学课本》，共三编，被视为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始。<sup>②</sup> 1901年，清政府议行新政，实行新式教育，新式教科书大量出现。本书作为中小学教育所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即从这里开始。

教科书编写主要受政府教育政策与编者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至四章将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历史教科书发行、审定与管理等，与其他门类教科书基本一样，相关研究较多，这里不再赘述。本书主要从政府教育方针政策方面来讨论，侧重于教科书的编写精神。讨论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对认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与社会思潮有重要意义，也为本书的研究奠定基础。

## 一 清政府教育宗旨与教科书编写

1901年，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实行新政，把兴办教育视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鼓励兴办学堂。<sup>③</sup> 新式教育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制定学制，统一课程。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以日本教育为参照，引入西方教育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把中国教育推上了近代化轨道。<sup>④</sup> 《奏定学堂章程》确立立学宗旨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务期他

①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第6页。

②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38~139页。

③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谕切实举办京师大学堂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8页。

④ 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第303页。

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sup>①</sup>同年颁布的《学务纲要》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清政府立学宗旨强调，一要“忠孝为本”，注重中国传统经史教学；二要“练其技能”，注意发挥西学对学生成才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清末流行的“中体西用”精神。围绕这个立学宗旨，《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级学堂的办学要求，将培养爱国奋发之心作为中小学堂教育的重要目标。<sup>②</sup>

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显示出新教育首要目标是为清朝统治服务。1906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sup>③</sup>这五项宗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忠君、尊孔，这是对生与国民的政治要求，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统治；二是尚公、尚武、尚实，这里注重振奋国民志气，培养新式国民。清政府将“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通过学校教育向国民灌输忠君意识，“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高地厚之恩，睹时局而生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倡导孔子之道，“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邪。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清政府用“忠君”“尊孔”来抵御清末流行的“排满”、民权等“异端邪说”。“尚公”“尚武”“尚实”体现了时势特征：“忠君、尊孔二义，固尽人皆当知而行之矣；惟中国当列强雄视之时，必造就何等之国民，方足以图存之具，此不可不审者也。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性，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

①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8页。

②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0、315页。

③ 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47页。下一段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该折。

清政府对历史教育极为重视，希望培养忠孝国民，同时振发国民志气。《奏定学堂章程》对各级学堂历史教育要义做了规定，初等小学堂要“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德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政德，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高等小学堂“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堂讲授中国史时，“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中小学堂历史教学都注重对本朝历史的讲述，特别强调本朝“仁政德泽”。清政府意识到历史教育对培养新式国民的意义，强调历史教学“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sup>①</sup>

学制与教育宗旨既定，对教科书编写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清政府成立专门机构，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对教科书编纂进行管理。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书处，专门编写中国经史、诸子、修身、伦理课本，确定编纂宗旨为：“一曰端正学术，不坠畸邪；二曰归于有用，无取泛滥；三曰取酌年限，合于程途；四曰博采群言，标注来历。”<sup>②</sup>1904年，总理学务处成立，其中编书局负责教科书编纂。1905年学部成立后，将学务处编书局改为编译图书局，专门研究编纂各种课本。<sup>③</sup>图书局章程规定：“编纂教科书，无论何种，俱宜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宗旨，以实行国民教育。小学须合于应

①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5、6、7页。

② 《中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载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196页。

③ 《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缺额折》，载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5页。

用之道德、智识、技能；中学须合于完备之普通教育；初级师范教科书与中学略同，而加以教育。各书要使程度相宜，教育进步。”<sup>①</sup>

为了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规范教科书编写，清政府加强对教科书的审定。上述编书处、编译图书局等都是政府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是，政府编译的教科书却受到了朝野内外的批评与指责，<sup>②</sup>原拟部编教科书为国定教科书的设想落空，转而采取审定方式，对民间自编教材进行审定。审定教科书，除一般的学术性与技术性标准外，是否合乎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是个重要标准。<sup>③</sup>清政府“对教科书中所反映的政治、道德、风俗的倾向性是极为关注的，凡是有可能危及封建统治，危及封建道德的内容，它都绝不放过”。<sup>④</sup>彪蒙书室的《绘图中国白话史》被禁，学部认为该书“书名已不可解。而书中所演如‘头子’‘许都’‘弃掉’‘位子’等语，又多渗入土话……贻误后学不浅。应不审定”。<sup>⑤</sup>查禁白话文教科书，可能是因为白话文有利于“传播维新思想，对其统治不利”。<sup>⑥</sup>刘长城的《初等小学历史课本》没有通过审定，学部认为该书“惟自上古至中世第一章设为问答，措辞不伦，说各种族同化亦未引确据”；“叙述本朝无一语及列圣仁政，殊失培养国民忠爱之意”。<sup>⑦</sup>商务印书馆的《世界文明史》因为对儒学有批评而未被列为教科书：“第二编内言，

① 《第一次学部编译图书局备览》，《学部官报》第68期，1908年，“附录”第7页。

② 如有人指出“学部教科书恶劣之声不绝于教育社会”，其“分配之荒谬，程度之参差，大为教育界所诟病”。参阅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之状况》，《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1期，1914年1月。

③ 吴科达：《臣民还是公民——教科书审定制度和思想道德教科书（1902~1949）》，第24页。

④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第175页。

⑤ 《咨各省督抚严禁各学堂用彪蒙书室各教科书文》，《学部官报》第91期，1909年，“审定书目”第1~2页。

⑥ 郑逸梅：《最早编印白话教科书的彪蒙书室》，载《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第83页。

⑦ 《札复广东提学使前送刘长城历史课本无庸审定文》，《学部官报》第95期，1909年，“审定书目”第3页。



教科书成为当务之急。1905年废除科举后，学堂与学生人数大增，一时之间难以有大量的适合新教育的教科书，编译外国教科书成为一种可行的救急办法。在选编上，日本教科书尤其受到重视。历史教科书编写也是如此，最初引译了一些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直接用作中国学堂教科书，然后国人进行改编与自编，经历了一个从引译日本教科书到改编与自编的过程。

清末，最初引译日本教科书，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是希望能够取鉴日本富强的经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激发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也使清政府对日本的强盛有了新的体认，认为这是日本重视教育的结果，“日本学校，虽皆习西文，而实以其本国文及汉文为重。故所授功课，皆译成本国文者。其各种品类、各种各物无不订有本国名目，并不假经西文。且现其出洋之人，皆学业有成之人，否，亦必学有根底之人，故能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sup>①</sup> 这很符合清政府“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效仿日本的办学模式来兴办中国新教育为一时之选，引译日本教科书也是为了从中获得日本富强之方。二是中国缺乏编辑教科书人才，教科书编写上只好取法日本。新式教育在中国是个新事物，大部分国人对此相当陌生。新政之初，“那时中国不但没有一本能用作教材的教科书，甚至连能编写教科书的人也找不到一个。在这个情况下，又只能向日本学习，模仿日本”。<sup>②</sup> 清政府出洋学生总监督夏偕复建议，中国教科书的编纂可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虑始之际，似可取日本现行之教科，师其用意，略为变通，颁而行之，作为底稿，然后视所当增减，随时修改，以至于宜”，“今欲求一至速至多至廉之术，宜即日本东京设一大译书局，翻译东籍”。<sup>③</sup> 1902年，京师大学堂拟按学堂课程

① 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20页。

② 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第171页。

③ 夏偕复：《学校刍言》，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90、191页。

编纂教科书时，即把日本作为仿效对象：“其各门用最简单之本，为蒙学及寻常小学之用；较详之本，为高等小学及中学之用；其自高等及专门者，由教习口授无课本；盖其编纂目的，一仿日本教科书方法。”<sup>①</sup>

清末各科教科书中，由日本人编辑、后译为中文的教材，就占20%左右。<sup>②</sup>中国历史教科书几乎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sup>③</sup>日人编写的中国历史著述，不仅中国通史，一些断代史、专门史都被用作中国学堂教科书。<sup>④</sup>清末引译自日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情况，见表1-1。

表1-1 清末引译自日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译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898	最近支那史	4 <sup>[1]</sup>	河野通之、石村贞一		振东室学社	2卷, 汉文编著, 被审定为“暂用书目”
1899	支那通史	4	那珂通世		东文学社	4卷, 汉文编著, 另有中央堂1888年版, 4册
1899	东洋史要	1	桑原鹭藏	樊炳清	东文学社	4卷, 另有周同愈1904年、金为1908年等译本
1901	清史揽要	—	增田贡		上海书局	汉文编著
1901	支那文明史论	1	中西牛郎	普通学书室	普通学书室	
1902	支那史要	1	市村瓚次郎	陈毅	广智书局	6卷, 由《支那史》缩写而成

①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117~118页。

② 徐冰：《中国近代教科书与日本》，《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

③ 汪向荣：《日本教习》，第171页。

④ 参阅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351~354页。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译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2	中国文明小史	1	田口卯吉	刘陶	广智书局	原名《支那开化小史》
1902	东洋史要	—	小川银次郎	屠长春	普通学书室	
1902	中国历史问答	1	富山房	邵振东	商务印书馆	《普通学生问答全书》之一
1902	东洋史教科书 <sup>[2]</sup>	—	日本开成馆	王琴希	明德译书局	仅见初编
—	东亚史要	—	日本开成馆	陆鏊	直隶学校司编译处	
1902	普通历代史 <sup>[3]</sup>	1		世界公学	广益书局	
1902	支那全史	—	藤田久道		上海书局	
1902 <sup>[4]</sup>	东洋历史	2	幸田成友	东华译书社	会文学社	普通百科全书之70种
1903	支那文明史	—		范迪吉	会文学社	
1903 <sup>[5]</sup>	支那史教科书	2	富山房	唐秋渠	东亚译书会	小学用
1903	支那史	6	市村瓚次郎、 泷川龟太郎	桥本海关	教育世界社	8卷,大事表1卷
1903	东邦近世史	—	田中 萃一郎	湖北学报馆	湖北学报馆	
1903	支那近三百年史	1	三岛雄太郎		群谊译社	封面标注“一名清国史”,汉文编著
1903	中国历史教科书	—	日本成城学校		商务印书馆	7卷
1903	中国史要	—	普通教育研究会	罗福成		
1903	支那文明史 <sup>[6]</sup>	1	白河次郎、 国府种德	上海竞化书局	上海竞化书局	
1904	东洋通史 <sup>[7]</sup>	1	久保天随	蔡汇东	昌明公司	6卷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译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5	东西洋历史 教科书	1		吴葆诚	上海科学 书局	学务大臣鉴定

注：[1] 这里的“册数”只是个参考，不同版本册数可能不同。下表同。

[2] 明德译书局 1902 年出版的《新编东洋史教科书》，由日本开成馆著，长洲王季点译，见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下册，第 268 页。该书与《东洋史教科书》或为同一种书。

[3] 此书疑为译著。实体书 1 册，叙事至清末“两宫回銮”。该书未见版权页，第 2 页上写“壬寅仲春二月世界公学译印”，封面书名《普通历史》下有“遁天署”字样。

[4] 该书未见版权页，书前附“启示”，落款为“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三日”，是为 1902 年。李孝迁认为该书初版于 1903 年，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 353 页。

[5] 或认为该书初版于 1883 年，参阅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 218 页。

[6] 该书又以《帝国文明史》为名，由东华译书社编译，上海会文学社出版，封面标注“普通百科全书之六十七”。

[7] 翻译本略有改动，译者在“凡例”中指出：“是书原本，如称中国曰‘支那’、日本为‘我国’等类，著者为日本人，固宜尔也。今译以饷我中国故，故书中称谓略有改窜。”

资料来源：各教科书文本；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附录一、二；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民国图书总目录·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下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清末西学出版者概览”；等等。

引译自日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等有较大影响。《支那通史》由那珂通世用汉文编著。那珂通世（1851～1908）毕业于庆应义塾，受福泽谕吉的影响较大，强调中国文化的停滞性，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创立者。<sup>①</sup> 1886 年后，那珂通世致力于《支那通史》的撰述，1888 年该书刊行。《支那通史》共 4 卷，叙事起自上古，止于五代辽宋，分为总论、上世史、中世史等几部分，内容上改变了以前日本所著中国史仅限于军事和政治事件的简单概括，不仅解释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还特别介绍了文物制度；编写上采用新的体例和方法，打破中国传统史书体

<sup>①</sup>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 1 卷，第 224～225 页。

例，采用西方“通史”体例，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每卷之后附有图表。该书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由日本学者撰写的新型通史，开创了一种新的“通史体”，后来日本和中国的通史著述，无不受其影响。<sup>①</sup>《支那通史》在日本也用作学校的教科书，于1899年被引介到中国，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重刻出版，作为学堂教科书。学部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此书汰冗存真”，“历朝大事尚无遗漏”，“取材尚丰润，而无断烂朝报之讥”。<sup>②</sup>《支那通史》在中国流传广泛。



图 1-2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中央堂，1888

《东洋史要》由桑原鹭藏编著。桑原鹭藏（1871～1931）曾受教于那珂通世，于1898年完成2卷本《中等东洋史》，被日本学校用作教科书，确立了日本东洋史教育的基础。樊炳清将之翻译成汉文，改名《东洋史要》，1899年由东文学社出版。《东洋史要》分6卷，叙事起自上古，终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分为总论、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与近世期几个部分，采用了新式历史分期，内附多幅插图。该书并非专述中国史，而是较为注重亚洲诸国的关系，实

①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卷，第191～192页。

② 《书目提要》，《学部官报》第57期，1908年，“审定书目”第5页。

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史。梁启超认为此书为“现行东洋史之最良者”，“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校教科用，条理颇整”。<sup>①</sup>《东洋史要》“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sup>②</sup>据李孝迁的研究，《东洋史要》在中国有多个版本：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校刊的《东洋史要》，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印的《新刻中国历史》，1904年文明书局周同愈译《中等东洋史教科书》，1904年东京泰东同文局用汉文出版的《东亚史课本》，1908年商务印书馆金为重译的《东洋史要》等。1903年陈庆年又对《东洋史要》进行改编，名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并出版。<sup>③</sup>《东洋史要》对中国自编教科书以及中国新史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图 1-3 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教科书》，  
周同愈译，文明书局，1904

- ① 梁启超：《东籍月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4，中华书局，1989，第98页。  
②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③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5页。

《支那史要》由市村瓚次郎编著。市村瓚次郎（1864～1947）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成立东洋学会，出版《东洋学会杂志》，勾勒了东洋史的基本框架，对日本现代东洋史的确立有重要贡献。1888年，市村与泷川龟太郎开始合作编述《支那史》，到1892年完成，共6卷，主要叙述历史事件，间及社会制度、经济、风俗文化，该书阐发有限，但适合用作学校教材。<sup>①</sup>次年，市村又将《支那史》缩写为2卷本的《支那史要》，用作中学教科书。《支那史要》共6卷，分为总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今代史六部分，叙事起自上古，终于清代台湾与伊犁纷争，书前附有“历代一览表”“历代帝系表”“历代帝都表”。在当时，该书可以和那珂通世的著作相媲美，颇适合作为教材。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被中国学堂广泛采用。

### 三 爱国教育：中国自编教科书之兴起

编译日本教科书暂时缓解了中国新办学堂的教科书需求，也把近代新观念输入到了中国，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新史学与新教育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其风行及其流弊，引起了国人的担忧。这种情况，促进了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兴起。

首先，许多质量低劣的日译图书充斥市场。编译日本教科书较为便捷，有利可图，许多地方编译机构和民间社团也都组织翻印日本学校教科书，“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译较他国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sup>②</sup>许多稍通日文的人也从事日文教科书的翻译，其中不合规范之处颇多：“上海小书贾所译东文各书，并不注明著

<sup>①</sup>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卷，第366页。

<sup>②</sup> 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载王韬、顾燮光等《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399页。

者、译者姓名，多有摘取原书一段与一己私意相合者译出流布，并不顾本书宗旨。”<sup>①</sup>如会文学社的范迪吉，一个人就译了100种，从《初等算术新书》《肥科学》《商业经济学》到文史类，什么都译，不加筛选，质量不高。<sup>②</sup>

其次，从民族感情方面来说，中国采用外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让人难以接受。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与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为中国很多学堂使用。对此，一些中国学人感到羞愧。蔡汇东在翻译《东洋通史》时感觉到莫大耻辱：“吾译《东洋通史》，吾耻耻者，耻吾中国无完全之历史也。左、迂而外，史书踵出，然大都为一家一人之意义，即尚有可称者，而或则偏于事实，或则偏于制度，总二者而一具如炬眼光、察当日情事以成一完全中国历史者，则吾遍求之而未得。求完全之中国历史未得之中国，而乃得之扶桑三岛。天下之耻，孰大于是？”<sup>③</sup>罗振玉在《支那通史》序中明说：“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故序而重刊之，世之君子以览观焉。”<sup>④</sup>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记录，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居然要假手外人，似有不妥之处。

最后，从教科书独特功能来看，应该使用自编教科书。一些人

- 
- ① 《奏定学务纲要》，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9页。
  - ② 《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62页。关于清末日文书籍翻译情况，包天笑对启秀编译局的回忆可供参考。启秀编译局翻译日文书籍，老板叶浩吾“的译文，只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装文法，用笔勾了过来，添注了中国几个虚字眼儿，就算数了。有时一句句子长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组织，简直拖沓地读不下去”。“帮他译东文的，都是他的学生，有些日文未通，连国文也未通。”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242、243页。
  - ③ 久保天随：《东洋通史》第1卷，蔡汇东译，昌明公司，1904，“序”第1~2页。
  - ④ 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第1册，东文学社，1899，“重刻《支那通史》序”第3页。

从教科书独具的教化功能考虑，劝诫中国学堂“勿沿用洋人课本”，因为它们“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sup>①</sup> 东新译社认为，编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sup>②</sup> 文明书局也持同样的看法：“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国史料为彼学校外国历史之科，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称谓辞气之间，客观让作主位，令国民遂不能兴其历史之观念，可忧孰甚焉。”<sup>③</sup> 梁启超认为，市村的《支那史》，“若我国学校据为教科书，则有所不可。盖日人以此为外国史之一科，则此简略似此已足”。梁启超的批评主要是着眼于历史教育在塑造国民方面的特殊作用：“本国入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sup>④</sup> 周同愈翻译《中等东洋史》时指出，此前译本照搬原书，缺乏爱国之心，所以要重译以彰显爱国热情：“凡吾之所为勤劬而不敢忽者，无他故，总以吾爱国之心，激动读者爱国之心。”<sup>⑤</sup> 翻译改编日本教科书，甚至被认为是清末教育“最错误者”：“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其目的也。”<sup>⑥</sup> 国人意识到引译日本教科书的弊端，不利于用历史教育来激励国人，这推动了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的兴起。清末国人自编或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情况，见表 1-2、表 1-3。

①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载 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 384 页。

② 《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东新译社，1903，“附录”。

③ 《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旨》，《大公报》1903 年 10 月 19 日。

④ 梁启超：《东籍月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 4，第 99 页。

⑤ 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卷上，周同愈译著，文明书局，1904，“重译《中等东洋史》自序”。

⑥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第 5 期，1933 年 7 月。

表 1-2 清末国人自编或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小学 (含蒙学) 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1	小学历史读本	1			华洋书局 <sup>[1]</sup>	
1902	中外故事读本	1	张肇桐		文明书局	
1902	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	1	张肇桐		文明书局	
1902	中等本国史教科书	—			会文学社	
1903	东洋文明史	1	萨幼实 <sup>[2]</sup>		支那翻译会社	
1903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2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	蒙学史论课本	—	吴孟坚		北京大学堂官书局	
1903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2	丁宝书		文明书局 <sup>[3]</sup>	后经学部审定,初小用
1904	蒙学东洋历史教科书	—	秦瑞玠		文明书局	
1904	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	2	汪承镛	吴启孙、李广濂	文明书局	由廉泉删订
1904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sup>[4]</sup>	2	陈懋治		文明书局	
1904	小学本国史教科书	2	澄衷学堂		澄衷学堂	作者为杨逊斋、章一山、白振民 <sup>[5]</sup>
1904	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2	姚祖义	夏曾佑、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1904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 <sup>[6]</sup>	4	姚祖义		商务印书馆	高小用
—	中国历史教科书	2			商务印书馆	
1905	东西洋历史教科书 <sup>[7]</sup>	1	吴葆诚		文明书局	
1905	绘图中国白话史 <sup>[8]</sup>	4	戴克敦、钱宗翰		彪蒙书室	
1905	中外豪杰史读本	1			彪蒙书室	小学堂用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5	中外神童史	1			彪蒙书室	目录页写有“绘图蒙学中外神童史读本”
1905	绘图蒙学历史读本	1	曹侃夫		崇实书局 <sup>[9]</sup>	
1905	中国史教科书	2	时中书局		时中书局	高小用
1905 <sup>[10]</sup>	初等小学本国历史教科书	3			会文学社	
1905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	张家模		会文学社	
1905	新体高等小学中国历史	2			时中书局	
1905	最新东洋历史教科书	2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高小用
1906	普通新历史	1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1906	初等小学国史第一读本	—	苏民		开明书店	
1906	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3	会文学社编译所	杜芝庭、蔡元培	会文学社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
1906	绘图蒙学中国历史实在易	4	唐懋哉、戴克敦、和墨卿、钱宗翰		彪蒙书室	初小用,白话讲义蒙学丛书,此书即《绘图中国白话史》
1906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	萧友梅		广州蒙学书局	
1906	初等小学本国历史教科书	—	单毓元		震东书局	
1906	高等小学本国历史教科书	—	单毓元		震东书局	
1906	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新教科书	3	李培鐸		乐群书局	
1906	最新小学女子历史教科书	3	张倬云、李恢伯		乐群图书编译局	女子历史教科书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6	简易历史课本	1	富光年		商务印书馆	简易课本 <sup>[11]</sup>
1906	新定中国历史	—	褚传浩		通社久记书局	
1906	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2	周世棠	庄景仲	新学会社	初等小学简明历史教科书
1907	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	张家模		会文堂政记	
1907	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2	王国贞		南洋官书局	
1907	初等小学历史教科书	3	钱宗翰	彪蒙编译所	彪蒙书室	
1907	高等小学历史课本	4	赵钺铎	沈恩孚、华国铨、汤振常	中国图书公司	
1907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2	张崇仁		南洋官书局	
1908	新体中国历史	—	西农氏	张松坚	均益图书公司	
1908	蒙学历史教科书	—	吴蒙		宁波京兆庆余轩	
1908	国史读本	9	李岳瑞		广智书局	高小用
—	中国历史教科书	3			乐群书局	初小用
1908	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2	蒋维乔	高凤谦、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初小用
1908	小学教科初等历史教科书	—	严鄂		集成图书公司	
1908	历史启蒙	2	胡朝阳		新学会社	
—	中国历史问答	—			商务印书馆	
1910	中国历史读本	2	吴曾祺		商务印书馆	学部审定,初小用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10	中国历史读本	2	吴曾祺		商务印书馆	学部审定,高小用
1910	新体高等小学中国历史	4	国民教育社		国民教育社	

注: [1] 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写为“华阳书局”, 见该书第 218 页。

[2] 此处编者见该书“凡例”说明: “是书经福建侯官萨君幼实编辑, 萨君赴东游后, 又经瑞安郭君奇远、桂林马君君武, 一再润饰昭文, 殷君次伊复加校讎, 始付手民。”“凡例”落款为“支那翻译会社”。

[3] 该书 1902 年由文澜书局出版。

[4] 另有 1908 年南洋公学出版陈懋治编写的同名教科书, 为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课本。

[5] 见该书汤寿潜所作“序”: “日本高等小学即以我国历史列为科, 课本不一, 唯富山房所编较善, 杨逊斋同岁为澄衷学堂订课本, 取而补其缺、汰其口, 馥乎备矣。吾友章一山太史、白振民孝廉更为勾取其翔实, 分为二百三十四课。”另, 汪家熔将作者记为“杨逊斋等人”, 参阅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下册, 第 199 页。

[6] 该书又以《最新高等小学教科书中国史》名字出版。后又出金为校订本。

[7] 该书封面标注为“学务大臣鉴定”字样, 全书分为“东洋之部”与“西洋之部”两部分, “东洋之部”为中国史, 讲述了从远古至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8] 《时报》广告说: “中史浩繁, 编纂非易, 新辑历史课本类皆文义精深, 初学未能领会。是书将五千年大事纯用白话演说, 略通文义者即可读, 此洵小学之佳本也。”见《时报》1905 年 4 月 20 日。

[9] 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录有书名, 标注为“出版者不详”, 见该书第 219 页。此处编者与出版社, 参照汪家熔《清末西学出版者概览》提供的信息。两种书名相同, 且出版时间一致, 或为同一种书。见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下册, 第 200 页。

[10] 该书未见版权页, “编辑大意”落款为“光绪三十一年季冬”, 或为 1905、1906 年出版。

[11] 是书专为寒素子弟不能受完全教育者而编辑的简易课本, 暂归于小学用书之列。“窃思我国地大人众, 学制初定, 风俗未能遽开, 且贫寒子弟过时失学, 或虽当学龄而迫于生计, 不能不兼治他业, 必一一责以完全教育, 毋亦甚难。本馆用特编辑简易课本, 曰修身、曰国文、曰历史、曰地理、曰数学、曰格致、曰实业、曰法律, 凡八种, 为书十册, 日授数点钟, 一年可以毕业。虽所学不及高深, 而于立身之道、应世之用, 或不无少补, 则亦谋教育普及者所不弃。”(见该书“编辑简易课本缘起”)

资料来源: 各教科书文本;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 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民国图书总目录·中小学教材》; 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 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下册, “清末西学出版者概览”; 等等。

表 1-3 清末国人自编或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学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1	普通新历史 <sup>[1]</sup>	2	普通学书室		商务印书馆	
1902	历代史略 <sup>[2]</sup>	8	柳诒徵		江楚书局	中新书局版被学部审定暂用
—	历代史要 <sup>[3]</sup>	3	蒋荫春	直隶学务司	山东官印书局	
1903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	1	支那少年		广智书局	封面标注“中学历史教科书”
1903	皇朝掌故读本	2	窦士鏞		文明书局	
1903	中国历史教科书	1	陈庆年			武昌两湖文高等学堂教科书,后刊行 <sup>[4]</sup>
1903	国史初级教科书	2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1903	中国历史教科书	2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1903	中国历史 <sup>[5]</sup>	1	横阳翼天氏		东新译社	
1904	中国历史课本	—	常培璋、刘乃晟		华新书局	北洋大臣鉴定,卷首有袁世凯“序” <sup>[6]</sup>
1904	精图中等本国历史教科书	—	延通人 <sup>[7]</sup>			
1904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3	夏曾佑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1905	中学本国史教科书	—	夏清贻		开明书店	
1905	中国历史教科书	2	刘师培		国学保存会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5	中国历史教科书	4	国学保存会		国学保存会	
1906	中国史讲义	—	汪焱		南昌普益书局	
1906	最新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	—	祝震		南洋官书局	
1907	新体中国历史 <sup>[8]</sup>	1	吕瑞廷、赵激璧 <sup>[9]</sup>		商务印书馆	
1908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3	章焱		文明书局	
—	女子通用国史教科书	—	章焱		文明书局	
1908	历史教科书本朝史	1	沈恩膏	朱寿朋	中国图书公司	中学及师范用
1908 <sup>[10]</sup>	中国历史讲义	1	徐念慈		宏文馆	
1908	中国历史	—	赣州中学堂			赣州中学堂史学讲义
1909 <sup>[11]</sup>	新编中国历史全书	18	张运礼		商务印书馆	又名《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1909	简明新国史读本	—	许志毅		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另有中国图书公司1909年出版的许志毅《中学适用简明新国史教本》 <sup>[12]</sup>
1909	中国历史教科书	1	陈庆年		商务印书馆	学部审定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09	中国历史教科书	1	汪荣宝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学部审定,又名《本朝史讲义》
1910	中国历史读本	2	吴曾祺		商务印书馆	中学用

注: [1] 是书“以日本中学学科教授法研究会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增删而成”。见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周鹏校订本,民国后又由赵玉森增订出版。

[2] 或认为出版于1903年,参阅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第349页;《历代史略》在1902年编纂完成,1903年由江楚编译局印行,1905年湖广督署重刊发行,同年,中新书局出版发行。1906年,学部钦定此书为中学教科书,参阅孙文阁《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0年第7期。

[3]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4] 参阅黄东兰《“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载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第147~148页。

[5] 该书出版时间标为“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正月元旦印刷,三月二十日发行”。作者用的是孔子纪年。据元旦初研究,出版时间当为公元1903年;作者横阳翼天氏即留日学生曾鲲化。参阅元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95页注释10。

[6]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7] 另见由何琪编纂,由会文学社于1905年出版的同名教科书,参阅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下册,第236页。

[8] 另有吕瑞廷、赵澄壁编纂《新体中国史》,初版时间与出版机构都与该书相同。

[9] 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将作者写为“赵澄壁”,参阅该书第557页。

[10] 该书出版时间标注为“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印刷,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发行”。此处按发行时间。

[11] 该书从1909年秋开始发印,至1911年秋印成。

[12] 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下册,第393页。

资料来源:同表1-2。

新学制推行以后,国人就开始自编教科书。自编教科书受到日本教科书的很大影响。首先,一些教科书直接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中国编写的教科书中,在前言中直接指明改编或参照日本教科书的有:普通

学书室的《普通新历史》改编自《东洋历史》；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元代以前部分改编自《支那通史》，支那少年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改编自《支那史》；萨幼实的《东洋文明史》以日本白河次郎的《支那文明史》和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为蓝本；澄衷学堂的《小学本国史教科书》改编自富山房《支那史教科书》；范迪吉的《支那文明史》与横阳翼天氏的《中国历史》都编译自日本教科书；姚祖义的《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插图参照了日本小川银次郎的《西洋史要》《东洋史要》等书；吕瑞廷、赵激璧的《新中国历史》依据《支那史》改订；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取材自《东洋历史大辞典》《东洋历史》等，沈恩膏的《本朝史》取材之一是桑原鹭藏《东洋史要》；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改编自《东洋史要》；张运礼的《新编中国历史全书》取材自《东洋史要》《支那史要》《支那通史》；等等。有些教科书虽未指明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但受到日本教科书影响是明显的，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sup>①</sup>

其次，很多教科书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形式。一是在编写体裁上，一般采用“篇（卷）一章一节”“篇（卷）一章”“章一节”等新形式，与传统史书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不同。二是采用新的历史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几期，与传统史书只有朝代断限不同。三是在内容安排上，也有两处不同于传统史书：第一，开篇有个“总论”部分，介绍中国地理、民族（人种）、历史分期以及历史的功用等；第二，在每一部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后有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教科书采用章节体、历史分期以及内容分类等编写形式，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一个实践。

但是，中国改编和自编教科书与引译的日本教科书“貌合神离”，即形式上取鉴，精神上分离，在具体问题的叙述上，中国改编

<sup>①</sup>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34~535页。

与自编教科书对日本教科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自己的历史理解，突出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sup>①</sup>

中国改编的历史教科书中，柳诒徵的《历代史略》与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有一定的特色。《历代史略》改编自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1902年由江楚书局出版。《支那通史》的叙事仅至宋代，柳诒徵对此进行了改编，并补上元、明两朝，章节后有按语及评论，叙事清楚简明。第六卷讲述元明历史，书后附有“明及诸国世系”“明帝在位年数及年号”“高丽和日本诸王世系”“元明职官沿革表”“明百官品秩表”“明儒传授图”等图表。作为改编本，《历代史略》与《支那通史》对中国历史认识不同，如《支那通史》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按照“进步”与“停滞”把中国历史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开化的三代与停滞的秦以后，<sup>②</sup> 秦以后的中国是停滞不前的：“秦汉以下，二千余年，历朝政俗，殆皆一样。文化停滞，不复进动，徒反复朝家之废兴而已。其间战乱攘夺，不可胜纪。”<sup>③</sup> 《历代史略》时段划分与《支那通史》相同，但认为中国各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是变化与发展的：“政治之得失，学术之升降，疆域之分合，国势之隆替，代有不同。然统观历代，大抵自唐虞至秦而一变，自汉至五代而一变，宋元以来之风会，与上古划然不可复合。”<sup>④</sup> 《历代史略》“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以后教科书编写多受其影响，“清末以来，编历史教科书的，大抵以此书为蓝本”。<sup>⑤</sup> 《历代史略》堪称其时较完备的历史教科书，<sup>⑥</sup> 《支那

① 刘超：《貌合神离：近代中国新史学与日本史学——以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史林》2014年第5期。

② 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叙述》，载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第137页。

③ 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卷1，第6页。

④ 柳诒徵：《历代史略》卷1，第5页（原书未见版权页）。

⑤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页。

⑥ 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第197~199页。另见孙文权《柳诒徵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第47页。



通史》的流传，实得益于《历代史略》。<sup>①</sup>

《中国历史》由东新译社出版、横阳翼天氏编辑，“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发行，出版时间为公元1903年，封面标注为“普通学教科书第一编”。该书仅见上册，叙事从太古至秦灭六国。《中国历史》特色鲜明，在内容上，一是特重“国民”叙述，反对专制，如讲述商汤“自为牺牲为国民请雨”一事，作者评论道：“国史氏曰：所谓贤君贤主者，何牺牲其身为国民求幸福者也；所谓暴虐无道者，何牺牲其国民以恣己之所欲者也。故今日西洋各国，谓其国王曰‘公奴隶’，而自称‘主人翁’，盖王者之为国民而牺牲，公理上应有之义务也。”<sup>②</sup>二是特重汉族，有强烈的汉族立场，以汉族为中心是该书的“内容重点”之一：“今特发挥种族团体之大义，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以养成种族主义之特质。”<sup>③</sup>三是在正文中间，以“国史氏曰”的形式插入作者评论。《中国历史》在编排上，首附黄帝肖像；正文前附有“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内容重点”和“中国国号变迁纪实”三节。钱玄同初见该书，“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以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sup>④</sup>近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开始关注此书。

国人自编教科书中，文明书局“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系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02年创办的文明书局，是较早编印教科书的出版单位之一。<sup>⑤</sup>文明书局创办之初就开始出版讲述新学的《蒙学读本》，“初显近代新式学堂教育的课程体系框架，开

①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2页。

②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第79页。

③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中国历史内容重点”第2页。

④ 钱玄同：《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载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5页。但钱玄同对此书实持批评态度：“盖俭腹人为屠梁肉，乃以糠秕为佳矣！在今日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特前揭黄帝之像，并有民族主义之语。较之今日鉴定各种课本，实有霄壤之别矣！”此条材料承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博士惠示，在此谨致谢忱。

⑤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第120页。

启了以新学育人的脚步”，出版后曾风行一时。<sup>①</sup>“蒙学教科书”出版多达23种，覆盖多个学科，较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sup>②</sup>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为其中“中国历史”一科，1903年出版，作为初等小学堂用书。<sup>③</sup>该书按朝代顺序，分为中国之古代、秦汉三国时代、晋及南北朝、隋唐时代、五代及宋、元明时代、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我朝与外国交涉时代”八篇，叙述起自太古，止于清末列强强占租借地。该书叙述简洁清楚，附有多幅插图和“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该书或被认为“充满近代史学强烈经世的时代精神”，是史教救国的典范。<sup>④</sup>该书多次再版，1904年出了修正7版，1908年出了修正40版；民国以后继续使用，1913年出到38版。<sup>⑤</sup>

文明书局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章嵒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一定的特色。章嵒编著有数种教科书。《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于1908年出版，共3册。1912年民国成立后，文明书局又出了修订版。该书在内容上，注重政治史、民族史和文明史。政治史尤重帝王世系，同时对各朝代政治特点予以介绍；民族史有着浓厚的传统夷夏观念；文明史占据很大篇幅，丰富具体，是该书一大特点。该书获得了一定的好评，有评论者将之与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并称。在史事方面，“皆以帝名标题，题下加以简要的叙述，同时书顶眉标，亦颇扼要”；“编制及材料，颇为得当，极合教科书之用”。<sup>⑥</sup>《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转型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

① 周利荣：《文明书局考》，《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②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第88~96页。

③ 该书在文明书局1906年第32版版权页中，著作者标注为“丁保书”。本书“丁宝书”与“丁保书”互用。

④ 马执斌：《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江南大学学报》（人社版）2014年第4期。

⑤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220~221页。

⑥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图 1-4 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  
教科书》，19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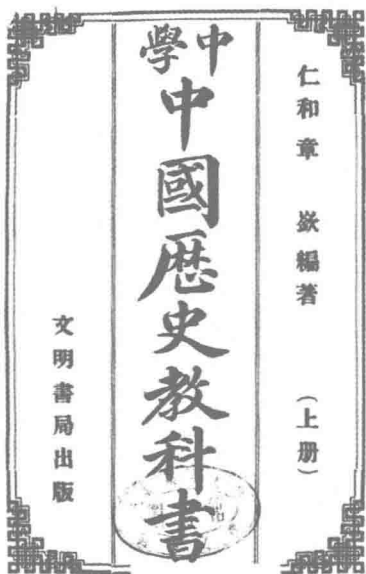


图 1-5 章焱《中学中国历史  
教科书》，1908

范例：一方面具有新史学的特征，另一方面受传统史学影响深厚。

商务印书馆于 1897 年在上海创办，编辑中小学教科图书是其重要业务，从 1903 年直至民国时期一直是教科书编辑发行的龙头。<sup>①</sup> 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最新教科书”系列包括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三类用书，“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科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 1904 年一直发行到 1911 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 80%”。<sup>②</sup> “中国历史”方面，中学由夏曾佑编写，名为《最新中学

① 据统计，从 1897 年至 1949 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中小学教材 952 种，占商务印书馆总出版数的 6.29%，占这一时期全国出版 4055 种中小学教材总数的 23.48%。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 168、174 页。

② 商务印书馆：《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和编辑大意》，载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 2 卷，第 533 页。

教科书中国历史》，分3册于1904年至1906年出版，叙述了从远古到隋朝的历史。该书采取进化论观点，采用章节体编写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如把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把开辟至周初称为“传疑时期”。梁启超为此称赞夏曾佑“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sup>①</sup>该书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sup>②</sup>该书被视为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作，在近代史学史中常被提及。



图 1-6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19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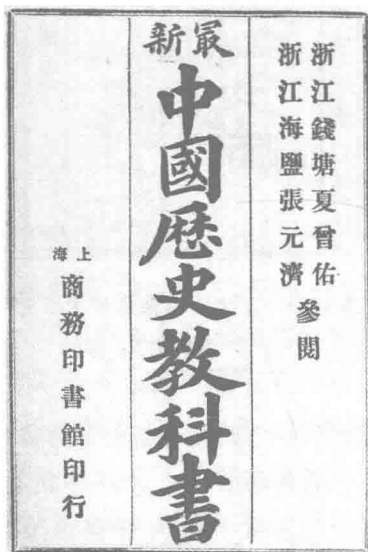


图 1-7 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

小学类由姚祖义编写，分为两种：一是《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用，共4册；二是《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①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149页。

②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1949年10月。

共2册。这两种教科书讲述了从“五帝”到清朝的历史，都是按“课”来编写，以人物或事件为中心，每课讲述一个人物或事件。高小教科书比初小内容丰富。这两种教科书出版后都多次再版，《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出版后，当年12月就出到了第6版，1908年出到第15版（上册），1910年出到第20版（下册）；《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出版后，1906年由金为进行修订，1910年出到第22版。<sup>①</sup>

#### 四 教科书与清政府教育目标之分合

清政府教育宗旨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旨：“忠君”“尊孔”以维护清朝统治，“尚公”“尚武”“尚实”以振发国民志气。这两个教育目标在历史教科书编写实践中有不同的体现：振发国民志气这种目标被贯穿到教科书内容之中，而编者对忠君尊孔的目标则有不同的看法。

以历史教育来“激动爱国精神”是很多书局编写教科书的自觉要求。文明书局编写《蒙学读本》时，即以激发爱国之心作为编辑要旨，如以地理知识激发学生“宝爱土地之思，知我国与全球相关之形势，而后有强国保种之志气”；汇录历史上豪杰故事，使学生“共有爱国敌忾气象，以成完全之国民”。<sup>②</sup> 商务印书馆把培养爱国精神作为编辑教科书的要求：“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凡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议院、地方自治、军情、教育之要政，无不详言，其表彰国粹，纠正陋俗，亦再三致意。至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尤言之至详，以期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sup>③</sup> 东新译社谈到其开办缘由及其特质时说

①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222页。

② 子冶辑注《〈蒙学读本全书〉卷端》，《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

③ 《商务印书馆根据“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教育宗旨编辑出版初等小学教科书》，载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187页。

道：“同国家之裔割、愤种族之犬羊，怜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虽算术几何，亦多合爱国爱种之分子焉。”<sup>①</sup>

培养爱国精神是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一个重点。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指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交通愈广，畛域愈廓。今黄种与白种竞争，犹昔汉族与非汉族竞争也。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状吾幼年之气。”<sup>②</sup> 1902年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指出历史教育“要在激发其（学生——引者注）志气，鼓舞其兴会，俾童子成长而后不问执何事业，皆无可愧为国民”。<sup>③</sup> 支那少年认为我国无史，“庞然塞于栋者，非二十四史乎？我谓二十四姓之家乘而已，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sup>④</sup> 所以支那少年将《支那史》改编成《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以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国民的爱国心。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指出，历史教育在于使学生“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sup>⑤</sup> 1908年的《第一简明历史启蒙》的编写要旨为：“于历代兴亡关系最为注意，而近世史则于外交问题，尤为注重，以期养成儿童爱国心。”<sup>⑥</sup>

- ① 《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附录”。
- ② 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年初版，1906年20版，“编辑大意”第1~2页。
- ③ 张肇桐编辑《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2年初版，1903年再版，“例言”第1页。
- ④ 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广智书局，1903年初版，1906年3版，“弁言”。
- ⑤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3年初版，1909年12版，“序”。
- ⑥ 胡朝阳原著，江起鹏、周世棠、江起鲲等订正《第一简明历史启蒙》前编，新学会社，1925年45版增订，“原著例言七则”。

开通民智成为新式国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重要基础，对此，教科书编写尤为致意。《中外故事读本》指出，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情形，才可以成为新式国民：“小学教育，以磨砺学者品性为第一要义。中外互市以来，国民不攘夷即媚外，实两失之。此编取中外故事相类者，两两相比，意在使少年思想豁达，识见明通，晓然于彼我情形。”<sup>①</sup>《普通新历史》认为，近世全球交通之会，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sup>②</sup>《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国与国文明相等，各不能肆膨胀之力，于是均以帝国主义，日经营组织于和平之中，吸彼文明，导我进步，故交通者，无形之竞争、国力消长之枢轮也。是编以交通世界互换知识为主，我祖国数千年以来，能具此手段者，必扬榷陈之，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sup>③</sup>《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为编辑用意，在内容上详述三个方面：“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sup>④</sup>陈庆年认为，“今天史家”，对中国国内事情或许有所了解，但对于世界大势可能懵然无知；对前代历史或许有所了解，但对当代史可能懵然无知，“其与世界之思想无所鉴观，而多所障距。一遇事变，不为狂举以凶于而国，则坐视天下瓦解以去，为括

① 张肇桐编辑《中外故事读本》，文明书局，1902年印行，1905年4版，“例言”第1页。

② 普通学书室编纂《普通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06（原书未见版权页，此处信息为封面标注），“凡例”。

③ 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第2页。

④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2册，“凡例”第1页（原书未见版权页）。

囊之腐儒”。<sup>①</sup> 注重中西交通史与当代史是其《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特色。



图 1-8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1909

发挥国民爱国之心，成为编者编辑教科书的自觉行动，这与清政府振拔国民志气、培养国民爱国之心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编者与政府在借助历史教育激发爱国精神的要求上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对清政府倡导的“忠君”“尊孔”，一些编者则有不同的看法。

倡民权、反专制思想在清末教科书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东新译社的《中国历史》倡导书写民史、高扬民权，认为中国现在落后实由于专制：“自秦汉而降，进化之度极迟，虽谓中国人气质，有是古非今、

<sup>①</sup> 陈庆年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1年5版，“序”第2页。



尊中贼外、保守照例、傲慢自大等病，然其最大之原因，未始非沉沦于专制政治之黑暗时代，而结成此腐败不堪之秽录也。”<sup>①</sup> 澄衷学堂的《小学本国史教科书》指出通过历史教育“力求为五千年流传古国之国民，以争存于地球，则所以开启吾全国青年之独立思想者”。<sup>②</sup> 李岳瑞的《国史读本》注重民史书写，为此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对之进行修订：“一洗旧日神史君史之旧习性，而与吾全国国民以更始，则斯书之出，谓为吾国今日史界之明星可，谓为吾国五千年来民史结晶亦无不可。”<sup>③</sup> 章嵒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因为民权思想突出，被认为是清末民初书写“民史”的代表。有论者认为，章嵒著作特色“犹有足述者，即其历史观念即由其‘君史’的立场进而至于‘民史’的立场，这在我国史学史上，可谓是个大的过渡”。<sup>④</sup> 教科书中隐含的民权思想，显示了其与清政府维护统治的要求有所背离。

对“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清末即有反对声音：“学部所大书特书之兴学宗旨，‘尊王’‘尚孔’四字而已。夫‘尊王’‘尚孔’之主义，若发生于下，则出于公，盖以尊重国权论，王固当尊，以保存国粹论，孔亦宜尚也。若倡之自上，则不过借孔教中尊上损下之说，以隐庇君权、潜夺民权而已。且在欧美诸邦，天赋人权，视同神圣，信教自由，垂诸宪法。乃吾国之司教育权者，其用意正与相反，此精神上之奴隶教育也。……故虽谓吾国所有之学堂，悉为制造奴隶之大工场，未为过也。”<sup>⑤</sup> 教育宗旨由于将忠君放在第一位，显得与新学传入中国的民众启蒙诉求格格不入，因而这种教育被指斥为奴隶教育。同样，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也有不同的看法。培养新式国民既是编者一知识精英的目标，也是政府的期许。晚清

①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第3页。

② 澄衷学堂编辑《小学本国史教科书》卷上，澄衷学堂，1904，汤寿潜“序”。

③ 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第1册，世界书局，1926年1月初版，9月再版，“支序”第3页。

④ 吴景贤：《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法与通史之检视》，《教与学》1935年第4期。

⑤ 《社说——论近日奴隶教育之进化》，《民呼日报》1909年5月28日，载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57~58页。

的“国民”论述在“救亡图存”民族危机中，难以摆脱国家的影响，但是，编者—知识精英与政府对“国民”的理解不同还是相当明晰的：清政府希望养成的“国民”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编者—知识精英则开始注意到个人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各项权利与义务。<sup>①</sup> 与之相关联的是，编者与清政府的国家观念不同。清政府的“国家”更多是指朝廷，爱国首要是维护清朝统治；而编者显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朝廷意识，具有近代的国家意识。这些认识差异，都使得教科书与清政府的教育要求有一定的距离。

## 小 结

本章考察了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希望引起讨论的是清政府教育目标在教科书中的实现情况，也即教科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教育要求。本章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的关系。近代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由引译日本教科书到改编与自编的过程。日本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编写有很大影响，中国教科书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形式，但在内容上突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有着明显的日本立场，为日本近代霸权服务。那珂通世、桑原鹭藏与市村瓚次郎等人的中国历史研究，勾勒了东洋史的基本框架，确立了日本东洋史教育的基础。东洋史研究取向的用意在于：用亚洲而非欧洲的历史来定位日本。它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书写中国的历史，不如说是了解日本在亚洲崛起的根源，并更进一步了解日本有别于中国的独特之处。<sup>②</sup> 东洋史是日本参与世界历史并在其中给自己寻求

<sup>①</sup> 参阅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

<sup>②</sup> 参阅卜正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载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第124页。

“中心”定位的体现，这种“中心”的一个参照就是书写中国历史，通过中国历史来突出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中的地位。“中国在日本知识人的心目中也由以往的文化认同所在变成了文化上的‘他者’”，“日本通过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来确立日本的自我认同”。<sup>①</sup>日本历史教科书这种编写意旨，被中国史家抛弃。

二是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间的关系。从教科书编写实际来看，教科书与清政府的教育目标有所分合：一方面对“忠君”“尊孔”的要求有不同的处理；另一方面对振发国民志气的要求都有反映。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强调培养新式国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趋新改革人士对教育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思考，以及积极推动社会新旧更替的追求与努力。<sup>②</sup>学者们希望运用历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政府在依靠历史教育来“振发爱国志气”这点上基本相同，这使编者与政府对历史知识利用上有着某种一致性。其实，这种一致性更多是形式上的一致。在晚清新思想与新教育的影响下，很多知识观念与传统上的已有了很大不同。

从本章的讨论来看，尽管遵循政府教育政策是教科书编写的基本要求，但是教科书与政府的教育目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教科书中的实现程度还要具体分析。清政府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既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即要维护封建政权、封建道统；又体现了一定的宽松性，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sup>③</sup>一些教科书标榜遵循政府教育宗旨，按照政府要求来编纂，这主要是出于学部审查策略的考量，教科书内容也体现了编者对历史教育功能与塑造何种国民的理解。从教科书内容上看，有些教科书不仅违背了政府的教育期许，与政府教育宗旨要求差距甚大，甚至走向了政府的对立面。

① 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叙述》，载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第151页。

②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314页。

③ 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第231页。

## 第二章

# 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制，宣布实行共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南京政府统治结束，民国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几个时期，政权更迭以及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的颁行，深刻影响到教科书编写。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出现三次高峰，分别是1912年民国成立、1922年新学制颁行和1932年课程标准制订。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学制教科书编写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本章承续第一章，讨论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情况，重点考察新学制教科书的编写。<sup>①</sup>

### 一 养成共和国民：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中华民国是在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培养适合民国的现代国民，养成国民的共和精神，是民国教育的首要目标。

---

<sup>①</sup>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未出版教科书。这里的“民初”包含北京政府时期。

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对清代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制定新学制与颁布教育宗旨。9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sup>①</sup> 新宗旨体现了共和国的新精神，以德、智、体、美四育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中心，这里的“道德”，实即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实行道德教育主要是养成适合民国的共和国民新道德。新教育宗旨突破了“中体西用”旧模式，与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有本质的不同，它以养成共和国民的健全人格为目标，突出了新教育的革命、民主意义。<sup>②</sup>

为配合与保障新教育的实施，在教育宗旨颁行前后，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及其实施细则，对中小学校教育要求做出了规定。“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sup>③</sup> 在中国历史教学方面，小学“本国历史教学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本国历史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中学“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本国历史“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sup>④</sup>

在教科书编写方面，教育部制定一系列政策来予以规范。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教科书使用做出特别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

① 《教育宗旨》，载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篇》上册，日本学术振兴会，1973，第403页。

② 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第13页。

③ 《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63、669页。

④ 《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中学校令实施规则》，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0、11页。

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亦可指出，呈请民政司或教育会通知该书局改正”。<sup>①</sup> 1912年5月教育部颁布《审定教科图书暂行章程》，9月公布《审定教科用书规程》14条，规定了教科书审定办法：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编辑教科用图书，应依据《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sup>②</sup> 教科书编写主要采取审定制。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名称	册数	定价	所编	用学	发行	年月	日	编辑	行人						
小学新编历史教科书	二册	每册一角五分	高等小学校用	四年	三月	再版	北京教育图书馆	康	康						
商业地理	下册	每册一角五分	小学校用	四年	八月初	版	北京教育图书馆	康	康						
实用修身教授书	一至八册	每册六分	国民学校用	四年	十二月初	版	北京教育图书馆	康	康						
实用修身教授书	一至八册	每册六分	国民学校用	四年	十二月初	版	北京教育图书馆	康	康						
新制本國史教本	上册	每册一角四分	小学校用	四年	一月初	版	北京教育图书馆	康	康						
实用历史教授书	一至三册	每册一角五分	高等小学校用	四年	十二月初	版	北京教育图书馆	康	康						
实用历史教科书	一至二册	每册一角四分	高等小学校用	四年	十二月初	版	北京教育图书馆	康	康						

图 2-1 民初《教育公报》所载审定书目

- ①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06页。
- ② 《审定教科用书规程》，载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100页。

民国成立之初，一时难有大批适合民国新教育的教科书，就从前清部分教科书进行改编，以应一时之需。<sup>①</sup> 民初改编自清末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表 2-1。

表 2-1 民初改编自清末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	民初改编出版情况
小学	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 1913 年 4 月第 38 版
	赵钰铎《高等小学历史课本》	沈恩孚校订，名为《中华民国高等小学历史课本》，商务印书馆 1912 年 2 月第 8 版，同时又出改正 8 版，1912 年 4 月出改正 9 版
	蒋维乔《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出订正版，名为《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sup>[1]</sup>
	胡朝阳《历史启蒙》	江起鹏二次订正、周世棠三次订正、江起鲲四次订正，新学会社出版，名为《第一简明历史启蒙》 <sup>[2]</sup>
中学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	金为译述，商务印书馆 1913 年 4 月第 6 版
	普通学书室《普通新历史》	赵玉森增订，名为《增订普通新历史》，商务印书馆 1913 年 11 月初版，1915 年 7 月再版 <sup>[3]</sup>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商务印书馆 1914 年第 10 版
	东新译社《中国历史》	翼天氏译，1912 年 3 月再版，卷端题名《普通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	赵玉森增订，名为《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1912 年后出增订本，1912 年 3 月初版，1921 年出第 16 版
	吴曾祺《中国历史读本》	赵玉森重订，名为《增订中国历史读本》，商务印书馆 1912 年 10 月出第 3 版，1915 年出第 5 版

① 民国成立，旧教科书多不适用。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公布后，“上海出版业遵照修正抽印发行，惟时日短促，存书繁多，势难于旬日之间修订推行内地，而各校又未便停课待书，某书肆商之陆费伯鸿君提议变通办法，呈请教育部通电各省，凡旧教科书有与国体违碍者，准由教员自行修改，一律通用，并由出版业将修正各课另刊校勘记，随处分送，以便教员照改，免致旷误等，因蒙教育部批准，通电各省遵行，同业既因之少受损失，内地所存旧书亦不致违法废弃矣”。《书业商会十年概况》，载汪耀华编著《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第 55-56 页。

续表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	民初改编出版情况
中学	吕瑞廷、赵激璧《新体中国历史》	赵玉森重订,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6月出到第14版,1926年1月出第29版
	沈颐《中国历史讲义》	许国英订补,商务印书馆于1913年初版,1923年出第9版
	章铤《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文明书局1913年修订版,名为《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
	李岳瑞《国史读本》	广智书局1912年出增订版;印水心评注,名为《评注〈国史读本〉》,世界书局1926年出版,新学制中学校用

注:[1]该书订正本初版时间不明,笔者所见书标注为1927年4月第33版。从出版情况估计,可能是民初。

[2]该书增订本初版时间不明,笔者所见书标注为新学会社1908年初版,1925年第45版增订。

[3]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第222~223页。资料来源:各教科书文本;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等等。

民初改编自清末的教科书,在形式上修改了教育部明令删除的尊崇清朝、避讳抬头字样,有的具体内容几乎未做改动。如晚清教科书称清朝为“本朝”,民初则一律改称为“清朝”。这里可举章铤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来看民国成立时历史教科书改编情况(见表2-2)。

表2-2 章铤《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8年版与  
1913年版比较

改动部分	1908年版	1913年修订版
书名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
绪言	五:国名	删除这节
第四编编名	最近世史:始自天命迄于今日	今代史:始自天命迄于今日
第四编第二、三章名称	本朝武功	清之战事

有的改编本与清末旧本不同:一是增加了民国史内容,二是在清朝历史叙述上有所变化,清代以前的部分基本保持原状。这里以



《普通新历史》为例。《普通新历史》1901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成立后，赵玉森予以增订，19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增订本主要变化有：一是原书叙事至戊戌政变，增订本叙事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二是增加了文字狱等批评清朝专制统治的内容，一些事件的评价也有变化。具体见表2-3（加下划线部分为增改之处）。

表2-3 《普通新历史》1906年版与1913年版比较

改动部分	1906年版	1913年增订版
“清朝史” 部分目录	第八章 国初 第一节 武功 第二节 武功下 第三节 制度及学术 第四节 欧人东渐 第九章 嘉道咸同间 第一节 内地诸寇 第二节 鸦片战争 <u>第三节 发匪大乱</u> 第四节 英法同盟军之寇	第八章 清之初叶 第一节 圣祖之经营 第二节 世宗及高宗之经营 第三节 康雍乾三朝之制度及学术 <u>第四节 文狱之繁兴</u> 第五节 欧人东渐 第九章 清之中叶 第一节 内乱迭兴 第二节 鸦片战争 <u>第三节 大乱踵起</u> 第四节 英法同盟军之寇
对太平天国 运动的评价	<u>秀全之乱，自兹十五年，蹂躏跨十六省，所陷之城六百余，所过之处，都市荒凉，所失之财产不可数计，以之失生命者，不下二千万。彼中凶悍者，如李开芳之守冯官屯、林启容之守九江、萧云来之守安庆，皆坚韧不屈，江宁之役，十余万之贼，坚守累年，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古今罕见之巨寇也（第56页）</u>	都计太平军之兴起及其灭亡，前后共十五年，纵横凡十六省，人民所失之生命财产，殆不可数计。就中健将，如李开芳之守冯官屯、林启容之守九江、萧云来之守安庆，皆坚韧不屈，江宁之役，十余万之众，坚守累年，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其毅力实有足惊人者（第140页）

从表2-3可见，民国后增订版主要是在清初部分增加了“文字狱”一节，一些表述有所变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变化很大：1906年版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发匪”加以否定，1913年版去除了清末的贬抑性词语，多了肯定性的评价。这种修改表达了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批判，显示了民国教育政策的影响。

率先推出适合民国教育宗旨教科书的,是1912年1月新成立的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于1911年秋筹设,武昌起义胜利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陆费逵预感到革命能够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就秘密编辑一套新教科书。<sup>①</sup>其后,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等纷纷改编或新编教科书,形成民国初年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一个高潮。此期教科书编写情况,见表2-4、表2-5。

表2-4 民初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小学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12	小学历史教科书	2	开智编译社		开智编译社	
1912	中华民国高等小学历史课本	8	赵钺铎	沈恩孚	中国图书公司	
1912	新式初等历史读本	—			世界书局	
1912	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	4	汪楷、华绍昌		中华书局	
1912	共和国新历史	6	傅运森	高凤谦、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春季始业用,教育部审定
1913	共和国新历史:乙种 <sup>[1]</sup>	6	傅运森	高凤谦、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秋季始业用,教育部审定
—	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	蒋维乔	高凤谦、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	第一简明历史启蒙	—	胡朝阳	江起鹏、周世棠	新学会社	
1913	小学历史	—	李玉林			
1913	高等小学新历史教科书	6	赵钺铎		中国图书公司 <sup>[2]</sup>	秋季始业用
1913	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改订本)	4	汪楷、华绍昌		中华书局	

① 熊尚厚:《陆费逵先生》,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1987,第2页。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13	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	6	潘武、章嵒	范源濂、沈颐	中华书局	春季始业用
1913	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	9	汪楷、章嵒、华绍昌	戴克敦、沈颐、陆费逵	中华书局	
1913	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 <sup>[3]</sup>	9	章嵒、丁锡华	戴克敦、沈颐、陆费逵	中华书局	
1913	高等小学校新历史	6	丁宝书、张景良		文明书局	中华民国新历史
1913	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 <sup>[4]</sup>	9	汪楷		中华书局	
1915	普通新历史	6	赵玉森、傅运森		商务印书馆	教育部审定，秋季始业用
1915	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2	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	
1915	实用历史教科书	6	北京教育图书社	王凤岐、邓庆澜、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	教育部审定
1916	新式历史教科书	6	杨喆、庄启传	沈颐、范源濂、崔景元	中华书局	

注：[1] 与《共和国新历史》内容相同。

[2] 有版本以及不同册数或标注为“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印行。

[3] 与上一种书内容相同，秋季始业用。

[4] 1913年6月、7月、11月各版，1915年8月版及1920年12月版为章嵒、丁锡华编。

资料来源：各教科书文本；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等等。

表 2-5 民初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学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修订)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12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 <sup>[1]</sup>	4	潘武	陆费逵、姚汉章、戴克敦	中华书局	
—	增订中国历史读本	2	吴曾祺	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	清末出版，民国增订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修订)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12	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	2	陈庆年	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	清末出版,民国增订
1912	中国历史	—	东新译社		东新译社	清末出版,民国出版时署“翼天氏译”
1912 <sup>[2]</sup>	订正新体中国历史	1	吕瑞廷、赵激璧	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	清末出版,民国增订
1912	清史 <sup>[3]</sup>	1	华鹏飞		中华书局	
1913	增订普通新历史	—	普通学书室	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	
1913	共和国本国史	2	赵玉森	傅运森、蒋维乔	商务印书馆	教育部审定
1913	中国历史教科书 <sup>[4]</sup>	1	叶维善	沈彭年、沈恩膏	中国图书公司	许国英修改
1913	历史教科书	1	潘武	戴克敦、姚汉章、陆费逵	中华书局	讲习适用,刘法曾参订
1913	中等历史教科书	1	赵懿年		科学会编译部	本国之部
1913	中国历史讲义	1	沈颐		商务印书馆	师范讲习社讲义
1913	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	3	章欽		文明书局	清末出版,民国修订
1914	新制本国史教本 <sup>[5]</sup>	3	钟毓龙	姚汉章、谢无量	中华书局	教育部审定
1914	新制东亚各国史教本	1	李秉钧		中华书局	教育部审定
1914	新历史	4	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	教育部审定,师范学校用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修订)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14	本国历史讲义	—	南洋中学		南洋中学	南洋中学第一年级
1915	实用历史讲义 <sup>[6]</sup>	1	潘武		中华书局	师范讲习所用

注：[1] 第4册“西洋之部”为张相编辑，姚汉章校订。

[2] 笔者所见书版权页写的是1907年初版，1915年5月19版。此处时间根据书前“重订《新体中国历史》序”中的落款“新纪元四月”而定。

[3] 另有2册版本。

[4] 笔者所见的版本是“中华民国二年三月改正五版”，未标注初版时间。此处时间为“改正五版”出版时间。

[5] 1915年该书出师范用版，略有增补。

[6] 与潘武《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相同，见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资料来源：同表2-4。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于1915年1月颁布《特定教育纲要》，提出实行义务教育、申明教育宗旨等，其中专门有“教科书”一节，对教科书的编纂做了规定：“兴学由造就师范编辑教科书入手，应由教育部通行各省，按照各地方所需教员之数分期造就，并由部编辑小学、中学教科书，以确定全国教育之基础。”“至教科书系达教育目的之要具，如与教育宗旨不相呼应，即不能达到目的。应就现在部设之编审处，按照学生迅速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其教科书内容，务与国家教育宗旨相合。其参考各书，为学校所需而坊间所不备者，亦应一并编辑，以为改良教育之准备。”<sup>①</sup> 在《颁定教育要旨》中，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初教育宗旨。<sup>②</sup> 袁世凯的教育宗旨与清末颇为相似，只是以“爱国”替代了“忠君”，这种“复古”教育方

① 袁世凯：《特定教育纲要》，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760页。

② 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770~779页。

针，因袁世凯下台很快结束，《特定教育纲要》和《颁定教育宗旨》于1916年9月被撤销，民国元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又得到认可，<sup>①</sup>如1916年1月公布的《高等小学校令实施细则》对高小历史教学要求，完全照搬1912年12月《小学校教则》。基本上整个北京政府时期仍把民国初年培养健全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国民作为教育主要目标。

突出民国共和宗旨、养成共和国民，是民初教科书编写的首要目标和基本精神。商务印书馆在改编清末教科书时指出，清末教科书多为清朝专制讳言，“民国丕造，数千年专制积秽，一旦粪除。历史为全国国魂，允宜确定指归，不容复有讳饰”，“俾使知君主政体之不宜再现于中华”。<sup>②</sup>在编辑“共和国教科书”时，商务印书馆说明：“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之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本馆即将旧有各书，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编，凡与前清有关者，悉数删除，并于封面特加订正为‘中华民国’字样”，“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sup>③</sup>中华书局在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指出，编写“注重历史上之精神，凡事实之确有可疑者，悉与平反，而予专制之积弊，尤痛斥之不遗余力，务使以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于后生心目之中”；“社会进化之状况，如风俗、礼教、文化、学术，及政体之沿革、民族之兴衰、民权之消长，尤为民国历史上所宜注意”，“于五族共和之

①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19页。

② 陈庆年编纂，赵玉森增订《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1913年9版，“补订序”。民初赵玉森校订的几种教科书都是突出共和宗旨，如校订《新体中国历史》时指出：“近顷国体既新，万端更始，凡从前专制时代之所讳饰，自不得不概予扩清，而我中华民国之所开始经营，尤不得不特加记载。爰将原书参酌校订，缺者补之，谬者正之，期合于共和宗旨，以饬我学界。”吕瑞廷、赵激璧编纂，赵玉森重订《新体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1912年15版，“重订序”。

③ 《商务印书馆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422~423页。

旨，尤三致意”。<sup>①</sup>这种对共和精神的注重在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极为普遍。

从民国成立到新文化运动前这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新成立的中华书局编写的“中华教科书”。“中华教科书”于1912年民国成立推出后，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教科书市场。“中华教科书”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师范课本27种。<sup>②</sup>其中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为汪楷、华绍昌编《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第1、2册讲述中国史，第1册于1912年3月出版，可谓是民国第一种新编历史教科书。该书叙事起自上古，止于1912年民国成立。<sup>③</sup>“大革命与民国成立”一课讲述民国成立以来几个月的历史：“满洲入关，残虐无人道，人民积怨已深。二百余年来，屡谋起事，皆不成。中日战后，国势阽危，加以朝政愈紊，赋敛繁重，于是孙文创兴中会，旋与黄兴联合，从事革命。……武昌起义……不二月，全国响应，光复十有六省，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清帝辞位，孙文辞职，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自是吾国帝王之局终，而共和成立矣。”<sup>④</sup>

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有一定特色。《新制本国史教本》共3册，叙述从远古至民国初年的历史，为中学用，后又成为师范学校教科书。该书绪论指出，今日中国非常贫弱，是由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尚文与崇虚特点所造成，以致数千年内乱与外侮，无代无之，现今“清祚告终，外侮日亟，所望全

① 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1册，中华书局，1912年初版，1913年5版，“编辑大意”第2、3页。

② 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72页。

③ 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记载，该书为4册，第1册初版于1912年1月，第2册与第4册初版于1912年4月，第3册初版于1912年2月（见该书第223页）。笔者所见为两册本，第1册叙述自上古至隋炀帝，第2册叙述从唐朝至中华民国成立。

④ 汪楷、华绍昌编《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第2册，中华书局，1912，第27~28页。

国民意之一致，以安内攘外为心，则一切国是进行自易”。<sup>①</sup> 该书有强烈的反专制、兴民权思想，对专制制度的评判贯穿全书，体现了民初共和教育宗旨。书中附有多幅图表。教育部审查认为该书“条例简明，叙述清晰，于历代兴亡及内治外交诸政均能揭其大纲，详为指示。至诸族之肇兴与进化，搜举靡遗，而与汉族并叙之处，绝无轩轻之语，编辑尤为得体”。<sup>②</sup> 该书多次再版，上册至1928年出到28版，中册至1923年出到20版，下册至1924年出到20版。<sup>③</sup>



图 2-2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1914

- ①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20年16版，第2页。本书使用了《新制本国史教本》数个版本，以下未注明版本信息者，皆为此版本；如使用其他版本，皆特为注明，未特别注明者，皆为第一次出现之版本。其他教科书也是如此。特此说明。
- ② 《批中华书局〈新制本国史教本〉一册照签改正印成后再送复核准作中学教科用书》，《教育公报》1914年第3期，1914年7月，“公牍”第72页。
- ③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559页。



民国成立，商务印书馆适时推出“共和国教科书”，高等小学历史为傅运森编写的《共和国新历史》，于1912年6月出版。傅运森又名傅纬平，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编写校订有多种教科书。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业界龙头地位，傅运森编写的教科书为民国时期发行最多的教科书之一。《共和国新历史》共6册，讲述从远古到民国统一的历史，考虑到小学生的接受程度，分两次讲述：前4册为“史谈体”，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较为简单；第5册和第6册为“开化体”，把中国历史又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一次，增加了文化和制度等内容。第6册有“中华民国之兴”一课，讲述孙中山组建兴中会以谋革命、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等史事，认为民国建立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清之季世，共和民权之说输入，民志一变，卒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政体，而建中华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也。”全书最后强调五族共和：“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故将来发达文化、巩固国家，必赖五族之相亲相保矣”；“虽中华民国已成立，五族已为一家，尚宜实体共和之旨，互相爱护，永固民国万年之基”。<sup>①</sup>该书有“春季始业”和“秋季始业”两种，多次再版，如春季始业的《共和国新历史》，到1922年，第1册、第3册、第5册和第6册分别出到272版、199版、156版和152版；第2册与第4册到1921年，分别出到214版和165版。<sup>②</sup>

<sup>①</sup> 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新历史》第6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1月初版，4月20版，第17~18页。另外。该书第4册“民国统一”一节中，也表达了五族共和之意愿：“我中华民国，本部多汉人，苗、蛮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轻，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1913年1月初版，7月30版，第15页）

<sup>②</sup>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223~2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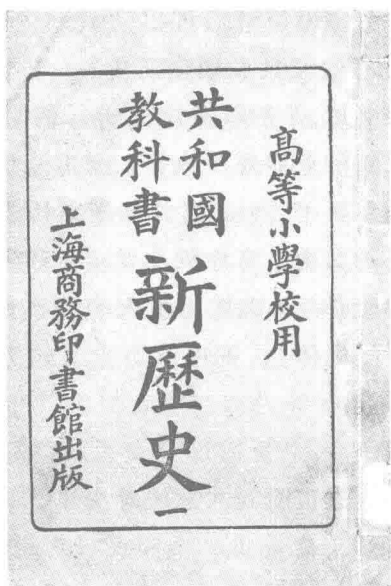


图 2-3 傅运森《共和国新历史》，1912

## 二 1922 年新学制与教科书编写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实行，开始主要借鉴日本的教育经验，从清末的癸卯学制到民初的壬子癸卯学制，日本的影响相当明显。日本经验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创生有很大的意义，推动了中国教育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取鉴日本经验发展而来的中国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这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1922年新学制改变了以往借鉴日本的做法，转以美国学制为主要的蓝本。<sup>①</sup>新学制是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一个成果。<sup>②</sup>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① 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第13页。

② 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第229页。

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几项主张,<sup>①</sup>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个性自由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22年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

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颁布,对民初的壬子癸卯学制进行了改革,制定了新的学校系统案,即新学制,包括“标准”、“学制系统图”和“说明”三部分。新学制提出的“标准”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sup>②</sup>该标准秉承民初共和教育思想,吸收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第一,该标准没有提及民族、国家,不再把民族、国家意识教育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而是注重平民教育,强调发展学生个性。这是新学制教育目的和教育观的重大变化。第二,增加国民经济力、生活教育等内容。新学制表示将教育重心下移,更重视基础的民众的教育,培养各个层次的人才,适应社会和个人的需要。<sup>③</sup>新学制“较好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教育改革的新经验,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表现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觉醒和庄重的使命感”,<sup>④</sup>对中国教育与教科书编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学制对中学阶段的调整,直接影响到中学教科书的编写。就中学建制而言,中国在清末新政时期全面引入西方三段式学校系统,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9~162页。

② 《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008~1009页。

③ 石鸥、吴小鹏:《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228页。

④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151页。

中学制度正式在学校系统中确立并延续下来。清末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都正式设立中学堂，这是我国教育体系有中学之始，中学制度于此确立。<sup>①</sup> 民国初年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为4年。1922年新学制把中学分为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两个阶段，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为6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3年，高级3年。<sup>②</sup> 中国的“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自此开始，中学教科书也就有了“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之分。为适应初中与高中分开的中学教学方式，各书局纷纷新编教科书，形成了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情况，见表2-6、表2-7。

表2-6 新学制时期（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小学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20	新法历史教科书	6	吴研因	庄俞、吕思勉、范祥善、高凤谦	商务印书馆	教育部审定
1921	新法历史自习书	6	吴研因	范祥善	商务印书馆	
1921	新教育历史教科书	6	洪籟、朱文叔	李廷翰、陆费逵、张相、李直	中华书局	
1922	历史读本	—	李法章	秦同培	世界书局	
1922	新法历史教科书	4	傅运森		商务印书馆	新学制小学用，教育部审定
1923	注释白话中国历史教科书	3	冰壶主人	琴石山人	会文堂书局	

① 现代中学观念产生于近代欧洲，“中学”是相对于大学与小学而言的，是指三段式学校制度系统的中间阶段。“中学”一词常有两种含义，一是特指普通中学，二是泛指全体中等学校。一般的“中学”特指普通中学。参阅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2页。

② 《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010页。这是指一般而言的，该法令同时又规定，中学依学科性质，得定为初级4年，高级2年，或初级2年，高级4年。初中和高中修业年限，可依地方情形自定为4年或2年。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23	实验历史教科书	4	卢秉征	郑朝熙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1923	新小学历史课本	4	金兆梓、洪崑	陆费逵、戴克敦、朱文叔、张相	中华书局	1928年大学院审定
1924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	4	傅运森	朱经农、王岫庐	商务印书馆	1928年大学院审定
1924	新撰历史教科书	4	傅运森		商务印书馆	新学制小学用
1924	小学文体历史教科书	4	张鸿英		中华书局	新学制适用
1925	高级历史课本	4	杨喆、朱翊新	范祥善、董文	世界书局	新学制适用,教育部审定
1925 <sup>[1]</sup>	第一简明历史启蒙	2	胡朝阳	江起鹏、周世棠、江起颀	新学会社	初小用

注: [1] 该书是1908年版增订本, 未见民国后的初版时间, 这里是依据版权页“1925年5月45版增订”。该书前编有民国内务部出具的执照, 落款时间为1923年3月。资料来源: 同表2-4。

表2-7 新学制时期(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学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20	新式国史课本	2	汤济沧		国光书局	中学、师范学校用
1922	新著本国史	2	赵玉森	李石曾、陈铎	商务印书馆	
1923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	2	傅运森	胡适、朱经农、王岫庐 <sup>[1]</sup>	商务印书馆	
1923	现代初中本国史	3	顾颉刚、王钟麒	胡适	商务印书馆	
1923	初级本国历史 <sup>[2]</sup>	2	金兆梓	戴克敦、张相	中华书局	新中学教科书, 教育部审定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23	白话本国史	4	吕思勉		商务印书馆	自修适用
1924	新著中国近百年史	3	李泰棻		商务印书馆	中等学校用
1924	新学制高中本国史	1	吕思勉		商务印书馆	1928年大学院审定
1924	中国文化史	2	顾康伯		泰东书局 <sup>[3]</sup>	
1925	新撰初中本国史	1	陆光宇		商务印书馆	后由大学院审定
1925	新撰初中本国史	1	陆光宇		北师大附中	中学适用最新体裁
—	中国最近世史	—	孟世杰			高中用 <sup>[4]</sup>
1926	评注近代史读本	3	印水心	杨燧城等	世界书局	新学制中等学校适用
1926	评注国史读本	12	李岳瑞、 印水心	金式陶等	世界书局	新学制中等学校适用

注：[1] 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认为校订者为王岫庐（即王云五）、朱经农二人（见该书第576页），笔者见到的教科书封面标注为胡适、朱经农、王岫庐三人。

[2] 该书后又以《新中学本国历史》（初中）为名出版，书前加了“引言”，1928年经过大学院审定，上册于1932年出到37版。

[3]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4] 该书曾用作南开中学高中教科书。高彦博说：“民国十五年秋，任教南开中学，高级一年，中国近世史一科，原教本为同学孟威宇所编《中国最近世史》一书。”参阅高彦博编著《中国近百年史纲要》，文化学社1927年初版，1931年5版，“编辑原起代序”。

资料来源：同表2-4。

此期教科书出版事业的繁荣，与一些书局的成立及政治形势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民国时期的五大书局，除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成立外，其他四个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大东书局都于此时成立，参与教科书的编写出版。<sup>①</sup> 此时的政治形势与教科书

<sup>①</sup> 文中的排序以印售中小学教科书数量之多寡而言的；如以开办时间先后，则为商务印书馆（1897）、中华书局（1912）、大东书局（1916）、世界书局（1921）、开明书店（1926）。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7页。

管理规定，也有助于教科书出版。民国成立时，教育部规定教科书“任人编辑”，要合乎共和国宗旨。<sup>①</sup> 1914年，教育部修正审定教科图书规程，取消1912年规程中“任人自行编辑”“各省组织图书审查会”条款，让各校长自行择用教育部审定的图书。<sup>②</sup> 新学制颁行后，教育部于1925年颁行《审定图书规程》，该规程较此前严格。但是，由于军阀混战与政府控制力较弱，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审查是“宽松有序”，教科书编写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态势。<sup>③</sup>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和影响的教科书，如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等，后两种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轰动一时的教科方案，本书后面将予以专门讨论。<sup>④</sup> 这里对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略做介绍。

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有一定特色，反复讲述中国史。吴研因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编著有数种教科书，又在政府教育部门任职，参与一些课程标准的制订。《新法历史教科书》于1920年出版，高小用。该书按课讲述，共6册，前5册为中国史，讲述了从远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时期的中国历史，第6册为世界史。该书按“圆周法排列”，每年一周，由浅入深，分3次来讲述，即把中国历史讲了3遍，偏重有所不同：第1、2册侧重于人物和事件；第3、4册侧重于思想文化；第5册侧重于社会制度。像这种采用不同方式编写而反复讲述的情况在其他小学教科书中也出现过。该书多次再版，

①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06页。

② 《教育部公布修正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载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485页。该规程实际使用了十多年时间。

③ 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250页。

④ 详见第十四、十五章。

第1册至1923年出到57版，第2册至1922年出到47版。<sup>①</sup>

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共2册，为中学用。民初，赵玉森对清末历史教科书进行校订，供民国使用，其后又编著有数种教科书。《新著本国史》于1922年出版，有较为鲜明的特色。一是尤重文化史，以中国文化发展为线索，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太古至周，为文化发育时代；自秦至明代中叶，为文化推衍时代；自明中叶至今，为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的时代。二是具有强烈的反专制思想，倡导民权。如称秦始皇为政治界的“大魔头”，陈胜、刘邦的起义为“平民革命”。三是打破了按照朝代与帝王顺序叙述的方式，以事件为中心进行专题讲述。<sup>②</sup>其后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王钟麒的《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与梁园东的《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等书均采用了这种方式。教育部审查认为，“是书取材列目，斟酌合宜，敷议亦尚平正，可以疏沦学生读史之心胸”。<sup>③</sup>该书1930年出到6版，1932年出国难后1版。

金兆梓的《初级中学历史》有很大影响。金兆梓于1920年代初进入中华书局，后来成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编写有多种教科书，1920年代后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很多是由他编写或校订的。《初级本国历史》于1923年出版，叙事起自远古，止于国语运动时期。该书特点：一是注重文化史，如把秦代的李斯、赵高，汉代的董仲舒都视为文化人物，突出他们对文化的影响；二是

①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225页。

② 如在第一期太古至周的“文化发育时代”，共27课，讲述27个专题，分别为：历史学的旨趣及划分时代的标准、中国人种的起源及其移殖、太古传说及社会生活最初的发明、国家的组织及均产制的创始、文化开始的成绩、洪水前后的治绩、域内文明的互换、征诛的创局、水患及都城的迁徙、美术及工艺的发达、农业的发达及征诛的继起、教育盛兴及治理的完密、刑法的修改、西征的伟绩、民权的发轫、武备的整伤及文字的改良、封建的流弊、内部的国际、大教育家的特起及人伦教的流行、贵族政治的结束及政客的捣乱、学术的自由研究、实业界的巨子、农业上的进步及均产制的废除、暗杀的发端、社会的组织、内部种族的融化、风俗的变迁及工商技术的进步。

③ 《批上海商务印书馆〈新著本国史〉上下二册修正送核准予审定作为中学校历史教科用书》，《教育公报》1922年第11期，“公牍”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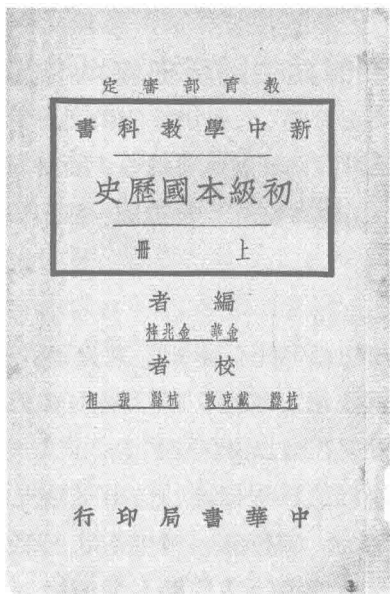


图 2-4 金兆梓《初级本国历史》，1923

有强烈的反专制思想，并以之来选择与品评人物，如叙述魏晋清谈中嵇康、鲍敬言的反君主专制思想，认为是思想史上之“异彩”。该书用白话编写，采用新式标点，出版后深受好评：“将学术文化、社会生活，兼筹并顾；且其叙述，不蔓不支，言简意赅，允合历史问题。总之，此书于当时课本，堪称无比。”<sup>①</sup> 教育部审查认为，“该书具有特识卓裁，不偏重政治史，能留意于社会变迁及思想表现诸方面之建材，其选择既属合宜，而叙述以能简练，应准审定”。<sup>②</sup> 该书多次再版，至1932年出到38版。<sup>③</sup> 1928年，经大学院审定后，又以《新中学本国历史》为名修订出版。

①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② 《批上海中华书局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上册一册应准审定》，《教育公报》第10卷第4期，1923年4月，“公牒”第29页。

③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560页。

### 三 新学制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

新学制教科书是中国教科书编写的一个新阶段，相较于清末和民初，新学制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sup>①</sup>

#### 注重文化史教学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承担了塑造新式国民而建立富强国家的任务，比较注重政治史叙述。新学制注重文化史教学，教科书编写侧重于文化史方面，增加文化史内容。

依据新学制而修订的课程标准，突出文化史教学。初中历史课程纲要规定教学目的为：①研究人类生活状况之变迁，以培养学生适应环境、制御天然的能力。②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以养成学生博爱、互助的精神。③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④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sup>②</sup>高中则教授文化史，指出文化起于人心与自然的环境及社会环境之互感，其动力则出于观念之实现与开展。文化史宜用重要潮流，统率史事。史象有因果可寻者，以因果关系以说明之。高中文化史的教学，“1. 注重研究世界文化之源头，及其同流交感之效果。2. 以说明世界文化之性质，及现代文化问题之主旨。3. 以领会现代为归宿”。<sup>③</sup>

① 关于新学制与教科书编写情况的讨论，参阅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225～248页；朱煜《历史意识：20世纪20年代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分析》，《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王正瀚《简论我国第一部中外史合编课本——〈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4期；张汉林《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等等。

②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4页。

③ 《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6～17页。

受课程标准影响，教科书都比较注重文化史叙述。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即是如此。该书认为，历史学是讲求人群进化的学术，文化是衡量进化程度的主要标准：“地球上不管哪一国的国民，他有了文化，自然就发达，没有文化，自然就堕落；他的文化高一步，自然发达也加进一步，这是逃不了的公例。”编写历史，应该趋重于文化两字；读历史者，也要趋重于文化两个字，才能收得历史学的效果。<sup>①</sup>傅运森编写的教科书都注重文化史，1922年出版的《新法历史教科书》强调“注重中国与世界的文化”。<sup>②</sup>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指出：“旧时历史，差不多都是记述战争和政治的事；本书注重文化”，“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这里有两种道理：一，使学生知现在的人类世界，是怎样成功的；二，文化上应当研究的问题，都有个大概始末，供学生自己探索”。<sup>③</sup>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以社会进化、文化发达、政治变迁以及各民族之接触与文化之交换为纲，其中又以先民精神活动及其生活上之需要为主旨来叙述，“对于朝代之兴亡以及制度、战争等事实，除与先民活动之演进及吾国现势有关系者外，虽本身素有权威之史料，悉略而不收。即所取者亦足以代表时代精神者为限”。“先民精神之活动，莫要于思想之变迁及能力之发展二事。本书于此等处，务推陈其因果关系，使读者可明其由来。”<sup>④</sup>1924年吕思勉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指出：“本书力矫旧时偏重政治方面之弊。”<sup>⑤</sup>

中国文化的演进成为教科书编写的一条主线。重视文化史内容，

①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23年3版，第1编第1~2页。

② 傅运森编纂《新法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23年21版，“编辑大意”。

③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26年90版，“编辑大意”。

④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上册，中华书局，1923年发行，1925年14版，“编辑大意”第1~2页。

⑤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27年4版，“例言”第1页。

是此时期教科书编写的一个突出特点。<sup>①</sup> 注重文化史而淡化政治史，实则反映了这一时期平民教育精神的要求。

### 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与白话文教科书

新学制继承了民初共和国国民的教育精神，突出表现在高倡平民教育，谋个性的发展。平民教育思想于1920年代前后兴起，平民教育运动在多地开展，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平民教育与民主教育密切相连，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是此期教科书取材的一个重点。

1920年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也与新学制精神相契合。该书取材“注重民本的，群众的，进化的，世界的，实在的，扼要的，积重的，实用的，感发的，适时的十大要点”。<sup>②</sup> 所谓民本，即是“最足以发挥民治之精神，或反证专制之弊害者”。<sup>③</sup> 顾颉刚在《现代初中本国史》中指出：“时代精神是历史的主眼，如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的风尚，学术的嬗递，凡足以表现当时的特征而影响及于后世的，本书便取材于此，都为简单的系统的介绍。”<sup>④</sup> 傅运森的《新法历史教科书》指出，“全书完全用语体文（白话文——引者注）”，并且始终注重平民主义。<sup>⑤</sup> 金兆梓《新小学历史课本》指出：“本书对于史材本身的价值和儿童学习的能力，两者谋适当的调剂，所以选材标准，估量

① 注重文化史与近代中国学科意识提升和“专门史”书写受到重视有关。参阅章清《重塑“中国历史”——现代学科意识的提升与“专门史”的书写》（下），《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此点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惠示，在此谨致谢忱。

② 吴研因编纂《新法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0年初版，1923年57版，“编辑大意”。

③ 吴研因、王钟琳编《新法历史教授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0，“新法历史教科书编纂纲要”第2页。

④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24年3版，“编辑大意”第1页。

⑤ 傅运森编纂《新法历史教科书》第1册，“编辑大意”。

他是否适合时代精神和儿童能力而定。”<sup>①</sup>《新学制高级历史课本》中写道：“本书取材，注重现代社会，凡与现代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风俗、习惯等有密切关系者，竭力搜集酌量编入，其无甚关系者概不参加。”<sup>②</sup>

为贯彻平民教育精神，此时期教科书编写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采用白话文。文言文是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1920年以前的教科书主要用文言文编写，但也出现了用白话文编写的教科书。早在新式教科书开始出现之时，一些供儿童使用的童蒙课本与读物，为通俗易懂以使儿童学习方便，就用白话文编写，像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商务印书馆的《简明教科书》、彪蒙书室的白话教材等。<sup>③</sup>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要求文言一致。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1920年，教育部令行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吾国以文言分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因此要求国民学校自本年起，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sup>④</sup>稍后，教育部修正《国民学校令》，规定将“国文”改为“国语”，国民学校一至四年级均学语体文。

新学制实行后，一些书局编辑语体教科书。就中国历史教科书而言，采用白话文的有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傅运森《新法历史教科书》、洪鋈和朱文叔《新教育历史教科书》、杨喆和朱翊新《高级历史课本》、冰壶主人《注释白话中国历史教科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顾颉刚和王钟麒

① 金兆梓、洪鋈编《新小学历史课本》第1册，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编辑大意”第1页。

② 杨喆、朱翊新编辑《新学制高级历史课本》第1册，世界书局，1925年初版，“编辑大意”。

③ 参阅曹琴仙、吴洪成《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文教材》，《课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7期。

④ 《教育部令行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载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158页。

《现代初中本国史》等。这些教科书在编排上逐渐使用横排方式，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其后白话教科书渐渐成为编写主流。“文本的意义不只和内容有关，也和它与读者接触的形式有关。文本印刷形式的改变，从标点断句、分章分节到所使用的语言程度，都会导致意义产生重大变化。”<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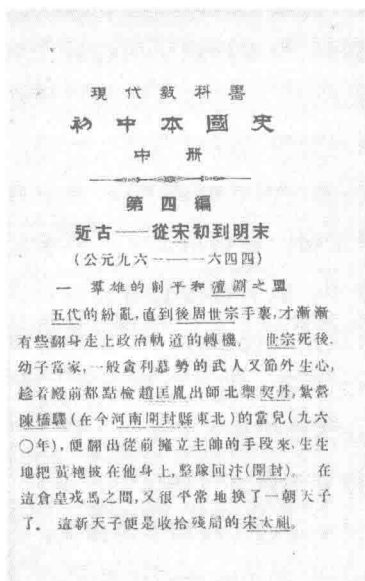


图 2-5 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内页

白话文教科书对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有重要意义，“教科书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折，则直接有利于教育与科技的普及和推广，有利于在教学中贯申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白话文教科书的出现，不仅在民国教育史上是一项重大改革，而且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教育近代化的产物，又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sup>②</sup>

① 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期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2期，2011年6月。

②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488页。

### 培养世界意识与混编教科书

世界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它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特色。<sup>①</sup> 世界主义反对强权主义，把自由与平等的“公理”作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共同基础，认为中西差距不是实力或国力，而是文明程度，即是否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文化与制度。<sup>②</sup> 世界主义影响到教育，使得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具有世界主义色彩。<sup>③</sup>

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是此时期教科书编写的一个特征。一些教科书明确将之作为编写的一个指针。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就强调在取材方面的一个要点是“世界的”，即“正大公平，接轨大同；非武断专私，凌蹙异姓，毁灭弱小者”。<sup>④</sup> 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在论述历史大纲时指出：“第一，就是社会方面，一切民生问题、民治问题、民权问题，这都不可不注意的；第二，就是国家方面，一切政治问题；第三，就是世界方面，一切国际问题、交战问题、文明互换问题，这也都不可不注意的。”该书就是按照这几个方面来编写的。<sup>⑤</sup> 此时再版的《实用历史教科书》也注重中外关系的叙述：“国史以发挥本国文化及民族特性为主，然世界大通，不能不兼及中外交涉。”<sup>⑥</sup>

为了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教科书编写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 
- ①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00，第25页。
- ② 许纪霖：《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39页。
- ③ 朱煜：《民国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的编制及其价值取向》，《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8期。
- ④ 吴研因、王钟琳编《新法历史教授书》第1册，“新法历史教科书编纂纲要”第2页。
- ⑤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第1编第1~2页。
- ⑥ 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实用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1921年29版，“编辑大意”。

是采用混编教科书。新学制课程标准规定历史教学实行中国史与外国史混合教学：“中学历史，向分本国史世界史二部。今为使学生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状况，打破关于朝代国界的狭隘观念起见，初中历史编制宜取混合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宜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sup>①</sup>采用中外历史混合教学方式，其目的就是明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1923年课程标准对混编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做出了具体规定。为适应这种要求，出现了一些中外历史混合编写的教科书。

混编教科书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册编写，合在一起供学校历史教学使用。这实际上把原本作为两套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教科书合编为一套教科书。这种混编教科书内容上相对较为简略，小学历史教科书多采取这种形式，如前几册讲述中国史，后几册讲述世界史，其中以中国史为重点。二是打乱国别限制，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放在一起编写，如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前一种情况持续时间很久，而后一种主要出现在新学制时期，

---

① 关于混编教科书的内容安排，这里以汉唐时期的内容为例略做介绍。初中历史内容为：两汉内政与外交，中古亚洲西部诸国之情形，罗马之兴亡，三国六朝时代，中古欧洲，基督教之西渐与佛教之东渐，回教之兴，唐宋内治，日本与中国之关系（《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4页）。高中文化史内容为：秦汉时代之社会，佛教之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之中国美术，汉代之教育与学术，希腊文化与罗马之关系，罗马统一意大利、宪政之发展，罗马帝国之建设，罗马之中央行政及地方行政，罗马之都市及农村社会，罗马之建筑及其他美术，罗马之哲学及民族道德之演化，罗马希腊时代之耶教及教会组织，希腊罗马文化及耶教融成近世西洋文化之基础，汉魏六朝时代中国与外族之关系，汉魏六朝时代中国社会之变化，佛教与中国思想及美术之关系，中世胡族日耳曼族亚[阿]拉伯人迁徙之概况，日耳曼族之民族精神，日耳曼族之迁徙大势及其影响，比散丁文化，回教势力之发展及撒拉逊文化，中古欧洲封建社会，中古教会之专制，道院之知识生活及经济生活，中古之都市生活及工商业，中古之建筑及其他美术，中古之大学，隋唐间之经济状况，隋唐时代日本之中国化，唐代之政治及法律，唐代之宗教，唐代之学术及教育（《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8页）。



可谓混编教科书的典型，也是本节讨论的重点。

这一时期，中外历史混合编写的教科书主要有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指出：“本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sup>①</sup>《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共2册，计9编，分别为“引论”“历史以前的状况”“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人类信仰的变迁”“人类组织的变迁”“人类思想的变迁”“人群的斗争和联合”“中华民国”“结论”，在内容上以社会史、文化史为主。如第五编“人群的组织”，讲述各国的政治制度与组织形式，分三章：第一章“概论”，分为“婚姻的变迁”“人群进步的原因”两节；第二章“家族和部落”，分为“婚姻的变迁”“族制的发达”“部落的变迁”三节；第三章“国家和政体”，分为“国家观念的发生”“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立宪的国家”“共和的国家”四节，中国历史夹杂在外国史中间叙述。该书渗透着世界主义精神，多次宣扬了国际互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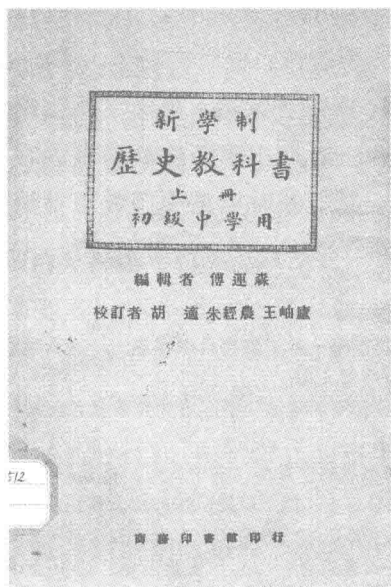


图 2-6 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1923

①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上册，“编辑大意”。

合作的思想，展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sup>①</sup>

历史教科书的混合编写，有利于中外历史比较，使学生对中外情况有较为直接的认识，但是，混编教科书有其不足：一是在内容上，中国史的内容不够突出，中国史夹杂在外国史中，显得支离，不够系统；二是在实际教学中，“此种编法，在初中不甚适当。盖一课西史，一课中史，轮流教授，易使学生头脑昏乱，记忆模糊，且先教西史，后及中史，喧宾夺主，更失本国史的主要目的”。<sup>②</sup>内容上中外历史混合的教科书可能存在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这种编写方式后来很少使用。<sup>③</sup>

## 小 结

民初的教科书编写，可以新学制颁行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2年，1922年新学制颁行到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其间尽管有袁世凯复古教育，但时间短暂，影响有限，从整体上看，民初确立的共和国民教育宗旨基本延续下来，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时期。本章讨论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重点讨论了新学制时期教科书。新学制时期是中国教科书编写的新阶段，教科书编写呈现出一种新气象。

① 王正瀚：《简论我国第一部中外史合编课本——〈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4期。

②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与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③ 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翊新《初中历史》也采用混编形式。《初中历史》共6册，前4册为混合历史，后2册为中国历史。在前4册混合历史中，也讲述了部分中国历史，但主要还是以外国历史为主。如该书第1册主要内容为：1. 史学的新建设。（1）什么是历史；（2）历史的历史；（3）史学研究法。2. 先民活动迹象。（4）地球及其生物之进化；（5）石史的记载；（6）史前时期的先民；（7）民族的形成。3. 古文明之苗圃。（8）历史的开幕；（9）埃及；（10）巴比伦；（11）印度；（12）中国。4. 地中海与西亚诸民族的蜕变。（13）希腊二盟主；（14）波斯；（15）波斯战争与亚历山大帝国；（16）希腊文化。从第1册目录中可见，混合编写的教科书把中外历史编写在一起，重点还是讲述外国史。

如果以清末新政时期作为中国国民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编写开端的话，那么，历经清末、民初，到新学制时期，中国教科书编写才真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成立后，尽管教育宗旨和要求与清末不同，但就教科书编者与使用的教科书情况来看，与清末还有着种种的联系。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开始摆脱清末以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理念渗透到新学制时期的教育实践中，使得这一时期教科书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第一，注重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培养学生的个性，而不是维护统治；第二，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淡化民族国家意识；第三，注重社会文化史，淡化政治史。其中，又以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为核心，为此采用了白话文、中外历史混合编写等方式，使得这一时期教科书具有民主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色彩这些特点使其在中国教科书史和中国教育史上都有特殊的地位。

1930年代，作为教科书编者也是课程标准制订者之一的吴研因，在回忆清末以来小学教科书编写情况时说：“最初的小学教科书，很注重修身忠君爱国等材料。民国以后，把忠君崇满和不合民国宗旨的材料革去，加入了关于民主政治的自由思想。民四、五因为袁世凯要做皇帝，各书店也都有所谓《实用教科书》等出版，避去了‘民国’‘共和’等字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国内军阀屡次内战的恐怖，国内外都倡导和平。我国民十以后的小学教科书，例如《新学制》、《新教育》、《新教材》等，就几乎成了无目的、无宗旨的世界通用读本，很缺少民族精神和国家思想的表现，这确是当时教科书的最大的缺点！民国十六年以后，革命空气弥漫了全国，小学教科书如商务的《新时代》、中华的《新中华》、世界的《新标准》、开明的《开明》、大东的《新生活》等，叫嚣的气焰低了些，目的也逐渐正确了，各科教科书大概都能依照部定的各科课程标准编辑。”<sup>①</sup> 在吴研因看来，1921~1927年的教科书“缺少民族精神和

<sup>①</sup> 吴研因：《清末以来小学教科书概观》，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第53页。

国家思想”，这可谓道出了新学制教科书的一个特点；而“无目的、无宗旨”显然不符合教科书的实际情况。吴氏所批评的新学制教科书的缺点，恰是当年其编写教科书时所追求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由于政府的管理相对疏松，教科书更多地体现了编者对历史教育的理解和对个人、国家关系的思考。

## 第三章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 教科书之编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完成了国家统一。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加紧侵略中国。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政府时期（1945年前），正是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抵御日本侵略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时期。南京政府一方面要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另一方面要挽救民族危亡，特别重视教育的功用，实行新的教育方针，制订新的课程标准，强化教科书管理，对教科书编写产生了很大影响。

### 一 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全面实行“三民主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即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

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sup>①</sup> 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决定把党化教育改称为三民主义教育。“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教育，就是各级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sup>②</sup>

1929年4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颁布，确立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其“实施方针”前两条规定：“一、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二、普通教育，须根据孙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以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sup>③</sup> 1931年6月，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根本原则”。<sup>④</sup> 三民主义教育“沦为国民党正统思想主宰下的文化旗号，教育与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合流”，“党化教育从此实现了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使党化教育具有国家权威性和意识形态独断性”。<sup>⑤</sup> 无论是党化教育还是三民主义教育，都是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政治化，沦为维护政党统治的工具。民初以来的共和国民教育受到冲击，逐渐式微。

① 《“党化教育”之意义及其方针》，《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1927年8月，“教育界消息”第1页。

② 姜琦等：《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说明书》，载中华民国大学院编纂《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商务印书馆，1928，第2页。

③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载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第35~36页。

④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国民教育专章》，载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第37页。

⑤ 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38、319页。

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南京国民政府试行新课程标准，该标准于1929年制订，1932年修正后正式实行。1932年课程标准对历史教学的目标、时间支配、教材大纲和实施方式都做了详细规定，如初中历史教学目标为：①研求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②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③叙述各国历史之概况，说明其文化之特点，以培养学生世界的常识，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唤醒学生在本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④叙述中外各时代文化之变迁，应特别说明现代政治制度及经济状况之由来，以确立学生对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信念。高中历史教学目标为：①叙述我国民族之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本国现状之由来，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的根据；②注重近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诸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本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③过去之政治经济诸问题，其有影响于现代社会者，应特别注重；④叙述各重要民族之发展与各国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⑤说明近世帝国主义之发展，民族运动之大势与现代国际重要问题之由来；⑥叙述各民族在世界文化上之贡献及其学术思想演进之状况。<sup>①</sup> 1932年课程标准虽然明确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指导，但明显弱化了民权和民生问题教育，更加注重民族问题，尤其是近代中国所受的外国侵略。

1932年课程标准颁行后，书局纷纷按照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出现了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第三个高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参见表3-1、表3-2。

①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第43、50页。

表 3-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小学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27	新时代历史教科书	4	傅林一		商务印书馆	大学院审定
1927	新中华历史课本	4	李直 <sup>[1]</sup>	陈棠、张相	新国民图书社	1930年教育部审定
1928	新主义历史课本	4	朱翊新	魏冰心、范祥善	世界书局	
1929	小学纪念日读本	4	朱剑芒		世界书局	小学补充教材
1929	中国历史课本	1	戴洪恒	傅运森	商务印书馆	新时代民众学校用
1929	中国历史教材	1	张寿林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公民教育科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高级平民学校用书
1931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	4	徐家汇光启社		土山湾印书馆	
1932	南洋华侨历史课本	4	金兆梓、洪璧		中华书局	
1932	北新历史教本	4	储祎		北新书局	
1932	高小社会课本历史编	4	储祎	杨人榘	青光书局	
1933	小学历史课本	4	姚绍华	金兆梓	中华书局	新课标适用
1933	社会课本:历史编	4	朱翊新、宋子俊	范祥善	世界书局	新课标适用,教育部审定
1933	复兴历史教科书	4	徐映川	王云五、傅纬平	商务印书馆	
1935	新课程标准小学历史课本	4	罗良铸、姚绍华	陆费逵、金兆梓	中华书局	
1935	开明历史课本	4	金井秋		开明书店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36	中国历史	1	敬之		读书生活出版社	“社会常识读本”,李公朴主编
1937	复兴历史教科书 <sup>[2]</sup>	4	徐映川、傅纬平		商务印书馆	遵照修正课标编辑
1937	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历史课本	4	姚绍华	陆费逵、金兆梓	中华书局	
1937	社会课本·高小新历史	—	朱翊新		世界书局	
1940	高小历史课本	4	范作乘	姚绍华	中华书局	修正课标适用,教育部审定
1942	高级小学历史	4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银行信托部	
1943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	4	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		七联处 <sup>[3]</sup>	
1945	高小历史复习	1	秦湘荪		正中书局	“高小各科复习丛书”
1946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	4	宋延庠、孙懋禄、蒋子奇	国立编译馆	七联处	教育部审定
1946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修订本)	4	宋延庠、蒋子奇、聂家裕	金兆梓	七联处	教育部审定,国立编译馆主编
1947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2次修订本)	4	蒋子奇、聂家裕	金兆梓、邓广铭	七联处	教育部审定,国立编译馆主编
1948	言文对照中华历史快读	4	冯慕云	陈锡芳	香港世界书局	

注: [1] 该书第1、2册为本国史,由李直编;第3、4册为外国史,由郑昶、洪鋈编,1928年出版。

[2] 该书内容与徐映川1933年《复兴历史教科书》大部分相同。

[3] 即“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下同。

资料来源:各教科书文本;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等等。

表 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学部分)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27	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	2	王钟麒	胡适	新时代教育社	下册为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	中国近百年史纲要	2	高彦博		文化学社 <sup>[1]</sup>	
1927	本国史	2	周景濂		商务印书馆	“中学各科要览”
1927	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2	谢观		商务印书馆	
1928	中国近百年史纲要	2	高博彦		文化学社	
1929	新中华初中本国史	2	金兆梓	郑昶、张相	新国民图书社	
1929	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	2	王钟麒 <sup>[2]</sup>		商务印书馆	
1929	初中历史	6	沈味之、朱翊新、朱公振	董文、魏冰心	世界书局	
1929	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	2	王钟麒	吴敬恒	商务印书馆	教育部审定
1929	近百年本国史	1	沈味之		世界书局	
1929	高中本国史	2	陆东平、朱翊新		世界书局	“新主义教科书”
1930	初中本国历史教本	4	梁园东	江恒源、苏甲荣	大东书局	教育部审定
1930	北新本国史	2	杨人榘		北新书局	初中用
1930	初中本国历史	2	姚绍华	金兆梓	中华书局	修正课标适用
1930	新中华语体本国史 <sup>[3]</sup>	2	郑昶	金兆梓	新国民图书社	初中用
1930	初中本国史	4	朱翊新		世界书局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30	初中本国史	4	朱翊新、 黄人济、 陆并谦	范祥善	世界书局	
1930	高中本国史	3	金兆梓		中华书局	
1930	中国近世史	3	陈其可		苏州小说 林书社	高中用
1931	开明本国史教 本	2	周子同		开明书 店 <sup>[4]</sup>	教育部审定
1931	初中本国史	2	李云坡		文化学社	该书版权页标注 为“初中本国 史”，封面标注 为“中等学校教 科书本国史”
1931	中国近百年史	2	孟世杰	王桐龄	百城书局	高中用，由孟世 杰《中国最近世 史》改编
1931	初中中国史	2	孟世杰		百城书局	初级中学学校教本
1931	中国近百年史	4	邢鹏举		世界书局	高中教本
1931	高中本国史	2	吕克由		民智书局	民智高中教本
1932	初中本国史	2	孟世杰		百城书局	初中师范职业用
1932	初中本国史	2	何祖泽		新亚书店	新亚教本
1932	初中本国史	一	赵征铎	张国仁	民智书店	
1932	高中本国史	3	缪凤林		钟山书局	钟山读本
1932	新中华高中本 国史	3	金兆梓		新国民图 书社	
1932	高中本国史	1	钟月秋		长沙湘芬 书局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32	本国现代史	2	梁园东		世界书局	高中教本
1933	复兴初中本国史	4	傅纬平		商务印书馆	
1933	初中本国史	4	姚绍华	金兆梓	中华书局	新课标适用,教育部审定
1933	朱氏初中本国史	4	朱翊新	陆光宇	世界书局	
1933	谢氏初中本国史	4	谢兴尧	朱翊新	世界书局	新课标世界中学教本
1933	陈氏高中本国史	2	陈登原		世界书局	世界中学教本
1933	余氏高中本国史	2	余逊		世界书局	教育部审定,新课标世界中学教本,1934年修正
1933	高级中学本国史	5	郑师许			稿本
1933	本国文化史	1	顾康伯	孟寿椿	大东书局	
1933	中国近百年史	1	吴贯因		建设图书馆	“新建设时代高中”
1934	初中本国史 <sup>[5]</sup>	4	周予同		开明书店	新标准教本
1934	初中本国史纲要	—	高庆赐		文心书业社	
1934	新生活初中本国史	4	梁园东	江恒源	大东书局	新课标适用
1934	开明中国历史讲义	2	王钟麒、宋云彬		开明函授学校	
1934	新标准初中本国史	2	李云坡		文化学社	
1934	复兴高中本国史	2	吕思勉		商务印书馆	依照新课标编辑,教育部审定
1934	高中中国史	2	白进彩		文化学社	新课标高中文化教本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34	高中本国史	2	孟世杰	王峰山	文化学社	
1934	高中本国史	3	罗元鲲		开明书店	新课标适用
1935	初中本国史	4	杨人榘		北新书局	依照新课标编辑,教育部审定
1935	初中教本本国史	4	吕思勉		中学生书局 <sup>[6]</sup>	修正课标适用,教育部审定
1935	初中本国史	4	应功九		正中书局	新课标适用
1935	中国史 <sup>[7]</sup>	—	鲍文希	李楚材	万叶书店	中学历史补充教材
1935	高中本国史	2	白进彩		文化学社	
1935	高中本国史	3	金兆梓		中华书局	新课标适用
1935	高中本国史	3	罗香林		正中书局	遵照课标编著
1935	高中本国史	3	杨东莼		北新书局	
1935	本国史(改订本)	1	吕思勉		商务印书馆	“高中复习丛书”
1936	建国初中本国史 <sup>[8]</sup>	—	应功九		正中书局	教育部审定
1936	历史	4	卢文迪、姚绍华、范作乘		中华书局	新课标简易师范、简易乡村师范适用
1937	初中本国历史	4	姚绍华	金兆梓	中华书局	
1937	更新初中本国史	4	吕思勉		商务印书馆	教育部审定
1937	初中本国史	4	李清悚、蒋恭晟		大东书局	新修正标准
1937	初中新本国史	4	蔡沔因		世界书局	修正课标适用
1937	新编高中本国史	3	金兆梓		中华书局	修正课标适用,教育部审定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38	复兴初中本国史	4	傅纬平		商务印书馆	审定本,教育部审定
1939	本国史纲	1	朱翊新		世界书局	“中学活用课本”
1941	初中本国史	4	彭勋阁	萧和玉、徐谷生	江西艺文书社	
1941	高中新本国史	3	孙正容、王芸庄 <sup>[9]</sup>		世界书局	遵照修正课标编辑,新课标世界中学教本
1942	初中本国史	—	陈旭麓	姚薇元	文通书局	“中学复习受験丛书”
1943	中国史纲要	—	梅孟文		艺文书局	
1943	新本国史	2	张熙		福建省政府教育厅编辑委员会	中等学校补充教材,社会科之六
1943	初级中学历史	5	宋延庠等	国立编译馆	七联处	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编
1943	新编高中本国史	3	金兆梓		中华书局	
1945	初级中学历史(修订本) <sup>[10]</sup>	6	聂家裕	金兆梓等	七联处	教育部审定,国立编译馆主编
1945	初级中学历史	6	宋延庠		七联处	
1945 <sup>[11]</sup>	初中本国史	5	易仁荃		大光印书馆	
1946	高中近代本国史	—	罗元鲲		善益协社	
1946	初级中学历史	6	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	国立编译馆	七联处	
1946	高中本国史	3	杨东莼		北新书局	新版教本
1947	本国史	4	周予同		开明书店	初中用
1947	初中本国史(修正本)	4	傅纬平		商务印书馆	

续表

出版年份	书名	册数	编(著)者	校订(参阅)者	出版机构	备注
1947	初级中学历史 (修订本)	6	王鸿俊		七联处	
1947	初级中学历史 (第2次修订本)	6	聂家裕	金兆梓、郑鹤声、黎东方	七联处	国立编译馆主编
1947	中华本国历史	4	姚绍华		中华书局	初中用
1947	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	2	杨东莼		开明书店	
1947	高中新本国史	2	孙正容、王芸庄		世界书局	
1948	高中本国史	—	金兆梓		中华书局	

注：[1] 文化学社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五大书局之一，在专营出版机构中居于首位。民国北京地区五大书局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文化学社、地址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参阅邱崇丙、子钊《民国时期北京的出版机构》，载《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北京出版史志》第8辑，北京出版社，1996，第137页。

[2] 王有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将作者写为“王钟麟”，见该书第561页。

[3] 1932年，姚绍华编有《新中华语体本国史详解》，是为郑昶此书的教学参考书，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将其列为教科书（见该书第562页）。

[4] 或称此出版社为“立达学园”，见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562页。

[5] 1934年修正课程标准出来后，又出版《初中本国史》修正本。

[6] 吕思勉在中学生书局还出版有《初中标准教本国史》（遵照教育部新课标），两书基本相同。

[7] 笔者见到第1~4册，第4册为近世史部分，叙事至清末。

[8] 与应功九1935年《初中本国史》基本相同。

[9] 笔者仅见该书的上册与中册，上册是1947年6版，编者为孙正容；中册是1946年3版，编者为王芸庄。

[10] 该书有数家出版社出版：①上海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②南京正中书局，③上海商务印书馆，④上海中华书局。该书从1945年一直出到1948年。参阅《民国图书总目录·中小学教材》，第215页。

[11] 该书共5册，仅见第2、3册，第2册版权页标注为“1945年3月4版”，初版时间不详，表中的出版时间为4版时间。

资料来源：同表3-1。

## 二 教科书编写的模式化与 “国定本”的颁行

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整个教育与教科书编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强化教科书管理，教科书编写逐步模式化。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国民党要求各级学校开设党义课程，其他课程也要按照党义进行改编。国民政府提出“要把学校的课程重新改组，使与党义不违背，及与教育学和科学相符合，并且能够发扬党义和党的政策。我们应赶促审查和编著教科用图书，使与党义与教育宗旨适合”。<sup>①</sup> 1931年，《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初等教育“应以三民主义重要的观念，为编订全部课程的中心”，“根据中山先生遗教中合于儿童身心之发展事理，制成信条，以指导其整个的生活”；中等教育“全部课程的编制，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确定青年三民主义之信仰，并切实陶冶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sup>②</sup>

其次，加强教科书管理，教科书编写趋于定型。为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民国政府高度重视教科书的管理。在1940年代以前，是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而以审定制为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间书局是编写发行的主流。南京国民政府强化教科书管理。1927年12月，大学院公布《教科图书审查条例》，规定教科书“非经中华民国大学院审定者，不得发行或采用”，其内容“以不违背党的主义，党纲，及精神，并适合教育目的，学科程度，及教科体裁者，

<sup>①</sup> 《“党化教育”之意义及其方针》，《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1927年8月，“教育界消息”第3页。

<sup>②</sup> 《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载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第38~39页。



为合格”。<sup>①</sup> 1929年1月教育部《订定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精神要“一，适合党义；二，适合国情；三，适合时代性”。<sup>②</sup> 国民党的党义、历史与政策是教科书编写的依据和重要内容。民间书局的教科书要想通过教育部的审定，必须依据政府给定的课程标准，严格按照教材大纲来编写，否则审查不予通过。1942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杨东莼《高中本国史》因为没有送审而被查禁：“事先并未呈送教育部审定，殊属不合，在未完成送审手续以前，自不许在任何地点发售。相应咨请查照，转令所属各行政机关，遵照执行查禁。”<sup>③</sup> 1944年，世界书局蔡沔因《初中新本国史》因为“思想谬误”被查禁：“取材失当，思想谬误，除咨内政部查照，并令该书局禁售外，合亟令仰该厅转飭所属各校一律不得采用。”<sup>④</sup>

1932年课程标准在教科书编写定型上有重要的影响。1932年课程标准被称为“最硬化的中学课程”，<sup>⑤</sup> 其后，国民政府在1936年、1940年、1941年、1948年对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但基本上是以1932年课程标准为基础，变动不大。作为教科书编写的指导与依据，每次课程标准修订后，教科书也要随之进行修正。这给民间书局编写教科书带来不便。同时，政府对民间书局编写的教科书审查越来越严格。因此，新课程标准制订后，书局往往是将以往教科书进行修正，新编教科书越来越少。“1936年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标准全国没有一个出版社根据它编过一整套课本。”<sup>⑥</sup>

① 《教科图书审查条例》，《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

② 《教育部订定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92页。

③ 《准内教两部咨请查禁杨东莼著〈高中本国史〉仰遵照查禁由》，《安徽省政府公报》1942年第137期，第14~15页。

④ 《为令飭蔡沔因编〈初中新本国史〉取材失当思想谬误不准采用由》，《四川省政府公报》1944年原第461期，第15页。

⑤ 参阅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第104页。

⑥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第140~141页。汪家熔先生指出：“1934年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干脆不再编撰新的教科书。”就笔者所见，1934年后，尚有新编教科书出版，只不过相对较少了。

最后，政府试图统一教科书编写，发行“国定本”教科书。1932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隶属于教育部，理关于各种学校之图书编译事务”，“编辑教育上必要之图书”，同时还负责“审查关于学校用之图书、标本、仪器暨其他教育用品”。<sup>①</sup> 1936年7月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是：“一、拟定及审核教科用书及有关读物之编辑方针；二、计划中小学及民众学校教科用书之编辑事项；三、计划青年读物及民众通俗读物之编辑事项。”<sup>②</sup> 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府与人民内迁，政府决定自行编辑教科书。1942年，教育部将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归并于国立编译馆，改设教科用书组，编辑中小学教科用图书。同年，颁发新课程标准，试图淘汰按照旧标准编写的教科书，各民营出版机构只能代印国立编译馆编的课本发卖。<sup>③</sup> 国民党政府以此加强对教科书的全面控制。1943年编订的“国定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七家组织联合办事处负责发行。<sup>④</sup>

“国定本”教科书中，中国历史主要有小学和初中两种。《高级小学历史》遵照1942年《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内“历史科”教材大纲和要目编写，由宋延庠、孙懋禄、蒋子奇编辑，王云五、朱家骅、吴大钧、吴俊升、吴绳海、余井塘、金兆梓、陈可忠、陈布雷、陈果夫、叶溯中、潘公展、郑鹤声、黎东方、魏冰心、顾毓琇和顾树森等参阅。该书“立论，根据国父遗教、总理言论及中央国

① 《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载教育部参事处编辑《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再版，第12页。

② 《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载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第70页。另，“国定本”教科书在“编辑经过”中提出，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是1934年度组织的，参阅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辑《初级中学历史》第1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5年上海白报纸本第1版，1946年上海白报纸本第130版，“编辑经过”第1页。

③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第140~141页。

④ 陆殿扬：《中小学国定教科书编篡之经过及其现状》，《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策”；“编制力求生动活泼”，课文内重要名词、文句，均用黑体字排印；“每课课文之前，列有问题数则，归纳本课内容要点”。<sup>①</sup>该书讲述从远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共4册，每册18课，每课之前列出要教授的问题，课后附有作业，全书最后附有“中外大事对照表”。该书1943年出版后，1945年重出，1946年、1947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多次再版。



图3-1 国立编译馆《小学历史课本》大东书局版，1947



图3-2 国立编译馆《小学历史课本》文通书局版，1947

《初级中学历史》遵照1940年《修订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编辑而成，由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写，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等人编辑，国立编译馆校订，王云五、朱家骅、吴大钧、吴俊升、余井塘、沈其达、金兆梓、陈可忠、陈布雷、陈果

<sup>①</sup> 蒋子奇、聂家裕编辑《高级小学历史》（1947年修订本）第1册，大东书局，1947年第1版，“编辑要旨”。

夫、梁实秋、常道直、许心武、叶溯中、潘公展、郑鹤声、黎东方、钱穆、蓝文徵和顾毓琇等参阅。该书取材上，“政治方面，关于朝代兴衰、名人伟绩以及与现在生活有关之制度等资料。社会方面，关于社会之进化、文明之发达以及与现在生活有关之风俗习惯等资料。经济方面，关于农工商业之演进，国民经济之发展以及国家财政之措施等资料。文化与学术方面，关于固有文化之一贯性、学术思想对于民族生活及国家缔造之关系，以及中外文化之交换等资料”。<sup>①</sup>该书前5册为中国史，叙述从远古到1940年代抗战时期的历史；第6册为世界史。该书出版后有多家书局印行，多次再版，如第1册至1947年出到沪210版，第2册至1946年出到沪205版、粤2版。<sup>②</sup>该书在1945年又出了修订本，1946年重新校订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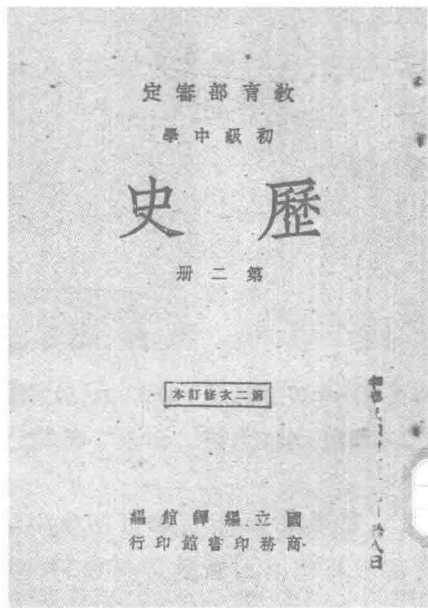


图3-3 “国定本”《初级中学历史》，1947

- ① 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辑《初级中学历史》第1册，“编辑要旨”第1页。
- ②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565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加强教科书审定与编写“国定本”等方式，政府从编写、审定到出版发行等方面来加强对教科书的管理，教科书的编写逐步定型并趋于模式化。

###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 教科书改编本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的编写、发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改编本教科书较多。1932年课程标准颁行时，出现了教科书编写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持续了大约三年时间。到1935年后，新编的教科书逐渐减少，新出版的教科书大多是改编本。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如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强化教科书管理，加强教科书审定，这影响到书局的教科书编写。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益艰难的国内环境。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出版重镇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内迁，内地缺乏编辑出版的物质条件，民营出版社更无力维持编辑队伍，造成内地学校缺少教科书。因此，一些书局就将以前的教科书修改使用，以缓解教科图书短缺状况。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新编的教科书不多，教科书往往是随着课程标准的修改而改订的，或者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重新审定。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改编情况，这里以五大书局为例略做介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一般都有自己的编译所和编译人员，从教科书出版情况来看，各书局历史教科书编者相对比较固定，商务印书馆主要是傅纬平（即傅运森）和吕思勉，中华书局是姚绍华和金兆梓，世界书局有朱翊新和余逊，开明书店为周予同和罗元鲲，大东书局为梁园东等人。现将五大书局主要编者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及在不同时间的版本列举如下（见表3-3）。

表 3-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五大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编者与版次

出版社	编者·教科书		版次
商务印书馆	初中	傅纬平 《复兴初中本国史》	1933年初版,1934年75版,1937年64版; <sup>[1]</sup> 1938年审定出版,1941年长沙审定55版; 1947年修正版,1948年修正8版
	高中	吕思勉 《复兴高中本国史》	1934年初版,1935年18版,1941年52版,1946年69版; 1948年5月修正110版,1948年8月修正112版
中华书局	初中	姚绍华 《初中本国史》 <sup>[2]</sup>	1933年初版,1936年46版,1940年82版,1941年130版
		姚绍华 《初级本国历史》	1937年初版,1940年78版,1941年126版
		姚绍华 《中华本国历史》	1947年初版,1948年7版
	高中	金兆梓 《新中华高中本国史》	1932年3月发行,8月再版
		金兆梓 《高中本国史》	1935年初版,1935年4版
		金兆梓 《新编高中本国史》	1937年初版,1939年10版,1940年15版,1945年25版,1947年31版,1948年38、39版
世界书局	初中	朱翊新 《朱氏初中本国史》	1933年初版,1934年6版;1939年新4版,1940年新5版
	高中	余逊 《余氏高中本国史》	1934年初版,1936年9版;1938年新2版; 1941年新版,1946年新10版,1947年新12版
开明书店	初中	周予同 《本国史》	1934年初版,1936年5版;1934年修正本,1934年2版;1938年版,1940年5版;1947版
	高中	罗元鲲 《高中本国史》	1934年初版,1936年8版,1940年12版,1948年21版
大东书局	初中	梁园东 《本国历史》	1930年初版,1934版; 1934年《新生活教科书本国史》

注: [1] 一般每种教科书有数册, 各册出版时间不尽相同, 这里的版次以第1册或上册为例。

[2] 《初中本国史》在1937年以《初中本国历史》为名, 分别在上海与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至1940年香港本出到90版, 1941年上海本出到126版。下一栏《初级本国历史》即上海本。1938年中等教育研究会编纂、华北书局出版的《初中本国历史》与姚绍华《初中本国历史》基本相同。

资料来源: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

从表 3-3 可见,一些教科书多次再版或冠以“新编”之名出版。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教科书,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很多教科书照搬以前教科书的内容。这里的再版或“新编”教科书往往是以前教科书的重印。所谓的版次,有时是印次。如周予同、梁园东先后出版的初中历史即是如此。第二,一些教科书稍微进行了改编,主要是“与时俱进”,后来编写的教科书,新增了当下的内容,其他部分变动不大。所谓的“新编”,大多是按照新修订的课程标准而对以前的教科书略做修改。如金兆梓的《高中本国史》,中华书局于 1930 年作为“修正课程标准”教科书出版后,1932 年又作为“新中华教科书”出版,1935 年作为“新编”教科书出版,1939 年标注为“教育部审定、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出版,1943 年又经教育部审定出版,一直出到 1948 年,大部分内容基本相同。王钟麒、朱翊新、姚绍华、梁园东、周予同、孟世杰、应功九等先后出版的教科书,尽管标以“依据新课程标准”,或有不同名字,但内容基本相同。如王钟麒 1927 年出版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在 1929 年被查禁,但同年他又出版了《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与王氏前编《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课目虽间有增减,然其内容,彼此相同,一字不改”。<sup>①</sup>

这些改编本的出现,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这些教科书都有较大的影响。在 1943 年“国定本”教科书出版以前,这些教科书往往多次印行,构成教科书市场的主力。即便是“国定本”出版后,有的教科书还在继续使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由傅纬平与吕思勉等编写。傅纬平的《复兴初中本国史》共 4 册,叙述了从远古至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历史。该书叙事较为简洁,正文之外有大量的注释以补充说明,每课之后附有习题。在第 4 册最后有一章“总论”,讲述“历史与人类生活之关系”“中华民族之逐渐形成与

<sup>①</sup>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 5 期,1933 年 7 月。

现代的复兴运动”“中华文化之演进及其光荣”“国际现势下之吾国地位”等问题。吕思勉曾经做过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编著有《白话本国史》（1923）、《新学制高中本国史》（1924）、《复兴高中本国史》（1934）、《初中教本本国史》（1935）、《更新初中本国史》（1937）等历史教科书。《复兴高中本国史》共2册，叙述了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内容上注重“一时代重要之事，如汉之外戚、宦官，唐之藩镇”，“其事对于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如明清两代的制度”。<sup>①</sup> 该书叙事较1924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详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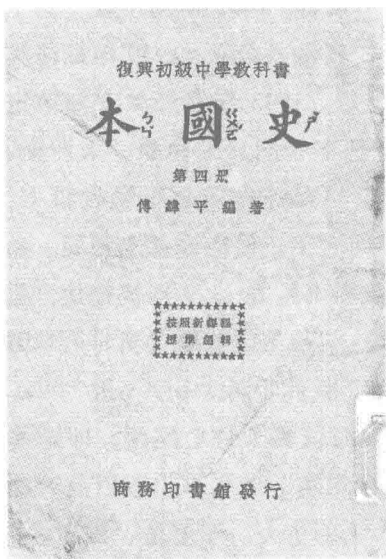


图3-4 傅纬平《复兴初中本国史》，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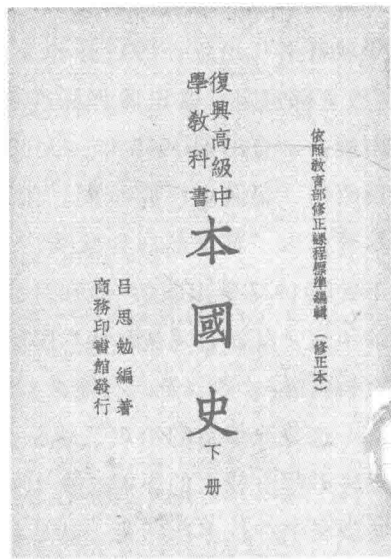


图3-5 吕思勉《复兴高中本国史》，1934

中华书局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由姚绍华和金兆梓编写。姚绍华是中华书局编辑，他与金兆梓编纂的教科书是中华书局的品牌教科

<sup>①</sup>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1948年20版，“例言”第3页。



书，为很多学校采用。<sup>①</sup>姚绍华《初中本国史》共4册，叙述了从远古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的历史。该书叙事简洁，条理清楚，对重要名词加以注释说明，每章之后附有提问要点。《初中本国史》由金兆梓校订，很多内容是照抄其《初级本国历史》。从学术上看，姚绍华的教科书没有新意；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多次再版与长期使用的教科书，它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金兆梓的《高中本国史》共3册，叙述了从远古至当下的历史，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讲述。该书保持了金兆梓此前教科书叙事简洁、条理清晰的特点，适合教学。

世界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朱翊新的《初中本国史》有较大影响。世界书局于1924年编辑出版教科书，一度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第三大书局。<sup>②</sup>朱翊新是世界书局的编辑，编校有多种教科书，中国历史有《高级历史课本》（小学用，1925）、《高小历史课本》（1928）、《初中历史》（1929）、《高中本国史》（1929）、《初中本国史》（1930）、《朱氏初中本国史》（1933）等。《朱氏初中本国史》共4册，在编写上有一些特色。在内容上注重中外关系。在编排上，每册开始有“本册提要”，介绍本册所要讲述的重点和注意事项，每册最后附有这一时期的大事年表；每节后附有研究问题，每一历史分期讲完后附有一章结论，提示该时期历史要点；全书最后有三章综论，讲述研究历史的方法、本国史的回顾与前瞻。

开明书店名列民国五大书局之中，共出版教科书100多种，内容新，质量好，有广泛的影响。<sup>③</sup>周予同曾为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编辑，在开明书店出版过《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和《初中本国史》（1934），是开明书店所出的主要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初中本国史》共4册，叙事简洁，课后附有注释和习题。该书吸收了

① 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18页。

②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138页。

③ 王久安：《我与“开明” 我与“中青”》，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第6页。

大量新材料，如当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是开明书店重要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共3册6编，叙述了从上古至1930年代“新生活运动”时期的历史。书前有“绪论”部分，介绍历史的定义、中国民族形成、中国疆域及政体概略、时期划分；书后有“结论”总结全书，回顾中国民族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的使命。该书条理明晰，特别是课后附有内容提要，以图表的形式将该章内容重点列举出来，适合教学。



图3-6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

大东书局于1916年创办，在教科书发行上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位居第四。大东所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是梁园东编著的两部初中本国史：《初中本国历史教本》（1930）与《新生活初中本国史》（1934），两者内容基本一样。《新生活初中本国史》尤注重文化史叙述，按照专题来进行讲述，在编写上，“注重事业的演

变与解释，凡重大改变，必特为指明，并说明其演变之意义及演变之关系”。“对上古史料，以人类学方法，加以整理”；“于中古史，注重本国文化与社会概况与国家组织之特点；于近世史，注重中西交通及西学输入之影响”。<sup>①</sup>对一些历史问题，梁园东有自己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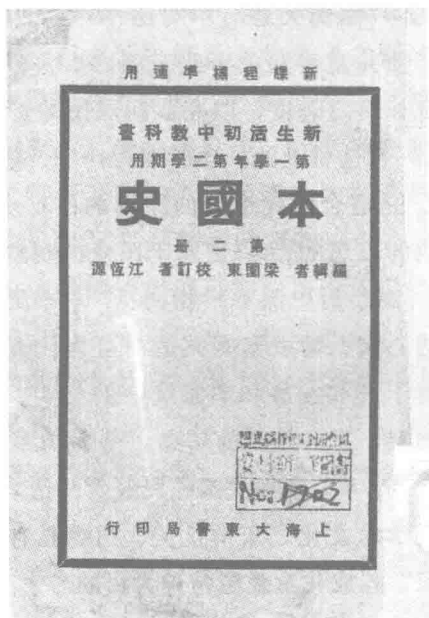


图 3-7 梁园东《新生活初中本国史》，1934

#### 四 高扬民族主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

养成国家观念，突出近代所受的外国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的

<sup>①</sup>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1册，大东书局，1934年初版，“编辑大意”第1~2页。

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抵御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华民族的要求，这也体现在1932年课程标准中。高扬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普遍重视的问题。<sup>①</sup>

小学教科书编写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养成国家观念。李直在《新中华历史课本》“编辑大意”中写道：“本书取材，注重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使儿童略知关于此三项之事实，在历史上有如何之经过，将来应取如何之态度，以完成新国民的责任。”<sup>②</sup>朱翊新的《新主义历史课本》在选材上的几项标准为：“1. 是符合或不背中国国民党党义的；2. 是适合时代进化的原则的；3. 是富于革命精神，足以培养积极进取的思想的；4. 是属于民众的观察，足以代表民意的。”<sup>③</sup>范作乘的《高小历史课本》指出：“本书处处依社会科的立场，并依据儿童的心理，搜求富有兴趣而可为代表的具体史实或人物，作为材料。对于民族发展和国家统一的史实，尤摘要采取，借以养成儿童爱护国家、复兴民族的信念。”<sup>④</sup>国立编译馆的《高级小学历史》编写主旨为：“以叙述我国先民经营缔造之辛苦，历代开发创业之艰难，与夫学术文化之宏博优美，道德精神之伟大高尚，以增强儿童民族意识，养成儿童爱国精神为目的。”<sup>⑤</sup>

中学教科书更注意联系中国现状，关注中国近代所受的侵略，以激发民族意识，实现中国民族的复兴。《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指出该书编写要点为：“课文的撰集，着眼在整个民族的立国精神”，“取材方面，在古代则注意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制度风俗的由来，在近

① 1930年以后，民族主义历史教育成为主潮，但世界化趋向并未中绝，仍然注意培养学生世界观念和 international 眼光。参阅左玉河《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李直编《新中华历史课本》第1册，新民图书社，1927年发行，1931年33版，“编辑大意”。

③ 朱翊新编辑《新主义历史课本》第1册，世界书局，1930年3月审定，12月14版，“编辑大意”。

④ 范作乘编《高小历史课本》第1册，中华书局，1941年155~156版，“高小历史课本编例”。

⑤ 蒋子奇、聂家裕编辑《高级小学历史》（1947年修订本）第1册，“编辑要旨”。

代则注意帝国主义的侵入和国民革命的发展”。<sup>①</sup> 罗元鲲《高中本国史》的编写目标为：“（1）我国民族之拓展，（2）历代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之变迁，（3）外交失败之经过。尤注重讨论现代各项问题，期求得我国应付世界事变之妥善方案。”<sup>②</sup> 姚绍华在《初中本国史》中指出该书“尤特别着重现代政治制度及经济状况的说明，其目标一以使学生于研求中国民族及文化演进之概况中，谋高尚志趣的养成、民族思想的激发为鹄的”。<sup>③</sup> 李清悚在《初中本国史》中指出该书“于民族进化、政治经济设施、社会制度演变，凡足以表现一时代民族文化之特征及影响于后代者，均扼要显示，以期唤起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思想”。<sup>④</sup> 蔡沔因的《初中新本国史》指出：“本书唯一目标，在叙述我国历史演进的程序，并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性，借以引起学生研究历史的兴趣，和爱护国家的观念”；“叙述历代受外族压迫抗争的情形特详，借以激起其爱国信念，使努力于雪耻工作，以谋我民族的复兴”。<sup>⑤</sup> 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指出：“本书叙述史事推移沿革时，概以现代为立场，使现代所有政治、社会、文教等现象，都有历史的根据可寻；其于近世以来外交之失败、政治之纷更、社会经济之变动，尤根据现代社会之趋势，详述其因缘，期使读者明白我国现状之由来，及国民革命之背景，而知今后整个民族所应有之努力。”<sup>⑥</sup>

### 突出古代历史的荣光

叙述中国历史上的荣光以树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为教科书

- 
- ① 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9，“编辑大意”第1页。
- ② 罗元鲲编著《高中本国史》第1册，开明书店，1934年初版，1935年4版，“编辑大意”第1页。
- ③ 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1册，中华书局，1933年发行，1934年12版，“编例”第1页。
- ④ 李清悚、蒋恭晟编辑《初中本国史》第4册，大东书局，1937，“编辑大意”。
- ⑤ 蔡沔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世界书局，1937，“凡例”第1页。
- ⑥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中华书局，1939年10版，“编例”第1页。

编写所注重。《新生活初中本国史》指出：“本书所取材料，大都以有关社会生活者为主，如各种制度、风尚、思想、学说，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皆必指出其社会的意义。”<sup>①</sup>《朱氏初中本国史》中写道：“本书在叙述各时代民族演进史迹时，特别注意于发扬我国民族精神和表彰我国民族对于世界文化贡献的事实。”<sup>②</sup>《新编高中本国史》指出：“本书对于民族复兴有关的教材，例如我国民族之何由强盛何由衰落；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占的地位，衰落时如何保持其固有文化以同化新兴民族等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sup>③</sup>《初中新本国史》指出：“凡历代的开创、制度的更张，以及制作之有关全时代全人类的，都特别提明，使知我民族祖先开拓辟殖发明发现之不易，而知努力于社会的创造与改进”；“凡文化的传播、民族的繁殖与散布，皆明其脉络源流，使明白我民族祖先的勤劳精神，及现在衰落的原因，以促起其责任上的自觉”。<sup>④</sup>“国定本”《初级中学历史》中写道，该书内容“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特别说明国史上光荣事迹，以激发学生爱国心，并养成其坚强的民族意识与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sup>⑤</sup>

## 五 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之分合

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强化教科书管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和课程标准成为教科书编写的依据。教科书如何体现政府的教育要求？在教材大纲框架内，教科书还能否表达自己的观点？本节即

①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1册，“编辑大意”第1页。

② 朱翊新编著《朱氏初中本国史》第1册，世界书局，1933，“编辑大意”第1页。

③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编例”第2页。

④ 蔡沔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凡例”第1~2页。

⑤ 聂家裕编辑《初级中学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34版，“编辑要旨”。

以1932年初中历史课程标准颁行后，通过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中上古史的具体编写情况为例，对这些问题做一考察。

1932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教材大纲规定，上古史要讲述：①太古之传说，②中华民族之建国，③唐虞夏商之政教，④上古之文化与社会，⑤周之建国及其政教，⑥春秋与战国，⑦周代之社会概况，⑧春秋战国之学术思想，⑨本期结论。<sup>①</sup>1932年以后出版的教科书也都标明依据新课标编写，通过教育部审定。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1932年以后的教科书，并非都是依据1932年课程标准来编写的，如世界书局朱翊新的《朱氏初中本国史》（1933）、文化学社李云坡的《新标准初中本国史》（1934）、大东书局梁园东的《新生活初中本国史》（1934）等即是如此。这从该书上古史目录中可见（见表3-4）。

表3-4 朱翊新等三种教科书上古史目录比较

	朱翊新本	李云坡本	梁园东本
第一章	古史的传说	史前期的原始社会 <sup>[1]</sup>	中国的原始民族
第二章	中国民族的建国	唐虞夏商的政治设施	原始时代的传说
第三章	唐虞夏商的政教	集上古文化大成的周朝	部族国家的状况
第四章	周之建国及其政教	春秋和战国	周的势力及其封建制度
第五章	周初社会经济及其转变	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的混乱及原始民族的混合
第六章	春秋战国时代与其学术思想	上古时代的民生与风俗	春秋战国间文化的剧变
第七章	本期结论		思想学说的蜕化 <sup>[2]</sup>

注：[1] 李云坡本在第一章前有“绪言”一章，分三节：“历史是什么”“民族与地域”“史期的划分”。

[2] 分三章讲述。

①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第43~44页。

上述三种教科书都标明依据新课标编写，且都标明通过教育部审定。但从其目录可见，这些教科书的章节设置明显与课程标准中教材大纲的规定不符；这些教科书之间也有不同，彼此有一定的差距。

不仅如此，即便是依据同一课程标准编写的教科书，相互之间也有不同。这里以商务印书馆傅纬平的《复兴初中本国史》（1933）、中华书局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1933）、开明书店周予同的《初中本国史》（1934）、正中书局应功九的《初中本国史》（1935）、<sup>①</sup> 中学生书局吕思勉的《初中教本本国史》（1935）的上古史为例，略做说明（见表3-5）。

表3-5 傅纬平等五种教科书上古史目录比较

	傅纬平本	姚绍华本	周予同本	应功九本	吕思勉本
第一章 太古之传说 <sup>[1]</sup>	1. 历史的意义与征实 2. 神话及传说	1. 开天辟地的神话 2. 初民的生活状况 3. 有巢燧人伏羲神农	1. 历史和“史前时期” 2. 天地开辟的神话 3. 传说中的初民生活	1. 历史与神话 2. 最早的君主	1. 伏羲以前之传说 2. 伏羲神农之传说
第二章 中华民族之建国	1. 中华民族的由来 2. 黄帝建国 3. 文化的进步与制作	1. 汉族之定居 2. 黄帝之建国	1. 黄帝的建国 2. 黄帝制作的传说 3. 汉族的来源和定居	1. 中华民族的由来 2. 国家的建立	1. 汉民族的由来 2. 中国本部原有之各民族 3. 各民族的由来 4. 黄帝之武功 5. 汉民族的建国 6. 征服异族展布之次第 7. 黄帝之制作

<sup>①</sup> 正中书局1931年开业，由于与陈立夫等国民党人的关系，具有官书局色彩，得到国民党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支持，业务发展很快，抗战初、中期，一直是重庆最大的出版机构（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第138页）。正中书局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初中与高中主要有一种，分别由应功九、罗香林编写，都于1935年出版，1936年应功九《建国初中本国史》与1935年版基本相同。



续表

	傅纬平本	姚绍华本	周予同本	应功九本	吕思勉本
第三章 唐虞夏商 之政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唐虞之世</li> <li>2. 夏商之世</li> <li>3. 汉族与各族的关系</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唐虞之政教</li> <li>2. 君主世袭及贵族革命</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唐虞禅让的传说</li> <li>2. 夏商的政教</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唐虞</li> <li>2. 夏商</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尧舜之政制及其教化</li> <li>2. 尧舜之禅让</li> <li>3. 舜之武功</li> <li>4. 禹之治水</li> <li>5. 帝位之世袭</li> <li>6. 夏之政教</li> <li>7. 汤之革命</li> <li>8. 商之政教</li> <li>9. 周武王之革命</li> </ol>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与社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中国的原人</li> <li>2. 中国石器时代遗物</li> <li>3. 殷商的文化</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人民生活的进化</li> <li>2. 文字和学术的进步</li> <li>3. 社会概况</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中国本土原人的发现</li> <li>2. 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li> <li>3. 殷墟遗物的发现</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上古的创制</li> <li>2. 上古文化之分期</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上古生活之进化</li> <li>2. 上古社会组织之形成及其进化</li> <li>3. 上古制度文物之进化</li> </ol>
第五章 周之建国及其政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周代初基</li> <li>2. 周代的宗法封建井田制度</li> <li>3. 周代的共和</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周之建国及封建制度</li> <li>2. 礼治与礼教</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周初的政治建设</li> <li>2. 周初的文化建设</li> <li>3. 井田制度的传说</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周的建国</li> <li>2. 西周与东周</li> <li>3. 周代的政教</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周初之国际组织</li> <li>2. 封建制度之确立</li> <li>3. 西周之政治</li> <li>4. 戎狄之内侵</li> <li>5. 平王东迁</li> </ol>
第六章 春秋与战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春秋之世</li> <li>2. 战国之世</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周之东迁及春秋列国之争霸</li> <li>2. 战国七雄的并峙</li> <li>3. 汉民族大混合</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春秋列国的争霸</li> <li>2. 战国七雄的并峙</li> <li>3. 中原文化的分布</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春秋</li> <li>2. 战国</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春秋战国之界说</li> <li>2. 周代中央权势之衰微</li> <li>3. 诸侯强大与五霸</li> <li>4. 国际礼法</li> <li>5. 秦之强大与六国</li> <li>6. 约纵连横</li> <li>7. 六国之灭亡</li> </ol>

续表

	傅纬平本	姚绍华本	周予同本	应功九本	吕思勉本
第七章 周代之社会概况	1. 周代的礼教 2. 五行之说 3. 战国时代的人生	1. 井田制 2. 宗法制 3. 社会组织的动摇	1. 周代的社会组织 2. 周代的礼仪风俗 3. 周代的宗教思想	1. 西周的社会概况 2.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概况	1. 井田制 2. 自治制 3. 宗法制 4. 工商业之进化 5. 风俗之剧变 6. 私家教学之盛行
第八章 春秋战国之思想	1. 儒道墨三家 2. 其他诸子 3. 史学文学	1. 学术思想勃兴的原因 2. 学术思想的派别	1. 学术思想勃兴的原因 2. 学术思想的流别 3. 文学与史学	1. 儒家 2. 其他诸子 3. 史学文学	1. 学术思想发达之原因 2. 学术之分派 3. 春秋战国时学术之影响
第九章 本期结论				1. 中华民族建国的基础 2. 上古文化对于后世的影响	1. 上古期内民族展布之范围 2. 上古期内制度文物对于后世之贡献

注：[1] 周予同本第一章名称为“太古的神话与传说”。

这五种教科书都声明依据 1932 年的课程标准编写，章目上也是严格根据教材大纲的规定来设置。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不相同。首先，每章具体内容有详有略，其中以吕思勉本最为丰富；应功九、吕思勉本有“本期结论”一章，对上古史进行总结；而傅纬平、姚绍华与周予同本则没有。

其次，每节具体内容选择上也有差异，如在第四章“上古文化与社会”中，傅纬平、应功九、周予同本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考古发现与研究，叙述了中国石器时代文化与猿人情况，而姚绍华、吕思勉本则没有将考古发现纳入讨论范围。

最后，具体观点也有差异，如中国信史起点、中国人种来源以及孔子评价等问题的叙述有所不同。第一，关于中国信史起点。傅纬平、应功九本根据古史记载，认为可信的历史起自伏羲；周予同

本根据殷墟考古发现，认为中国信史从商朝开始；姚绍华、吕思勉本介绍了上古的传说，没有明确回答中国信史起点问题。第二，关于中国人种起源。傅纬平、姚绍华本未提及清季民初流行一时的西来说，直接叙述黄河流域中国民族生活情况，认为中国民族是黄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应功九、周予同本则介绍了西来说和土著说，认为土著说较为可信，但仍抱有一些怀疑；吕思勉本对汉族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化发生于本土，但指出这不是确实的结论，只能说汉民族由来很早。第三，关于对孔子的评价。姚绍华本认为孔子是博学多能的大学问家；傅纬平本认为孔子是教育家和学问家；周予同本简要介绍了孔子“仁”的思想，认为孟子更受世人的崇拜；吕思勉本没有专门介绍孔子，只是在“私家教学之盛行”一节提及孔子：“我们试看：孔子有弟子三千人；战国时代，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孟子自己，也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便可见私家教学的兴盛。”<sup>①</sup> 应功九本则高度赞扬孔子：“孔子之前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流传；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也没出孔子启导的范围：所以说孔子树立中国的中心。”<sup>②</sup>

中国信史起点、中国人种来源以及孔子评价等在上古史中有重要地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影响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态度。这几种教科书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历史认识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编写。

从上述几种教科书中关于上古史的叙述可见，依据同一课程标准编写的教科书，在具体问题的叙述上也有所不同。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即便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强化教科书管理以及教科书编写模式化的情况下，教科书依然有着不同的编写立场，不同的看法依然存在，其中的差异值得关注。

① 吕思勉编著《初中教本本国史》第1册，中学生书局（原书未见版权页），第60页。

② 应功九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正中书局，1935，第72页。另见应功九编著《建国初中本国史》第1册，正中书局，1936年初版，1937年22版，第65页。

## 小 结

本章通过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来讨论教科书对政府教育要求的实现情况。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与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影响，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成为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成为这一时期教科书的鲜明特点。这一时期政府力图加强对教科书的管理和控制，但是，一些教科书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历史理解，与政府的教育要求有所合离。

本章与第一、第二章讨论教科书编写，历经清朝、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几个时期，国家教育政策有很大变化，教科书编写方针也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从清末忠君尊孔、民初注重国民共和精神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教育，清末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把教育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从理论上说，通过政府审定的教科书，反映国家的教育要求，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但实际上，教科书编写尽管受到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审定规程的限制，但是编者的学术观点和知识水准在教科书中都有所体现，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很自然地渗进教科书中。在讨论教科书编写时，还需注意编者的知识与政治素养，这是影响教科书编写的直接因素。因此，教科书研究，还必须关注编者的立场，注重对编者的研究。

## 第四章

# 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

教科书编写受到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同时与编者也密切相关。教育政策与课程标准为教科书编写提供方向性指导，而教科书编写是通过编者来具体完成的。教科书体现的是“有选择的传统”，它只是某些人的选择，只是某些人对法定知识与文化的看法，它参与决定了社会上什么样的知识会被认为是合法与真实的。<sup>①</sup>教科书的编写过程是政府与编者共同生产知识的过程。什么人能够承载教育国民、关乎民族国家发展的教科书编纂的重任？教科书编纂是否需要专门性知识？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何来衡量教科书的质量。本章拟从教科书编者方面，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前三章从政府教育政策方面讨论教科书编写，本章是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研究，拟从编者的知识背景、职业与专业、编者对政府教育目标以及课程标准的态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编者对教科书编写的影响。

---

<sup>①</sup> M. 阿普尔、L. 克里斯蒂安 - 史密斯主编《教科书政治学》，第4页。

## 一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概况

据笔者统计,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约有120人(不含译者)。<sup>①</sup>这里为叙述方便,先将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编者概况列举如下(见表4-1)。

表4-1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概况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教育背景	主要职业(清末民国时期)	
				教育·任教学校	编辑或其他
常璋璋	直隶饶阳		保定莲池书院	北京大学 <sup>[1]</sup>	于陆军部任职 <sup>[2]</sup>
汪承镛	江苏如皋				
陈懋治	江苏元和		南洋公学,留日	南洋公学附小	教育部金事、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等
姚祖义	浙江杭州		贡生		官员(知县)
吕瑞廷	湖北武汉				
赵激璧	江苏镇江				
沈恩膏	江苏苏州				嘉定县城议事会议员
潘武	上海				中华书局编辑
汪楷	江苏常州				
单毓元				泰州教育局局长	
黄人济	江苏苏州				
沈味之	江苏苏州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赵懿年	广西桂林			广东武备学堂	
汤济沧	江苏吴兴			上海文科专修学校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
窦士镛	江苏无锡	1844~1909		东林书院	
吴曾祺	福建侯官	1852~1929	光绪举人		商务印书馆编辑

<sup>①</sup>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除中国编者外,还有日本编者,这里只讨论中国编者。

续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教育背景	主要职业(清末民国时期)	
				教育·任教学校	编辑或其他
杨逊斋	浙江慈溪	1858 ~ 1939	光绪举人	澄衷学堂、浙江求是学堂、京师大学堂等	
褚传诰	浙江天台	1860 ~ 1940		山西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两广方言学堂、台州中学 <sup>[3]</sup>	
陈庆年	江苏丹徒	1862 ~ 1929	南菁书院, 优贡	江浦县教谕	江楚编译局和江南图书馆
刘乃晟	河北衡水 <sup>[4]</sup>	1862 ~ ?	保定莲池书院		萍乡知事等 <sup>[5]</sup>
夏曾佑	浙江杭州	1863 ~ 1924	进士	天津育才馆	官员, 北京图书馆馆长 <sup>[6]</sup>
李岳瑞	陕西咸阳	1863 ~ 1927	进士		官员, 民国后为史馆编修
丁宝书	江苏无锡	1865 ~ 1935	南菁书院, 恩科副贡	无锡三等公学堂	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
赵玉森	江苏镇江	1868 ~ 1945	南菁书院		商务印书馆编辑
叶维善	江苏扬州		江苏南菁高等学堂 <sup>[7]</sup>	灌云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江苏师范教育研究会会员 <sup>[8]</sup>
庄启传	江苏镇江	1870 ~ ?			
周世棠	浙江奉化	1871 ~ 1940			
戴克敦	浙江杭州	1872 ~ 1925	秀才	杭州求是书院	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 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
傅运森	湖南宁乡	1872 ~ 1946			商务印书馆编辑
蒋维乔	江苏武进	1873 ~ 1958	南菁书院, 常州致用精舍		商务印书馆编辑、官员
徐念慈	江苏常熟	1874 ~ 1908	秀才		《小说林》月刊主编
秦瑞玠	江苏无锡	1874 ~ ?	留日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吴县地方审判厅推事、代理农商部次长

续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教育背景	主要职业(清末民国时期)	
				教育·任教学校	编辑或其他
李恢伯	浙江湖州	1874 ~ 1933		湖州府学堂	湖州商会会长 <sup>[9]</sup>
许志毅	江苏武进	1875 ~ 1923	留日	南洋公学、金陵女子高等师范 <sup>[10]</sup>	商务印书馆编辑 <sup>[11]</sup>
夏清贻	江苏嘉定	1876 ~ 1940	留日		创办集成图书公司、开明书店,官员 <sup>[12]</sup>
汪荣宝	江苏吴县	1878 ~ 1933	拔贡留日	京师译学馆	官员
柳诒徵	江苏镇江	1879 ~ 1956	三江师范学堂	两江师范学堂、东南大学等校	于江楚编译局任职 <sup>[13]</sup>
李法章	江苏武进	1880 ~ ?	江西优级师范学堂	武进县立第八高等小学校、无锡竞志女子师范学校 <sup>[14]</sup>	
章铤	浙江杭县	1880 ~ 1931	举人	浙江高等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等	《地学杂志》主笔 <sup>[15]</sup>
钟毓龙	浙江杭州	1880 ~ 1970	举人	杭州宗文中学	浙江通志馆副总纂
曾鲲化	湖南新化	1881 ~ 1925	私塾,留日		官员
沈颐	江苏常州	1881 ~ 1946	常州龙城书院	上海澄衷学堂	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 <sup>[16]</sup>
罗元鲲	湖南新化	1881 ~ 1953	湖南中路师范学堂	湖南新化中学	
张肇桐	江苏无锡	1881 ~ 1938	南洋公学,日本、比利时		创办《江苏》杂志、官员
萧友梅	广东中山	1883 ~ 1940	留学日本、德国,举人	创办国立音乐院,后改名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广东省教育司学校科科长
印水心	江苏盐城	1883 ~ 1968	京师大学堂		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校理,《神州日报》《民权报》《新闻报》主笔及广学会编辑 <sup>[17]</sup>



续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教育背景	主要职业(清末民国时期)	
				教育·任教学校	编辑或其他
刘师培	江苏仪征	1884~1919	举人	北京大学	《民报》编辑,创办《天义》《衡报》《国故月刊》等
吕思勉	江苏武进	1884~1957		东吴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等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
富光年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sup>[18]</sup>	浙江省教育厅视学	
钱宗翰	浙江仁和				浙江省议会议员
赵铎铎	江苏东台				
吴研因	江苏江阴	1886~1975	上海师范学校	江阴县立单级小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	菲律宾《公理报》总编辑,南京教育部官员
陆光宇	广东信宜	1886~1959	两广方言高等学堂		主要从事法律工作 <sup>[19]</sup>
金兆梓	浙江金华	1889~1975	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	北京高等师范、大夏大学	中华书局教科图书部部长、编辑所副所长、新中华杂志社社长
蔡河因	浙江嘉兴 <sup>[20]</sup>	1890~1955	留日	浙江省立五中、省立二中等	世界书局编辑
王钟麒	江苏吴县	1890~1975	苏州公学	北京大学	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
顾颉刚	江苏苏州	1893~1980	北京大学	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等	商务印书馆编辑
卢秉征	河北乐亭			百善小学、北京师大附中 <sup>[21]</sup>	
郑昶	浙江嵊县	1894~1952			中华书局编辑,创办汉文正楷印书局、画社
孟世杰	河北大兴	1895~1939	北京高师	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 <sup>[22]</sup>	

续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教育背景	主要职业(清末民国时期)	
				教育·任教学校	编辑或其他
朱翊新	江苏吴江	1896~?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世界书局编辑
朱文叔	浙江桐乡	1896~1965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上海大夏大学附中和东吴大学兼课	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教科书编辑部部长
李泰荃	河北阳原	1897~1968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宋云彬	浙江海宁	1897~1979			报刊编辑、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国文讲义》与《中学生》杂志主编、香港文化供应社编辑
周予同	浙江瑞安	1898~1981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厦门大学、安徽大学	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教育杂志》主编
缪凤林	浙江富阳	1898~1959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中央大学	《史学杂志》《国风半月刊》编辑
朱公振				于苏州任教	世界书局编辑 <sup>[23]</sup>
陆东平					世界书局编辑 <sup>[24]</sup>
陈登原	浙江余姚	1900~1975	东南大学	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世界书局编辑
杨东莼	湖南醴陵	1900~1979	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师范学校	
陈其可	江苏苏州	1901~1988	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留法	武汉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 <sup>[25]</sup>	
梁园东	山西忻县	1901~1968	北京大学	上海劳动大学、浦东中学、大夏大学、武汉大学	大东书局编辑

续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教育背景	主要职业(清末民国时期)	
				教育·任教学校	编辑或其他
杨人楦	湖南醴陵	1903 ~ 1973	北京师范大学,留英	四川大学、西北联大、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	
李清悚	江苏南京	1903 ~ 1990	东南大学,留日、留美	南京第一中学,政治大学、中央大学	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重庆) <sup>[26]</sup>
储祎	江苏宜兴	1904 ~ 1988			北新书局编辑,创办东方书店 <sup>[27]</sup> ,创办《时事课本》周刊 <sup>[28]</sup>
姚绍华	浙江金华	1905 ~ ?	上海大夏大学	浙江诸暨县立中学	中华书局编辑所编辑,《新中华》与《中华教育界》主编
余逊	湖南常德	1905 ~ ?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谢兴尧	四川射洪	1906 ~ ?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等	
邢鹏举	江苏江阴	1908 ~ 1950	光华大学		
徐映川					于江苏省教育厅任职
白进彩	陕西米脂		北京大学	绥德师范学校	
易仁菱	湖南湘阴	1908 ~ 1990	湖南一师、清华大学 <sup>[29]</sup>	湖南一师、民国大学	
孙正容	浙江瑞安	1908 ~ 1985	东南大学	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	
罗香林	广东兴宁	1909 ~ 1978 <sup>[30]</sup>	清华大学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	
应功九				复旦大学 <sup>[31]</sup>	
卢文迪	浙江临海	1910 ~ 1982	中国公学		中华书局编辑、《新中华》杂志主编
周景濂	江苏常熟			常熟中山中学	
陈旭麓	湖南双峰	1918 ~ 1988	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		贵阳文通书局兼职编辑干事

续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	教育背景	主要职业(清末民国时期)	
				教育·任教学校	编辑或其他
宋延庠				朝阳大学 <sup>[32]</sup>	
聂家裕					国立编译馆编辑

注：[1] 见国学网近代日记史料库，[http://www.guoxue.com/cp/jxdj\\_ty.htm](http://www.guoxue.com/cp/jxdj_ty.htm)。

[2] 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徐天祥点校，黄山书社，1989，第294页。

[3] 天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台文史资料》第5辑“天台历史名人专辑”，1989，第180~181页。

[4] 一说是东北人，见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萍乡文史资料》第1辑，1984，第115页。

[5] 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第303页。

[6]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989页。

[7] 《又奏核江苏南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生奖励折》，《政治官报》第965期，第9页。

[8] 灌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灌云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744页。

[9] 李学海：《我的父亲李恢伯》，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州文史》第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95~97页。

[10] 秦榆编著《骚客的传记》，京华出版社，2006，第369页。

[11]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第43页。

[12]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第989页。

[13] 《柳诒徵年谱简编》，载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第349页。

[14] 吴之光：《民国前黄小学前身史略》，<http://blog.cz001.com.cn/?uid-169018-action-viewspace-itemid-1272895>。

[15] 贾逸君编《民国名人传》，岳麓书社，1993，第410页。

[16] 叶舟：《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沈颐的生平与成就》，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98~310页。

[17] 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盐城市志》中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第2764页。

[18]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536页。

[19] 陆光宇在清末有革命之志，“朱执信先生领导青年倡行革命，公欣然加盟”，参阅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5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第255页。

[20] 原籍诸暨，参阅乔晓军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2编，三秦出版社，2007，第502页。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乐亭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乐亭文史》第4辑，1989，第96页。

[22] 陈玉莹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851页。

[2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9）·昔年文教追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第101页。

续表

[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文史资料辑存》第6辑, 1966, 第10页。

[25] 江苏省昆山中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昆山中学史(1946~2006)》, 方志出版社, 2006, 第4页。

[26] 梁实秋著, 张昌华编《槐园梦忆》,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第266页。

[27] 李伟:《痛抚伤痕话当年——我在八年抗战中》,《文史春秋》2007年第1期。

[28]《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出版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29] 孙海林主编《湖南第一师范名人谱(1903~1949)》,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2003, 第344页。

[30] 一说出生于1906年。

[31] <http://chinese.fudan.edu.cn/zhongwenxi/historynow/zhongwenxishi.asp>。

[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灌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灌南县文史资料》第1辑, 1985, 第96页。

资料来源: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中国人名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等等。

表4-1统计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有相关信息的有90人, 占编者总数的2/3。这些编者从整体上来看有如下特点。第一, 江浙两省人士占多数。从地域来看, 编者中已知籍贯的有82人, 其中江苏人最多, 为37人; 其次是浙江人, 有20人, 江浙两省在一起超过50人, 占已知籍贯编者的一大半。由此可见, 编者之间存在地缘关系是历史教科书编者中一个突出特点。第二, 多数为大学教授和书局编辑。从职业来看, 编者中担任大学(师范学校)教职的约有36人, 担任过书局编辑的约有32人, 约占已知职业情况的编者的一半, 其中不乏史学专家。下面即讨论编者这种特点对教科书质量的影响。

## 二 编者之构成: 地缘与学缘

民国书局人员中, 亲缘、地缘和学缘的关系较为普遍。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30年代初, 商务印书馆对总馆全体职员籍贯进行统计, 江苏占46.03%、浙江占45.39%,<sup>①</sup>江浙两省共占近92%, 地

<sup>①</sup> 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 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商务印书馆, 1992, 第755页。

缘特色特别明显。负责教科书编写的编译所也是如此，商务编译所内素有“闽派”“绍兴帮”“常州帮”之说，编译人员主要来自江苏、浙江与福建三省，而各省内又有所集中，江苏主要来自常州，又以武进为多，浙江主要来自绍兴，福建主要来自闽侯。<sup>①</sup>

地缘或学缘的关系在历史教科书编者中也是如此。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商务印书馆常常对外招聘工作人员，但要进编译所工作“却不容易，第一要问有无需要，第二要看申请人有无才力”。<sup>②</sup>除了真才实学之外，同乡与同事等关系在进入书局时也较重要。商务印书馆人员中，创办人夏瑞芳邀请张元济、沈知方等人，张元济聘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人，被邀请的人或有声望或有才能，与商务邀请人有一定的交往。夏曾佑与李岳瑞为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是因为其与张元济的关系。夏曾佑、李岳瑞与张元济都曾赞成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三人先后来到上海。张元济进商务印书馆任职后，夏曾佑与张元济“在上海为邻居，往还甚密，谈话大都涉及改良时政和文化出版事业，特别感到史学书籍的重要作用，而中外史著卷帙浩繁，文笔艰深，亟应有简化的、普及的课本问世，以满足读者需要。于是张元济就约夏曾佑写《中国历史教科书》”，“还没有写到近代，即由张元济付印出版”。<sup>③</sup>李岳瑞是张元济好友，1905年来到上海后，应张元济邀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一度在中国公学兼任国文课程，在上海期间他还为《甲寅》杂志撰稿。<sup>④</sup>

蒋维乔通过蔡元培而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亦担任爱国学社总理。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计

① 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第71页。

② 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46页。

③ 伍蠡甫：《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78页；另见该书第135页。

④ 陈国庆：《李岳瑞传略》，载韩学儒、吴永涛主编《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第83页。

划编写教科书，“但一时不易聘请到编辑人员，并且怕开支太大，决定暂时由他约请爱国学社中蒋维乔等教师在课余时间从事编辑，编成后按每课一元计酬”。<sup>①</sup> 其时蒋维乔在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国文编辑。蒋维乔进入商务后，又推荐常州同乡庄俞进馆。蒋维乔、庄俞与沈颐等人不仅是同乡，还是常州龙城书院的同学。<sup>②</sup> 1919年吕思勉入商务任编辑是经同乡谢利恒的介绍。谢家世代行医，在江苏武进颇有名气。吕思勉舅家为武进名医，与谢家有交往。时谢利恒在商务编辑医学辞典，而且急于成书，就邀请吕思勉入馆一起编辑。<sup>③</sup>

顾颉刚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则是由于老师胡适的推荐。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商务印书馆因为“保守”受到新文化派指责。商务欲聘请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未就职商务，却推荐一些他的老师、学生去商务任职，如推荐其中国公学的老师王云五做编译所所长、北京大学的学生顾颉刚去编辑教科书。顾颉刚由于胡适的介绍，1922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国语和本国史教科书，由叶圣陶、王伯祥两位协助编辑。<sup>④</sup> 而叶圣陶与王伯祥恰是顾颉刚中学同学。<sup>⑤</sup> 王伯祥又介绍宋云彬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以后宋云彬去开明书店任编辑时，王伯祥也任开明书店编辑。<sup>⑥</sup>

中华书局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华书局发起人陆费逵、戴克敦、沈颐、沈继方等人，大多为商务印书馆时期的同事。<sup>⑦</sup> 中华书局创

①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08页。

② 叶舟：《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沈颐的生平与成就》，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第301页。

③ 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第75页。

④ 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95页。

⑤ 王湜华：《王伯祥与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77页。

⑥ 俞筱尧：《从编辑到编辑——宋云彬先生文化苦旅六十年》，《学林漫录》第15集，第14页。

⑦ 钱炳寰：《谈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出版史料》1992年第4期。

办后，“于商务发行、编辑两方面，且招致多人，入中华书局，以厚其力”。<sup>①</sup> 1914年吕思勉经中华书局创办者之一沈颐介绍，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张相任中华书局编辑所副所长时，与潘武合作编过中华书局第一套中学历史教科书。张相在中华书局时，其学生金兆梓、郑昶、朱文叔都来做编辑。<sup>②</sup> 而另一位在中华书局出版《新制本国史教本》的钟毓龙，则是张相的好友。<sup>③</sup> 姚绍华进入中华书局也是因为老师的引荐。姚绍华是金兆梓的学生。金兆梓在大夏大学授课，讲授中国通史，姚绍华从大夏大学毕业后即入中华书局工作。<sup>④</sup>

金兆梓进入中华书局，除了老师张相的关系外，也有创办者陆费逵的因素。金兆梓出身于浙江金华知识分子家庭，父兄皆是有一定名望之人。其二哥金兆炎为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与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相识，被中华书局聘为交际员，由他与教育部机关联系，为中华书局所出教科书审查通过取得方便。因此陆费逵也早已知道其弟金兆梓。<sup>⑤</sup> 金兆梓1923年受聘任中华书局编辑，1929年任编辑所副所长，1942年任总编辑兼编审部长。

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发行最重要的两大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大多有同乡、同学或师生之谊。其他书局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张肇桐、汪荣宝、徐念慈等不仅是江苏同乡，还都是留日同学。柳诒徵到江楚书局任职，则是由于陈庆年的举荐。陈庆年为柳诒徵的镇江同乡，也是柳诒徵父亲的学生。<sup>⑥</sup> 开明书店同事间的同乡

- 
- ① 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丁编》下册，第399页。
  - ② 赵俊：《怀念雄才大略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载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02，第6页。
  - ③ 吴铁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8页。
  - ④ 陈伯吹：《我和中华书局》，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112页。
  - ⑤ 吴铁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31页。
  - ⑥ 《柳诒徵年谱简编》，载柳曾符、柳佳编《勉堂学记》，第348页。



关系更为明显，甚至被认为是“同人书店”。<sup>①</sup>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于1926年创办《新女性》杂志，以此为中心创办了开明书店。后来夏丏尊、刘叔琴、丰子恺、胡愈之、郑振铎、孙伏园等加入，王伯祥、叶圣陶等也离开商务印书馆前来帮忙。

地缘和学缘关系在书局职员中的普遍存在，影响到书局的出版业务与文化选择。如早期商务印书馆所出文、哲、政、经类书刊中，福建作家占有相当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当时以张元济、高梦旦为首的浙闽旧知识分子在商务印书馆中的重要影响，而高氏兄弟和当时福建人士如严复、林纾等有同学、同年的交谊。<sup>②</sup>杜亚泉任商务编译所理化部部长时，商务印书馆最初出版的博物、理化、算学等教科书都由他设计编辑。<sup>③</sup>编译人员主要是以地缘、学缘为基础的群聚，会不会降低编者的专业要求，从而影响教科书的质量？编者的地缘与学缘关系，或许可以引起人们对社会意识形成与观念变化等问题的思考。

### 三 编者的职业与专业：编辑与史家

从表4-1可见，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一般都接受过传统教育或高等教育，清末的编者都有一定的功名，或有留日经历。从职业来看，他们大多是书局编辑或大学教授，甚至二者兼任。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大致可分两种情况：专职编辑与史学专家。

首先是专职编辑。作为书局编辑的教科书编者，编辑是他们的职业，编写教科书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对历史未必有专门研究，不仅编写历史教科书，还编写其他科目的教科书。一些书局编译所中，历史与地理合在一起成立史地部，史地部编辑既编译历史教科图书，

① 参见刘积英、张新华《同人书店与商人书局——从融资方式看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发展》，《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6页。

③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2页。

也编译地理教科图书。这类编者主要有夏清贻、徐念慈、蒋维乔、吴研因、金兆梓、朱翊新、傅纬平等人。他们编写的教科书种类较多，大多包含有历史、地理与国文等科。编译历史教科书的既编有本国史，也编有外国史；编译地理教科书的既编有自然地理，也编有人文地理。有的编写科目跨度较大，如徐念慈就编纂历史与算术；吴研因编纂的有历史与国文，校订的有工艺、音乐、社会等科；金兆梓主要编写历史教科书，校订的科目涉及英语、物理、公民、常识等；朱文叔编写的有修身、地理、论理（逻辑）、国文（国语），校订的有图画与公民等科；朱翊新在编写历史、地理、国文外，还编有常识、社会与三民主义等教科书；而蒋维乔编校的科目更多，含国文、历史、地理、论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商业、唱歌等，地理一科中，就涵盖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与中国地理（见附表4-1）。

一人编校多个科目教科书的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书局编辑的“职业”特点。金兆梓在回忆起民国时期编辑历史教科书时说：“我既不搞历史，又不搞教育，怎么会在团团转当中又从历史转到教科书上来了呢？这当然有个缘故。我头两次进中华书局，是我在中学里的文史老师张相——张献之先生。我初次进中华书局，他正在主持文史地的中小学教科书。我一进局，他就教我编著一部新学制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我推说历史非素所习，不好胡乱搞。他鼓励我并且允许我尽量帮忙。师命难违，我只好担任下来。”<sup>①</sup>金兆梓原先学的矿冶，喜欢的学科是化学，而进书局后却编起了历史教科书，并担任地理等其他学科教科书的审校。金兆梓走上历史研究之路，是在参加编写历史教科书之后。还有一些编者在学界非以历史研究闻名，如丁宝书、郑昶等以画家身份闻名，许志毅、吴曾祺等以文学家身份闻名。对他们来说，教科书编写只是他们从事的一项

<sup>①</sup> 金兆梓：《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27～228页。

工作。

对书局来说，编者是否从事专门与精深的研究并不重要。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原因是商务编辑教科书不重研究的做法不满，虽然是商务的编辑，却与学问无关：“馆中主持的人，一方面逼人努力出货，一方面禁止人家的读书研究。在他们想，做了研究就迟了出货；而在我们想，没有研究便无从出货。这两个抵牾的观念，使我感受到在馆服务甚是乏味的事。”<sup>①</sup> 商务印书馆出于商业考虑，要求编辑们按照学期情况跳着编写，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种教科书编写几乎与学问无关。书局对编者没有特别的专业要求，也不鼓励他们从事专业研究，“实际上，编译所并不需要编译员具备多么高深的文化知识，他们只要求编译员能够将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善加利用——阅读、寻觅、摘抄、整理、编辑、成书”。<sup>②</sup> 这种情况或如1930年代论者所道：“我国兴办现代教育以来，不过三十年。学校中所用的教科书，向来是全仗着几个大印书公司所编辑的。全国儿童所用的教科书除却了译本之外，到如今大半还是所谓‘编辑所中几本洋书，几把剪刀之工作’。”<sup>③</sup> 这些编者的主要职责是编辑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教科书，能够给书局带来利润与利益。编写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教科书，要求浅显易懂，未必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专业研究的教科书编写，很自然会影响到教科书的质量。他们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按照政府教育要求，按部就班，以致在形式上千篇一律，内容上大多因循抄袭，缺乏新意，甚至引起教科书抄袭之争与版权诉讼。

其次是史学专家。这类专家型编者大多是教师，从事教育事业，与书局关系很近，或做书局编辑，徘徊在书局编辑与大学教师之间。

①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76页。

② 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第73页。

③ 汪祥庆编《中等学校各种教学用书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262页。

这类编者中间不乏学界名人，像陈庆年、柳诒徵、夏曾佑、刘师培、章楫、吴曾祺、金兆梓、顾颉刚、吕思勉、梁园东、罗香林、缪凤林、周予同等，都是清末民国时期的知名学者。这里将这种编者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历史专业著作列举如下（见表4-2）。

表4-2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的历史专业著述

姓名	主要著作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中国教育史》《满清年间》
窦士鏞	《历朝文学史》《皇朝掌故》《澹远轩文集》《绮云楼诗集》
曾鲲化	《中国铁路史》《中国交通史》《交通统计》《政余随笔》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诗集校》
刘师培	《群经大义相通论》《中国中古文学史》等
章楫	《中华历史地理大辞典》《中华通史》
李岳瑞	《春冰室野乘》《郢云词集》
陈庆年	《兵法史略学》《春秋兵史》《吴越战史》《陶隐居年谱》《沈梦溪年谱》《杨文襄公年谱》《吴勤惠公年谱》《西石城乡土志》《两淮盐法志》
钟毓龙	《中国神话史》《浙江地理考》《科场回忆录》
吕思勉	《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中国民族史》等
顾颉刚	《古史辨》《尚书通检》《当代中国史学》等，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
王钟麒	《旧学辨》《四库全书述略》
金兆梓	《国文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史纲》《菴厂治学类稿》
李泰棻	《西洋大历史》《国民军史稿》《西周史证》《方志学》
印水心	《盐城县乡土地理》《盐城县乡土历史》
梁园东	《中国文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外史》《中国文学史》
杨人榘	《非洲史纲要简编》《圣鞠斯特》，译著有《法国大革命史》《法国革命史》
姚绍华	《崔东壁年谱》《美国史》
周子同	《朱熹》《群经概论》《汉学与宋学》
邢鹏举	《勃莱克》《中国近百年史》《历史学习法》，译有《波多莱尔散文诗》
孟世杰	《中国最近世史》《先秦文化史》《化石期之文化》
缪凤林	《中国通史纲要》《日本论丛》
谢兴尧	《书林逸话》《堪隐斋杂著》《堪隐斋随笔》，整理《荣庆日记》
陈登原	《荀子哲学》《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文化史》《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制丛考》《中国田赋史》《国史旧闻》

续表

姓名	主要著作
罗元鲲	《中国近百年史》《史学研究》《中国史表解》
宋云彬	《中国近百年史》《东汉之宗教》《王守仁与明理学》《中国文学史简编》
罗香林	《中国民族史》《中国族谱研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
卢文迪	《中国近代史》《国际政治形势图解》
蔡沅因	《清代七百名名人传》
余逊	《晒蓝本汉简释文》(合著)、《汉魏晋南北朝东北诸郡沿革表》
陈旭麓	《近代史思辨录》《近代中国八十年》
杨东莼	译著有《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
孙正容	《朱元璋系年要录》《中国通史讲义》

资料来源：同表 4-1。

表 4-2 统计的从事历史研究、有历史著作的编者 30 多人，约占本章所统计编者的 1/3。这些史学专家在编写教科书时，往往把学术研究与教科书编写相结合，把教科书编写作为自己研究的一部分。史学专家编写的教科书，往往会把自己的观点带入其中，使得教科书与一般历史著作区别不大，如顾颉刚、吕思勉、周予同等人的学术观点在其所编的教科书中都有所体现。一些教科书被视为历史著述，如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后以《中国古代史》为名多次再版；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高中用）上、下两册，在 1940 年代，分别以《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两书出版；<sup>①</sup> 陈登原把他所编的《高中本国史》视为其编写通史理想的一个实践。<sup>②</sup> 一些教科书也是编者学术专著的简本，如章铤《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其《中华大历史》的简本，缪凤林《高中中国史》是《中国通史纲要》的简本。这些教科书中，编者的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在

① 李志茗：《金兆梓的生平与学术》，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第 292 页。

②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33 年 7 月初版，9 月 3 版，“序例”第 2 页。

教科书中有所体现，与政府的教育要求或有不同，有些被政府查禁，甚至被起诉，产成教科书案。

#### 四 编者与政府之分合

编者的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编写，同时，编者的政治素养也会有重要的影响。下面从编者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方面来讨论。

清末的中国编者大多受到新式思想的感染，有改良或革命倾向。具有改良倾向、支持维新变法的编者有丁宝书、秦瑞玠、夏清贻、常培璋、夏曾佑、李岳瑞等人，他们或支持维新变法，或直接参与了变法实践。丁宝书就读于江阴南著书院，戊戌变法时期，他与吴稚晖等人在无锡创立三等学堂，讲授新学。<sup>①</sup> 秦瑞玠参加由郑孝胥、张謇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宣传宪政知识，推动清廷立宪。<sup>②</sup> 夏清贻倾向维新变法，关注民族危亡，撰有系列文章《自新篇》，探索救亡图存之道。<sup>③</sup> 常培璋关心时事，经常阅读报刊、西学书籍，倾向变法。<sup>④</sup> 夏曾佑、李岳瑞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多有交往，同情和支持变法活动，主张君主立宪。夏曾佑在维新变法中没有参加实际的变法活动，李岳瑞则与人联络在京的陕西籍官员发起组织了“西学会”，作为赞同变法维新的团体。李岳瑞还曾上书光绪帝，提出废除跪拜礼、易服制、用客卿等主张。<sup>⑤</sup>

编者中还有一批是具有“排满”革命思想的人，如曾鲲化、刘师培、张肇桐、徐念慈、汪荣宝、蒋维乔等，他们大多是留日学生。

①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19页。

② 黄志良：《日本立宪与辛亥革命》，载《海门日报》2011年10月8日B1版。

③ 夏清贻曾经撰有《自新篇》，发表于《格致新报》，见王伟《格致新报与戊戌维新》，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第22页。

④ 参阅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http://www.guoxue.com/cp/jxdj-ty.htm>。

⑤ 陈国庆：《李岳瑞传略》，载韩学儒、吴永涛主编《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第78页。

东新译社《中国历史》编者横阳翼天氏即为曾鲲化，青年时在湖南新化实学堂求学，与陈天华结为好友，其后赴日本留学，担任湖南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编辑，并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结识蔡锷等革命人士，加入同盟会。<sup>①</sup>张肇桐与汪荣宝等江苏志士发起成立革命组织青年会，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为留学界组织革命团体之嚆矢”，<sup>②</sup>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张肇桐以“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的署名，著有小说《自由结婚》，<sup>③</sup>书中借新式学生之口说道：“第一句，本朝不应该做我们的皇帝；第二句，皇帝是小丑，应该杀的；第三句，革命是百姓极好的事情。”<sup>④</sup>鼓吹民族主义，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徐念慈早先在家乡常熟与人创立中西学社，1903年，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成立，以教育掩护反清革命，徐念慈曾任主持人，后加入兴中会。徐念慈与曾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专以小说鼓吹革命。<sup>⑤</sup>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1903年到上海后，结识了爱国学社的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革命者，迅速投入到反满革命宣传中，“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sup>⑥</sup>刘师培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刊《俄事警闻》，“针砭时政，阐扬革命”，发表《中国民族志》《攘书》等，以汉族为主，具有强烈的汉族立场。在安徽公学任教时，刘师培“用革命思想讲授历史与伦理学，公开宣传反满反清革命”。<sup>⑦</sup>刘师培编

① 兆蓉：《记曾鲲化先生》，载黄昌勇、陈华新编著《老交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第231页。

② 《秦毓盛事略》，载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09，第98页。

③ 《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载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册，第442页。

④ 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自由结婚》，载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6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第441页。

⑤ 《周桂笙与徐念慈》，载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51~262页。

⑥ 汪东：《序》，载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影印本）上册，凤凰出版社，1997，第26页。

⑦ 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第90页。

辑《中国历史教科书》时，正是其用“光汉”名字、反满革命思想高涨之时，因为教科书需清学部审定，而改署名“师培”。<sup>①</sup> 蒋维乔1902年时起抛弃了先前的西学救国思想，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以教育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sup>②</sup> 文明书局创办人之一廉泉，在京任职期间，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其中有苏曼殊、徐锡麟、秋瑾等，后来又结识了孙中山，曾被指控为“附逆”而不顾，隐然有革命倾向。<sup>③</sup> 清末这些编者或改良或革命的思想倾向在其所编教科书中有所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党化教育，教育沦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民初兴盛一时的教育独立思潮式微。一些教科书编者有着对历史教育的思考，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教育政策和党化教育的态度。

对国民党党化教育，一些编者就表示反对。金兆梓认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不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本体，其态度是科学的；历史教学的对象是历史的作用，其态度是教育的。<sup>④</sup> 中学教科书教学目的应该是：“据过去各民族的活动，取其和现代生活有影响的各方面，加以综合的观察，比较其异同厉害，以期明白我民族整个的现代生活所由来，并认识其在各民族间的单位，而定今后活动的方针。”历史教科书编写必须以现代生活为中心，所选取的材料要与现代生活有关。<sup>⑤</sup> 金兆梓并非全部认可当时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目的，认为历史教育主要是传授历史知识，鉴往知来，为当下的情况提供历史的解释，而并不是维护党国的统治。

杨人楩也对党化教育表达了反对态度。杨人楩认为，教育的功用在于延续及增进人类的文化，政治是被包含在文化层面的，什么

① 郑裕孚：《刘申叔遗书后序》，载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影印本）下册，第2048页。

② 何宗旺：《蒋维乔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9页。

③ 张梅：《文明书局教科书出版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16页。

④ 金兆梓：《历史教学的我见》，《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

⑤ 金兆梓：《中学历史教材的商榷》，《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4期，1931年10月，“教科书专号”。



样的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文化领导政治，故教育亦当领导政治。但实际情况是，政治在控制教育，其目的只在加强一种政权的统治，拿教育做政治上的工具而忽视其文化的功用，则属滥用教育。教育被滥用以后，教育本身一定会遭受损害，奴化教育只可培育奴才，纵不使文化灭绝，至少会使文化落伍、停滞或延迟进步。“我们今日的教育，无疑是被滥用了的教育。自从有所谓党化教育以来，教育即已丧失其独立的意义。一切为了党，教育也是为了党。教育的目的并非是培育优良的公民，更非为延续文化，只是为着便于党的统治，为着加强党的统治。”杨人榭指出，“为着要贯彻教育的功用，我们不能不反对教育之被滥用；为着要使教育免于滥用，我们不能不要求自由教育。统制教育可以培植出奴才与乡愿，同时却也会培植出叛徒，可见教育是滥用不得的。惟有尚宽容而少干涉的自由的教育始可培植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民”。<sup>①</sup>

对国民政府推行“国定本”教科书，一些编者非常不满。金兆梓认为，教科书定于一尊，是专制时代帝王统制人民思想的产物，“到了秦始皇死后已二千多年了，竟还要师其愚黔首的伎俩”；“现在大家不是嚷嚷要民主吗？要尊重人民的自由吗？为什么还要使中小学教师与学生连选择自己所用教学工具的自由都没有呢？若照思想自由的原则讲，连课程标准中的各科教学大纲，规定了一条条的教材，似乎也还没有跳出汉唐元专制帝王的窠臼”。<sup>②</sup>金兆梓对“国定本”教科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不满，显示了其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杨人榭也反对“国定本”教科书，认为这是国民党加强思想控制的手段。

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加深，中国民族面临深重的危机，倡扬民族主义成为教育的重点和教科书编写的一个指针。一些编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功用，激发国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但

<sup>①</sup> 杨人榭：《教育的滥用》，《新路周刊》第2卷第3期，1948年11月。

<sup>②</sup> 金兆梓：《我也来谈谈国定本教科书》，《新中华》复刊第5卷第4期，1947年2月。

是，利用历史教育来启发民族意识，会不会影响到历史的真实性，有些编者表示了担忧。吕思勉认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坚持求真立场，反对利用历史教育来激发学生爱国精神，认为那样会有违历史真实之道。在吕思勉编著的几种历史教科书如1923年《白话本国史》、1924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1934年《高中本国史》中都注重“客观”事实。吕思勉把追求真相作为历史教育的指针，它也是其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立场。<sup>①</sup>

本节的目的不是系统地梳理教科书编者的历史教育思想，而是想通过他们的政治立场以及对历史教育的态度来说明，教科书的编者群体，其内部实际有很大差异，他们所编的教科书之间也会有所不同。这提醒我们，研究教科书要具体分析影响教科书编写的各种因素，不能笼统地以教育政策分析取代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

## 小 结

从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情况来看，把教科书编写作为职业的与以历史研究为志业的都存在。职业编辑编写教科书往往是为了应对学校教学需要，遵循政府的教育要求和课程标准，但编者没有自己的研究，这些教科书缺乏新意，很多观点来自他人甚至抄袭其他教科书，一般被认为是“流于教科”，没有学术价值。史学专家将教科书编写与自己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一些历史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对历史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在教科书编写形式上也有自己的考虑，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也是重要的学术著作，往往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但是，政府与学界对教科书评价不同，如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两种教科书《现代初中本国史》与《白话本国史》都得到学术界较高的评价。这里涉及一些问题：如何评判教科书质量？是从教科书学术性方面还是从完成教育目标方面来衡量？教科书应该坚持历

<sup>①</sup> 详见第十五章。

史的真实还是让历史服务于教育目标？历史教育是坚持“求真”还是维护统治？这是本章讨论的问题。<sup>①</sup>

民国时期，既是教科书编者，又是管理者的李清悚的一段话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教科书编辑与一种学术工作或行政事务不同，必具充分之研究功夫，学识修养与日俱进，亦即工作效能与学俱增。”教科书编辑应具备以下修养：“1. 对于当前国家政策与政治理论有充分了解与信仰。2. 对于教育理论及目前国家教育政策有相当修养与了解。3. 对于各专科学术具相当根底。4. 对于本国文字有相当素养，至少能行之流利畅达者。5. 有各该科教学经验。6. 有著作经验，最佳者能有编辑教科书经验，或至少能对于各现行教科书有相当研究。”这里提出了教科书编写学术方面的要求，但是，李清悚又指出：“流俗见解，均以为中小学之各科教师，仅须延用各科专家即能尽教学之事，实则不然。各科专家，仅足称某科学者，而非某科教师也。学校仅有学者而无教师，不足以尽教育之事，甚者或以反教育，此凡稍具办学经验者皆能道之。”<sup>②</sup>在李清悚看来，一般专家学者所编的教科书恰恰不能完成教育任务，自然不是好的教科书。教科书首要功能是实现国家教育目标，而不是传播学术知识。

在教科书质量的评判上，一般都是以能否体现政府教育目标为标准。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了编者与政府在教科书编写中的离分，教科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著述。因此，编者因素还需要考较。编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讨论的对政府教育政策的态度外，还需关注编者的地缘与学缘关系可能产生的潜在影

① 教科书质量不仅包括内容，还包括装帧、印刷、纸张等多个因素，这里主要指教科书内容。1930年代中期，华北基督教教育协会曾对协会中各中学教学用书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请教师对教科书做出评价，其中涉及部分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些评价集中于教科书是否适宜教学方面。参阅汪祥庆编《中等学校各科教学用书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2），第290～305页。

② 李清悚：《战时补充教材编辑工作之检述》（续完），《教育通讯》第2卷第38期，1939年。

响。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会不会表达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清末民国教科书中，一般所谓的质量不高、流于教科的教科书，多是从学术方面来评价的，而从政府层面来看，这类教科书因为缺少编者个人观点，比较忠实地执行了政府的教育要求，是一种“高质量”的教科书；反之，那些一般从学术方面认为是高质量的教科书，正是由于有编者的个人认识，而未必符合政府的教育要求。这种评价差异，反映了教科书质量评价上的难局，因此，对政府与编者来说，都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对政府而言，如何在统治的合法性与传授近代化知识之间，确立自己的教育目标；对编者而言，如何在历史知识传授与国民教育之间，确立自己的编史立场。对教科书研究者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思考。

附表 4-1 中国历史教科书部分编者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秦瑞玠	《蒙学东洋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	《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
	《蒙学外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	《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5
	《普通西洋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7	《共和国民新读本》，商务印书馆，1912
丁宝书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4	《小学分类简单画》，文明书局，1905
	《初等小学国文读本八卷》，文明书局，1907	《高等毛笔习字帖》，文明书局，1908
	《蒙学铅笔习画帖》，文明书局，1909	《中华民国新国文》，文明书局，1913
	《高等小学校新历史》，文明书局，1914	《高等小学校新历史教授书》，文明书局，1913
	《高等小学校毛笔新画帖》，文明书局，1914	
刘师培	《经学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5	《伦理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5
	《中国历史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5	《中国地理教科书》，国学保持会，1906
	《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6	《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7
	《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7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夏清贻	《普通地理读本》,王氏育材学堂编译所,1901 《龙门师范学校西洋史讲义》,开明书店,1906	《龙门师范学校讲义历史教授法》,开明书店,1906 《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开明书店,1905
徐念慈	《订正师范学校教科书中国地理》,商务印书馆,1906 《中国历史讲义》,宏文馆,1908	《近世算术》,1906
许志毅	《简明新国史教本》,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1909 合译《普通百科全书》100册 《重订中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 《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商务印书馆	《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3 《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1913 《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4
蒋维乔	《最新初等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04 《女子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07 《初等小学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8 《女子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 《简明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2 《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 《订正最新国文教授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4 《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7	《最新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5,1907 《简明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7,1909 《简易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 《论理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1 《订正简明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 《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 《各科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6
沈颐	《简明国文教科书(初小)》,商务印书馆,1907 《简易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 《订正女子国文教科书(初小)》,商务印书馆,1912 《订正初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 《订正高等小学女子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 《简明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2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甲种》,商务印书馆,1912	《女子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 《女子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1 《订正简明修身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2 《订正初小女子修身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2 《新国文:乙种(初小)》,商务印书馆,1912 《新修身》,商务印书馆,1912 《新修身:乙种》,商务印书馆,1912,1913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沈颐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商务印书馆,1912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甲种(高小)》,商务印书馆,1912
	《中国历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	《新国文:乙种(高小)》,商务印书馆,1913
	《新中华国文》,新国民图书社,1913	《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初小)》,中华书局,1913
	《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高小)》,中华书局,1913	《新编中华修身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
	《女子修身教科书》,中华书局,1914 - 1915	《女子国文教科书(高小)》,中华书局,1915
	《新制中华修身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1913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初小)》,中华书局,1912
	《新制单级修身教科书》,中华书局,1914	《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
	《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甲编》,中华书局	《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乙编》,中华书局
	《新式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5	《新国文》,中华书局,1915
	《新国文(高小)》,中华书局,1916	《订正新编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5
	《订正新制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5	《订正新编修身教科书》,中华书局,1915
赵征铎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中国图书公司,1907	《高等小学历史教授本》,中国图书公司,1907
	《高等小学新历史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3	《新历史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3
	《高等小学新历史参考书》,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5	《初中本国史》,民智书局,1932
赵玉森	《中学中国历史读本》,商务印书馆,1909	《中国历史教科书(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12
	《新历史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13	《(增订)普通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13
	《共和国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	《历史》,商务印书馆,1914
	《本国历史参考书》,商务印书馆,1915	《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商务印书馆,1915
	《新著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2	
潘武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	《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
	《伦理学大要》,中华书局,1913	《修身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
	《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	《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
	《新编中华历史教授书》,中华书局,1914	《实用修身伦理学讲义》,中华书局,1915
	《实用历史讲义》,中华书局,1915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吴研因	《新法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0	《新法历史教授书》,商务印书馆,1920
	《新法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0	《新法历史自习书》,商务印书馆,1920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	《小学教学法概要》,商务印书馆,1925
	《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1925	《小学历史科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9
	《民智国语标准读本》,民智书局,1931	《新中华小学教学法》,新国民书局,1932
	《国语新读本》,世界书局,1933	《小学历史科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33
	《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中华书局,1935	《初级小学国语新读本(改编本)》,世界书局,1937
	《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卫生、体育、劳作、 美术、音乐》,中华书局,1937	《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国语、社会、自然、 算术》,中华书局,1937
	《基本教科书国语》,商务印书馆	《国语新读本》,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
朱文叔	《历史》,中华书局,1921	《历史教案》,中华书局,1921
	《地理》,中华书局,1921	《地理教案》,中华书局,1921
	《地理课本》,中华书局,1923	《地理课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3
	《修身》,中华书局,1921	《修身教案》,中华书局,1921
	《公民课本》,中华书局,1923	《公民课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3
	《新教育教科书修身》,中华书局,1922	《新小学教科书地理课本》,中华书局,1923
	《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24	《国文读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4
	《初中国文读本》	《初中国文读本普及本》
	《新中华国语读本》,新国民书局,1927	《新中华国语与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28
	《新中华国语读本教授书》,新国民书局,1928	《新中华教科书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27
	《新中华教科书国语读本教授书》,新国民书局	《新中华外国地理教科书》,新国民书局,1930
	《初中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33	《小学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33
	《小学国语读本(五彩本)》,中华书局,1933	《高中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34
	《我们的国旗与党旗》,中华书局,1935	《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35
《新编高小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37	《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37	
傅运森 (傅纬平)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12	《东西洋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
	《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商务印书馆,1913	《共和国教科书东亚各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乙种》,商务印书馆,1913	《人文地理》,商务印书馆,1914
	《自然地理》,商务印书馆,1914	《东亚各国史参考书》,商务印书馆,1918
	《新法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2	《新法地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2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	《新撰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3	《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23
	《历史》,商务印书馆,1926	《本国史(修正本)》,商务印书馆,1947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洪莹	《修身教案》,中华书局,1921	《历史》,中华书局,1921
	《历史教案》,中华书局,1921	《新小学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23
	《新小学历史课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3	《公民课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3
	《国文读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4	《新中华历史课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8
	《南洋华侨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32	《南洋华侨历史课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32
吕思勉	《高等小学国语课本》,中国图书公司,1912	《高小国文课本(改正本)》,中国图书公司,1912
	《新编共和修身教授书》,南洋图书沪局,1913	《新编国文教科书(初小)》,南洋图书沪局,1913
	《高小新修身教授书》,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4	《新式地理教科书》,中华书局,1916
	《新式地理教授书》,中华书局,1916	《新式地理教授书》,中华书局,1916
	《新式历史教授书》,中华书局,1916	《新式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6
	《新法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0	《新法历史参考书》,商务印书馆,1920
	《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0	《新式地理教科书》,正中书局,1923
	《新学制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4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3	《修正本复兴高中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4
	《本国史(高中复兴丛书)》,商务印书馆,1935	《更新初级中级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7
《初中教本本国史》,中学生书局,1935		
王钟麒	《新学制地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	《新学制地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地理》,商务印书馆,1923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
	《爱国教材》,商务印书馆,1925	《现代初中教科书世界地理》,商务印书馆,1925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参考书》,商务印书馆,1927	《新时代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7
	《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商务印书馆,1929	《开明国文读本》,开明书店,1932
	《开明国文读本参考书》,开明书店,1932	《开明中国历史讲义》,开明函授学校,1934
	《中学国文科略读用书》,开明书店,1948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金兆梓	《国文法之研究》,中华书局,1922	《新小学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23
	《新小学历史课本教授书》,中华书局,1923	《初级本国历史》,中华书局,1923
	《初级世界史》,中华书局,1924	《初级本国历史参考书》,中华书局,1926
	《新中华外国史》,新国民书局,1930	《新中华本国史》,新国民书局,1928
	《新中华本国史》,新国民书局,1932	《南洋华侨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32
	《高中外国史》,中华书局,1934	《高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35
	《新编高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37, 1943,1948	《新编高中外国史》,中华书局,1937, 1945
郑昶	《新小学教科书地理课本》,中华书局,1923	《新小学教科书地理课本教授书》
	《新师范教科书图画教材概论》,中华书局,1924	《新中华教科书历史课本》,新国民书局,1928
	《新中华本国史》,新国民书局,1928	《三民主义》,新国民书局,1929
	《新中华本国史语体》,新国民书局,1930	《新中华外国地理》,中华书局,1932
	《新中华外国地理》,中华书局,1932	《新中华三民主义语体》,新国民书局
	《新中华建国方略语体》,新国民书局	《新中华党义课本》,新国民书局
	《新中华党义课本教授书》,新国民书局	《民众三民主义课本》,中华书局,1932
	《初中外国史》,中华书局,1934	《南洋华侨地理课本》,中华书局,1937
徐映川	《初中党义》,世界书局,1929	《中国的交通》,新中国书局,1932
	《世界的交通》,新中国书局,1932	《复兴常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3
	《复兴常识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33	《复兴初小常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7
	《复兴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37	
朱翊新	《高级历史课本》,世界书局,1925	《高级卫生课本》,世界书局,1925
	《三民主义读本》,世界书局,1926	《时令读本》,世界书局,1926
	《前期小学社会课本》,世界书局,1927	《初级国语读本》,世界书局,1928
	《高级小学卫生课本》,世界书局,1928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世界书局,1928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教学法》,世界书局,1928	《前期小学常识课本》,世界书局,1929
	《前期小学三民主义课本》,世界书局,1929	《各科题解》,世界书局,1929
	《初中历史》,世界书局,1929	《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29
	《初中历史指导书》,世界书局,1930	《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0
	《初中外国史》,世界书局,1930	《世界史》,世界书局,1930
	《民众历史读本》,世界书局,1930	《民众地理读本》,世界书局,1930
	《新课程社会课本》,世界书局,1931	《初中外国史指导书》,世界书局,1931
	《高小国语读本》,世界书局,1933	《社会课本:历史编》,世界书局,1933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朱翊新	《世界初小国语读本》,世界书局,1934	《朱氏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3
	《朱氏初中外国史》,世界书局,1934	《朱氏初中本国史指导书》,世界书局,1934
	《高小国语新读本教学法》,世界书局,1935	《新主义常识课本》,世界书局
	《新主义教科书历史课本》,世界书局	《社会课本高小新地理》,世界书局,1937
	《社会课本高小新历史》,世界书局,1937	《初小国语读本(修正本)》,世界书局,1937
	《高小国语读本(改编本)》,世界书局,1937	《初小国语读本教学法》,世界书局,1937
	《高小新地理》,世界书局,1937	《高小新社会教学法》,世界书局,1938
	《本国史纲》,世界书局,1939	《朱氏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9
	《近百年外国史》,世界书局,1939	《初小国语读本》,世界书局,1940
	《初小国语教学法》,世界书局,1939	《作文大纲一千题》,日新出版社
	《初中外国史表解》,世界书局,1943	《国语教材》,土山湾印书馆,1943
	《新国语:高等小学副课本》,世界书局,1945	《文句构造及修饰》,日新书局,1946
	《低年级作文练习书》,广益书局,1947	《小学升学指导各科试题解答》,教育书店,1947
	《初中国文:丙编》,大东书局,1948	《幼稚读本》,华成书局,1948
《小学暑期课本》,大东书局,1949		
黄人济	《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0	《初中外国史》,世界书局,1930
	《初级中学矿物学》,文化书局,1930	《初小国语教学法》,世界书局,1933
	《高小国语教学法》,世界书局,1933	《小学常识课本教学法》,中华书局,1933
	《我们住的地球(小学副本)》,中华书局,1935	《我们的特产(小学副本)》,中华书局,1935
	《一个麻面小孩(小学副本)》,中华书局,1935	《看不见的猛虎(小学副本)》,中华书局,1936
《四大宗教(小学副本)》,中华书局,1936	《常吃蔬菜(小学副本)》,中华书局,1936	
朱公振	《初中历史》,世界书局,1929	《幼稚园社会自然课本》,世界书局,1931
	《幼稚园社会自然课本教学法》,世界书局,1931	《幼稚园故事课本》,世界书局,1932
	《幼稚园故事课本教学法》,世界书局,1933	《模范国文》,世界书局,1939
	《基本国文》,世界书局,1939	《基本国语》,世界书局,1940
储祜	《后期小学北新历史教本》,北新书局,1932	《后期小学北新历史教本教授书》,北新书局,1933
	《高小社会课本历史编(修正本)》,北新书局,1934	《高小社会课本公民编教学法》,北新书局,1934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姚绍华	《 <u>初中本国史</u> 》,中华书局,1934	《 <u>中华本国历史</u> 》,1947
	《 <u>新中华语体本国史详解</u> 》,新国民书局,1932	《 <u>初中本国史参考书</u> 》
	《 <u>小学历史课本</u> 》	《 <u>初中外国史参考书</u> 》,中华书局,1935,1940
	《 <u>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本国史</u> 》,1936	
卢文迪	《 <u>历史</u> 》,中华书局,1936,1941	《 <u>初中外国历史</u> 》,中华书局,1937
	《 <u>中华外国历史</u> 》,中华书局,1947	《 <u>初中外国史参考书</u> 》,中华书局,1935,1940
张鸿英	《 <u>小学高级文体历史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24	《 <u>小学高级文体历史教授书</u> 》,中华书局,1924
	《 <u>小学高级文体地理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24	《 <u>小学高级问题理科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24
	《 <u>小学高级文体公民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25	
李直	《 <u>地理教案</u> 》,中华书局,1921	《 <u>新中华历史课本</u> 》,中华书局,1928
	《 <u>语体文法</u> 》,中华书局,1937	
周予同	《 <u>新学制国语教科书</u> 》,商务印书馆,1923	《 <u>开明本国史教本</u> 》,立达学园,1931
	《 <u>初中本国史</u> 》,开明书店,1934	《 <u>初中本国史(修正本)</u> 》开明书店,1934
	《 <u>初中本国史</u> 》,开明书店,1947	《 <u>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u> 》,开明书店,1946
	《 <u>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注释本):甲种</u> 》,开明书店,1946	
李清悚	《 <u>实验设计教材实施法</u> 》,南京书店,1932	《 <u>实验设计教材实施法:总说明</u> 》,南京书店
	《 <u>社会课本</u> 》,南京书店,1932	《 <u>健康课本</u> 》,南京书店,1932
	《 <u>社会课本教学参考书</u> 》,南京书店,1933	《 <u>择业指导</u> 》,大东书局,1933
	《 <u>我们的首都教学大纲</u> 》,儿童书局,1933	《 <u>小学卫生课本(初小、高小)</u> 》,中华书局,1933
	《 <u>小学卫生课本教学法(初小、高小)</u> 》,中华书局,1933	《 <u>卫生课本</u> 》,中华书局,1934
	《 <u>小学行政</u> 》,中华书局,1935	《 <u>小学教材及教学法</u> 》,正中书局,1935
	《 <u>初中本国史</u> 》,大东书局,1937	

续表

姓名	所编校的教科书(教授书)	
杨人楩	<u>《初中本国史》</u> ,北新书局,1930,1934 <u>《北新外国史》</u> ,北新书局,1932	<u>《高中外国史》</u> ,北新书局,1931 <u>《初中外国史》</u> ,青光书局,1934
杨东莼	<u>《高中本国史》</u> ,北新书局,1935,1946 <u>《高中公民:法律大意》</u> ,北新书局,1938 <u>《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u> ,开明书店,1947	<u>《高中公民:社会问题、政治概要》</u> ,北新书局,1937 <u>《高中公民》</u> ,北新书局,1946
杨喆	<u>《订正新编国文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15 <u>《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13 <u>《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u> ,中华书局,1913 <u>《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u> ,中华书局,1914 <u>《订正新制国文教授书》</u> ,中华书局,1916 <u>《初级国文读本》</u> ,世界书局,1924	<u>《公民课本教授书》</u> ,中华书局,1923 <u>《女子国文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14 <u>《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14 <u>《中华女子国文教授书》</u> ,中华书局,1915 <u>《新式历史教科书》</u> ,中华书局,1916 <u>《高级历史课本》</u> ,世界书局,1925
宋云彬	<u>《开明中国历史讲义》</u> ,开明书店,1934 <u>《高中进修国文选》</u> ,进修出版教育社,1945 <u>《现代公民教学法》</u> ,上海书局,1948 <u>《现代算术教学法》</u> ,上海书局,1948	<u>《开明国文讲义》</u> ,开明书店,1934 <u>《初中精读文选》</u> ,文化供应社,1946 <u>《现代算术课本》</u> ,上海书局,1948 <u>《现代常识读本》</u> ,上海书局,1948

注: [1] 不少教科书由几人共同编写, 这里分别列入单个编者名下。

[2] 加下划线者为中国历史教科书。

资料来源: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 读秀知识库、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合作计划项目(CADAL)等。

## 第五章

# 书局的权势网络与知识生产

教科书要真正发生影响，必须被学校与学生使用，这样，才能实现其文教价值。在教科书的出版过程中，发行工作至关重要，其中书局具有重要地位。书局作为一个企业，利润是主要的考量。“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sup>①</sup> 清末民国时期，民间书局一直是教科书编辑、发行的主流。<sup>②</sup> 对书局来说，图书是一种商品，其编写与发行过程，也是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书局只有将图书这种商品推销出去，才能获得利润，书中的知识才能真正发挥影响。

关于书局的地位，清末即有人指出：“教育者，国民之基础也。书籍者，教育之所借以转移者也”；“书籍之组构，由于编辑，由于印刷，由于发行，而后乃得流传于世。是编辑、印刷、发行者，所以组构而成书籍者也，故编辑、印刷、发行之权在我，则组构书籍之权在我，而教育之权亦在我。编辑、印刷、发行之权在人，则组

---

①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第25页。

② 19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行“国定本”教科书，各大书局不再自行编写，主要是承担印发任务。

构书籍之权在人，而教育之权亦在人”。<sup>①</sup> 图书是人们知识的重要来源，书局在图书编辑、印刷、发行中占据中心地位，关乎教育之权。我们在通过图书获取知识时，应该对图书“组构”过程有所了解，对书中“知识”进行思考：这种知识是如何生成的，其意义与价值如何？本章尝试以民国时期书局的教科书编写、发行为中心略做讨论。讨论书局的教科书编写、发行情况，对了解知识生产的过程以及教科书知识的性质有一定意义。<sup>②</sup>

## 一 高集中度与高关联性：以商务 印书馆为中心的出版业

书局的地位与教科书编写、发行密切相关。“教科书是各家[书局]发行的最大目标，因为它利润最大销数最稳定。”<sup>③</sup> 民国几大书局都是因为发行教科书起家。1904年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发行成功，开始确立其在出版业中的龙头地位，民营出版企业逐渐认识到教科书编写、发行是一条成功之道，有条件的纷

①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招股缘起（代论）》，《申报》1906年4月25日，《申报》（影印本）第8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第241页。

② 近年来，民国出版业及教科书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在图书编写与文化教育意义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方面的研究，参阅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王建辉《旧时代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关系之考察》，《出版广角》2001年第1期；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洪九来《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务与中华的出版竞争评议——以中华书局“民六危机”为中心的考察》，《都市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2007；黄宝忠《近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研究——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考察对象》，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等等。目前的研究主要讨论到书局间的“出版竞争”，多侧重于商业上的“成功之道”，很少注意到书局的出版活动对图书知识性质的影响。

③ 金兆梓：《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28页。

纷加入其中。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书局趁民国成立之机，发行新式教科书成功，开始跻身大书局行列。世界书局也是趁1922年新学制颁行时编写新教科书而取得成功。开明书店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关注妇女问题的杂志社，后编辑学生读物《活页文选》和教科书而逐渐做大。<sup>①</sup> 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正中书局也是靠发行教科书起家的。<sup>②</sup> “教科书是书业中最大的业务，不出教科书，就算不得是大书局。”<sup>③</sup>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能够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其他各小出版家，如果没有教科书或其他销数较大的出版物，往往都倏起倏灭，不能维持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更谈不上什么发展”。<sup>④</sup> 教科书业务对出版企业有很大关系，往往一套教科书的成功便可造就一个书局的崛起。<sup>⑤</sup>

出版课本与教育用书的书局，笔者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一书统计，约有190家。这些书局有两个明显特点。首先是有较高的集中度。一是书局所在地主要集中在上海。近代上海得风气之先，是中国文化出版的中心，也是教科书编写、发行的中心。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书局超过100家，占全国书局总数的大半。二是出版业务主要集中在几家大书局。民国时期书局较多，但大多数是中小型书局，资本不多，职工人数一般数十人至百余人，有的仅出几种图书。从印售中小学教科书数量来看，大书局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这五家，<sup>⑥</sup> 其中又以

① 邱雪松：《开明书店、“开明人”与“开明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的一种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第32页。

② 黎子遗：《概述国民党正中书局》，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406页。

③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140页。

④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华书局，1964，第98页。

⑤ 王愨：《近代商人出版家的成败——以沈知方与他的世界书局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第20页。

⑥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7页。

商务、中华与世界为前三，1934年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1%、1935年的62%、1936年的71%均出于这三家书局。<sup>①</sup>就教科书出版来说，1920年以后，“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十六，中华供给十三”，<sup>②</sup>商务与中华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940年代国定本教科书发行才结束。

其次是书局之间有一定关联性。一是不少书局的骨干出自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为业界龙头，后来的几大书局，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的创办人都出自商务。中华书局发起人陆费逵、戴克敦、沈颐、沈继方等人为商务时期的同事。<sup>③</sup>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是商务的老员工，也是中华的创办人之一。后来沈知方脱离中华书局，独资经营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兄弟都曾是商务印书馆员工。开明书店创办后，商务印书馆一些编辑过来任职。大东书局创办者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四人都曾是商务的员工。<sup>④</sup>二是经营方式也借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设立编译、出版（印刷）与发行等机构，这种经营模式为其他大书局所借鉴，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的组织与商务印书馆一样，“是合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其性质近乎托拉斯”。<sup>⑤</sup>开明书店“规章制度，大部分是从商务那里抄来的”。<sup>⑥</sup>

从地区分布、书局关系来看，民国时期形成了以商务印书馆为基础、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为中心的出版格局。这种

① 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427页。

②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载《陆费逵文选》，第396页。

③ 钱炳寰：《谈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出版史料》1992年第4期。

④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32页。

⑤ 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载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76页。

⑥ 宋云彬：《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7页。



出版格局使得大书局的出版思想影响到整个行业，给教科书编写和发行也带来重要影响。一般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很大程度上就是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这使得商务与中华能够影响到大多数中小学生：通过教科书获取的知识，基本是商务与中华所推销的“知识”。

## 二 书局与课程标准的制订

教科书是国家教育目的的体现物。政府颁行教育宗旨与课程标准来指导和规范教科书编写。课程标准是教科书编写的直接依据，其制订和修改受到书局的高度重视，书局往往直接参与。1912年，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是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蒋维乔、陆费逵等起草的。<sup>①</sup>其后课程标准制订中，也有书局的影响。这里以1923年与1929年小学与初中两次课程标准起草、制订人员情况为例，略做说明。

1923年与1929年课程标准在民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1923年开始实行新学制，标志着北京政府教育的一个转向。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新课程标准，1932年修订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课程标准。课程标准制订者一般是各科专家以及有实际教学经验者，1929年后，课程标准制订人员相对稳定，变动较小。<sup>②</sup>1923年、1929年课程标准制订者，见表5-1、表5-2（名字加下划线者为书局编辑或在书局工作过的人士）。<sup>③</sup>

① 蒋维乔：《蒋维乔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第42页。

② 杨红波：《他们是谁 谁来选择 选择谁——论清末民国时期历史课程标准编写者的选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③ 本节未注明出处者，均参阅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

表 5-1 1923 年课程标准起草、制订者名单

小学	国语	吴研因	公民	杨贤江	社会	丁晓先
	历史	朱经农、丁晓先	卫生	俞凤宾、胡宣明、 丁晓先	自然园艺	施仁夫、姜文洪、 葛敬中
	算术	俞子夷	地理	黄孟竦、王伯祥	形象艺术	宗亮寰
	音乐	刘质平	体育	王小峰	工用艺术	熊翥高
中学	公民	周鯁生	历史	常乃德	地理	王伯祥
	国语	叶绍钧	外国语	胡宪生	算学	胡明复
	自然	胡刚复	体育	麦克乐	图画、手 工、音乐	刘海粟、何元、 俞寄凡、刘质平

资料来源：《中小学的课程、教材与教法》，载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第193页。

表 5-2 1929 年课程标准起草人或审查人名单

小学	国语	吴研因	美术	宗亮寰	算术	沈百英、金桂荪
	社会	任桐君、吴研因、 金海观、胡宣明、 马客谈、盛朗西	卫生	俞凤宾、胡宣明、 丁晓先	自然	王莹若、李鼎辅、金润清、 徐九昭、马客谈、赵士洁 等 9 人
	音乐	何明斋、程懋筠	体育	朱士芳、吴蕴瑞、 沈寿金	工作	尹柏丞、吴研因、周尚志、 熊翥高
中学	国文	刘大白、孟宪承、 刘奇、孙学辉	英文	张士一、林语堂、 胡宪生	历史	陈训慈、顾颉刚、何炳松
	体育	袁敦礼、吴蕴瑞、 金兆均、张汇兰、 朱士芳	算学	艾伟、吴在渊、 汪桂荣、 段育华、褚士荃	地理	竺可桢、胡焕庸、张其昀、 许寿裳
	生理 卫生	金宝善、姚永政、 胡宣明、姜振勋、 俞凤宾、黄颂林	工业	吴承洛、钟道锟、 倪祝华、熊翥高、 黄同义、陈芬质	农业	傅焕光、钱天鹤
	音乐	程懋筠、肖友梅	家事	杨保康	图画	吕凤子、李毅士
	自然	王璠、伍献文、朱昊飞、吴子修、秉志、张景钺、彭世芳、郑贞文				

资料来源：《中小学的课程、教材与教法》，载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第194~196页。

1923 年与 1929 年小学与初中课程标准制订者与书局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曾经在书局工作过。这类制订者将近一半，如在商务

印书馆工作过的有沈百英、杨贤江、朱经农、宗亮寰、周鯁生、吴研因、叶绍钧、王伯祥、顾颉刚、胡明复、吴在渊、陈训慈、何炳松、张其昀等人；在中华书局工作过的有金海观、丁晓先、张士一等人；在开明书店工作过的有丁晓先、叶绍钧、王伯祥、林语堂等人；在世界书局工作过的是朱昊飞等人。这些制订者中，又以商务印书馆的为多。如国语一科，吴研因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叶绍钧做过商务印书馆与开明书店的编辑，刘大白等人与商务印书馆有相当深的渊源；历史一科，朱经农后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训慈、顾颉刚、何炳松等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这些人都编校有教科书。

二是未在书局工作过的人员，一般都编校有教科书。课程标准制订者，基本上都是本学科的专家，除了上述在书局工作过的人员外，剩下的很多人都编写、校阅过相关教科书（见表5-3）。

表5-3 1923年、1929年小学、初中课程标准部分起草、制订者编校的教科书

年份	制订者	编校的教科书
1923	王小峰	《小学体育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5
	胡宣明	《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1
	胡先生	《新学制英文读本文法合编》，商务印书馆，1923；《新学制高级中学英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30等
	俞子夷	《社会化的算术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算术练习用书》，大东书局，1933等30多种
	施仁夫	校《算术课本》，世界书局，1933；校《小学常识课本教学法》，中华书局，1934等20多种
	姜文洪	《高级自然课本》，世界书局，1925；《高级小学自然课本》，世界书局，1928
	葛敬中	校订《蚕体生理学》，商务印书馆，1934；校《桑树栽培学》，商务印书馆，1935
	刘海粟	《新学制图画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校《初级图画课本》，中华书局，1924
	何元	《初级图画课本》，中华书局，1924；校订《工艺新建材》，商务印书馆，1928
	俞寄凡	《小学教师应用美术》，世界书局，1933；译《美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22等
	刘质平	《唱歌教本》，泰东图书局，1923；《弹琴教本》，泰东图书局，1923；《开明音乐教程》，开明书店，1934等

续表

年份	制订者	编校的教科书
1929	马客谈	《公民训练教材》，大东书局，1933；校订《初级算术课本》，世界书局，1924等20种
	盛朗西	《暑假国语自习书》，北新书局，1933；《当代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等10多种
	金润清	《初小国语教学法》，世界书局，1933；《我们的老祖宗》，中华书局，1935等
	王璠	校订《大时代高中化学》，兼声编译社，1942
	尹柏丞	《小学劳作指导书》，中华书局，1934
	周尚志	《儿童文学读本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2；校订《新学制小学复式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4
	熊翥高	《新编图画课本》，商务印书馆，1920；《新学制工用艺术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等十多种
	吴蕴瑞	《体育教学法》，勤奋书局，1934
	沈寿金	《小学体育教本》，正中书局，1947
	何明斋	《手工教本》，泰东图书局，1923；《新学制音乐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等20多种
	孟宪承	《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校订《国文》，正中书局，1935等
	刘奇	选注《初级中心国文：甲编》，正中书局，1933
	袁敦礼	校阅《最新实验小学游戏教材》，世界书局，1948
	艾伟	《小学国语默读测验》，中华书局，1939；《教育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5等
	汪桂荣	《初中算术》，正中书局，1935；《高中平面几何》，钟山书局，1942等
	吴子修	《初级中学北新植物学》，北新书局，1932；《初中植物学》，北新书局，1934等
	彭世芳	《中华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中华中学植物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等
	胡焕庸	《外国地理》，钟山书局，1933；校订《高级小学地理课本》，中华书局，1947
	钱天鹤	校《中等养蚕法》，中华书局，1930
	倪祝华	《基本初小劳作教本》，商务印书馆，1931；《初小劳作教本》，世界书局，1933等
吕凤子	校订《水彩画》，大东书局，1930	

资料来源：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

由表5-3可见，或是书局直接参与课程标准的制订，其中一些人就是书局的职员；或是在书局出版过教科书的编者应书局邀请参加教科书编校。书局通过参与课程标准制订，与课程标准制订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保证其所编写的教科书“符合”政府的要求，为顺利通过审定提供保障。

### 三 上层路线：书局与教育部之关系

商务印书馆老员工汪家熔说：“发行是出版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说它是出版的命根子并不夸大。没有健全的发行，再好的书也行之不远，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sup>①</sup> 这道出了发行之于出版的重要性。教科书的发行首先要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定或认可。因此，书局非常重视与教育部门的关系，以保证教科书能够通过审定，并借助教育部门来帮忙推销。

书局与教育部人员都有直接联系（见表5-4）。

表5-4 民国教育部职员与书局之关系

时期	姓名	在教育部中职务 <sup>[1]</sup>	与书局的关系
民初	蔡元培	总长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范源濂	总长	中华书局总编辑
	严修	总长	
	黄炎培	总长	编辑《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江苏省教育会教育研究部，1914；校订《新体修身讲义》，贾丰臻编纂，商务印书馆，1918
	王桐龄	参事	编纂《新著东洋史》，商务印书馆，1922；校阅《写真中国地理》，中央地学社，1927；校订《中国史》，百城书局，1931；校订《中国近百年史》，百城书局，1931
	蒋维乔	参事	商务印书馆编辑
	夏曾佑	社会教育司司长	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
	钟观光	参事	校阅《理化教科书》，上海科学仪器社，1902；著《理科通证：动物篇》，新学会社，1909；述《化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2；述《理化初步讲义》，商务印书馆，1917
	沈步洲	专门教育司司长	中华书局英文编辑主任
	任鸿隽	专门教育司司长	商务印书馆编辑
	马邻翼	次长	
	马叙伦	次长	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
	章士钊	总长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数种

<sup>①</sup> 《1931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发行》，载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118页。

续表

时期	姓名	在教育部中职务	与书局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蔡元培	院长(大学院)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蒋梦麟	院长(大学院)	商务印书馆编辑
	陈布雷	次长	商务印书馆编辑
	朱经农	次长	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45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马叙伦	次长	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
	刘大白	次长	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出版图书
	顾树森	国民教育司长	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编纂与校订多种教科书
	吴研因	国民教育司长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在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

注：[1] 各人任职时间不一，有时职务也有变化，这里限于篇幅，仅列出主要职务，不列出任职时间。

资料来源：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

从表5-4可见，教育部很多职员与书局都有关联。民初的几位部长与次长，如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章士钊、马叙伦等，一些参事与司长，如王桐龄、蒋维乔、钟观光、夏曾佑、任鸿隽、沈步洲等，都曾在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任职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梦麟、陈布雷、朱经农、顾树森、吴研因等人都曾任书局编辑。

书局维持与教育部人员的联系，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教科书审定与推销提供帮助。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小学教科书，就运用政府力量。新课本问世时，即“请各省教育行政首脑予以推销”。<sup>①</sup>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审定工作能够顺利展开，与曾任甘肃教育厅厅长、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的马邻翼的帮助有很大关系。<sup>②</sup>正中书局后来居上，是因为陈立夫的关系。陈立夫接掌教育部后，事事照顾正中书局，在推

① 《1931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发行》，载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129页。

② 刘弘任：《回忆世界书局北京分局》，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343页。

销方面，正中往往利用人事关系，占些上风。<sup>①</sup>开明书店也“跟南京的官方虚与委蛇”。<sup>②</sup>1943年，商务、中华等七家书局组成的“七联处”能够取得“国定本”教科书的发行权，一个原因是与官方来往较多，关系密切。<sup>③</sup>教育部部长的更迭会引发新的书业之外的竞争，书局都设法走上层路线，拉拢关系，与教育部部长关系的亲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教科书竞争的格局。<sup>④</sup>

不唯与教育界，书局也维持与政界的联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等都吸收在政界有影响的人物做股东，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招揽业务。商务印书馆延请伍廷芳、郑孝胥等任董事，与政界保持良好的关系。<sup>⑤</sup>开明书店邀请邵力子入股，并请其做董事长。大东书局吸收陶百力、杜月笙做股东。后来大东书局利用政界关系，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印钞厂。<sup>⑥</sup>中华书局聘请范源濂、梁启超、唐绍仪、王正廷、于右任、孔祥熙等任董事。1935年币制改革时，中华书局能够承印中央银行的钞票和债券，一个原因是孔祥熙是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那时中华书局承印的钞票，图案设计都和孔子有关，如用孔庙、孔墓、孔林、万古长青等为背景，也是为了博得孔祥熙的好感”。<sup>⑦</sup>世界书局邀请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为董事，为了教科书审订顺利，先后请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审订人。世界书局每月送于右

- 
- ① 黎子遗：《概述国民党正中书局》，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408页。
- ② 宋云彬：《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8页。
- ③ 参阅贺金林《“七联处”与1940年代的教科书发行》，《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 ④ 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
- ⑤ 参阅王建辉《旧书店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关系之考察》，《出版广角》2001年第1期。
- ⑥ 黄宝忠：《近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研究——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考察对象》，第64页。
- ⑦ 吴中：《近代出版业的开拓者陆费逵》，载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112页。

任审订费 300 元。<sup>①</sup> 1936 年世界书局编辑《世界新公民》，请周佛海校订，“其时周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又有‘宣传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等名义，利用其名以便推销”。<sup>②</sup> 正中书局是“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纠合那时的几个国民党要人共同组织的。它的资金，最初是由农民银行（CC 的金融机关）拨借的。总经理吴秉常，就是陈立夫的连接。协理叶溯中，也是国民党名人（曾经做过浙江教育厅长），此外还有南维岳、刘守宜、陈宝书等，都是 CC 派的头面人物。……他们倚仗‘党国’权势，来开办正中，无非是要在出版业中插上一手，进一步控制整个出版界”。<sup>③</sup>

与教育界及政府各部门搞好关系，不仅有助于推销教科书，还可以在书局遇到“困难”时请他们出手相助。这里以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英文课本的诉讼为例。1928 年，开明书店出版林语堂《开明英文读本》，该书发行很好，给开明书店带来很大利润。1930 年，世界书局出版林汉达《标准英语读本》。开明书店认为世界书局抄袭，登报指责世界书局，要求世界书局停止发行《标准英语读本》并赔偿损失。世界书局向法院控诉开明书店诽谤罪。世界书局为了必胜，花重金请女律师郑毓秀辩护。因为郑毓秀与当时的司法部部长王宠惠有某种关系，凡是郑毓秀经手的案件只能胜诉不许败诉，否则法官饭碗不保。见法院偏袒世界书局，开明书店找到了教育部，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与林语堂有关系，认定世界书局抄袭。见此，世界书局只得请教育部常务次长刘大白出来调解。世界书局赔偿开明书店损失，将课本纸型交给开明销毁。但此时，世界书局让林汉达重编《进步英语读本》，通过教育部审定，销路不错。“不久，蒋梦麟、朱经农等垮

① 朱联保：《回忆上海世界书局》，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 293～294 页。

② 朱联保：《上海世界书局史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 274 页。

③ 刘寒英：《关于“七联处”》，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 430～432 页。



台，南京教育部的部长、次长都换了人，世界书局乘机把《标准英语读本》重新送审，“改名为《英语标准读本》，予以审定”。<sup>①</sup>

书局与教育界、政界以及学界都保持联系，<sup>②</sup>尤其是大书局与之联系更为密切，形成一个关系网络。书局借助它们来保证图书的编写与发行，为书局的利益服务。

#### 四 占领市场之一：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广告战

如果说通过教育部门审定是教科书发行前提，那么，如何让学校选用本书局的教科书，是成功发行的关键环节。为了争夺教科书市场，各书局在地方上设立公司或销售处，刊发教科书广告，打广告战、价格战，甚至进行诉讼，实行多种促销手段，开展同业竞争。这里仅以民初历史教科书广告战、世界书局的促销活动以及书局间的合作为例略做说明。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新成立的中华书局趁其他书局没有准备，推出“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sup>③</sup>为夺回市场，商务印书馆很快推出“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各校纷纷采用，呈大销特销之势。商务印书馆由此在教科书市场上重振雄风”。<sup>④</sup>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新制教科书”，“刊出新国旗作封面。中华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場”。<sup>⑤</sup>一时间，“共和国教科书”与“新制教科书”形成竞争。1913年8月，秋学期开学前，正是各书局推销教科书的关键时期，两大书局在《申报》上打起广告战。中华书局指出其“新制教科书”课时分量

① 宋云彬：《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7页。

② 关于书局与学界的联系，参阅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下册第六章。

③ 钱炳襄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中华书局，2002，第4页。

④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第214页。

⑤ 熊尚厚：《陆费逵先生》，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页。

与授课时间相适应，内容注重国民教育，印刷精良等；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不敷课时应用，底面单页，字形过小等。对于中华书局的指责，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一一做了回应。有趣的是，这次双方在教科书内容上争论的对象，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下面对此略做介绍。

此次中国历史教科书广告战，缘起是中华书局指责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教科书“不言及甲午战争赔款”，以说明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叙述恰当。所涉及的两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分别是中华书局的《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新历史》。《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由章嵒与丁锡华编写，共9册，第一册于1913年3月初版。《共和国教科书》由傅运森编写，共6册，第一册于1913年1月初版。两种教科书都是供高等小学校秋学期使用，都由教育部审定。

争论涉及的内容是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叙述。《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在第六册第十四课“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讲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德宗乃命李鸿章至日本，议和于马关。认朝鲜独立，偿日本兵费二万万两，割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群岛与日，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商铺。所谓《马关条约》是也。方是时，日得辽东之地，颇不利于俄，俄乃纠合德、法，迫日以辽东归还中国。中国又加银三千万两，为赎地于日本之报”。<sup>①</sup>《共和国新历史》在第四册第十五课“中日之战”讲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德宗乃命李鸿章赴日本议和，许朝鲜为独立国，并偿兵费，割台湾，战事始已”。<sup>②</sup>

从上述两种教科书的叙述来看，《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详述了《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内容，而《共和国新历史》叙述较为简略，提及赔款一项而未说明数字，割地一项仅讲割让台湾而未讲割让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中华书局指出：“本局教科

① 章嵒、丁锡华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6册，中华书局，1913年4月初版，8月4版，第8~9页。另见汪楷、章嵒、华绍昌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6册，中华书局，1913，第8~9页，两书叙述相同。

② 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新历史》第4册，第11~12页。

书处处注重国民教育，于国耻及租借割让地尤为注意，非如该馆有所顾忌，赔款仅言庚子之四万五千万两，不言甲午之二万三千万两也。”<sup>①</sup> 对此，商务印书馆的回应是：“至谓本馆共和本，言赔款事，只言庚子赔款不言甲午赔款，似谓本馆编辑同人甘忘国耻，此则不容不辨。本馆前编最新国文，分量较多，曾将割地赔款各事详列一表（见第十册），共和本分量较少，教科书但举其略而详尽于教授法（按教授法有甲午赔款事）。该局自谓注重国民教育于国耻及租借割让地，尤为注意何以？新制本并庚子赔款亦不言及且本馆共和本叙述外交失败连及三课，该局仅有租借割让地一课。”<sup>②</sup> 就此，中华书局指出，“至于甲午庚子赔款，该馆确系仅言四万五千万两，不言二万三千万两，且将四万五千万两之‘五千’二字漏去？如非有所顾忌，何以显分详略？本局新制本并不错误”。中华书局将两书相关内容附录于下。<sup>③</sup>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之初，就反对引用日本人编写的教科书，而主张国人自编，其原因就在于认为外人编写的教科书不利于发挥历史教育的功用。中华书局对商务印书馆的指责也是出于商务印书馆里有日本股份的考虑，认为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合资经营，因此在叙述中日战争时，对日本侵略多有回护。因此，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教科书不完全是国人自编的教科书，不利于国民教育与国耻教育。从教科书的内容看，中华书局的批评也有道理，不过，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争夺教科书市场。中华书局成立后，积极拓展教科书市场，陆费逵提出“用教科书革命”与“完全华商自办”两个

① 《中华书局答商务印书馆声明》，《申报》1913年8月15日，《申报》（影印本）第123册，第573页。

② 《商务印书馆第二次登报声明》，《申报》1913年8月16日，《申报》（影印本）第123册，第585页。

③ 《中华书局再答商务印书馆》，《申报》1913年8月17日，《申报》（影印本）第123册，第597页。中华书局附录两种教科书相关内容（甲午战争赔款内容见正文，此处仅录庚子赔款内容）为：“《中华新制高小历史》第六本第十五课……赔各国兵费四万五千万两，派大臣至德日二国致谢，而处载漪诸人首获之罪。商务共和《高小历史》第四本第十四课，诛贬王公大臣以谢并偿银四万万两，与联军和。以上二则，共和春、秋两本皆同。”

口号与同业竞争。<sup>①</sup> 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完全华商自办”提法，就明显地针对与日商合资一事。与日本合资，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对教科书编写、印刷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受此次教科书战的影响，商务印书馆花大力气清退了日资，1914年初，在《申报》上宣布为完全国人集资营业的公司。<sup>②</sup>

关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起教科书之争的结果，1913年7月的绍兴教育会审查图书报告或许可以作为参考。绍兴教育会开会审查小学教科书，代表到会者十余校，经审查后认为，修身、国文以中华书局为佳，算术、理科以商务印书馆为佳。史、地、图画二者仿此。“遂经公决高初修身国文以中华为适用，其他各科，本可分别采用，唯商务书一年二册，于教授上滋多不便，现重要科目，既决用中华，不如连带采用以归统一，经多数赞成通过。”<sup>③</sup> 可见在绍兴一地，中华书局的教科书最获认可。

民国时期，书局之间常常因为教科书“抄袭”而互相指责，甚至为此发起诉讼。如1930年8月，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因为《初中本国史》“抄袭”问题，发生了一次笔战。<sup>④</sup> 书局通过刊登广告及开展广告战来扩大影响，这成为其占领市场的一个重要策略。

①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4页。

② 张树年：《纪念夏公瑞芳》，载《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第339-340页。

③ 转引自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第137页。

④ 1930年8月14日中华书局在《申报》发文指出，世界书局1930年出版的《初中本国史》有两处抄袭了中华书局1923年版的《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历史之回顾’一节，与本局全书结论一章，十同其九”；“附图‘三国鼎立图’及‘太平军图’与本局《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附图‘三国鼎立图’及‘清中叶及太平军图’，形式内容完全相同”。参阅《中华书局悬赏二千元》，《申报》1930年8月14日，《申报》（影印本）第273册，第305页。为回应中华书局“抄袭”质疑，世界书局在17日《申报》上刊登介绍了《世界书局初中本国史十大特色》，将该书内容提要与目次刊出，强调该书是“依照教育部暂行课程标准编辑的唯此第一部”。参阅《世界书局初中本国史十大特色》，《申报》1930年8月17日，《申报》（影印本）第273册，第377页。31日，世界书局又在《申报》上发表宣言，将世界书局创办来与其他书局教科书竞争情况做了回顾，指责中华书局对世界书局的不正当竞争与打压。参阅《世界书局宣言》，《申报》1930年8月31日，《申报》（影印本）第273册，第748页。

## 五 占领市场之二：书局间的 竞争与合作

世界书局于1923年起开始编印教科书。当时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几乎为商务、中华两家所垄断。世界书局为了争夺市场，运用各种营销方法，很快在教科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书局的推销手段是了解教科书发行及知识生产的一个参照。

世界书局要编写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立即出手阻挠。世界书局对此早有准备。在学校推销方面，“聘请了四位推销员：一是龙门师范毕业的；一是第二师范毕业的；一是上海中学毕业信仰天主教的；一是广东人。因为本市和邻近各县的小学校长和教师，绝大部分是龙门和二师出身。天主教和粤侨在本市设立的学校亦不在少数，而且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这四位推销员各以同学、同道和同乡的关系，分别向本市各小学教师打交道，进行推销，收效很大”。<sup>①</sup>针对商务、中华教科书低价倾销及买通贩卖同业，停销世界书局出版物的做法，世界书局除了对贩卖同业给予优厚回佣外，“组织他们另辟门面，悬挂世界书局牌号，订立特约往来合约，不到2个月光景，在沪宁、沪杭两路沿线以及苏北、皖北等处中等城市，出现了10余处世界书局特约发行所，扩大了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在和各处订约中，又收到一批往来账款的保证金数万元，一举两得”。<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书局在推销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世界书局“有的分局，对女教员赠送旗袍、高跟鞋、丝袜；对男教员更进一步，假期里经常在大旅馆里包下房间，请他们日夜吃喝赌博，借给赌本，甚至叫妓女作乐。有的分局把教科书样本捆成一包，送请各教育官吏、各校校长批评指

① 刘季康：《世界书局的发行工作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338页。

② 刘廷枚：《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316~317页。

教，包内却夹入银行礼券。真是异想天开，无奇不有”。<sup>①</sup> 经过努力，世界书局打破商务与中华的封锁，教科书销量有了迅速发展。

书局在竞争之时也有合作，或者说合作是竞争的另一种形式。中华书局成立后，就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对手，双方在利益都受到影响时，也会尝试合作。1914年3月，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各书局教科书加入颂扬袁世凯大总统的内容。此时，教科书付印已全部准备就绪，再进行修改，会给书局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商务与中华联合起来抗议。双方协商抵制办法，派代表共同赴京与教育部交涉。在两家力争之下，此事最后不了了之。<sup>②</sup> 1920年代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时，商务与中华就联合起来进行阻挠。“先是利诱，愿以银币10万元送给沈知方个人，而要沈知方以世界书局停止出版教科书为条件。”<sup>③</sup> 被沈知方拒绝后，商务与中华在1924年夏联合成立国民书局，针对世界书局小学教科书的品种，出版初、高级各一套，用售价更低廉的办法，在世界书局教科书主要行销的地区销售，不计成本，用免费赠送和跌价办法与世界书局竞争。<sup>④</sup> 商务与中华的合作，是面对新竞争对手的联合，目的是与世界书局竞争。

教科书市场的激烈竞争，让各家书局都深受其苦，书局也在尝试联合办法，维护自身利益。1936年教育部指令划一教科图书价目，上海书业公会借此制定了统一的图书售价实施办法，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六家订立了“六家公议”，主张“划一教科图书价目，并维持同业信誉，避免同业牺牲”，教科书市场的混乱局面由此才稍稍澄清。<sup>⑤</sup>

①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93页。

② 参阅吴燕《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联合谈判始末》，《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③ 朱联保：《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载《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37~238页。

④ 钱炳寰：《20年代教科书竞争二三事》，《出版科学》1997年第4期。

⑤ 刘季康：《世界书局的发行工作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340页。

1940年代初政府准备发行“国定本”，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和开明五家民营书局担心正中书局会借助政府力量垄断教科书市场，就谋划联合起来。世界书局提出，五家内部先休战，团结起来，然后把正中书局拉进来，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合理解决分配营销教科书问题。这个提议得到商务、中华等书局的赞成。后来“国定本”就由正中、商务等六家分销，其他书局很难插手。“从此这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这起初是五家民营书店借此来束缚正中书局，但实际上却形成了书业托拉斯，从此这个集团以外别家书店，就休想出版教科书。”<sup>①</sup>由此来看，书局之间的合作也是出于竞争考虑，是想维护其垄断利益。

关于书局竞销教科书情况，1935年，《大上海教育》指出：“各书局对于所出教科书……不惜工本的设置推销，在上海一个具备五六间教室以上的小学校长，在开学的时候，总要收到好几家书局的请帖。结果，却不了情，就分赃式的大家用几本，一年级的历史、地理是一家书局，自然、公民又是一家书局；甚而至于一年级的国语是一家书局，二年级的国语又是一家书局。”<sup>②</sup>学校在选用教科书时，主要是依据与书局的关系，而不是依据教科书的质量。如1932年开明小学语文课本，“叶圣陶写课文，丰子恺画插图，可称双绝。可惜小学教科书一向被商务、中华、世界垄断着，开明无法跟它们竞销，后来只好不印了”。<sup>③</sup>对教科书而言，在生产的书局与使用的学校两端，质量未必是主要的关注因素。

正是通过诸多促销手段，大书局控制销售渠道，占领教科书市场。这不仅是教科书商品市场，也是书局占领的“知识领地”，读者

① 宋云彬：《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8页。后来加上文通书局，共七家。

② 转引自朱翊新《我在上海世界书局的编辑工作》，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310页。

③ 宋云彬：《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6页。

使用某书局编写的教科书，获得的是该书局传授的知识，受到该书局的影响。

## 小 结

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业兴盛，促进了教育进步与近代知识文化的发展，塑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间书局初涉教科书市场时，怀有教育救国、开启民智的理想；但后来更注重商业目标的实现。<sup>①</sup> 面对激烈的教科书竞争，身处其中的张静庐说：“商务以教科书为主要营业，教科书的销数和产量，都有相当的统计，平时各书店教科书方面的营业，并不是有特辟的新路线，而是在同一个圈子里互相竞争；说得明白些，就是在已经为商务所控制下的生意，大家以各自的智慧和手腕去分些过来。有的以质的改进，内容充实，印刷精美来争取读者；有的以编著方便，工料减低，回佣优厚来争取顾主。”<sup>②</sup> 这段话可能道出了其中的实情：对书局来说，教科书出版是一种生意，“当时无所谓文化教育与出版责任，小说书也好，出课本也好，印刷花纸也好，只要有利可图，就是方向”。<sup>③</sup> 而无论是“生意”，还是文教事业，看似轰轰烈烈的有多家书局参与的教科书出版，实际上一一直在商务印书馆的控制之下。

本章以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发行为中心，讨论了书局在图书出版中的作用，希望引起讨论的是知识的生产及其性质。教科书编写、发行的过程，也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书局通过控制教科书的编写、发行，确立其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实现知识的社会控制。从本章的讨论可见，那些看起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知识思想，往往是个别书

① 蔡丽丽、王天根：《教科书：理想还是生意？——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竞争》，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第515页。

②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101页。

③ 俞鼎梅：《我与世界书局琐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331页。



局知识观念的体现。与之相应的是，编者个人的认识通过书局的权势网络，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传授一般知识的教科书，所体现的也是“有选择的传统”，只是某些人的选择，只是某些人对知识与文化的看法，它参与决定了社会上什么样的知识会被认为是合法与真实的。<sup>①</sup>书局通过教育途径，以国家的名义将地方性知识全国化，将个人性知识大众化，使一种地方性的、部分人的知识成为“经典”知识，影响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思想观念。

如本章开头所言，书局与教育权的关系，时人早有警觉。1905年清政府试图推行“国定”教科书，陆费逵就表示反对：“以全国四万万人之教育而委之学部数十人之手，一成不变，其必无良果可想而知。”<sup>②</sup>陆费逵担心的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教科书究竟应该由何人编写。对于书局的影响，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就注意到：“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sup>③</sup>“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sup>④</sup>实际上，后来陆费逵等出版人的努力，好像并未改变他们所担心的教科书编写一事的实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从官方的教育部门转移到民间的书局。从民国教科书编写、发行来看，关系全国学生与一般民众知识观念的教科书编写何尝又不是“委之数十人之手”？因此，我们认为是“经典”的知识，其价值与意义需要重新估量。

① M. 阿普尔、L.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主编《教科书政治学》，第4页。

② 陆费逵：《论国定教科书》，载《陆费逵文选》，第52页。

③ 胡适：《日记》（1921年4月27日），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218页。

④ 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1937年1月。

## 第六章

# 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

——以孔子叙述为中心

教科书的编写过程是政府与编者联合生产知识的过程，教科书不仅反映了政府的教育要求与编者的理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教科书研究要回到当时的社会意识中，结合教科书实际内容来进行分析。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sup>①</sup> 社会意识影响教科书的编写，反之，教科书也会影响社会意识的形成。教科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政府的态度？教科书与当时的思想界有多大的关联？教科书知识有何特点？本章以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略做探讨。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成为自汉代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学说，孔子的思想、人格、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20世纪以来，孔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焦点，思想界的每次论争，几乎都与孔子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孔子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儒学论争“不仅关涉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与智慧资源，而且势必触及中国社会公众信仰问题”。<sup>②</sup> 清末民国时期是孔子儒学争议较为激烈的时

---

① M. 阿普尔、L.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主编《教科书政治学》，第2页。

②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369页。

期，此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本章将教科书中的孔子儒学叙述与同一时期政府、思想界的言说加以比较，以进一步呈现教科书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其特点。<sup>①</sup>

## 一 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

清末历史教科书中，日本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与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有很大的影响。《东洋史要》介绍孔子及其学说时写道：

孔子名丘，字仲尼，以鲁灵王二十一年生于鲁。唱 [倡] 儒教，大要本诸孝悌，轨于忠恕，以行仁道于天下。故其教始于修身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孔子素闷 [悯] 王室之衰，有志光复。然不得志于时，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笔削《春秋》，冀传其道于来世。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年七十三而卒。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之道，永为中国政教之基，后世谓奉其教者为儒家。孔子之孙有子思，作《中庸》以说“诚”，未几而孟轲出，约后于孔子百数十年，著《孟子》，说仁义，唱 [倡] “性善”。赵有荀况，生值战国末，稍后于孟子，作《荀子》，尚礼仪，唱 [倡] “性恶”。是皆儒家之铮铮者。<sup>②</sup>

《东洋史要》的叙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孔子的生平与志向，强调孔子“有志光复”；二是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指出儒学大要

① 孔子形象的研究颇多，可参阅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与儒学》，齐鲁书社，2004。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人物的言论上，对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研究不多。

②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卷1，金为重译，商务印书馆（原书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未见出版时间），第28页。该译本与金为译述的《东洋史要》（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1914年7版）内容相同。

在于“忠孝与仁道”；三是孔子编订六经，“冀传其道于来世”；四是孔子的门人弟子，介绍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文中特别指出“孔子之道，永为中国政教之基”。《支那通史》的叙述也大致相同，只是较《东洋史要》更为详细，最后特别指出：“孔子裔孙，达者颇多，历代帝王，奉孔子为先师，求其后，尊以爵秩，以祠圣庙，至今不绝。”<sup>①</sup> 孔子事迹主要源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左传》等，《东洋史要》《支那通史》的资料也未出上书之范围，所描绘的孔子形象与这些典籍中的孔子相近，肯定了孔子对中国政教的影响。

清末肯定孔子儒学的教科书，与《东洋史要》《支那通史》的叙述基本相同。丁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用“孔子”与“儒家”两节来介绍孔子儒学：“孔子歿，历代帝王奉之为先师，释奠（祭也）用王者之礼，列《论语》于学官（学校之官），《论语》者，即编孔子之言论也。”“孔孟之道，世称之为儒学，为中国政教之根本。”<sup>②</sup> 陈懋治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肯定孔孟之道为中国政教根本，“二千余年，政治之根本，多采取其说以成之。故孔孟者，不第为中国之大教育家，亦即中国之大政治家也”。<sup>③</sup> 富山房编辑的《支那史教科书》写道：“孔子之道，集支那上代学术而大成之，实能统治以后三千年之人心，而为政治道德上唯一之标准。”<sup>④</sup> 赵钺铎《高等小学历史课本》写到“历代帝王咸奉之为先师”。<sup>⑤</sup> 周世棠与富光年的教科书都指出孔子为万世师表。<sup>⑥</sup>

① 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卷1，第49页。

② 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7~8页。

③ 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4年初版，1908年18版，第17页。

④ 富山房编辑《支那史教科书》，唐秋渠译，上海东亚译书会，1903，第6页。

⑤ 赵钺铎编辑《高等小学历史课本》第1册，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初版，1910年7版，第8页。

⑥ 周世棠编著《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新学会社，1906，第1编第10页；富光年编辑《简易历史课本》，商务印书馆，1906年3月初版，4月3版，第4页。

在清末尊孔的教科书中，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值得关注。该书有“孔子世系及形貌”“孔子之事迹”“孔子之异闻”“孔子之六经”四节专论孔子，详述孔子的事迹与思想，充分肯定孔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如写孔子出生时，把孔子神化：“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元圣’。”<sup>①</sup>写孔子影响时，该书认为秦以前的上古史中“至要之事，乃孔子生于此代也。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sup>②</sup>秦以后两千多年，政治盛衰、人才升降、文章学问等都受到孔子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夏曾佑直接称孔子之道为国教，“其后孔子之道，成为国教，道家之真不传，墨家遂亡”。<sup>③</sup>

亦有教科书表达了对孔子儒学的不同看法。姚祖义的高小《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描述孔子儒学的有两处。一是在“孔子相鲁”一节中介绍孔子的事迹，孔子“去鲁，周流列国，十余年，季康子以币召之归，然鲁终不能用。乃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以老”。<sup>④</sup>二是在“周时学派”一节中介绍了儒家：“儒家祖孔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道之大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没，弟子本遗言以著《鲁论》，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孟子继之，言性善。荀子独反之，然荀亦儒家也。”<sup>⑤</sup>这里对孔子儒学的叙述较为平实，无论是孔子事迹，还是儒家思想，都侧重于史实介绍，没有提及孔子的尊号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史实列举”的态度，看不出对孔子儒学特别推崇。

①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05年订正3版，第98-99页。

②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84页。

③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130页。

④ 姚祖义编纂《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10年22版，第15页。

⑤ 姚祖义编纂《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第22页。

值得注意的是姚祖义对孟子仁政学说的介绍。他指出，孟轲“以辅世长民为己任，尝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初适梁，梁惠王不能用，更见齐宣王，为客卿，又不遇。往来宋、鲁、滕、薛，说时君，行仁政、王天下。然战国方务富强，闻王道说，莫不迂阔之。道卒不行，退与万章、公孙丑之徒，作《孟子》七篇，其辨王霸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鄙桓文之霸业，诋功利之徒，以民为贼”。<sup>①</sup>“民贵君轻说”是孟子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孟子限制王权、倡行仁政的主要理论根据。此前有些教科书在述及孟子思想时，主要谈其性善论，没有提及“民贵君轻”的仁政学说，尊孔子之道为国教的夏曾佑甚至未述及孟子思想。姚祖义选择叙述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显示了其限制君权、扩充民权的要求，隐含着反君主专制的意味。<sup>②</sup>《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孔子儒学“历史”的态度，在清末一些教科书中较为常见。<sup>③</sup>

综上所述，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或对孔子尊崇有加，或侧重于“客观”介绍。尽管一些教科书仍视孔子为圣人，但孔子形象已经开始了从圣人到历史人物的转变。

① 姚祖义编纂《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第19页。

② 在姚祖义编写的《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孔子儒学的态度与高小《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基本一致：“孔子名丘，鲁人也。生而好礼，及长，博学多能。当春秋时，欲大行其道，尝仕鲁，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欲去盟，孔子以礼却之，又争还汶阳之田。凡相鲁三月，鲁大治。齐人惧，用女乐之计，使鲁去孔子。由是周游列国，十余年，道终不行，乃返鲁。修订六经，以示后世。其门弟子三千人，知名者七十二人。”参阅姚祖义编辑《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06年6版，第7页。

③ 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介绍孔孟儒学为：“儒家之祖为孔子……初仕于鲁定公、哀公，不用，遂周流四方。其说以仁为本，论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先，弟子三千余人，最优者七十二人。……后孟轲受学于伋之徒，著《孟子》。其说尊王贱霸，重仁义轻功利，谓人性皆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至今称为‘亚圣’。后有荀况者，亦称大儒。其说亦以孔子为标准，然谓人性皆恶，不以礼仪矫正之，则不能为善，其旨与孟子颇异。”这里特别提及孟子为“亚圣”、荀子为大儒，而没有提及孔子的尊号。参阅吕瑞廷、赵澂璧编纂《新体中国历史》卷1，第48~49页。

## 二 民初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

民初一些教科书承续了清末客观介绍而不加述评的做法。《增订中国历史读本》有“孔子事迹”与“孔门弟子”两节叙述孔子儒学。“孔子事迹”详述了孔子的生平活动，“述《诗》、《书》、《易象》、《春秋》之文，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孔门弟子”中列举了随孔子求学的颜渊、子路等人。<sup>①</sup>《增订普通新历史》在介绍孔子删订《诗》《书》等典籍外，指出“孔子之学，以‘仁’为道之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道之大成，后世莫不宗之”。<sup>②</sup>该书未介绍孟子思想，也没有提及荀子。《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写道，儒学“以孔子为宗”，孔子“其学，以‘仁’为本；论政，以修身为先；教人，以循循善诱为法，盖合哲学、政治、教育而兼擅其长者也。志欲行道，列国不用。乃退而赞《易》，修《诗》、《书》、《礼》、《乐》，作《春秋》，为‘六经’。《论语》则门弟子所辑者也。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至战国时，孟轲、荀况，一主‘性善’，一主‘性恶’，皆祖述其道”。<sup>③</sup>

这一时期教科书多将孔子儒学放在“学术”一节中，视孔子为学术人物。蒋维乔的《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写道：“春秋之末，鲁有孔子，博学多能，传授弟子三千余人。战国时，孟子传其学，后世并称孔孟，谓之儒家。与孔子同时，楚有老子，为周室史官，其学主清静无为，与孔子异。孔子尝从而问道焉。战国时，庄周传其学，后世奉老子为道教之祖。”<sup>④</sup>沈颐的《中国历史讲义》指

① 吴曾祺编辑，赵玉森重订《增订中国历史读本》卷1，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1915年5版，第15~16页。

② 普通学书室编纂，赵玉森增订《增订普通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15年再版，第14页。

③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第53页。

④ 蒋维乔编《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原书未见版权页），第7页。

出：“儒家者，北方思想之代表也，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实为其说之中坚。创之者则为孔子。道家者，南方思想之代表也，崇虚无，齐物我，平阶级，明自然，其说正与儒家相反。”<sup>①</sup> 赵玉森的《新教科书历史》也视孔子为北方学术之代表，与道、墨诸家并列，一起造就东周以来的学术昌明时代。“两家南北并峙，成极端之发对。”<sup>②</sup> 中国学术向分南北两派，南方以老子道家为代表，北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孔子只是中国北方学术之代表，能否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尚存疑问。蒋维乔、沈颐与赵玉森等都是将儒家与道家对举，儒道并列，实际上是降低了儒学的地位。

孔子儒学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变，意味着孔子不再是不容置疑的“圣人”，一些教科书对孔子进行了批评。在民初注重共和的时代背景下，孔子与专制制度的关系使其首当其冲。1912年潘武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指出孔子思想与专制制度之关联。“（孔子）祖述尧舜，其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为主，而归之于平天下，隐具有世界主义。而其言则仍不出君主之范围。孟子名轲，宗之，以民为贵、君为轻，而归本于行井田、兴学校，又倡‘性善’之说，以诱导世人。大抵孔孟之学说，皆以政治为前提，而归之于教育，其言颇平易可行，后世号为儒者。孔氏之说，尤为历代君主多利用。”<sup>③</sup> 该书省略了一般教科书中常见的孔子生平介绍，侧重于孔子思想评析，对孔子学说与专制制度的结合颇有不满。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中特别提到孔子思想被后世误解与利用：“影响到后世，竟被那辈自托于儒者的播弄，竟把名分看得太重，等威辨得大明，只有片面的伦理，以上陵下了。桀黠的君相，更假以自便，硬

① 沈颐编纂《中国历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22年9版，第47页。

② 赵玉森编纂《新教科书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1920年8版，第39页。

③ 参阅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1册，第50页。潘武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见潘武编辑《历史教科书》（讲习适用），中华书局（原书未见出版时间），第25页。



抬孔子，于是孔子的尊严愈益隆重，而实际上不任礼法束缚的人们，还是止不住他们的反动——任情放浪。直到现在，孔子反背着许多冤枉的恶名。”<sup>①</sup> 孔子被儒生和君主利用，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顾颉刚在区别真假孔子的同时对孔子寓含批评。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总结与继承了上古社会的文化传统。唯其如此，能够对后来文化产生深远影响。<sup>②</sup> 陆东平的《高中本国史》对孔子整理典籍的叙述值得注意。该书在介绍了儒家思想后指出，“其宗主为孔丘”，“其著作世传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但《诗》、《书》、《礼》都是旧文，《乐》无文，《易传》是否全为孔子作品，也不可知。惟《春秋》为其手定。故研究孔子学说，在其著作中探究比较困难；惟其弟子传记的《论语》，可作为最好参考”。<sup>③</sup> 该书对孔子与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典籍整理也产生了很大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从根本上动摇孔子的历史地位。而书中直呼孔子为孔丘，很难看出对孔子的敬意。

一些教科书尊崇孔子儒学，对其给予很高评价。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就明确称孔子为“人伦教教主”：“我国从古代以来就注重人伦”，“尧、舜、禹、汤、文、武许多大圣人，都把这人伦做治平天下的根本。到了东周孔子出世，赞《周易》，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处处表彰人伦紧要的道理”；“所以人伦一方，早已确定为宗教。大家为着孔子的道大德大，在这人伦教上有莫大的功劳，所以推他为人伦教的教主”。<sup>④</sup> 《新学制高级历史课本》中写道：“孔孟生逢乱世，各能抱其觉世救民之旨，大声疾呼，尽力提倡。故后世人士，莫不景仰之，尊为圣人。”<sup>⑤</sup> 金兆梓的《新小学历

①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54页。

② 中华孔子研究所编《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第2页。

③ 陆东平、朱翊新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世界书局，1929，第115页。

④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第1编第55~56页。

⑤ 杨喆、朱翊新编辑《新学制高级历史课本》第1册，第13页。

史课本》与张鸿英的《小学文体历史教科书》详述了孔子的事迹与思想，指出孔子“学说支配中国人心者垂二千余年，自古迄今，朝野上下，皆奉为圣人。日本、朝鲜、安南也被其教化，至今庙祀不绝”。<sup>①</sup> 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赞扬孔子热心救国的努力：“孔子本一热心救国之士，故不欲徒托空言，而思见诸实事。周游列国凡十三年，卒未遇行道机会；乃返身从事教育，尽以其学普及之于一切阶级。周末学术思想因以大盛，而孔子亦遂为当世大师。”孔子编订六经，“为后世人人必读之书。故今之言中国学术——甚至一切文化——者，无不举之以为代表”。孔子要改正当时繁缚之虚礼，对礼所养成之阶级制深为不满，所以倡正名主义，使统治阶级不得假托礼制以行暴政。<sup>②</sup>



图 6-1 洪鑒《新教育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像

- ① 张鸿英编《小学文体历史教科书》第1册，中华书局，1924年7月发行，7月再版，第6~7页。另见金兆梓、洪鑒编《新小学历史课本》第1册，第6页。两书意思一样。
- ②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上册，第25页。另，金兆梓编《新中学初中本国历史》（上册，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1932年37版，第31页）中的叙述基本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主要是肯定孔子儒学的历史地位，侧重于孔子整理古代典籍、兴办教育的功劳，以及其博学多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与清末尊崇孔子为“万世师表”有所不同。

肯定孔子，还须回应孔子儒学与专制制度之关系，而这正是儒学受攻击的关键所在。由于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孟子叙述逐渐凸显。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在“客观”地介绍了孔子及其学说之后说道：“孔子没后，儒家出了两派：一是孟轲，主张‘性善’说，以为人类本性，都是善的，都可以成圣贤；一是荀况，主张‘性恶’说，以为人类天性争好，只因被礼法缚住了，才不敢作恶。两说都和孔子有点不同，但是又都说得有理。孟子又抑制君权，说‘民为贵君为轻’，可见思想的进步了。”<sup>①</sup>与清末孟子作为“亚圣”受到重视不同，此时孟子是作为反对专制、伸张民权的一个代表出现的。

民初教科书除了继续注重从史实方面介绍孔子外，孔子叙述有两个变化：一是对孔子真实性表示部分怀疑，试图从根本上动摇孔子的地位；二是尊崇孔子的，也主要是关注孔子兴办教育等历史影响。这与清末的尊孔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颁布三民主义教育方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实行祭孔尊孔活动，教科书对孔子叙述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般教科书都肯定孔子儒学。《陈氏高中本国史》对孔子的努力表示赞赏，对孔子的际遇表示同情，指出孔子“抱着积极救世的决心，他相信天下必可太平，他主张用仁义建树人格，用礼制范束私

<sup>①</sup>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下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26年55版，第9页。

欲，用诗歌陶冶性情。他虽觉得这社会不可救药，然非给与救药不可。所以他虽然少有从事政治的机会，但终是热心海育青年，栖栖皇皇地奔走。可惜奔走了一生，没有人用他以展他的抱负，到晚年，他只有把精力用在删定纂修方面”。<sup>①</sup>《余氏高中本国史》中写道，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从内省的修己，推之于用世以安人。孔子鉴于当时政治纷乱与民生痛苦，想改善当代的社会和政治。他对政治问题，主张“隆礼”“正名”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秩序，矫正贵族阶级的僭妄。对于人生，他提出“仁”的观念，要人努力做一个成人，教人“泛爱众而亲仁”。“儒家温和的政治主张，教育的伦理的倡导，和其努力于古代文献的保存，知识的传播，影响于后世者至为远大。”<sup>②</sup>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指出，孔子“是一个博学多能，事事讲求实际的大学问家。他虽认定人类理想的社团生活，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但他以为要达到这世界，必须先有良好的民众，所以他努力于礼教的维持和改进，就人类现实的生活，而施以教育，打算由所谓‘小康之政’而谋‘大同世界’的实现。当时各国诸侯都不能采用他的主张，他便一心从事教育”；“后世人所认为的必读的五经，便是由他修订而成的”。<sup>③</sup>

孔子游历各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国多不用，继而从事教育。前期教科书述及此点时，往往说明孔子的不得志，兴办私学也是无奈之举；此时大多宣扬孔子的心热救国，兴办教育也是孔子救国情怀的延续，这种叙述普遍多了种温情与敬意，肯定了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

这一时期教科书孔子儒学叙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其进行了新解释，赋予其时代特征。《朱氏初中本国史》认为，孔子“以‘仁’为宗，以‘忠’、‘恕’为为人之道，改正当时繁缛的虚礼；

①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00页。

② 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34年7月修正，9月再版，第61~62页。

③ 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30页。



图 6-2 姚绍华《小学历史课本》中的孔子像

又倡‘正名’主义，使治者阶级，不得假托礼制，以逞其横暴。他的作《春秋》，便是‘正名’主义的表现”。这里，“忠恕”和“正名”都有着矫正时弊、限制统治者而关注普通百姓的意味，与以前认为孔子儒学为统治者服务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sup>①</sup> 李云坡的《初中本国史》把孔子政治思想与“三世说”联系起来，以当时流行的进化论加以解释。书中指出，孔子“哲学思想，根本在一‘易’字，‘易’是变易，是进化”；“他的政治主张，根本在一‘德’字，主张为政者‘以身作则，以德化民’的德治主义”；“他对于政治的实施方案，却又主张分期不同：据乱之世，应当‘正名’，作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分相符”；“小康之世，应当‘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大同之世，应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sup>②</sup> 同样，孟子也成为民权的倡导者。徐映川的《复兴教科书历史》中写道：“（孔子）

① 朱翊新编著《朱氏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23~24页。

② 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文化学社，1932年3版，第33~34页。

游历各国，君主多不能用他，他因此回家教授学生，亲自删定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传给后代。后百余年，孟子出，追宗孔子，讲‘仁’、‘义’，说‘民为贵君为轻’，为提倡民权的第一人。”<sup>①</sup> 孟子提倡民权，在1920年代的教科书中也有论述，不过在这里却多了另一种含义。孟子提倡民权，孔子不为君主所用，隐含着不和君主合作，甚至有种反君权的意识。对孔子学说的重新解释，主要是想厘清儒学与专制之关系，而这正是反孔者批评孔子儒学最为集中的一点。

孔子是中国文化中心的说法以及“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名号又被重新拾起。《朱氏初中本国史》特别指出：“孔子为儒家之祖，树中国文化的中心，因孔子以前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流传；孔子以后数千年的文化，也没有离开孔子之道。”<sup>②</sup> 李云坡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孔子“主张‘因时为治，不泥一义’，故后人称‘孔子圣之时者也’”。<sup>③</sup> 徐映川的《复兴教科书历史》中写道：“孔孟学说，至今为学者所崇仰”，“我国国民性仁爱和平，是受着这派学说的影响”。<sup>④</sup> 应功九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孔子树立中国文化的中心，自从汉朝起，一直到现在，儒家的理论，始终为人所推崇，“孔子的学说，精深博大，中正和平，影响中国的思想，至数千年之久”。<sup>⑤</sup> 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新本国史》就特别以“至圣先师”来描绘孔子，指出孔子“把一向传下来的六经——《易》、《诗》、《书》、《礼》、《春秋》、《乐》，重新整理了一下，为儒家之祖，历代

① 徐映川编著《复兴教科书历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7月初版，8月10版，第12页。

② 朱翊新编著《朱氏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22页。另外，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也持同样的观点（第1册，世界书局，1930，第44页）。

③ 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第34页。

④ 徐映川编著《复兴教科书历史》第3册，第12页。

⑤ 应功九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73页。

都很崇奉。‘至圣先师’的名号是明朝时候定的”。<sup>①</sup>《高中新本国史》指出，孔子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六经上去，实行以述为作的工作，六经是古代的典籍，是中国文化的大渊藪，在先秦思想界中，以孔子造诣最深，影响最大，“屹然为‘万世师表’，一直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sup>②</sup>《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称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其救世救人的抱负，代表了当时的传统精神，其倡导的学说，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所以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孔子“删正经典，对先代遗籍加以理论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至于他的学说，平易笃实，不尚高论空谈，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则直至今日，我们的行为和思想还受他的影响”。<sup>③</sup>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指出孔子学说“集道大成”，“孔子之道，实为中国政教之基础”，书后列有“孔子事略表”，从孔子的简历、事功、宗旨、教育、经典、孔门人才等方面详述，并引用司马迁《史记》的话，称孔子为“至圣”。<sup>④</sup>

但是，对孔子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史学专家编写的教科书，或批评孔子，或淡化孔子的影响。《北新本国史》中写道：“儒家始自孔丘。其学说，完全建立在农业经济的社会上面，以家族主义为治国平天下的骨干。所以正名分、严序别、重礼教，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儒家学说能支配国人心理至千年之久，其原因亦在于此。”<sup>⑤</sup>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认为，孔子信仰传统思想如天命之说，是旧制度的拥护者。孔子的思想不能离家族主义，所以他又以孝悌为仁之本，为为政之本。孔子所谓仁政，固以德治为主，

① 蔡沅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世界书局，1937，第61页。

② 孙正容编著《高中新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47年6版，第126页。

③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上册，开明书店，1947年2月初版，11月4版，第62、69页。

④ 罗元鲲编著《高中本国史》第1册，第67、70页。

⑤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上册，北新书局，1930年初版，1932年6版，第40页。另见杨人榘编辑《初中本国史》第1册，北新书局，1935年初版，1937年14版，第62页。



图 6-3 国立编译馆《高级小学历史课本》中的孔子像

但正名分、重礼法、严阶级却是他为政的必要方法。<sup>①</sup>一些教科书对孔子的介绍相当平实，把孔子视为一个历史人物。《新生活初中本国史》以“孔子和儒家的礼教”为题，侧重于儒家“礼”的界定。<sup>②</sup>全书最后一章“结论”中指出，孔子的一些主张已经不适合现代生活：“若把孔夫子所讲的许多道理，拿来和现在所知道的道理相比较，真是微乎其微，他所主张的许多‘礼’，以我们现在看来实在是野蛮的；他所崇奉的许多事情，有许多是极幼稚的。我们并不是说孔夫子不好，我们实在是极尊敬孔夫子为圣人，不过他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的圣人罢了，绝不能是现在的圣人。”<sup>③</sup>吕思勉的《复兴高中本国史》在提及孔子儒学时，将儒、墨、道、法四家并列，

① 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北新书局，1935，第119页。杨东莼两种教科书对孔子的叙述不同。

②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61~66页。

③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4册，大东书局，1934，第121~122页。



对儒家的介绍一带而过，不加评述。<sup>①</sup>

至于1930年代以后的孔子叙述，一些教科书充分肯定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指出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万世师表。另一些教科书却表达了对孔子儒学的不同看法甚至予以批评。

#### 四 教科书叙述与国家、思想界之关联

梳理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讨论教科书的知识生产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把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与国家政府与思想界对孔子儒学的态度加以比较，可以看到教科书受到政府或思想界影响的程度，以及政府与思想界的态度如何影响到教科书的编写。

清政府与汉以来的很多传统王朝一样，对孔子儒学是持肯定与尊崇的态度。1901年新政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sup>②</sup> 新政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洋务运动以来的“中体西用”，即在坚持儒家“三纲五常”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清末教育改革也把忠君和尊孔作为首要的教育方针，尊孔是学校教育和历史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

清末思想界对孔子儒学的态度较为复杂。孔子儒学是思想界论争的一个焦点，孔子论约分三类：主立国教的尊孔论；力攻腐儒误孔误国的“真假孔子”论；倡“孔丘革命”的排孔论。<sup>③</sup> 尊孔者主要有两种：一是传统士人，接受儒学教育，对儒学有一定感情；二是如康有为等人，称孔子为“素王”与“儒教教主”，将儒学宗教

① 参阅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63页。

②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页。

③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359页。本段论述主要参考该书。

化，将孔子形象政治化，其目的则是托古改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支持。这些尊孔者尽管具体要求不同，但都维护清朝统治。反孔者也主要有两种：一是全盘反孔，以《新世纪》刊物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孔子成为中国最大的迷信，阻碍了历史的进化和科学的发展，倡导“孔丘革命”；二是以章太炎等国粹派为代表的反孔者，反对孔儒与专制制度之联结，他们对孔子既有批评，却又肯定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这种评孔方式影响深远。

清末教科书的孔子叙述有较大差异，体现了编者的不同立场。在对孔子持尊崇态度的教科书中，文明书局的两种历史教科书认为儒学为中国政教之根本，但未把儒学视为宗教，更未把儒学作为国教，认为孔子是人而非神。这与清政府的尊孔态度一致，也与思想界传统士人的孔子儒学态度基本相同。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尊崇孔子，把孔子看成神，把儒学看作国教，与尊孔的康有为一派相同，也可见夏曾佑作为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把孔子视为历史人物的教科书中，姚祖义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肯定了孔子儒学对中国的影响，但不同于把孔子儒学看作中国政教之根本或认为孔子是神人教主的清末思想界尊孔派，与清政府的尊孔要求有一定距离。这种看法与章太炎、刘师培等部分国粹派人士对孔子的认识接近，与部分维新派人士的认识近似。

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持抑制尊孔态度，北京政府尊崇孔子儒学。民初废止小学读经科，取消大学以下各级各类学校的读经、讲经课程，大学校撤并经科入文科，大学校以上改“通儒院”为“大学院”。儒家经学由以前的官方哲学转化成可以研究的学术文化科目之一，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sup>①</sup>尊孔被认为与信教自由相违，尊孔读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转

<sup>①</sup>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16页。

变，北京政府恢复了尊孔读经。1913年袁世凯发布《尊孔令》，<sup>①</sup>在《天坛宪法草案》中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其后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与《颁定教育宗旨》中都特别突出孔孟的地位。<sup>②</sup>北京政府时期的读经尊孔并未因袁世凯去世而结束，1925年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通令中小学生读经。

民初，思想界依然有着尊孔与反孔的对立，可以康有为的孔教会与陈独秀的新青年派为代表。康有为、陈汉章等发起成立孔教会，要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是清末的延续，但其尊孔内容前后不尽相同。清末康有为保教的“教”系指纲常名教，即儒家学说；民初立孔教的“教”则是宗教的“教”，其外壳是西方宗教形式，内核是传统儒学。<sup>③</sup>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派批判儒学与专制制度的联系以及封建礼教，认为其与共和政体、现代生活背道而驰。<sup>④</sup>新青年派提出“打孔家店”，反对定孔子于一尊，要求思想解放，<sup>⑤</sup>但也注意从孔子思想的本意出发，厘清孔子思想与孔子后学的差异，对孔子儒学还有所肯定。

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接近思想界的立场。此时期教科书对孔

- 
- ① 《大总统发布尊孔崇圣令》，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1~2页。其中写道：“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帝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者”；要求“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子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 ②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225、233~242页。《特定教育纲要》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颁定教育宗旨》提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教育宗旨，参阅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762、770~779页。
  - ③ 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52页。
  - ④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第268页。
  - ⑤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1929年9月。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子的叙述方式基本是史实介绍，把儒学学术化，将儒学作为一学术派别，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大多教科书将孔子儒学叙述放在“学术”一节中予以介绍；一些教科书把儒家与道家等诸子并列，实际上是降低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教科书显然与北京政府的尊孔立场有所距离甚至是对立，与南京临时政府立场接近，更多地受到新青年派反孔思想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孔子儒学持尊崇态度。孙中山用孔孟之道解释三民主义，戴季陶等人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奠定了尊孔的基调。1928年，南京政府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作为道德标准，在社会推广孔孟道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孔祭孔活动。<sup>①</sup>1934年7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在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在宣传方面，要“（一）讲述孔子生平史略；（二）讲述孔子学说；（三）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sup>②</sup>

思想界依然存在反孔与尊孔两派。反对孔子儒学的基本上还是新青年派，持论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相同。尊崇孔子儒学的主要有两种：1930年代出现的“本位文化派”代表与抗战时期出现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反对“全盘西化”，注重儒学的现代价值，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尊崇与批评孔子的叙述同时存在，显示了某种“分裂”：尊崇孔子的教科书认为孔子学说是中国文化中心，对孔子多加褒扬，体现了政府的尊孔意志；批评孔子的教科书认为孔子思想是宗法时代和农业社会的产物，或直接说孔子是旧制度维护者，认为孔子儒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这显然延续了五四新青年派的批孔思想，与南京政府的尊孔要求相背离。

① 王锟：《孔子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齐鲁书社，2006，第83页。

② 《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载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第132页。

清政府、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尽管它们的政权性质有很大不同，但都尊崇孔子儒学。孔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这几个政府尊崇孔子儒学，正是看中了孔子儒学在维系社会人心方面的重要功用，尊崇孔子儒学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他们的统治。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孔子儒学的尊崇，其间又有异同。首先，这几个政府都提倡尊孔读经，但都未立孔教为国教，特别是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其次，尊崇儒学的侧重点不同。清政府极力维护三纲五常。三纲五常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三纲中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清政府借此维护其专制统治。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注重孔孟的仁义学说，希图用儒家伦理中的五常来调整日常生活，而对三纲部分不太提倡，表现为政府提倡读经，但反对读全经。<sup>①</sup>

相较于清朝与民国政府较为一致的尊孔态度，思想界对孔子的态度较为复杂。就尊孔一方来说，除了康有为等人极力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外，多数人关注的是儒学中有现代价值的部分，如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宣称以承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但对儒学中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色彩部分予以清理，肯定其本体意义上儒学价值，否定其被专制统治者所歪曲利用的部分。<sup>②</sup>就反孔一方来说，清末主要批判孔子儒学与专制制度的关系，民初在此之外，还认为孔子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就立孔教为国教一事上，清末反孔者认为儒学非宗教，孔子非教主；民初在此之外，认为定孔子孔教于一尊会禁锢思想。

孔子儒学在近代中国有着受到尊崇与批判的双重境遇，影响到教科书的编写，不同教科书采取了不同的编写立场，或反映政府的尊孔要求，或反映思想界的态度。这使得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存在多样性。

① 张卫波：《民国初期尊孔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第111~113页。

② 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第397页。

## 五 教科书叙述：孔子儒学在近代中国的难局

清末民国时期政府和思想家对孔子儒学的不同态度，在教科书中都有一定的反映。在清末政府的语境中，对孔子儒学的尊重是应有之义，但教科书没有充分体现出这一要求，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一定影响。民初的教科书对政府的尊孔活动与要求反映不多。教科书中孔子形象既不同于新文化激进派的激烈反孔，也不同于尊孔派的要定孔教于一尊，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史实呈现”。相较于国家政府的尊孔，教科书中孔子地位明显低落，显然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一定影响；相较于当时思想界的反孔思潮，教科书这种温和态度，又是对孔子儒学的维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儒学地位迅速上升。一方面是官方复兴儒学运动，另一方面是现代新儒家在复兴和弘扬孔子精神方面做了很多努力。<sup>①</sup> 尽管对孔子儒学存在许多争论与冲突，但在民族精神的复兴与重建这一点上，各派学者都有相当一致的基本共识。<sup>②</sup>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部分教科书，都对儒学给予了高度肯定，孔子重新获得圣人地位。但是，学界对政府的儒学立场并不完全接受，针对孔子的不同声音并未消失。

教科书对孔子儒学的叙述方式，为我们认识教科书的编写立场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就单本教科书来说，其对孔子儒学的叙述有着明确的立场，可以从思想界或政府的态度中找到支撑，其与政府或思想界的某种认识紧密相连。如果把教科书视为一个整体的话，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既不同于思想界尊孔或反孔，也不同于国家对孔子的推崇或贬抑，即与政府、学界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介乎国家与思想界、尊孔与反孔之间。教科书的这种编写立场，可能体

① 参阅王锷《孔子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第215页。

②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1卷，第407页。

现了国家面对儒学的难局。

政府作为特殊的政治组织，首先要维护社会秩序，应当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建立民族认同，从而为自身提供合法性。一般而言，孔子由于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当是认同对象的最佳选择。然而现实远非如此。一些民族主义者宁愿建构出一个黄帝，也不愿接纳孔子。其中缘由比较复杂，但孔子儒教与专制制度之关系确是一个重要因素。<sup>①</sup>不仅如此，政府对孔子儒学的任何肯定和推崇，都有可能唤起儒学与专制制度联结之联想，从而招致反孔人士对儒学与政府双方的批评，连带危及对政府的认同。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潮，就是由袁世凯和张勋对传统与儒学的滥用而引发的。<sup>②</sup>国民党将三民主义儒家化及发起官方复兴儒学运动也遭到强烈反对：“孔子有孔子的价值，有孔子的气运。把三民主义孔子化，不独破坏三民主义，并且违反孔子及孔子学的本质。”<sup>③</sup>

那么，国家能否抛弃备受批评的孔子儒学呢？答案是很难。这不只是因为儒学在中国有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sup>④</sup>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与民间习俗中仍具有潜在的支配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民族主义立场看，抛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信仰，在民族认同方面就会产生危机，由此可能带来迷茫和消沉而失去认同，这不仅是一个民族衰微败落的征兆，而且孕育着国家的危机。<sup>⑤</sup>民族认同中，有自己特殊的文化传统的正向认同尤为重要，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以安全感、自豪感和独立意识。儒学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国家应当充分利用孔子儒

① 参阅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第43~48页。

② 参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第24~32页。

③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35，第189页。

④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37页。

⑤ 参阅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9~40页。

学这些传统资源，建构一种正向的民族认同。

国家面对的儒学难局，也是思想界所面临的问题。由民族主义而起的儒学危机，从一个方面呈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悖论：“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sup>①</sup>或许解开这一难局的办法就是常言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教科书中间立场的孔子形象的出现，可能预示了传统儒学的近代转换已经开始，也大致宣示了孔子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 小 结

论及教科书对编者观点的体现程度，或许周予同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周予同长期从事经学史研究，从1920年代开始出版数种研究著作，1934年出版《孔子》一书，对孔子及其思想有所论列，肯定孔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批判了孔子对旧制度的维护以及后世中的“假孔子”。<sup>②</sup>正是在这一时期，周予同开始编写教科书，1931年出版《开明本国史教本》，1934年出版《初中本国史》，可以说周予同的孔子研究与教科书编写同步进行。《开明本国史教本》中写道：“孔子主张仁治主义，以仁为个人及社会之至善至高的境界；换言之，即以人类应发挥其同情心以渐达大同世界为原则。但在方法上，仁德的表现，须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故主张差别的爱，从孝悌入手，而含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诸子中代表改良的、中庸的思想”；“这派的优点，在以和平的、教育的方法改善人类；而它的流弊，在易被黠君腐儒所利用，以拥护一切不

<sup>①</sup>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3页。

<sup>②</sup> 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97页。



合理的阶级制度。这派影响于后世极大，时间也极长，大抵在伦理与政治方面”。<sup>①</sup>《初中本国史》比较简略，对孔子思想的介绍与《开明本国史教本》基本相同，但去除了对孔子思想优点与流弊的评价，增加了“孟子更受后人的崇拜”叙述。<sup>②</sup>《开明本国史教本》既肯定孔子思想的历史意义，也指出其不利影响，基本反映了周予同在经学及孔子研究中所持的观点；《初中本国史》对孔子儒学的叙述相对“客观”，其中去除的部分大致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立场，但增加的部分表达了周予同的态度。

本章以孔子叙述为中心，讨论教科书与国家（政府）、思想界的关系，希望能够加深对教科书知识特点的认识。本章的讨论跨越 20 世纪上半期，不管是当时的政局还是思想界的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孔子形象在不同的言说中也有很大的不同。相较于政府与思想界对孔子的复杂态度，从整体来看，教科书对孔子的叙述相对“持中”：无论是尊崇孔子还是“客观”叙述，不管孔子以何种形象出现，它既不完全同于国家在教育方针中的设定，也不完全同于思想界与知识精英（编者）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基本是国家与思想界折中调和的结果。这种情况可能告诉我们，教科书编写处于政府与思想界之间，其知识也是介于政府与思想界之间。

当我们说起“教科书”时，往往是指教科书整体，所谓教科书特点，也即作为整体的教科书的特点。本章是把教科书视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希望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教科书的特点，这不仅是本书作为教科书专题研究的需要，也是一种方法上的尝试。探究与总结教科书的整体特点，可以为我们认识教科书提供一种参照，便于对教科书加以理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整体”考察还是有

①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1 初版，1934 年 7 版，第 45、46 页。

② 周予同编著《初中本国史》第 1 册，开明书店，1934 年初版，1936 年 5 版，第 53 页。另见周予同《本国史》第 1 册，开明书店，1947 年 7 页初版，11 月 3 版，第 48 页。两书叙述相同。

一定的危险，因为对一个个单种教科书来说，每种教科书都有其特点。因此，在实际研究中，既要注意对某一时期教科书整体特点的把握，还要进行单种教科书的具体分析。

有人认为，教科书反映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公认的知识。从本章对教科书中孔子叙述的讨论来看，这种认识尚需进一步讨论。如果仅有一种“国定本”教科书的话，这种认识大致可以成立，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公认”知识也主要是政府认可的知识，这种看法忽略了思想界不同的声音。如果同时存在多种教科书的话，那么这种认识恐怕就难以成立，因为各教科书之间有很大差异，甚至“极端”说法都会出现在教科书中。如教科书孔子叙述的多样性，恰是思想界认识多样性的反映，尽管其中也有体现政府要求、反映政府意志的。教科书之间的叙述不同，正说明了政府与编者在教科书编写中地位与影响：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其教育要求的实现程度与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考量；遵循政府要求来编写教科书的编者，其个人认识却多有反映。即便在教科书编写逐步模式化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编者的意图还是会以多种叙述方式在教科书中表达出来。

通过第一至第六章的讨论，希望能够引发我们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方法上的思考。政府教育政策往往是通过编者与教科书予以体现，编者对教育政策的理解是影响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目前大多数关于教科书编写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政府教育政策来分析，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教科书编写会必然反映政府的教育要求。从本书的讨论来看，尽管遵循政府教育政策是教科书编写的基本要求，但是教科书编者的认识与政府的教育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有时甚至是根本对立。因此，教科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府教育要求还需要具体分析；从政府教育政策来讨论教科书编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教科书情况，还难以确定。因此，教科书研究，应该将政府、编者与教科书内容结合起来进行。

# 下 编

---



## 第七章

#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清末以来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采用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也成为“新史学”一个特征。历史分期一般是指近现代历史工作者对长时段历史的阶段划分，其意图是通过划分历史阶段来认识历史的进程，表达了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sup>①</sup> 在民族史叙述中，历史分期与民族国家建构有很大关联。历史分期是历史获得意义的重要途径，它表达的不仅是对过去的认知，更是当下情状的体现，寓含着对未来的态度。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历史分期正是其建构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分期，把本地区纳入到普遍历史之中，从而使民族获得现代性。<sup>②</sup>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自己民族的历史，这种分期方式对

---

① 参阅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文章认为，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分期与理论性分期两种。自然的或技术性分期主要是对具体的历史过程为了叙述方便而做的分期，以比较直接的基于被描述的历史主体过程的自然阶段为特征。理论性分期跨越了单纯的朝代或事件，将某些具有同质性的事件因素归并为一个时期。这种分期倾向于以具有哲学意义的对于历史的理解为基础。一般而言的历史分期即为理论性分期。

② 参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1章。

人们历史观念产生何种影响，本章尝试以教科书中历史分期为中心略做探讨。<sup>①</sup>

自清季历史分期进入中国历史书写之后，就一直作为“问题”存在，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从未停息。<sup>②</sup>今天相当多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但多会触及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如何展开？对中国“近代”的讨论往往会追溯到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模式上。<sup>③</sup>本章要抛开史学史上有关历史分期的争议，不再纠缠于某个朝代特征的考订和具体时段的划分；而是将历史分期看成是表述史家历史认识的“文本”，以此来考察史家如何运用历史分期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通过历史分期，塑造了何种中国形象，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 一 历史分期与中国历史书写

历史分期是西方普遍历史的产物。西方历史采用“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现代）”的三分法，古代是创造民族与文化的时代，中世是衰退期，近代则是再生的时代，近代通过斗争以求变化，而达到进步。<sup>④</sup>历史分期原本就来源于西方，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入中

① 较早注意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的是李则刚，参阅李则刚《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该文只是列举了当时部分历史教科书历史分期，未做分析。

②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争论的相关论述，参阅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高明士、邱添生、夏日新等译，中华书局，1993；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③ 参阅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④ 参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2页。

国书写，其间又经历了日本的管道，<sup>①</sup>使分期使用的术语意思变得复杂。“上古”“中古”等词，中国古代典籍里多已出现，一般指茫无稽考的上古时期，有了确定的时期后，则用朝代来表示时期。<sup>②</sup>“近世”是接续于古代、中世后的时期，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意思，广义上的“近世”与近代同义，狭义上指有别于近代的在那以前的一段时期，一般指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以降，在日本史上特指相对于封建制后期的江户时代。“近代”广义与近世同义，一般指承于封建制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在日本史通常指明治维新之后至太平洋战争终结的时期。日本学者所说的“近世”主要指中国相对于封建制后期而类似于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时期。至于中国近世以后的时期，日本中国学家一般以日本汉字“近代”相指称。<sup>③</sup>历史分期术语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也是个文化概念，有着一定的价值取向。

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采用了历史分期。因果关系是中国史

- 
- ① 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63页。
  - ② 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书写》，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第242页。
  - ③ 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复旦学报》（人社版）2002年第2期。另参阅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150页。作者认为，“现代性”（modernity）在中文与日文里都是一个全新的用语。在中文里，它的标准代称是“现代”，意即“当前的世代”，“modernization”的代称是“现代化”，字面意思是“历经走向现代的变迁”。在日文里，“modern”的代称是“近代”，意味着“最近的世代”，这种表达方式意味着比“现代”更长的时间架构。中文的“现代”可以译成日文的“现代”，但严格来说，日文的“现代”是指当下目前，而非指广义的现代时期。“modernization”在日文是“近代化”而非“现代化”，因为后者在意思上指类似“与时俱进”的较浅短的变迁过程。另外，日文中的“近代”可以译成中文的“近代”，但这个词在意义上并不普遍，而且多半用于专有名词，如“近代史”，在传统分期上，它所涵盖的时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关于“近世”“近代”等含义的讨论，亦可参阅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载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

家理解与划分历史时期的重要因素。1913年沈颐的《中国历史讲义》指出，区分时代的原因：“上下数千年，世局之变动至繁，欲推究其变迁之故，则必会而通之，约至繁者归于至约，然后举其一二事，于国群有最巨之关系者，以为其一时代之标准，使读者可寻绪以求。”<sup>①</sup> 1923年顾颉刚在《现代初中本国史》中指出，历史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不但前因后果有互接相承的关系，就是同一时代，也不能不与近旁诸事发生影响。“至于时代的划分，本可不必，若依朝家的兴亡来断代，更觉失当。惟为研究的便利起见，略分几个史期也好。今且就前后因果最切，事实联络最密的若干年括作一期。”<sup>②</sup> 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也把“因果关系”作为分期的原因：“本书之叙述，意在使一时代中先民全体延续活动的精神，为整个的表现。故一方面打破帝王兴亡朝代观念；一方面复依各事迹之因果，认出其起讫以为大段落，且力谋此事迹与彼事迹之联络而明其递嬗之迹，以成一整个的历史时代观念。”<sup>③</sup> 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也是如此。<sup>④</sup>

因果关系主要是从事件之间的联系上考虑的，在具体的分期中，则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清末民国教科书中，或以民族为标准，或以社会文化为标准，或以经济为标准来分期。这里以孙正容的《高中新本国史》为例。《高中新本国史》中列举了五种分期方式，根据课程标准规定，该书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另外，又举出四种分期。第一，以政治为对象，分三期。①由部落至封建时期（神权政治时代）：自太古至周末；②君主专制时期（君权政治时代）：自秦统一至清末；③民主共和时期（民权政治时代）：自民国元年至现在。第

① 沈颐编纂《中国历史讲义》，第8页。

②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17~18页。

③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上册，“编辑大意”第2页。

④ 周予同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消极地打破帝王兴亡的朝代观念，积极地观察先民社会活动的事迹，探求他们的因果，划分为若干大段落，以表现出这整个的历史的时代观念。”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14页。



二，以经济为对象，分三期。①由采集经济至粗有农业时期：自太古至西周末；②共商勃兴转至以农为本时期：自春秋至清鸦片战争；③新工业输入、旧有经济组织动摇时期：自鸦片战争至现在。第三，以文化为对象，分三期。①中国文化独立成长时期：自太古至两汉；②中印文化由接触而糅合时期：自东汉至明末；③中西文化由接触而蜕变时期：自明末至现在。第四，以民族为对象，分八期。①境内原始民族逐渐统一时期：自太古至周末；②华族第一次向外拓展时期：自秦至东汉末；③华族中衰异族蹂躏中原而卒归同化时期：自三国至隋初；④华族第二次向外拓展时期：自隋初至唐末；⑤华夷抗衡卒至覆亡时期：自五代至元末；⑥华族复兴时期：朱明一代；⑦东胡族入主中国而同化于华族时期：逊清一代；⑧华族大团结共御外侮时期：自民国元年至现在。<sup>①</sup> 该书给出了五种分期方式，有三个到八个的时段划分，基本囊括了一般教科书的分期情况。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三个、四个或五个时段的划分法，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世”等词语来表示。教科书中的具体历史分期，见附表7-1。

## 二 “近古”与中国古代史：发展或停滞

中国古代史从时间上看有两种情况：一是从远古到明末；二是从远古到元统一。在时段划分上主要有两种：一是包括“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段；二是包括“上古”“中古”两个时段，和前一种情况相比，少了“近古”一个时段。这个或有或无的“近古”，使中国古代史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中国历史分期中，最为一致之处是对“上古期”的分段，都是将“秦统一”之前的历史作为“上古史”（或远古史）。<sup>②</sup> 上古期是

① 孙正容编著《高中新本国史》上册，第30~34页。

② 也有在上古史之前划出了一个“史前史”部分，如罗香林《高中本国史》。

中国历史的开幕时代，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或认为是中国“文化发育的时代”，<sup>①</sup>或认为是“由采集经济至粗有农业经济时期”。<sup>②</sup>此期是中华民族“从极浅演之群，进而至于建立一个大国的时代”，<sup>③</sup>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从秦到明末这段历史的分期，差异颇大，主要有两种划分：以唐末（五代）为界，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或将之单独作为一个时期“中古期”。这里先讨论存在“近古”分期的中古史与近古史的时期特征。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有很大影响的当推清末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东洋史要》把东洋历史——主要是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是从太古到秦统一，为“汉族充腴时代”；中古从秦到唐亡，为“汉族全盛时期”；近古从五代到明末，为“蒙古族全盛时期”；近世是从清至今，为“欧人东渐时期”。从秦到五代的中古时期，中国历史变动较快，统一与分裂交替，既有外族入侵引起的分裂，也有汉唐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尽管有北方民族南下骚扰，但对汉族影响不大，汉族开辟了空前的大版图，达到全盛时期。而从五代至明的近古期却是蒙古族极盛时代。近古期中，汉族“气焰全灭”，塞外诸族相继得势，通古斯族先兴，继而蒙古族兴起建立元朝，统一东亚，蒙古族势力更经中亚而席卷西北两部，影响远及欧洲大陆。“要之此期，洵蒙古族勃兴之世。彼族与东洋厄运，实为诸事变之主动力。”<sup>④</sup>《东洋史要》把从秦至明代的历史分为中古与近古两个时期，分别是汉族与蒙古族强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间，看不到有多少联系。

《东洋史要》四期划分法影响很大，如傅斯年在1918年所说：

①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目录第1页。

② 孙正容编著《高中新本国史》上册，第31页。

③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例言第1页。

④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卷1，第9~10页。

“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sup>①</sup>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史家如顾颉刚与周予同等人所编教科书，时期划分虽与桑原完全相同，但在表述上有很大差异。如桑原把中古时期的五胡乱华视为外族入侵引起了汉族的衰微，顾颉刚则对外族入侵持肯定态度。在《现代初中本国史》中，顾颉刚认为，北方民族南下，五胡进入中原，使得中原文化南迁，也使后来中国文明同化了新民族，形成了隋唐统一帝国，对中国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印度佛教传入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了活力，成为后来近古期中国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到汉魏有暮气，中间吸收新血液，返老还童到唐灿烂”。顾颉刚把从秦到唐末的“中古”称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蜕变时代”。<sup>②</sup> 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对于中古期的看法与桑原、顾颉刚有一定的相似，认为“中古”是汉族强盛与中国发展的时期。<sup>③</sup> 如果说顾颉刚与周予同对中古期看法较为一致的话，那么二人对从五代到明末的近古期看法差异很大。顾颉刚认为近古期是承续中古期继续发展的时期，“虽遭外患，仍在发展”，这一时期为“中国民族的争存时代”。<sup>④</sup> 周予同承认此期中国文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认为近古中国中止了发展态势，“在政治方面，更显示出君主的淫威；在社会方面，中国社会依然停滞在与中古同样的境界”。<sup>⑤</sup>

与上述桑原鹭藏等人的四期分法不同，钟毓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把中国历史分为五期：远古史，邃古至秦统一前；中古史，秦统一至南北朝；近古史，隋至南宋末；近世史，元至清末；现代史，中华民国。中古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汉族的拓展与外族的同化，二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一些史家注重民族分合不同，《新

① 傅斯年：《历史分期之研究》，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0页。

②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0页。

③ 参阅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16页。

④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1页。

⑤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16~17页。

制本国史教本》认为专制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尤为深远。为维护君主专制而实行的各项政策，是造成汉族衰微与外族入侵的重要原因，直接孕育着其后中国衰落的因素。“近古”期虽然有唐帝国的兴盛，但是在政治制度等方面并未改变其前专制性质，政治日坏，以致造成五代百余年的混乱。宋代建立后，采取重文抑武措施，以致积贫积弱，终以灭亡，“此亦远古史以来之大变故也”。<sup>①</sup>就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来说，近古期与中古期都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时期。

上述几种分期都存在“近古”划分，近古作为“中古”与“近世”之间的一个时段，时间上指“宋明”或“唐宋”，史家对近古以及中古的看法有所不同。顾颉刚认为中古与近古都是中国文明继续发展的时期；周予同认为中古中国继续发展，而近古则是文化演进而社会停滞的时代；钟毓龙认为，不论中古还是近古，都是中国走向衰微与停滞的时期。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近古”主要出现在193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中，1930年代以后，很少再有“近古”一期，它被纳入到“中古期”之中，这时的“中古期”就包括从秦统一到明末这段历史。这个“中古期”中，西北民族入侵，民族间的竞争与同化激烈，朝代变易频繁，从社会经济上看，中国社会则固定在农业经济上，始终是一个安定的农业社会。<sup>②</sup>“秦并六国，才确立统一的国家，汉代继起，制作大备，从此直至明代，政治设施大都因袭秦汉之旧，并且闭关独立，始终保有我自成一系的文化。”<sup>③</sup>从秦统一到明末的“中古”，政治制度没有更易，对外部世界接触不多，是个封闭和停滞的时期。

把“近古”融入“中古”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的表述。如果中国古代史是由“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段

①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2册，中华书局，1914，第1页。

②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第4册，世界书局，1930年初版，1933年订正3版，第98~99页。

③ 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

构成的话，那么这三个时段体现的中国古代史呈现出多变性，从整体上看，中国是向前发展的，实际上奠定了现代“新纪元”的基础。由“上古”“中古”两个时段构成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在“上古期”得到很大发展，秦建立统一的国家，构筑了中国文化发展模式。但此后直到明末“西力东渐”之前，中国都是在秦的制度文化影响之下，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在漫长的中古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 三 中国近代史：“旧史结穴时代” 或“西力东渐时代”

清末民国教科书中，存在“近世期”划分的，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清朝为“近世”，二是以元明清为“近世”。<sup>①</sup>这两种不同的“近世”起点，赋予中国近代史不同的意义。

以元明清三代为“近世”的有钟毓龙、吕思勉等人，日本史家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都采用这种分法。元明清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元与清两大帝国，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新制本国史教本》中近世史所关注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中国在此时期的衰微。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相遇，遭受西方侵略，其根由实肇始于近古时期，是近古专制问题的延续与结果。“五族沟通而合为一家之基础，实确定于此时期。然此时期中，尚文崇虚之习，又仍如前代。故自明代中叶以还，与西洋尚武崇实之诸文明国相遇，遂不免事事失败，武力既不足以相抗，学术工艺又不足以相竞，即人民之爱国心与自治力亦无在而不相形见绌，以至国势日颓，土地日蹙，财政日绌，民生日困，瓜分之祸，悬于眉睫。”中国历史到此告一段落，面临变局：“当此时而谋救国之道，诚非从根本解决，举历代相沿之

<sup>①</sup> 以清朝为近世的有两种情况：或从清初开始，或从明末开始（明清之际），二者相去不远，所描述的时代特征也相同，可以作为一个划分来看待。本章“清初”与“明清之际”互用。

弊习，摧陷而廓清之不可。故近世史者，中国旧历史结穴之时期也。”<sup>①</sup> 这里的近世，与此前作者对中古与近古的关注是一致的，注重中国专制制度的建立与加强，认为专制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民国建立，君主专制的历史才得以终结，中国历史开辟一新时期。

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族关系上，还体现在制度建设上，或认为明清制度与唐宋关系不大，而与蒙元有直接关联。<sup>②</sup> 吕思勉即是从制度沿革方面来分期。吕思勉编著有多种教科书，对中国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划分，如近世一期，就有“从明至清中叶以前”与“清朝”等几种。<sup>③</sup> 在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中，吕思勉的近世期是从元世祖灭宋到清全盛时期止。将元、明、清三个朝代划归一期，认为元代的制度开启了中国近世制度之先：“特如行政区划与兵制——近世式的制度，是元开其先，明集其成，清又踵而用之的。”有清一代的各种设施都是承续前朝，与元代以来的制度关系甚密，现在的制度风尚等，一些也直接沿自此期。近世期与当时的“现代”有很大的关联，但从中国历史发展上看，“是中国旧式历史最后的一期”。<sup>④</sup>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如魏晋南北朝与宋元时期的外族骚扰引起的动荡、民族分合为史家分期提供了参考。金兆梓即据此来划分时期。在《新中华初中本国史》中，金兆梓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近世期是自宋兴讫清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

①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3册，中华书局，1914，第1页。

②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2页。

③ 在《白话本国史》中，吕思勉把中国历史分为五期：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统一至唐朝全盛时止；近古史，从唐中叶以后至南宋亡；近世史，元至清中叶以前；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33年国难后第1版，第10~11页）。在《复兴高中本国史》中，吕思勉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上古，三代以前；中古，秦至明末；近世，清；现代，民国以来（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2页）。这里以清朝为近世的分期，基本遵循民国政府课程标准中的分期。

④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例言”第4页。

“种族竞争”时代。从五胡乱华至隋唐这一时期，民族竞争暂时停止，到宋初的时候又开始了民族竞争，东北新民族相继南逼，辽、金、元迭起，局面一变。明代兴起，汉族统一中国，与蒙古对峙；到其衰落时候，满族又崛起，先后与汉、蒙、回、藏各族相抗衡。<sup>①</sup>近世期是中国民族剧烈竞争的时期，“种族间的竞争没有停止”，直到民国成立，“清政府统治下之老大中国，乃划为一新时期，而现世史开幕矣”。<sup>②</sup>

上述几种分期，尽管具体时段划分不同，依据的标准不同，但都认为“近世”是中国“旧式历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与以元、明、清等朝代为“近世”不同的是，一些教科书则是将清朝作为近世，认为是西力东渐时期。

以清朝为近世的，又可以1930年代为界分前后两种。一种如前述桑原骝藏、顾颉刚等人以清朝为近世。桑原把清朝的“近世期”称为“欧人东渐时代”，认为此期不仅是欧洲人来到东方，东西方开始了联系，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而且是西方民族逐渐占据了东亚历史主动地位的时期。<sup>③</sup>顾颉刚认为，近三百年有清一代，西洋物质文明与学术思想大举纳入，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从民间思想到政治制度，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果是把帝制攻倒，改建民国。“近世期”为“东西文明的接近时代”。<sup>④</sup>桑原的近世是满族兴盛的时期，此时中国之发展实是满人之扩张；顾颉刚的近世则是中国历史继续发展中的一个时段，其中西方文明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①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初版，1932年12版，第1页。其四期划分为：上古，远古至周末止；中古，自秦至五代末；近世，自宋兴迄清亡；现代，中华民国。

②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123页。

③ 桑原骝藏：《东洋史要》卷1，第10页。在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对西方人来到中国，或称“欧人东渐”，或称“西力东渐”，二者同义，本文在使用上不再区分。

④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

另一种是1930年代以后教科书中以清朝作为近世。这时教科书对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看法与清末桑原鹭藏、1920年代顾颉刚等人不同，认为清朝的近世是中国走向衰落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期。吕思勉的《复兴高中本国史》指出：“假使世界而还是中古时期的样子，则我们现在，把这客帝驱除之后，就更无问题了。然而闭关的好梦，已成过去了，欧风美风，相逼而来，再不容我们的鼾睡。自五口通商以后，而门户洞开，而藩属丧失，外人的势力，深入内地，甚至划为势力范围、创作瓜分之论，又继之以均势之说。中国乃处于列强侵略之下，而转翼幸其互相猜忌，维持均势，以偷旦夕之安。经济的侵略，其深刻，既为前此所无；思想的变动，其剧烈，亦非前此所有。于是狂风横雨，日逼于国外，而轩然大波，遂起于国中了。”<sup>①</sup>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认为，由于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打破了以往的封闭局面，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明清之际，西学和传教士同时进入中国，中西交涉由此开始，中经鸦片战争，以至清末，西人更挟其乱山倒海之力侵略我国，摧毁我国的闭关主义，使我国不得不跑到世界史的舞台上。去。<sup>②</sup>史家基本上都认为“近世”是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影响的时期与受到西方侵略的时期，中国历史由此发生了转折，开始了与此前不同的时代。<sup>③</sup>

主张清朝为“近世”的，认为中国“近世”是“西力东渐时代”，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主张元明清为“近世”的，认为中国“近世”是中国旧式历史的终结时期。这两种不同的近世史划分，体现了不同的近代特征，也呈现了不同的中国历史模式。

①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页。

② 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

③ 参阅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姚绍华《初中本国史》、罗元鲲《高中本国史》、余逊《高中本国史》等。



#### 四 中国现代史：史家与时代

今天史家多将自己所在的时代划为“现代”（或“当代”），而在清末，史家对这一时期却有不同表述。桑原鹭藏将其当时的时代——清朝划归于“近世期”，而夏曾佑却将他所处的时代划归于“近古史”中。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其中近古史是自宋至今，又分为“退化”与“更化”两个阶段，夏曾佑所处的清后期属于“更化”阶段：“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sup>①</sup>清后期以来，世局发生变化，中国历史有可能进入另一个时代，但“现在”依然没有走出五代以来的“近古”。

清末教科书中，把当时划为“今代史”的有市村瓚次郎等人。市村瓚次郎的《支那史要》分中国历史为五期，第五期“今代史”起自道光以后，到作者所处的时代结束。中国与西方自明代时就发生了联系，但真正有影响的则是鸦片战争：“抑中国之势，自仁宗时渐衰，士气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敌英人之锋，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鸦片之战，知西人之伎俩，颇挫其虚傲尊大之气。他日设炮台、造军舰、改铳炮之机，亦由于此。故此一战争，关于中国之形势甚大矣。”<sup>②</sup>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局势发生了变化，故把其后的历史划分为一个新时期。

市村瓚次郎将清朝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为“今代史”，以示与以前历史之不同。这种划分方式给中

①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7页。该书分中国历史为三期：上古，自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今。

② 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卷6，陈毅译，广智书局，1902年初版，1903年再版，第3页。该书分期为：古代史，开辟到秦并吞六国；上世史，秦到隋统一；中世史，隋到宋亡；近世史，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今代史，自道光以后。

国历史分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鸦片战争为界的分期方式成为以后中国历史分期讨论的一个焦点。而突出“今代史”，实则反映了史家对自己时代的一种新认识。

在中国史家中，较早地将自己所处时代作为“现代”的是曾鲲化，其《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分为七期，除了一般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时期之外，在“上古”之前又划出了“大古纪”，在“近世”之后又划出“前世纪”和“现世纪”两个时期。由于《中国历史》目前仅见第一册，至于后面两期“前世纪”和“现世纪”的具体划分和言说无从得知，不过从他给出的时期特征来看，“前世纪：汉族复盛与西力东渐时代”应为明朝，而“现世纪：汉族衰微及多事时代”当为清朝。<sup>①</sup>《中国历史》编译自日文教科书，其“现世纪”的划分，当受日本分期的影响。稍后《中国历史讲义》也将清朝作为“现世期”。<sup>②</sup>曾鲲化等人将自己所处的清朝作为“现世纪”，是为自己时代寻求定位的一种尝试。

民国时期编写的教科书一般都将民国时期的历史独立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史”。《现代初中本国史》认为，中华民国开创了历史新时期，民间民治精神涌现，常借群众运动来表达倾向，一切学术思想也处处带着世界的色彩，这是“中国文明的世界化时代”。<sup>③</sup>《复兴高中本国史》认为，民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现代史是我们受了刺激而起反应的时代，时间虽短，亦可以分做两期。革命之初，徒浮慕共和的美名，一切事都不彻底，所以酿成二十年来的扰乱。自孙中山先生确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我民族奋斗、国家求治的方针，对内则铲除军阀，以求政治的清明，对外则联合被压迫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期国际关系的转变。虽然革命尚未成功，然而曙光已经发现了，

①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第18页。

② 徐念慈著述《中国历史讲义》，宏文馆，1908，第2页。

③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

所以国民政府的成立，亦当在现代史上，划一个新纪元。”<sup>①</sup>周予同指出，现代时期“社会组织和学术思想，都日在演变而渐有世界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向未曾有的伟大的激变的时代，它给我们以对这一民族、这一国家与这一世界之严重的责任”。<sup>②</sup>“现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政体的变革时代。<sup>③</sup>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分期之一的“现代史”主要是民国时历史分期的一个时段。清末史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多种分类，多将其看作“近世”，或者称之为“本朝史”，<sup>④</sup>“现代”只是多种称呼中一个。民国史家多把民国建立后的历史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现代史”。同是史家所处的“当下”，相较于清末的“近世期”而言，民国的“现代期”更具有现代意义。

## 五 “共和”、“中华民族”与“世界化”： 中国近代之展开

在讨论了历史分期中各时段的特征后，从整体上来考察分期标准就有了一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部历史都可以划分成“古代”与“近代”两个部分，理解了“近代”的含义也就理解了整个历史分期的意义。本节即以“近代之展开”为例，来讨论史家历史分期的标准及其凸显的历史模式。

民国成立，宣布共和，“共和”成为当时教科书历史分期的一个标准。民国成立不久出版的教科书，其历史分期多注重中国历史中的政治精神，这从《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可见一斑。该书要旨“在发挥吾国国民之特色，更推究其贫弱之原因，故于专制之成因及流

①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15页。

②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18页。

③ 杨东莼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

④ 称清朝为“本朝史”的有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商务印书馆，1911；张运礼编辑《新编中国历史全书》，商务印书馆，1909；等等。

毒，言之较详；而社会变迁、风俗隆替，尤所注意，庶学者读之，得知现势造成之由来，借资反省，与空谈往事而徒记姓名者不同”。<sup>①</sup>为此，《新制本国史教本》特别注重君主专制的影响。中国专制制度起自秦之统一，终于清之覆亡，这一时期即专制时期。中古以来的专制孕育了中国衰微的因素，这种衰微，直到“现代”——民国共和制度建立后，才有可能发生转变，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各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也成为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参考。民族标准一直为很多史家采用，但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族标准却有很大不同。如清末，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是从中国各民族盛衰角度来划分时期，其分期中，中国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本民族的主体——那不是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强所瓜分的领土。<sup>②</sup>桑原的分期割裂了中国民族主体的完整性，受到中国史家的批评，傅斯年认为，桑原的分期法“皆远东历史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尤有不可通者二端：一则分期之标准不一，二则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sup>③</sup>稍后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与《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都是站在汉族的立场上进行分期，所谓“中国的衰微”实是汉族的衰微。民国以后，中国境内各民族都统摄在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认识之下，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如《现代初中本国史》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不是中国动乱与衰微的原因，而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从中华民族形成的立场看，民国成立以前的各民族纷争，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时期，即民族竞争与融合时代。民国成立，民族分合的旧式历史至此结束，一个新时期——包容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时期得以开始。<sup>④</sup>

①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15年再版，“编辑大意”第2页。

② 参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24~26页。

③ 傅斯年：《历史分期之研究》，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30页。

④ 参阅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1页。

与“共和”或“中华民族”分期标准并立的是，大多数教科书注重中国的“世界化”进程，以之为标准来分期，无论其具体的时期划分有多大差异。<sup>①</sup>以“世界化”为标准的分期，都强调“西力东渐”的影响，并将西力东渐作为“近世”的开端，这个“近世”就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期。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注重中西文化的交融，分期标准中就强调“世界方面的一切国际问题、交战问题、文明互换的问题”。<sup>②</sup>吕克由的《高中本国史》写道：“中国从近代以前，政治上关系密切的，都是小国，或游牧部落，其文化程度，远出我下，文化足以裨益我们的，只有一个印度，却政治上没有关系。所以从有史以来，从没因和外人交通而发生关涉全体的大变化，到近世便不然了。”<sup>③</sup>欧人东来带来了西方的文化，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认识。欧人东渐也是近代“中西国际”问题出现的缘由，《新著本国史》指出：“明代自中叶以后，大局便渐渐纷乱，但有一大事因缘，促成我国进化的时机，并开世界将来大同的运会，那就是中西国际的由来。”<sup>④</sup>傅纬平的《复兴初中本国史》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始发生了近代的条约关系，以致清代“变迁很大，迥非以前历代可比。这种变动，尤以外国为最甚，中国不过在受动之列罢了”。<sup>⑤</sup>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中国开始被纳入到“世界舞台”。<sup>⑥</sup>

① 如李云坡在《初中本国史》中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上古，至周末至；中古，自秦之统一至五代末；近世，自宋初至清亡；现代，民国以来。该书认为，中西交通虽始于唐朝，但与西欧正式交通，则实见端于宋代，盛行于元明，而大生影响于清朝。所以将自宋至清末划为近世，称为“东西两大文化的接触时代”。参阅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第10~11页。

②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第1编第2页。

③ 吕克由编辑《高中本国史》下册，民智书局，1931，第101页。

④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25年4版，第1页。

⑤ 傅纬平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11月20版，第58页。

⑥ 参阅叶维善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改正5版，第141页；卢文迪、姚绍华、范作乘编《历史》第2册，中华书局，1936，第1~3页。

一定的分期方式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模式相联系。以“共和”或“中华民族”为标准的分期，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本身来观察中国历史，注重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理路。以此来看待中国历史，“近世”是“旧式历史之结穴”时期，它与古代的关系密切，而与“现代”差别很大，“近世”指向的是过去，与“现代”没有多少的联系。外在力量——西力东渐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采用这种标准，中国历史大致可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成立前的历史，包括上古、中古与近世期在内的时期属于古代史，它们是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成立后属于近代，这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代。这是纵向的“古—今”视角。以“世界化”为标准的分期，是从中西比较来看待中国历史，关注的是把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世界历史体系中。<sup>①</sup> 这里的“近代”指向的是未来，它与“古代”没有多少联系。采用这种视角的分期，中国历史大致可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两大时期：此前的历史，包括上古与中古，都属于古代史，这是个封闭与停滞的时代；此后的历史，包括近世与民国史，都属于近代史，这是个世界化的时代。这是横向的“中—西”视角。

“古—今”与“中—西”视角都是观察中国历史的方式，在清末民初，这两种视角是并列存在的，就是相同的“古—今”或“中—西”视角下的历史分期，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认知，中国历史模式呈现出多样性。这种情况到1930年代发生了改变，历史视角转换为单一的“中—西”视角，形成了中国历史公式——官方给定的历史模式逐步成为人们的历史常识和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

## 六 中国历史公式：普遍历史中的中国史

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1929年试行新的课程标准，新课标

<sup>①</sup> 参阅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于1932年修正后正式实行。新课标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上古：秦统一之前；中古：秦统一到清初；近世：清；现代：民国。这个分期所呈现的中国历史态势为：上古是中国发展时期，中古是停滞时期，这一停滞与封闭由于西方的到来而被打破，中国开始进入近代，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代，现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新时期。这个分期模式由于课程标准的规定，成为1930年代以后教科书中历史分期的主要表述，尽管当时与后来某些历史著作在具体时期划分上有所改变，但仍未脱这一模式的窠臼，它既代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也通过国民教育，形塑了一般国民的历史观念，成为中国历史公式，影响深远。

这个公式显然参照了西方历史分期。民初一些史家在划分历史时期时就声称：“所分时期，与东西洋史时期，互相参校，翼归一律，俾免学生将来讲授东西史时，因分划之过差而生误会，引起教授上之困难。”<sup>①</sup>西方近代史开始于新航路的开辟，教科书中把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清初“西力东渐”，就是考虑到西方近代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而试图与西方近代史保持同步。这个公式体现了中国史家试图通过历史分期使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历史，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从而赋予中国历史现代性特征。<sup>②</sup>

在取得了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阶段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显然与世界历史一致，中国历史的使命也有了“世界性”内容，即维护世界和平、建设世界大同。吕思勉的《高中本国史》认为，中西文明互有优劣，中西“两种文化，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自己的所短；同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补他人之短。这就是中国对于世

① 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本国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15年订正6版，“编辑大意”第2页。相同表述亦可见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第1册，“例言”第2页。

② 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第263页。

界的使命”。“中国人既以大同为最高的典型，所以其治法，必以平天下为最后的目的，而不肯限于一国。”<sup>①</sup> 白进彩的《高中本国史》认为，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有三：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既有此和平之美德，应发扬光大而及于全人类，则可免除世界之战争”；二是“扶助弱小民族，使其获得自由平等”；三是发挥大同精神，建设大同世界，“我国当保持此‘超国界’之精神，力求贯彻，以达到世界大同之目的”。<sup>②</sup> 孟世杰的《高中本国史》指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圣哲就提倡人类要相仁爱，以世界趋于大同而维护人类永久和平。“今世西洋科学，既挟其高潮以来中国，吾人除全部接受以外，更应以维护世界永久和平为己任，是则中国对于世界之使命，不可不勉力负荷，以福利全人类社会。”<sup>③</sup> 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协约国与同盟国订立了《凡尔赛和约》，但德国想突破和约的限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德日的侵略与对国际条约的破坏演变成当时的“备战狂”“侵略热”。金兆梓指出，将来的战争能否避免，“只看中国在最近期内是否能发奋自强，倘果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使各国不能乘我之弱点，当然可消灭了冲突。这样，我们不但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且能保持远东的和平乃至全世界的和平，或者天下大同的理想也将由此实现：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应该负担起来的使命”。<sup>④</sup>

1930年代，“中—西”模式依靠国家的力量，成为观察中国历史的主要视角，多样性的历史认识也简化为单一的历史公式。“中—西”模式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当然”方式，清初（明清之际）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近代历史书写的起点。中国史

① 吕思勉：《高中本国史》，载《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767页。

② 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文化学社，1935年3版，第370~371页。

③ 孟世杰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文化学社，1937，第615页。

④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中华书局，1939年9版，第326页。



家在民族危机与革命时代，通过历史分期，把中国纳入与西方历史相同的时间序列中，使中国历史成为“普遍历史”中的一部分，但中国不再像往昔那样是世界的中心，而是退居边缘。富强复兴，回到世界中心，是“现代”当然的使命和希望。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国民政府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却是一致的。1930年代前后，持唯物史观的史家从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角度重新划分中国历史时期。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说。<sup>①</sup>这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再加上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相一致。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试图展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范畴相适应、与时间顺序一致的历史进程的內部结构，对传统的认为中国历史具有唯一性与优越性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sup>②</sup>从而表明中国社会符合马克思在其关于欧洲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普世”法则。<sup>③</sup>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国民政府的分期，都是在寻求中国历史的普遍性，西方或者欧洲即是其标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分期方式同样抛弃了先前被国民政府否定的其他历史视角和分期方式，它们被彻底地遗弃直至被遗忘。“普遍历史”成为我们阐述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模塑了我们今天的历史认知。

## 余 论

一般来说，从历史分期来探讨“古代”与“近代”的表述，首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30页。这四个阶段为：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

② 参阅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第85页。

③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149～150页。

先要厘清这些分期术语的意义变化。这当然是研究史家分期意识一个很好的思路。姑且不说这种从“概念”出发来研究的倾向是否能够回到史家分期的现场；这种分期术语在使用中所发生的变化，恰恰可能是史家的有意为之。中国史家必须赋予这些分期术语不同于以往的意义才能实现其叙述目的。这在中国“现代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新时代的“现代史”，不仅是中国历史分期上的一个新时期，在民国史家看来，这个时期更是中国历史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不受时间长短的限制，可以是30年，也可以是1年。民国史家不需要去辨析“近世”是否包含“当下”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走出“近世”而迈向新时代是最终的努力。

如果把历史分期作为一个“事件”来看的话，这个事件在清末民国这一时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30年代以前，历史分期呈“纷繁”态势，多种分期方式并存。就中国“近代”的展开来说，认为是西方影响而开启中国近代的想法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在承认西方对中国近代影响的观点下，对西方影响的评价也不相同，就是在承认是西方“开启”中国近代的认识中，也认为西方因素在不同时段内发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差异可能正说明了历史分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sup>①</sup>

梳理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更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1950年代以来，在中国史研

<sup>①</sup> 民国时期，顾颉刚就对当时关于两种近代史开端的两种说法做了明确的表述：“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以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此故”；“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这里对近世的理解就与他在教科书中的看法不相一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5页。

究中，“冲击—回应”和“传统—近代”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这种研究模式被称为“以西方为中心”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此同时，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也开始从“革命史”向“现代化”转移。两种立场与范式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有所不同，对中国近代的关注却未稍减，都注意“西方”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在“普遍历史”的框架内讨论中国历史。当历史被认为是单线进化时，寻找源头与进行分期就难以避免。在我们试图破除线性史观、恢复历史的多样性时，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分期方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或许会给今天的相关研究提供某种参考：不同的历史分期，其划分标准与凸显的意义有很大不同；就是相同的时期划分，可能因为视角不同，对历史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距。历史分期的纷繁多歧，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现今的分期术语，而任何想通过历史分期以体现某种研究范式的做法也是危险的。<sup>①</sup>

附表 7-1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

书名	编著者	出版机构 与时间	历史分期
高等小学国史 教科书	张肇桐	文明书 局,1902	上古:伏羲至周亡 中古:秦统一至隋末 近古:唐至明末 今代:清
支那通史	那珂通世	东文学 社, 1899	上世:从唐虞三代至六国并于秦 中世:从秦至宋金之衰 近世:自元至今

<sup>①</sup> 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引起了史学界的讨论。彭慕兰等人所给出的中国“近代”起点，在民国教科书中有过详细的讨论。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出版机构 与时间	历史分期
东洋史要 <sup>[1]</sup>	桑原骥藏	商务印书馆	上古:太古到秦统一(汉族充腓时代) 中古:秦到唐亡(汉族全盛时期) 近古:五代到明末(蒙古族全盛时期) 近世:清至今(欧人东渐时期)
支那史要	市村瓚次郎	广智书局,1903	古代史:开辟到秦并吞六国 上世史:秦到隋统一 中世史:隋到宋亡 近世史: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 今代史:自道光以后
支那史教科书	富山房	东亚译书会,1903	上世紀:太古至春秋战国 中世紀:秦至西晋 南北朝:南朝至唐 五代:五代 近世紀:宋至清
国史初级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1903	上古:秦以前 中古:秦至隋末 下古:唐至元 近世:明清
中国历史	横阳翼天氏	东新译社,1903	太古纪:汉族发生时代 上古纪:汉族创国时代 中古纪,分三小期:汉族优胜时代,汉族与外族势力平均时代,汉族全盛与外族复炎时代 近古纪:汉族与外族冲突时代 近世纪:汉族极盛与东西两洋交涉时代 前世纪:汉族复盛与西力东渐时代 现世纪:汉族衰微及多事时代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陈懋治	商务印书馆,1904	上古史:太古至战国 中古史:秦至唐末 近古史:五代至明 近世史前纪:满洲兴起至欧人东渐 近世史:清统一至清与日韩之关系 近世史今纪:甲午之役至今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出版机构 与时间	历史分期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夏曾佑	商务印书馆,1904	上古:自草昧至周末 中古:自秦至唐 近古:自宋至今
中国历史教科书	刘师培	国学保存会	上古:远古至秦统一前 中古:秦至唐末 近世:五代至清(义和团)
普通新历史		商务印书馆,1902	分七章 三皇五帝及三代 秦汉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时代 五代及宋之时代 元明时代 清
中国历史讲义	徐念慈	宏文馆,1907	太古:尧舜以前 上古纪:夏至战国末 中古纪:秦统一至唐末 近古纪:五代至北宋末 近代纪:明 现世纪:满洲初兴至欧洲东渐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国史读本	李岳瑞	广智书局,1907~1909	全书分九卷 卷一:自黄帝至汉末 卷二:自三国至梁武帝 卷三:自梁末至隋炀帝 卷四:自唐初至玄宗 卷五:自安禄山之叛至昭义之叛 卷六:自唐宣宗至辽初 卷七:自五代至北宋 卷八:自宋绍述之议至蒙古兴起 卷九:自蒙古兴盛至元末明初
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蒋维乔	商务印书馆,1908	上古期:太古至战国 中古期:秦至五代 近古期:北宋至明 近世期:清
中国历史讲义	沈颐	师范讲习社	上古:远古至战国末 中古:秦统一至唐亡 近古:五代至明亡 近世:本朝(清)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出版机构 与时间	历史分期
中学中国历史 教科书 <sup>[2]</sup>	章铤	文明书 局,1908	远代史:自邃古迄于周末 中代史:自嬴秦迄于唐末 近代史:自五季迄于明末 最近代史:自天命迄于今日
新编中国历史 全书	张运礼	商务印书 馆,1909	上古史:太古至秦统一 中古史:秦统一至唐末 近古史:五代至明末 本朝史:清
新体中国历史	吕瑞廷、 赵激璧	商务印书 馆,1907	分七卷 卷一:太古史、三代史 卷二:秦汉三国史 卷三:两晋南北朝史 卷四:隋唐五代史 卷五:宋元史 卷六:明史 卷七:清史
中华中学历史 教科书	潘武	中华书 局,1912	上古期:秦统一以前 中古史:秦统一至隋亡 近古史:唐至明末 近世史:清
中华高小历史 教科书	汪楷、 华绍昌	中华书 局,1912	太古期:黄帝以前 上古期:尧舜至战国 中古期:秦至隋 近古期:唐至明 近世期:清至民国成立
共和国本国史	赵玉森	商务印书 馆,1913	上古史:太古至东晋末 中古史:南北朝至元末 近古史:明 近世史:清 现代史:民国史
增订普通新历 史	普通学书 室	商务印书 馆,1913	上古:史前至秦汉 中古:三国至宋金亡 近古:元明时代 近世:清 现代:中华民国
中国历史讲义	沈颐	商务印书 馆,1913	上古期:上古至战国 中古期:秦汉至唐 近古期:五代至明 近世期:清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出版机构 与时间	历史分期
新制本国史教本	钟毓龙	中华书局,1914	远古史:邃古至秦统一前 中古史:秦统一至南北朝 近古史:隋至南宋末 近世史:元至清末 现代史:中华民国
实用历史教科书	北京教育图书社	商务印书馆,1915	上古史:太古至战国 中古史:秦至南北朝 近古史:隋至五代 近代史:宋至明 最近代史:清 现代史:民国
新著本国史	赵玉森	商务印书馆,1922	太古至周:文化发育时代 自秦至明代中叶:文化推衍时代 自明中叶至今: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时代
现代初中本国史 <sup>[3]</sup>	顾颉刚、王钟麒	商务印书馆,1923	上古:秦以前 中古:秦统一至五代之末 近古:宋之明末 近世:清朝 现代:中华民国
白话本国史 <sup>[4]</sup>	吕思勉	商务印书馆,1923	上古史:周以前 中古史:从秦统一至唐朝全盛时止 近古史:从唐中叶以后至元亡 近世史:明至清中叶以前 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
初级本国历史 <sup>[5]</sup>	金兆梓	中华书局,1923	上古史:自开辟至秦 中古史:自秦至宋之统一 近世史:自宋之统一至清末 现代史:民国时代
第一简明历史启蒙	胡朝阳	新学会社,1925	上古史:自太古至秦 中古史:自秦至隋 近古史:自唐至明 近世史:清至民国
新撰初中本国史	陆光宇	商务印书馆,1925	上古:太古至战国 中古:秦至唐 近古:五代至明 近世:清至民国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出版机构 与时间	历史分期
评注国史读本	李岳瑞、 印水心	世界书 局,1926	太古史:远古至秦灭六国 中古史:秦统一至隋灭亡 近古史:唐至南宋灭亡 近代史:元至清亡 现代史:民国史
北新本国 史 <sup>[6]</sup>	杨人榷	北新书 局,1930	上古史:自远古到秦之统一 中古史:从秦之统一到明季 近世史:自明季至清季 现代史:自清季到现代
初中本国历史 教本	梁园东	大东书 局,1931	以民族的分合为标准,分五期 <sup>[7]</sup> 上古期:上古至战国末 中古期:秦至六朝末 近古期:隋至元末 近世期:明至清末 现世期:辛亥革命后
高中本国史	吕克由	民智书 局,1931	上古期:上古至周 中古期:秦至五代 近古期:北宋至清 近世期:民国
高中本国史	缪凤林	钟山书 局,1932	分九时代 甲:唐虞以前曰传疑时代 乙:唐虞夏商周曰封建时代 丙:东周曰列国时代 丁:秦汉曰统一时代 戊:魏晋南北朝曰混乱时代与南北对峙时代 己:隋唐五代曰统一时代与割据时代 庚:宋辽金元曰汉族式微与西北诸族崛起时代 辛:明至清中叶曰汉族光复与满洲人侵时代 壬:清季至今曰列强侵略中国屈服时代
高中本国史	钟月秋	湘芬书 局,1932	上古时期:汉族之萌芽及其滋殖 秦汉时期:汉族第一次大一统时代 两晋南北朝时期:异民族第二次侵入中原时代 隋唐时期:汉族第二次大一统时代 五代宋时期:异民族第三次侵入中原时代 元朝时期:蒙古大一统时代 明朝时期:汉族势力恢复时代 清朝时期:满族大一统时代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出版机构 与时间	历史分期
初中本国史	李云坡	文化学 社,1932	上古史:至周末止 中古史:自秦之统一至五代末 近世史:自宋初至清亡 现代史:民国以来
高中本国史	陈登原	世界书 局,1933	上古:从上古至秦之统一 中古:从秦至五代 近古:从宋至明 近世:清 近代:近时
复兴初中本国 史 <sup>[8]</sup>	傅纬平	商务印书 馆,1933	上古:秦统一前 中古:从秦统一至明 近世:明清之际至清末 现代:从孙中山革命至今
本国史提要	朱彦顺、 虞建青	中国科学 图书仪器 公司	上古:秦以前 中古:秦统一至明 近世:清代

注: [1] 与改编自该书的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分期相同(陈书至明代止,无清朝史,分期同桑原前三期)。

[2] 章铤的《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分期相同。

[3] 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分期基本相同。

[4] 吕思勉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分期相同。

[5] 金兆梓的《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新中华初中本国史》《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以及李云坡的《初中本国史》分期相同。

[6] 杨人榘的《初中本国史》，郑昶的《新中华语体本国史》，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的《初中本国史》分期相同。

[7] 梁园东在《新生活初中本国史》中又提及了以社会的演变为标准的三期分期方式。上古期：上古至战国末，中古期：秦至元末，近世期：明至清末。

[8] 1932年以后编写的教科书，如卢文迪、姚绍华、范作乘的《历史》，何祖泽的《初中本国史》、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朱翊新的《朱氏初中本国史》、周予同的《初中本国史》、吕思勉的《初中教本本国史》、应功九的《初中本国史》，余逊的《余氏高中本国史》、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吕思勉的《复兴高中本国史》、孟世杰的《高中本国史》、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白进彩的《高中本国史》、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孙正容的《高中新本国史》等，历史分期基本相同。

## 第八章

# 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

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在今天为很多中国人所接受。在民族史叙事中，悠久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荣光有着特别的意义，会给国人带来一种民族自豪感，有助于确立民族自信心，形成民族认同。在国人自豪的“文明古国”及中国是世界人类发祥地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考古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古学对民族历史与民族认同的影响，为很多史家所关注，也得到民国政府的重视，考古发现与研究很快进入教科书中，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会产生何种影响？本章以教科书中的考古发现为中心略做讨论。<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民国时期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的研究，在中国文明起源、疑古思潮、考古学与古史重建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一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有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1991年第11期）、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等，这些研究涉及民国时期的史前史研究，较多地侧重于考古学方面。二是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主要有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吴少珉和赵金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华书局，2003）等，这些研究较多从文献学角度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进行了讨论。三是考古学与中国古史重建关系的探讨，主要有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

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于 1920 年代,<sup>①</sup>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人种起源和古史重建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怀。近代考古学兴起于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寻找中国人种起源,以回应清季以来弥散开来的中国人种西来说。<sup>②</sup>近代考古学兴起,也是古史辨运动兴起之时,古史辨运动冲击了人们的古史观念,动摇了中国古史体系,也影响到民众的民族认同。“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本世纪初开始逐步引入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而与此前中国旧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考古学曾给 20 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sup>③</sup>从考古学来建设上古史成为很多人的期望,考古学不仅是中国古史建设的重要路径,也关系到民族认同的确立。

本章拟通过对近代考古学兴起前后教科书中关于上古史叙述的比较,来揭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及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sup>④</sup>1920 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后,教科书中出现大量考古学内容,这一

合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收录了张光直、杜正胜、童恩正等论述考古学与古史重建、历史学关系的文章;王明珂《华夏边缘》等讨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情况,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台湾中研院,1962),李学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都谈到了中国古史重建问题,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对中国史前文化序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苑出版社,2003)以人物为中心,分专题讨论了考古学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关系;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也从考古学方面对“先秦史”的结构进行了探讨。

① 夏鼐:《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 年第 3 期。

② 如陈星灿认为,“文化西来说本身虽没有太多的学术上的意义,但在事实上却刺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之秋,要解决中华民族是否‘还在少壮’,要寻绎出中国人的原始出来,考古学家自然责无旁贷”。参阅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 35、83 页。

③ 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编序”第 8~9 页。

④ 中国上古史叙述中,人种起源、“民族始祖”黄帝等问题都直接影响到民族认同的建立,也与考古发现有很大关联。这些问题将另文详述,本章不再讨论。

时期的教科书是本章讨论的重点。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考古学的作用，本章将通过考古学兴起前后教科书叙述的变化来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清末民初教科书也是本章的讨论范围。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 一 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

近代意义的考古学萌生于19世纪的欧洲，1800~1840年丹麦发生了古物学革命，汤姆逊提出石器、铜器、铁器三期说，沃尔赛从地层加以证实。“史前史”是以三期说为基础而建立的，指在传统的古代史分期前的漫长的无文字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sup>①</sup>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思想传入中国，<sup>②</sup>梁启超等人对考古学知识进行了介绍，意识到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sup>③</sup>这种新的考古学知识也为当时教科书编者所注意，清末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与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中就有考古学方面的内容。

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在论及世界之初时提及考古学：“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昔之学人，笃于宗教，每多人主出奴之意，今幸稍衰，但用以考古而已。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sup>④</sup>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介绍了考古学分期：“今以机器发达之顺序，分有史以前为三期：石器时

① 参阅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第1~22页。

② 参阅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2，第368~395页。

③ 参阅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36~42页。

④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1页。

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并对各时代特点做了初步介绍。<sup>①</sup>《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编写之时，中国近代考古尚未有发现，这里的考古学知识主要是来自日本。这两种教科书对考古学知识介绍较为简略，也未明言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但都把考古学视作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把史前时代视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他们对考古学知识的介绍，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属于最早的尝试。在清末直到近代考古学兴起前这段时间内，其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没有考古学方面的内容。

19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正是中国古史系统受到古史辨运动冲击而发生动摇之时，考古学被视为建设上古史的重要手段，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sup>②</sup>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历史教科书中也有所反映。教科书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一是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与方法。《陈氏高中本国史》指出，中国史籍繁多，史家所取的史料还不仅仅限于有文字记载的书籍。古人还没有记载的，要重视古人所遗留的器具。从古物可以看出那时期的文明和那时人的生活。<sup>③</sup>应功九的《初中本国史》认为，考古学给现今研究太古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考古

①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甲编第35~36页。

②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之初，王国维即提出用“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印证来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看重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的意义（王国维：《古史新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241~243页）。这里“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卜辞和金文。1920年代中期，发起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已经注意到考古学的影响：“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自序”第50~51页）考古学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李伯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69~270页）

③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1页。

学家发掘埋陷在地下的人骨及从前人类所造的器物，从这些上面推断出当时人类生活的情形。我们今日知道历史上有旧石器、新石器、铜器等时代的事实，全是靠这种发掘与推断的所得。”<sup>①</sup>孟世杰的《高中本国史》把考古学视为改造中国古史的方法，“吾国古史之改造，亦当以发掘地藏，取信实物为准则；否则文献不足征，终无廓清杂伪之一日”。<sup>②</sup>《余氏高中本国史》指出，前人研究古史，只凭纸片上的材料，这些“一半神话一半后人装点”的传说故事不能建设信史。“研究古史，以从事考古学努力于地下的发掘，为唯一的康庄大道。”<sup>③</sup>

二是考古学的证史作用，考古发现可以与中国古史记载相印证。中国古书中关于上古历史的记述，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就是对上古历史的记载；但经过疑古派的质疑后，大家对古书所说的上古史事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将它们视为传说和神话。《新中华高中本国史》认为，要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第一要将传说和信史分别清楚”，“现在研究上古史，最重要的证据，当然是地下史料”。<sup>④</sup>考古发现是分清传说与信史的重要标准。周予同指出，有文字前的事迹，如果我们不自满于神话与传说，那只有求助于考古学之地下发掘的证据。<sup>⑤</sup>“黄帝以前的史迹，只是史前时期的神话或传说；从黄帝到殷商的史迹，虽有记载可凭，但仍旧不能完全认为信史。我们如果要补救这种缺憾，只有求助于考古学，在地下探寻古代的遗迹遗物，以和古书上的记载相印证。”<sup>⑥</sup>高彦博的《本国史讲义》指出：“中国是文明古国，据普通的传说，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史记》所说

① 应功九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3页。另见应功九编著《建国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3页。

② 孟世杰编辑《高中本国史》上册，文化学社，1934，第29页。

③ 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页。

④ 金兆梓编《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上编，新国民图书社，1932年3月发行，8月再版，第37页。

⑤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22页。

⑥ 周予同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19页。

的古史，至夏代始有明白的世系，以前记载简略，且神话传说的成分太多，自然不能完全信赖。我们如果要真确地明白古代中国民族生活情形，必须求之于地下的发现。”<sup>①</sup>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相当重视考古学对于国家教育的意义，将之列为中小学历史的讲授内容。1929年的初中历史教材大纲规定，上古史首先要讲述的几点为：“（甲）古史的传说；（乙）中国北部石器时代的文化；（丙）中华民族的建国；（丁）古代文化的进步；（戊）夏商政教与汤武革命。”<sup>②</sup>高中本国史教材大纲的规定为：“1. 汉族由来的研究；2. 中国的古石器时代；3. 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4. 中国民族之定居与古代生活的进化；5. 古史传说的讨论；6. 尧舜与禅让的研究。”<sup>③</sup>教材大纲的这种规定，为考古发现进入教科书提供了依据。很多教科书把考古发现作为重要内容，对史前考古发现与殷墟发掘做了详细介绍。考古发现与史前史已成为1920年代以后教科书中一个章节，是上古史的重要部分（参见附表8-1）。

从教科书对考古学对历史研究意义的阐述来看，是把考古学作为证经补史的材料，当作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希图从中来建设中国上古史。这与学术界对考古学学术定位基本一致。考古发现进入中国历史书写，历史书写形式与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引起人们古史观念的转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历史认识与民族认同。

① 高彦博的《本国史讲义》中有：“二、古史的传说及开化：1. 中国立国的原始和开辟的故事。”该书为手写本，未见页码，封面标注为“汤珊藏书，北平市立师范学校，1934”。

② 《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22页。此处仅列举上古史最先讲述的几点。下同。1932年课程标准即是在1929年课程标准基础上修订的。

③ 《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31~32页。

## 二 史前史的出现与中国历史的拉长

19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很快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裴文中介绍，民国时期史前考古学上重要发现有四次：仰韶文化；河套旧石器文化；1926~1930年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猿人）遗址；1933年周口店山顶洞之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为史前学研究奠定了基础，<sup>①</sup>对历史书写和人们的古史观念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首先对中国近代考古发现进行介绍的，当属1923年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该书在第二编“历史以前的状况”中介绍了爪哇猿人、亚美尼亚王城等考古发现，详述了人类远古以来的进化史。在第三编“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中，介绍了考古学的三期说。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说是史前史建立的基础。书中写道：“最初人类用的器具，都是粗石，叫做‘旧石器时代’。这时候进步很慢，总要历几十万年。自从得了火以后，进步就快了，石器也渐渐精致了，叫做‘新石器时代’。这是‘洪积世’以后的‘人类时代’；耕种事业，也在这时期发生。”“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又有金属的发现，知道用金属做器具。也同火的发现一般，在人类文明史上，很有影响，应当划一个新时期。这发现的金属，就是铜；因为天然显露，容易炼取，史家就叫这时代为‘铜器时代’。”“铁的发现，在各金属之后。世界又要划一个新时期，叫做‘铁器时代’。”<sup>②</sup>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的叙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划分了史前史与历史期。人类历史有四五千年，“把四五千年到今日的时代，叫做历史时代。四五千年以前的时代，叫做历史以前的时代”。<sup>③</sup>二是

① 参阅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第3~10页。

②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上册，第42~44页。

③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上册，第7页。



介绍了中国的考古发现与史前史分期。“最近河南有出土的太古石器，陶器，和骨做的用具，知道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从商代到周，可以算中国的铜器时代。”“汉初，铁冶的事业才大为发达，中国才算进了铁器时代。”<sup>①</sup>三是将中国古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解释古史记载。“我国太古人民情形，只有史书上的记载；这无非后人的推想，却也有些暗合人类生活的进化次序；不过他把人群的努力，全认作古帝王的作为，说成神灵首出的事业了。且就史书所记指其大略：譬如说最古有有巢氏，是指最初人类住居树林的时代；次有燧人氏，是指人类得了火以后的时代；又次为伏羲氏，是指佃渔畜牧的时代；神农氏是指农业时代；这不是表明人类进化天然的次序吗！”<sup>②</sup>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是为适应 1922 年新学制要求，为初级中学编写的。该书为混编教科书，其中考古学内容以外国为主，但已经注意到中国的考古发现。该书编写之时，中国近代考古工作才开始，考古发现与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该书就吸收考古学成果，其史前史分期与古史解释方法，为后来很多教科书所采用。<sup>③</sup>

①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上册，42~44页。

②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上册，第42~43页。

③ 192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金兆梓《新中学本国历史》也有考古发现方面的内容。《新中学本国历史》从两个方面介绍考古学内容。一是史前史三期说。考古学家“依其所发掘石器之精粗及其所在地层，将人类始知用石器以后之年代，分为始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其所推定之年代大约为：始石器时代——自二十五万年前至四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自四万年前至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自一万年前至四千年前”。“自距今四千年前，始有铜制器具发现，乃入于铜器时代；至二千年前始入于铁器时代。”这里的三期说知识来自当时考古学理论。二是中国考古发现。“近十余年来，经西人及吾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先后在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辽宁诸省发掘之结果，陆续有新石器时代末期及铜器时代初期遗物之发现；至民国十二年，更于河套、甘肃及陕西邻近，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之大宗石器。”中国尽管有铜器、新石器与旧石器各期的发现，但是编者对这时的考古发现不能说明汉族来源而遗憾：“徒以未发现充分足资考证之人骨化石，未能遽断定为汉民族古文化之遗迹，亦未能确定其年代”，这显然受到把考古学作为探寻中国人种起源认识的影响。该书对中国考古学还是寄予很大期望：“愿此种发掘之结果，皆在黄河流域一带，与吾国向来文

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展，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能够很快进入教科书中。1920年代以后出版的教科书大多都有考古学方面内容，介绍考古学三期说与中国考古发现，其中，史前期重点介绍北京猿人的发现，历史期主要介绍安阳殷墟的发掘。



图 8-1 罗香林《高中本国史》书影



图 8-2 罗香林《高中本国史》中所述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进入中国历史书写，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史前史的出现。考古发现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在文字出现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史前时期。孟世杰的《初中中国史》认为，人类之有历史，至多不过四五千年。“依考古学者发掘古代遗迹的研究结果，总是此四五千年内材

字上所纪 [记] 载古代文化发展之地域相符，将来对于吾国远古文化之渊源，必大有贡献无疑。”（金兆梓编《新中学初中本国历史》上册，第 4~6 页）该书是 1923 年《初级本国历史》的重新出版，在前面加上一章“引言”，讲述历史意义、考古发现等。该书 1928 年经大学院审定。可惜笔者未见到该书系列版本，不清楚这段引言是何时于哪一版加入。所以，这里正文只介绍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



图 8-3 郑昶《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中所述考古发现

料。因此吾人可将此四五千年到今日的时代，叫作有史时代；四五千年以前的时代，叫作史前时代。”<sup>①</sup>《复兴初中本国史》认为：“近代史家征求古史遗迹，都在地层中探寻，把人类进化的次序，分做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太古人类，都用石器，无文字，无历史，叫做史前时代，就是历史以前的时代。”<sup>②</sup>周予同的《初中本国史》中写道：“有文字才有历史。但是文字的产生在人类社会比较文明以后，距离人类社会最初的存在已经很远。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以前，换句话说，在历史还没有出世以前，这时代，现在的学者称为‘史前时期’，这就是说历史以前的时期。”<sup>③</sup>考古学兴起后，史家开始以文字的有无来划分中国历史，将之分为史前期与历史期。

史前期与史前考古发现对中国历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

① 孟世杰编辑《初中中国史》上册，百城书局，1931，第13页。

② 傅纬平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2月65版，第2~3页。

③ 周予同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1~2页。

说明了中国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证实了中国历史的久远。《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认为，中国立国甚早，文化最古。“我们更就实物的验证来看，中国文化之古，愈得一重证明。”“近十年来，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辽宁各省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把古代文化拉长到公历纪元以前三四千年；陕甘宁夏各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又使我们把史前的文化拉长了三四万年”。<sup>①</sup>《余氏高中本国史》认为考古发现可以说明上古历史：“可以推测中华民族文化之悠久。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已上伸到公元前三四千年；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后，史前文化又伸长三四万年。”<sup>②</sup>

其次，也使古史中所描述的上古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孟世杰的《初中中国史》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各省，颇有旧石器时代人类遗物发现，证明中国有史以前，已有四五万年文化。更据外人之调查，且有谓在周口店所得之人牙，为五十万年以前人类所遗者。则中国之有人类，为更古远”。<sup>③</sup>《开明本国史教本》中写道，从考古发现情况来看，“中国民族文化在空间方面是顺沿着黄河流域而发展，在时间方面是已经延续着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却已得相当的证据”。<sup>④</sup>何祖泽在《初中本国史》中指出，从发现的人骨化石中“可测知当时的人，实为有史以后人民的远祖。虽然史事不易证明，而我民族文化的悠久而深厚，是毫无疑问的”。<sup>⑤</sup>一些教科书认为，古帝王的事迹传说，都发生在黄河流域；而考古学上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都在中国北部；且经证明在旧石器时代，陕甘河套一带已经有人类繁殖。这些都可以确定黄河流域是中国先民最初活动的地方。<sup>⑥</sup>

① 王钟麟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上册，第1、2页。

② 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0页。

③ 孟世杰编辑《初中中国史》上册，第5~6页。

④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22~23页。

⑤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上册，新亚书店，1932，第19页。

⑥ 参阅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1页；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5页；宋廷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辑《初级中学历史》第1册，第23页。

最后，史前考古发现拉长了中国历史，正如胡适所言：“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J. G. Anderson）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 e Licent）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文化拉长几万年。”<sup>①</sup> 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久远，这与中国人种本土起源一样，对民族认同的建构有重要意义，中国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久远，会给国人带来一种民族自豪感，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感情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助于确立民族认同。

### 三 商代的信史开端与中国历史期的缩短

与史前考古发掘同时进行的还有历史期考古。1928~1937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提高了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sup>②</sup> 中国历史期与史前期即以商代为界来划分。中国“信史”——历史期开始于殷商或商周之际，为学术界所认可。<sup>③</sup> 商代的历史期开端，为一些教科书所采用。

①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新月》第1卷第9号，1928年11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前言”第1页。

③ 如裴文中认为：“我国的历史，至现在止，可以追溯到商殷时代。”（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第3页）杨宽认为：“吾人今日论有史时代之历史，当断自殷墟物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117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考古发现，把殷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中国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根据最近考古学的知识所得的结果”，“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4~15页）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都是把商代作为历史期开端[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39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第20页]。

一些教科书根据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来划分史前期与历史期，把中国信史期的开端定为商代。《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介绍了殷墟发掘：“最近三十年，河南安阳发现了无数的甲骨，经许多学者的考定，确是商代的遗物；甲骨上的文字，可以考见殷商一代的君主与制度。殷商一朝得了这种实物的证明，故可以得到历史的时期。”“商周以下可以叫做‘历史期’，商周以前只可以叫做‘史前期’。”<sup>①</sup>周予同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史前时期虽然还没有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已经有用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因为它所说的故事，带有神怪的色彩，不是普通可靠的历史。”“中国考古学上所得的遗物，可以和古书的记载相印证的，从商朝开始。所以在目前，中国的信史，也只能说从商朝开始。”<sup>②</sup>《新中华高中本国史》根据当时考古发现与现有的文字记载的地下史料——殷墟契文，将信史断自殷代始。<sup>③</sup>这种情况，诚如李云坡在《新标准初中本国史》中所言：“近今历史学者，多以殷朝为中国信史之所自起，殷朝以上的历史，则概以传说视之。这是因为近三十年来，陆续有殷墟甲骨文的直接史料发现，而夏朝以前的事迹，则仅有间接史料的记载传述，而无直接史料的证明，故只好以传说的资料视之。这种态度自然是很科学的。”<sup>④</sup>

商代历史因为殷墟考古的发现而得以证实，商代进入信史期没有疑问，一些史家在承认商代是中国历史期的同时，又将历史期往前延伸到夏代，甚至唐虞时期。杨东莼的《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把夏代作为中国信史开始的序幕：“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已经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那么由此推论：一则《史记·夏本纪》所载夏世系，在未有地下发掘的其他史料足以证其为伪造之前，仍不失为信史；二则由殷商文化之高，可知夏代文化亦必发达至相当

① 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1932年国难后17版，第1~2页。

② 周予同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2、26页。

③ 金兆梓编《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上编，第38页。

④ 李云坡：《新标准初中本国史》上册，文化学社，1934年4版，第16~17页。

程度。所以如果说殷商是中国信史的开始，则夏代可以认为中国信史的序幕。”<sup>①</sup> 余逊的《余氏高中本国史》与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把唐虞时期视为信史期的开始。余逊认为，殷墟甲骨文字的出土证实了关于商代的传世文献的记载，确认了商代历史的真实性。商代以后之为有信史时期，已毫无问题。商代以前，从考古学的观点立论，还需要地下的新发现来确定，但唐虞夏三代，在春秋战国时，早已为各家学者所称道，其事实也不像唐虞以前的那样迷离恍惚，所以唐虞以后的历史，可以征信。<sup>②</sup> 金兆梓指出：“古史家如孔子、司马迁都认为，自尧以来，我国始有信史。”<sup>③</sup> 杨东莼与余逊等人都注意到考古发现对上古史研究的意义，其历史期分期也是从文字有无来划分的，因此把商代作为历史期的开始。但是，他们对商代以前、尧舜以来的历史，认为虽然没有考古发现予以印证，也可以作为信史来看待。

文字有无是区分史前期与历史期的一个标准，民国很多史家也是以此来分期。按照民国时期的考古发现，显然应以商代为界来划分史前期与历史期。以商代为历史期起点，对民族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通过与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上古史书写情况加以比较来说明。

对中国远古的历史，中国传统历史书写是根据经书和子书的记载，把上古史系统化，排列成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序列，这个顺序从东汉到民国初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sup>④</sup> 清末民初教科书也是如此。《东洋史要》认为可信的历史，是从有巢氏开始的。该书开篇写道：“相传开辟之初，有盘古氏，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被迹

① 杨东莼编《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开明书店，1947年2月初版，11月4版，第26~27页。

② 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4页。

③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4页。

④ 参阅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载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上册，第2页。

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十一头，兴于龙门熊耳山。治各万八千岁。天皇二十三万四千年，地皇十九万八千年，总年数四十三万二千年。复有十纪。”从对盘古、天皇、地皇等人事标以“相传”字样可见，桑原对这些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历史开始于有巢氏：“太古，人皆穴居茹生。有圣人教之巢居，号有巢氏，治石楼山南。”<sup>①</sup>《支那史要》认为从黄帝开始，中国有可信的历史：“人民既繁殖，因不可无首领以统御之，是支那之开辟，所以有三皇之名也。虽然三皇之名，古来无一定之说”；“盖开辟之事，多属传说。三皇之后有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也。自是之后，其事迹稍有可考”。<sup>②</sup>《支那通史》把唐虞以后的历史作为信史：“自唐虞而上，渺不可考。古书有三皇五帝之号，而不指明其人……（三皇）非实有其人，后人徒设其名，以表三才开始之序也。（五帝之创作）特足以征民智渐开之度而已。……至于唐虞时，人文既开，庶绩咸熙，历代之史，自是可得而述也”。<sup>③</sup>

日本教科书中把有巢氏、黄帝、唐虞等上古帝王作为可信的历史起点，这种看法为后来中国自编的历史教科书所继承。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认为可信的历史叙述起点，见表8-1。

表8-1 1920年代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信史起点

信史起点	书名及作者	上古史中的相关叙述
有巢氏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陈懋治	我国文化之开，去今已五千余年矣。其初盖仅在黄河滨岸之地，事当草昧，幽渺不可考。相传太古有盘古氏，后有天皇、地皇、人皇三皇者，实开拓斯土，而后不详其人。盖往古无一统之君，大率诸大族各奉其长，各据其地而已。 已而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始有居室烹饪之法，伏羲氏作网罟，以教佃渔，画八卦，作书契，以代结绳，作甲律，制嫁娶，造琴瑟，而文化渐兴。

- ①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卷1，第11~13页。  
 ② 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卷2，第1、2页。  
 ③ 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卷1，第7~8页。



续表

信史起点	书名及作者	上古史中的相关叙述
有巢氏	《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鸿蒙初开，相传有盘古氏，其后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谓之三皇，然旧史所载，荒渺难稽。自有巢氏作，构木为巢；燧人氏作，钻木取火，居室烹饪之功以著，而事迹稍稍可考矣。
	《初小简明历史教科书》，周世棠	相传国初有盘古氏，后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皆酋长中之有势力者，而古史载其事迹，渺茫不可信，亦神话时代必经之阶级耳。至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始有居室、烹饪之法。
	《高等小学历史课本》，赵征铎	庖牺者，太古时代之酋长也。太古文化未开，酋长中有能发明事物，以助人民之生活者，庖牺之前曰有巢氏，构木为巢，教民居处；曰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至庖牺出，定嫁娶之礼，以正夫妇之始，而人始异于禽兽；又造网罟，教民享佃渔之利，厥功甚伟。他如作八卦、造弦乐，则又文字、音乐之导源也。
	《中华高小历史教科书》，汪楷、华绍昌	太古之人，文化未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毒蛇猛兽之害。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烹饪，民始得有熟食；又立传教之台，以教人。惟尚无文字，作结绳之政，大事则大结其绳，小事则小结其绳，以便记忆。 <sup>[1]</sup>
	《共和国新历史》，傅运森	有巢氏始教民构木为巢，以避蛇虫猛兽之害。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造书契，定嫁娶之仪。神农氏作耒耜以教耕，尝百草以疗疾，立市廛以便交易。人民之幸福渐备矣。
	《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潘武、章焱	太古之民，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有巢氏始教民构木为巢，民不至于露处。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烹饪，民始得有熟食。太古结绳纪事，无史可稽。至伏羲氏，作书契，画八卦，始有文字可纪。
	《新式历史教科书》，杨喆、庄启传	相传首出御世者，曰盘古，继为三皇，未有文字，无史可稽。生活状况，穴居野处，茹毛饮血而已。有巢氏作，教民构木为巢，始免露处。燧人氏作，教民钻木取火，始知熟食。巢、燧之后有伏羲氏，创作寝多，定嫁娶之制，而男女有别；结绳而为网罟，而佃渔始便；又画八卦，制乐器，开后世文字音乐之先声。
	《新法历史教科书》，吴研因	上古时候的中国，遍地都是草、木、鸟、兽，人民杂在里面……后来有巢氏想出个法子，在树林里拿木头搭巢居住，遮蔽风雨，因此人民才有了住宅。燧人氏在木头上钻出火来，发生了熟食的方法。庖牺氏拿绳结网，用来打猎、捉鱼，发生了畜牧的方法。
	《新教育历史教科书》，洪崑、朱文叔	上古的人，没有住屋，不得熟食，全是一种自然的生活。自从有巢氏发明造巢，燧人氏发明取火，居住和饮食的方法，才得略有进步。
	《新著本国史》，赵玉森	我国相传有一段神话，说是土地初开，有位圣人，叫做[作]盘古……盘古而后，又有什么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各有不可凭信的神话。到了有巢氏，教人为巢；燧人氏教人火食，那功绩才有可传。

续表

信史起点	书名及作者	上古史中的相关叙述
有巢氏	《白话注释中国历史教科书》，冰壶主人	那酋长里头，最有势力的，相传下来，就叫盘古氏。接续他的人，有那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但是年代隔得久远，记载恐怕还不能凭信。不过，从有巢氏构木做了巢，教大众居住；燧人氏钻木取了火，教大众火食，那么人事才可以证实。 中国的文化，是五帝开启的，五帝里头，伏羲氏最前。他画八卦，造书契，既兴了文字，然后定嫁女娶妻的制度，使大家晓得做人的道理。
燧人氏	《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	太古时，有燧人氏，始创火食。伏羲氏，都陈，始画八卦，又结网罟，教佃渔畜牧。神农氏出，起于烈山，教稼穡，立市廛。后世称曰三皇。
伏羲氏	《支那史教科书》，富山房	西历纪元前三千余年之顷，有太昊伏羲氏者，始结网罟，教民佃渔，定嫁娶之礼。其后数世，炎帝神农氏出。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小），姚祖义	鸿蒙初开，相传有盘古氏，其后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谓之三皇，然旧史所载，荒渺难稽。今择其事迹可考者，自伏羲氏始。 <sup>[2]</sup>
	《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张肇桐	太古之民，穴居野处，捕逐禽兽，食其肉，衣其皮。但禽飞兽走，获之甚艰，不足以御饥寒。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结网罟以教佃渔，养六畜以供庖厨；始画八卦，象天、地、风、雷、火、水、山、泽八者，以类别万物之性情；始正姓氏之别，制嫁娶之礼，以禁人渎乱之风。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读本》（未见版权页）	太古之前，相传有盘古氏，其事迹不可考。盘古之后，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是为三皇。三皇之说，聚讼纷如，然自秦以上，已不能实指其名，何况后世。今自五帝为始。五帝者，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也。
	《初等小学历史教科书》，钱宗翰	相传国初有盘古氏，其后有天皇、地皇、人皇氏，则谓之三皇。三皇以后之著者，曰有巢氏、燧人氏；次有五帝，曰伏羲、神农、轩辕、尧、舜。 伏羲氏风姓，都陈，画八卦，造书契。
	《简易历史课本》，富光年	我国太古，荒远难稽，自伏羲氏造书契，神农氏尝医药，人事始有可纪。
	《中国历史讲义》，徐念慈	包羲氏，风姓，都于陈，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以脍皮制嫁娶之礼，始作八卦、造书契，以龙纪官，为龙师而龙名。由是以观，有姓氏，制嫁娶，则已立家族之制。（其结网）与动物竞争，亦渐以智力占优胜之地位；其作八卦、造书契，近于巴比伦之楔形文，盖造文字之滥觞，进化阶级，因有秩序不紊也。包羲氏在位一百十五年。
	《第一简明历史启蒙》，胡朝阳	我中国立国以来，总计年数，已历五千二百余年。 史家编年，起唐尧元年甲辰，计唐尧至今，凡四千二百余年。而伏羲至高辛，只计在位年数，计凡九百六十七年。合计五千二百余年。伏羲以上，则不可考。

续表

信史起点	书名及作者	上古史中的相关叙述
伏羲氏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章焱	(三皇)其说荒渺，总不足据。 (十纪)自九头纪以后，更历四纪。始教民穴居，又历二纪，而至循蜚，取世之君，始有氏可考。本编著录，始自伏羲，衡之彼论，则实在禅通一纪之中也。
	《中国历史读本》，吴曾祺	上古之世，民风沕穆。相传有盘古氏者，始为之长。其后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谓之三皇，然皆事迹茫昧，无可稽考。今取其可信，以五帝为始。五帝者，伏羲、神农、轩辕、尧、舜也。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潘武	上古期中，年代颇长，可析分为四时代。伏羲以前，无书可纪，是为传疑时代。伏羲之后，至于黄帝，有年可纪，文化肇兴，是为开化时代。
	《中国历史教科书》，叶维善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缘唐虞以前，为神话充塞时代也。中史谓人类始于盘古，西史谓人类始于亚当。就时代核之，正复不远。盘古后为三皇。三皇之称，古说互异。……皆荒渺难信，故近世教科书，多自庖牺氏始。
	《白话本国史》，吕思勉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开始了。 <sup>[3]</sup>
黄帝	《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	自盘古至神农、榆罔，通为历史以前时代。 历史开始期：自黄帝立，有史官，遂为我国历史之开始期。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丁保书	中国于黄河流经之处，有肥沃之地。太古汉族，由西北方移居于此。人口渐次繁殖，分众部落，各戴酋长，而营渔猎、畜牧、耕田、医药、纺织之业，斯为有酋长而无君主之时代。其后酋长中有黄帝，征服诸部落，拓疆土于长江南北。
	《最新中学教科书 中国历史》，夏曾佑	中国自黄帝以上，包[庖]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
	《初等小学本国历史教科书》，会文学社	我国历史始于黄帝，黄帝以前，无可征信。相传首出御世者，为盘古氏；其次有三皇氏，有五帝氏，而黄帝即五帝之一也。
	《新体中国历史》，吕瑞廷、赵激璧	三皇之传说，皆妄诞不谈，不足深信，至黄帝以后之事，则稍有可征者。
	《国史读本》，李岳瑞	有文字然后有记载，故未有文字以前，无历史也；仅凭故老之传说而已，及年湮代远，语焉不详：或以结绳为记，或以刻木为记，然久而久之，绳断木腐，征信不易。故我国古史，自黄帝以前，皆所谓传疑时期也。

续表

信史起点	书名及作者	上古史中的相关叙述
黄帝	《中国历史讲义》，沈颐	上古世运之变迁，计分二期：一、自开辟至周初。其时史书不完，一切政制，仅散见于群经诸子，而又不可尽信。可谓传疑期。二、自周之中叶至于战国之末……为化成之期。（神农氏）其后凡传七世，轩辕氏代之。于是文字兴，而先民事迹，渐有史可征矣。
	《共和国本国史》，赵玉森	中国人民之繁殖，约距今五千年。因黄河流域，天然之肥沃，我全国伟大之民族遂生息滋长于其间。相传最初之统御民族者，为盘古氏，次则初三皇、中三皇等，皆太古人民之首领，惟[唯]时代绵远，所传事实，不尽可凭，至黄帝以后，乃渐有可征。
唐虞	《小学历史课本》，华洋书局	三皇五帝，古有其称号，未定其人。自孔子作《易·大传》，并举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五帝，而其论始定。然《尚书》所载，仅自尧始，以前之事，邈远难稽矣。
	《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姚祖义	我国有史之世，起自唐虞，至今已四千余年矣。唐虞以上，历代岁月，无可征信。
	《历代史略》，柳诒徵	开中国之治统，为百王之仪范者，曰帝尧、帝舜。帝尧者，帝喾之子，初居陶，后为唐侯，继兄挚即帝位，号陶唐氏。能修仁智之德，以亲宗族、治群臣、和诸侯，太古民俗，至是一变。

注：[1] 汪楷、章楨、华绍昌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基本相同。

[2] 在《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姚祖义的叙述也是从伏羲开始，但是以唐虞为信史起点。

[3] 该书依据《白虎通》论三皇，讲述了伏羲氏、燧人氏与神农氏；依据《易系辞》讲述了伏羲以后的制作。

从表 8-1 可见，清末直至 1920 年代近代考古学兴起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认为的信史起点，主要有有巢氏、伏羲氏、黄帝、唐虞等。有巢氏、伏羲氏、黄帝等以来的历史是否就是可信历史，不是本章讨论的问题；本章关注的是，这些教科书对有巢氏、伏羲氏、黄帝以来的历史持肯定态度，把它们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归入中国“历史期”。从中国历史期长短来说，有巢氏、伏羲氏、黄帝等历史起点，相较于考古学兴起后的商代历史起点无疑向前延伸了很多。换言之，近代考古学兴起后，中国信史的起点，不论是开始于商代，还是夏代或唐虞时期，相较于考古学兴起前明显延后，中国的历史

时期也相应地缩短。

考古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影响之一，是缩短了中国的历史期。如果说中国历史的延长可以增强民众民族自豪感，那么，信史期的缩短会削弱民族自豪感。殷墟发掘一方面证实了商代后期历史，使中国信史起点确立在商代；另一方面，相较于考古学兴起前，又缩短了中国历史，而这无疑会影响到民众对于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自豪感。这种担心，从前述杨东莼与陈登原的历史教科书中大致可见。杨东莼与陈登原等人在确立商代信史起点后，又把历史期往前延伸至夏代或唐虞，试图拉长中国历史，以增强民众信心。历史期的缩短与中国历史的拉长一样，使民众对上古历史的认识发生变化，也影响到通过上古历史而建立的民族认同。

#### 四 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社会进化阶段的象征

史前史与历史期的分期，相对于中国传统历史书写来说，是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出现的新事物。考古学兴起后，中国历史多出了一个“史前史”部分，中国古史新出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文化顺序。<sup>①</sup>史前史的出现，使得原先古史记述的上古历史，现在都属于“史前史”部分。上古记述在“史前史”中应如何认识？它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如何？在这个新的史前史框架下，古史记述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三皇五帝的记载不再被视为信史。但由于三皇五帝在中国历史中的影响，1920年代考古学兴起后的教科书在讲述中国历史时，大

<sup>①</sup> 参阅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载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上册，第3页。

多还是从三皇五帝开始。<sup>①</sup>如上节所述，清末民初教科书一般是从有巢氏、伏羲氏、黄帝等上古帝王开始讲起，把这些帝王视为中国古史中的重要人物，对此学界基本持肯定态度。考古学兴起后，大多教科书将历史期以前的记载视为传说与神话。《谢氏初中本国史》指出，“所谓唐虞的禅让，乃后世学者‘托古改制’的说法，因为儒家是主张尊君，是主张以‘礼让为国’，于是他们便‘言必称尧舜’，后来增加附会，尧舜便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代表。后人被迷惑了数千年，其实是不可信的”。<sup>②</sup>白进彩的《高中本国史》认为，太古史实多见于纬书，或以纬书为古史，记述多荒诞不经，有若各国古史之神话也。<sup>③</sup>蔡沔因的《初中新本国史》认为，上古传说不外乎是后人的理想，用来表现先民的艰难和德泽的久长、民族对于

① “三皇五帝”历来有不同说法，教科书中对三皇五帝为何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持此看法的有蔡沔因《初中新本国史》、罗元鲲《高中本国史》等）；或以遂人、庖牺、神农为三皇（持此看法的有陈登原《高中本国史》、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等）；或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如孟世杰《高中本国史》）。不同教科书采用哪一种“三皇五帝”说，也各有所本，陈登原列举了古籍中关于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如三皇，司马贞认为是天皇、地皇、人皇，谯周认为是遂皇、戏皇、农皇，郑玄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班固认为是伏羲、祝融、神农，刘恕认为是伏羲、共工、神农，孔安国认为是庖牺、神农、黄帝；如五帝，司马迁认为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郑玄认为是黄帝、金天、高阳、高辛、尧、舜，孔安国认为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王肃认为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陈登原：《高中本国史》上册，第36、41页）。罗元鲲详细列举了“三皇五帝”说，比如三皇，《皇王大纪》中是天皇、地皇、人皇，《史记》中是天皇、地皇、泰皇，《尚书序》中是伏羲、神农、黄帝，《礼含文嘉》中是庖牺、燧人、神农，《春秋运斗枢》中是伏羲、神农、女娲，《白虎通》中是伏羲、神农、燧人，《风俗通》中是燧皇、戏皇、农皇；比如五帝，《皇王大纪》中是庖牺、神农、黄帝、尧、舜，《大戴记》中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月令篇》中是太昊、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尚书序》中是少昊、颛顼、高辛、陶唐、有虞（罗元鲲编著《高中本国史》第1册，第25页）。教科书中的“三皇五帝”说之出处基本来自上述古籍。这里“三皇五帝”泛指伏羲、黄帝等上古帝王。

② 谢兴尧编著《谢氏初中本国史》第1册，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第4页。

③ 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文化学社，1935年3版，第20页。

宇宙开辟的伟大想象和时间观念的久远。<sup>①</sup>与清末民初不同的是，考古学兴起后，教科书叙述上古史事时，一般都加上“相传”字样，特别注明其传说性质，认为三皇五帝的事迹是后人理想的寄托，不能尽信为历史。

三皇五帝等上古人物被视为社会发展阶段的象征。何祖泽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古史的不足凭信，是显而易见的。但其间有几个帝王的名号，很可见出是古初进化阶段的象征”，“有巢氏、燧人氏就是渔猎社会的象征，伏羲氏就是畜牧社会的象征，神农氏就是农耕社会的象征”，“历来的史家，以为文明的发展，是由一种超人的或半神体的人来主宰，就把社会进化的现象，统归于个人的事业了”。<sup>②</sup>缪凤林的《高中本国史》认为，古籍中三皇五帝之排序，“参差乖背，尤不可胜记”，“皆事理之所必无者，则迁书帝系之不足据，事甚明凿”。然而，尽管伏羲、有巢、燧人、神农四人的情况现在很难确知，但从这四个人的名号上，可以略见古初进化之迹。“有巢、燧人、庖羲、神农诸名，实为古初进化阶段之象征，其姓氏年氏，虽不可考，而古初社会之情况，反可由是窥见焉。”<sup>③</sup>《新编高中本国史》中的表述基本相同：“所谓有巢、燧人、庖牺、神农原不一定有其人，即就古籍上所传甚么庖牺蛇首人身，神农牛首人身，也都半人半兽，属于神话中的人物。现在就‘有巢’、‘燧人’、‘庖牺’、‘神农’四个名词看，顾名思义，实是‘树居’、‘用火’、‘畜牧’、‘耕稼’四个社会演进的阶段，不过古人思想简单，就将这四个演进的阶段人格化了。”<sup>④</sup>

社会进化次序，先为渔猎时代，次为畜牧时代，又次为农业（耕稼）时代，中国远古传说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进化过程。《开明

① 蔡沅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第2-3页。

②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上册，第17-18页。

③ 缪凤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钟山书局，1932年8月初版，10月再版，第36-38页。

④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8页。

本国史教本》认为，神话传说是初民思想的反映。其自身虽不是信史，却很可以由此了解我们民族进化象征的次第与时间的久暂。“盘古的神话代表初民对于天地形成的想象，有巢氏与燧人氏的传说，代表渔猎时代发明居处与火食的进化阶段。伏羲氏与神农氏的传说代表由渔猎演进为畜牧及由畜牧演进为农业的两大阶段。”<sup>①</sup>《新编高中本国史》指出，燧人氏发明用火，是由野蛮时代初期进入中期；庖牺氏养牺牲，神农氏种五谷，是由未开化时代初期进入中期，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发展。<sup>②</sup>《北新本国史》认为：“社会进化，先为渔猎时代，畜牧时代，后为农业时代。今考中国古史传说，正与此种进化程序相合。”“伏羲以前的传说——渔猎时代畜牧时代的象征”；“伏羲以后的传说——农业时代的象征”。<sup>③</sup>吕克由的《高中本国史》指出，人类的进化次序，根据使用的器具，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从经济上，则分为渔猎、畜牧和农耕时代，“中国的上古帝王，有巢、燧人氏大约在渔猎时代；伏羲、神农氏已进于畜牧、耕农时代了；三皇五帝之时，正是由石器而入铜器时代了”。<sup>④</sup>《复兴初中本国史》认为：“有巢氏是代表初民巢居时代，燧人氏是代表初民用火时代。伏羲氏是代表初民渔猎畜牧以及火食时代，那时候，当然有简单的婚姻制度了。神农氏是代表耕种时代，那时候当然有粗浅的医药知识，和以物相易的原始商业了。神农作耒耜，用石做兵器，更可见那时已入新石器时代了，因为斩木非用锋利的石刀石斧，是不能成耜的。”<sup>⑤</sup>

考古学兴起后，人们注意到考古学分期、社会进化阶段、中国上古帝王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将三者相对照，发现其在先后顺序上存在着一致性（见表8-2）。

①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20~21页。

②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7~18页。

③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上册，第17页。

④ 吕克由编辑《高中本国史》上册，民智书局，1931，第1~3页。

⑤ 傅纬平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4~5页。



表 8-2 史前史分期、社会进化阶段与中国上古帝王时代对照

考古学分期	社会进化阶段	中国上古帝王
旧石器时代前期 <sup>[1]</sup>	渔猎	有巢、燧人
旧石器时代后期	游牧	伏羲
新石器时代	耕稼	神农
铜器时代	文明	黄帝

注：[1] 有些教科书称为“初石器时代”。

史家通过排比考古学分期、社会进化阶段和中国上古帝王顺序，发现其中的时代对应关系，古史传说因之得到考古发现的某种证实，因而相信古史传说中有史实的成分，断定上古传说反映了社会进化次序，是初民生活的反映，上古帝王是社会进化阶段的象征。上古传说表现出社会由渔猎进到畜牧再进到耕稼的阶段以及国家雏形之出现，所以从盘古到黄帝，不必争论人物的有无，当认为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依次改进的表征。<sup>①</sup>

考古学兴起后，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对上古史事进行了解释：一是把它们作为传说，肯定其中的象征意义；二是怀疑它们的具体存在。这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共同促成了人们对上古史事态度的转变。肯定传说的象征意义，使“上古先王系谱不再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且重‘事’的整体观点逐渐地取代了以往重‘人’的世系递嬗的古史观念”。<sup>②</sup> 从社会进化阶段来解释古史传说，是将上古记载“虚拟化”，怀疑上古史事的具体存在，实际上是考古学“证实”了先前人们对上古传说真实性的怀疑，彻底宣告了上古“黄金时代”观念的破灭。

① 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35页。

② 张维屏：《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讲义所反映之当代古史观念的探讨》，《思与言》第41卷第2期，2003年6月。

## 五 考古学与民族认同：古史辨运动之参照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正是古史辨运动兴起并发生影响之时。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对于古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sup>①</sup> 顾颉刚用这个方法研究古史，要推翻“非信史”，达成这样的共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sup>②</sup> 古史辨运动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动摇了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上古史系统，给中国古史系统带来了很大冲击，一时间“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sup>③</sup> 古史系统的动摇会造成民族历史的迷失，影响到民族信心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因此，重建古史系统以确立民族认同，是一些史家与民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考古发现。<sup>④</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考古学兴起一个目的，就是回应疑古思潮，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史，确立民族信心。考古发现成为1920年代后中国古史建设的重要材料，被寄予厚望。通过对考古学建立的中国上古史与古史辨派——疑古一派的古史观念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的影响，以及考古学于历史学的意义。

①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60页。

②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96~102页。

③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7页。

④ 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疑古思想在中国产生较早,<sup>①</sup>西方考古学思想在清末传入中国之初,就有具有疑古思想的学者开始运用近代考古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史。较早进行这种尝试的当属夏曾佑。夏曾佑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期,其中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sup>②</sup>“传疑时期”的划分,是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对古代传说的多歧性加以注意并指出,不是动摇经书和正史的权威。<sup>③</sup>夏曾佑认为,上古传说体现了社会进化的程序:“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社会发展是由渔猎而游牧而耕稼的。“包牺氏时代,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之期。神农时代,中国已出游牧社会而进为耕稼社会了。”<sup>④</sup>夏曾佑尽管把古史视为传说,但是以进化论来解读,肯定传说中的象征意义。

夏曾佑对上古传说的态度使时人耳目一新,梁启超称赞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sup>⑤</sup>夏曾佑的“新见解”不仅是对上古传说的“存疑”,更主要的是跳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循环变易说而采用了进化观。<sup>⑥</sup>夏曾佑作为今文经学者,其疑古思想自有今文经学的传统。这种疑古思想影响到顾颉刚,成为顾颉刚古史辨伪思想的一个来源。<sup>⑦</sup>在《现代初中本国史》中,顾颉刚

① 参阅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自序”。

②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6页。

③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

④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11-14页。

⑤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36页。

⑥ 参阅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305-311页。

⑦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52页。

从社会进化方面来解释古史传说，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sup>①</sup>仍把古史传说置于中国历史书写之中，对这些传说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把它们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对照夏曾佑与顾颉刚的态度，大致可见考古学兴起后，人们古史观念变化的实质，以及利用考古学建设上古史的真实意味。从上节叙述可见，近代考古学兴起后，人们对上古史的态度为：不再承认历史期以前的记载为信史，而是视之为传说与神话；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肯定古史传说中蕴含的史实成分。这种对古史的态度与解读方式，与夏曾佑和顾颉刚的态度如出一辙，并无多少特别之处。考古学兴起后的中国古史解释方式，与疑古派基本一致。<sup>②</sup>作为古史辨运动的对立面、被寄予厚望的近代考古学，其重建的中国古史系统，与人们原先向往的信史系统，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

以考古学来建设上古史的一个期望，是回应古史辨运动对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的冲击。从考古学兴起后的古史书写情况来看，很难说达到了这一目标。殷墟考古发现与商代历史的证实，对疑古派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说”是重要的修正，一时也让反对疑古派的人欣喜，认为可以宣告古史辨运动的破产。实际上，这并未能真正回应疑古派对古史传说与“三皇五帝”系统的质疑。1921年，胡适就曾说道：“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十年，从《诗三百首》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格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sup>③</sup>胡适的说法可视为疑古派的基本看法。如前所述，考古学兴起后，根据考古发现，一般把商代作为中国信史期的开

① 参阅第十四章。

② 参阅王东杰《“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2-23页。

始，较之古史辨派“东周”信史起点往前延伸，但只是与“东周以上无史说”在具体时期断限上有所不同，未能动摇古史辨派的认识基础。<sup>①</sup>

## 小 结

本章通过考察考古学兴起前后教科书中上古史叙述的变化，讨论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考古学拉长了中国历史。石器时代特别是“北京人”的发现，使广义的中国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延伸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类发源地之一，这回击了清末以来的“中国人种西来说”，为说明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提供了“科学”证据，这可能是考古学在确立民族认同方面最重要的意义。<sup>②</sup>其次，考古学缩短了中国历史期。殷墟考古发现使中国“信史”起点移后至商代，相较于此前的伏羲氏等起点，中国历史期为缩短。中国历史延长，有助于增强民族信心；历史期缩短，同样会影响到民族心理。最后也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兴起后，中国历史书写出现了史前史部分，在这个新的史前史与历史期分期的架构下，上古历史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商代的历史期起点，使国家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确立的黄帝认同与上古“黄金时代”观念都处于无所依托的境地；而在史前史范围内，从社会进化角度来解释上古记载，将之视为传说与神话，也使得黄帝从政府确立的建国先祖与民族始祖变为社会进化阶段的象征，其真实性受到怀疑，实际上也彻底宣告了上古“黄金时代”观念的破灭，冲击甚至动摇了民族认同，影响到国家历史教育的目标。

<sup>①</sup> 参阅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5期。

<sup>②</sup> 参阅第九章。

考古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回应古史辨运动的冲击，重建中国古史系统。但是，从考古学兴起后所建立的中国古史系统来看，它与人们的希望尚有一定的距离。其中原因，除了民国时期考古发现材料不足外，还和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有关。一般来说，考古发现只有经过文献材料的印证，才可以确证“传疑时期”的史事，比如民国时期安阳殷墟发现，关于商代的文献记载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民国历史书写将“信史”起点定于商周，原因即在此。相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与中国历史学直接“衔接”、互为印证，史前考古发现则难以在中国古籍中找到直接的对应。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材料完全不同，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因为这段历史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考，而历史阶段的考古发现除了少量有文字可供参考并能印证典籍之外，绝大部分还是无言的物质遗存。这些遗存与文字记载的内容可能相去甚远，其中蕴含的信息也完全不同。<sup>①</sup>“与历史学依赖的文字典籍不同，考古发现的材料并不直接告诉我们历史的故事”，<sup>②</sup>史前考古发现与中国古史传说只有某种感觉上的相似性，它本身很难与古史传说直接印证。顾颉刚认为：“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大家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承认的根据，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否认的根据。”<sup>③</sup>杨宽也持同样的看法：“自王国维创立二重论证之说，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学者无不据之以为金科玉律，诚哉其金科玉律也！然此二重论证之方法，惟殷史因殷墟卜辞之出土乃得为之，（但卜辞多片段，若干文字之研究至今犹多未能论定，仍不得广为证明。）夏以上则病未能。近人或以山西西阴村之发现为夏民族之遗址，或以仰韶之彩陶文化为夏民族所遗留，皆证据薄弱，仅因与夏民族之地域传

①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第56页。

② 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③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自序”第5页。

说相合而谓得夏民族之遗址，实近武断！”<sup>①</sup>即便在1920年代把考古学作为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办法的李伯玄，在19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作中，也较少使用考古材料，大多还是使用文献材料。同样，徐旭生在研究古史传说时也认为，旧石器时代的发掘，与传说时代相离得太远，暂时可以不谈；新石器时代遗址同传说时代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是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变化，一直到其时几乎还是毫无所知。<sup>②</sup>从此可看出当时考古发现与研究对上古历史重建的实际效果。

民国时期，考古学家卫聚贤曾经指出：“考古之目的，非为夸扬古国之文明，亦非为崇拜古人之伟大，更非为仿古以作复兴之举，实欲明了前途应走之大道。”<sup>③</sup>卫氏此言，显然是不赞成当时以考古发现来证明中国为文明古国的做法。从民国时期史前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的这种紧密联系上，可以感知学界欲借助考古学来重建中国上古史、确立民族信心的迫切心情。

附表 8-1 1920 年代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史前史与考古发现

书名 (作者与初版时间)	相关史前史与考古发现目录	相关古史传说目录
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 (金兆梓,1923)	引言 历史定义 生物之始 石器时代 中国石器时代	地球初成 人类之始 铜器铁器时代

①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66页。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5页。

③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第1页。

续表

书名 (作者与初版时间)	相关史前史与考古发现目录	相关古史传说目录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 (傅运森,1923)	第二编 历史以前的状况 第一章 概论 5. 人类历史的年限 6. 考古的学者 7. 一万年的文化 8. 创造天地的古话 9. 学者研究的结果 第三章 人类出生 12. 人为万物之灵 13. 直立猿人 14. 猿人的生活 15. 人类出生的年代 16. 人类出生的地方 第三编 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 20. 人类何以谋生 21. 金属发现	
新时代初中本国史 (王钟麒,1927)	一、古史的传说 二、古史开幕时的状况	
新中华初中本国史 (金兆梓,1929)	第一编 上古史 至周末止 上古首期:至黄帝止 考古学与历史 汉族与黄河流域	初民生活及社会传说集中之黄帝
初中历史 (沈味之、朱翊新、朱公振,1929)	一、史学的新建设 6. 史前时期的先民 (1) 人类始祖的发现 (2) 先民活动的推测 (3) 初石器时代 (4) 旧石器时代 (5) 新石器时代 (6) 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的比较	
新中华语体本国史 (郑昶,1930)	第一编 上古史 第二章:中国北部地下史料的发现和殷墟文化 一、考古学和历史 二、我国石器时代的文化 三、安阳发现的殷墟遗物	第一章:古史的传说 一、初民生活演进之传说 二、传说集中的黄帝 三、洪水的传说和尧舜禹



续表

书名 (作者与初版时间)	相关史前史与考古发现目录	相关古史传说目录
北新本国史 (杨人榘,1930)	第二编 上古史 第一章 古史的传说与夏商二代 古史的传说 夏商二代 古代历史的新发现	古史的传说 一、伏羲以前的传说 二、伏羲以后的传说 三、尧舜禅让的传说 四、洪水及夏禹传子 的传说
开明本国史教本 (周予同,1931)	第二编 上古史 一、神话传说中的古史与石器时 代的文化:上古史的口碑与实物 从盘古到尧舜 神话传说的功用与解释 中国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	
高中本国史 (吕克由,1931)	第一编 上古史 有史以前的情形 三皇五帝 夏殷与西周	
初中本国史 (何祖泽,1932)	第二编 上古史 第一章 古史的传说和石器时代的 文化 最古的传说 象征的圣哲 石器时代文化的推测	第二章 中华民族的建国 黄帝建国的传说 黄帝时代开化的 传说 洪水的治平 贵族政治的成立
新中华高中本国史 (金兆梓,1932)	第一章 史前纪 一、中国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 二、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 四、汉族由来的研究 五、中国史的开始	五、中国史的开始 古史传说的讨论 中国有信史始于殷
北新历史教本 (储皖,1932)	原始人类的生活 初民的来源 石器时代 铜器铁器时代	
高中本国史 (缪凤林,1932)	第一章 传疑时代(唐虞以前) 一、北京人之发现 二、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三、史前之遗存与古史之传说 四、汉族由来问题	

续表

书名 (作者与初版时间)	相关史前史与考古发现目录	相关古史传说目录
复兴历史教科书 (徐映川,1933)	一、新发现的石器 1. 古史的传说 2. 发现甲骨文 3. 发现石器等 4. 新石器与旧石器时代 5. 古代文化中心	
复兴初中本国史 (傅纬平,1933)	上古史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与社会 中国的原人 中国石器时代遗物 殷商的文化	第一章:太古之传说 历史的意义与象征 神话及传说 第二章:中华民族之建国 第三章:唐虞夏商之政教
陈氏高中本国史 (陈登原,1933)	第一编 绪论 四、古物与发掘 非书本的史料 古物 竹书纪年 流沙坠简 仰韶文化 田野工作 九、中国人种的来由 北京人	第一章 古史上的疑问 十一、开辟与创制 十二、对于古史的解 释 第二章 部落政治 的开始 第三章 洪水时期 的前后 十七、洪水的传说
高中本国史 (孟世杰,1934)	上古史 第一章 史前的状况 一、汉族由来的研究 二、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期 文化 四、中国古代生活的进化	第二章 三皇五帝的传说 一、古史年代与帝系 的确实性 二、三皇五帝时代的 社会进化 三、黄帝时代部落种 族之争战 四、洪水与禅让的研 究
初中本国史 <sup>[1]</sup> (周予同,1934)	第一编 上古史 第一章 太古的神话和传说 第一节 历史和“史前时期” 第四章 上古的社会和文化 第一节 中国本土原人的发现 第二节 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 第三节 殷墟发现的遗物	第一章 太古的神话和 传说 第二节 开天辟地 的神话 第三节 传说中的 初民社会

续表

书名 (作者与初版时间)	相关史前史与考古发现目录	相关古史传说目录
本国史讲义 (高彦博,1934)	二、古代的传说与开化 3. 中国新旧石器时代的发现与研究 (1) 史前文化实物的证明 (2) 北京猿人头骨的发现 (3) 旧石器的发现 (4) 新石器与铜器的发现	二、古代的传说与开化 1. 中国立国的原始与开辟的故事 2. 中国民族的由来及其传说
余氏高中本国史 (余逊,1934)	卷一 上古史 中国远古的文化与社会——史前文化的实物发现与传说推测 研究古史的态度与方法 史前文化实物的发现 史前文化传说的推测	
高中本国史 (罗香林,1935)	第二编 史前史与上古史 第一章 我国民族之起源 东亚人种由来之古 中国民族西来说之不可靠 诸夏民族之起源 第二章 太古之文化与社会 人类进化之程序 中土之猿人时代 中土之旧石器时代 中土之新石器时代遗迹之发现 中土之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社会	第三章 唐虞之政治 民族部落社会之起源 传说中之伏羲神农 传说中之黄帝 唐尧虞舜之政治 氏族社会与母系制度
高中本国史 (杨东莼,1935)	第二编 上古史 第一章 我国民族的起源 名称的解释 汉族西来说 于闐说 北京人的发现与土著说	
初中本国史 (应功九,1935)	第一编 上古史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与社会 第二节 上古文化之分期	第一章 太古之传说 第一节 历史与神话
历史 (卢文迪,1936)	第一编 上古史 太古之传说及中华民族之由来 上古之文化及武功	

续表

书名 (作者与初版时间)	相关史前史与考古发现目录	相关古史传说目录
初中新本国史 (蔡沅因,1937)	上古史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与社会 中国猿人的发现 古代遗物的发现与社会的进化	太古之传说 历史与史前时代 初民生活的演进 中华民族之建国
新编高中本国史 (金兆梓,1937)	第一编 上古史 史前纪 中华民族之起源 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 中华民族由来的研究 汉民族最初的地盘	
初级中学历史 (宋延庠、蒋子奇等, 1945)	第二编 上古史 第七课 上古先民的创制与遗迹 我国历史的开端 上古先民的创制与遗迹 从考古学上推测先民的文化	
高中新本国史 (孙正容,1946)	上古史 第一章 石器时代的民族与文化 第一节 中国先史时期发掘的 经过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起源问题 第三节 由传说和新时期遗存中 所见的古代社会与文化	第二章 由君位拥戴到 君位世袭的演化过程 第一节 唐虞禅让 的研究

注: [1] 与周予同 1947 年版《本国史》相同。

## 第九章

# 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起源说

中国民族起源问题，在 20 世纪上半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也是历史教科书重视的问题。民族起源说是对一个民族的溯源研究，“在民族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溯源。这种溯源研究法，基本上是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的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一般咸信，经由这种溯源，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以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并且在如此的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sup>①</sup>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溯源来建构该民族的历史和国族形象，关系到民族身份和民族自信心的确立。本章以教科书中的民族起源说为中心，讨论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特征。<sup>②</sup>

---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 61 页。

② 关于中国人种起源说的研究中，对清末“西来说”的研究较多。王尔敏较早就注意到了“中华民族西来说”的“思想史”意义，建议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参阅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444 页。另有杨思信《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历史考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杨思信《拉克伯里“中国文化西来说”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反响》（《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2 期）、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李帆《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

本章承接前一章，继续讨论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国人对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清末至民国前期，相信“西来说”；1920年代之后，“西来说”逐渐被否定，“土著说”开始确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特别是史前考古发现的影响。如上一章所述，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探究中国民族起源，以回应“中国人种（民族）西来说”。确认中国民族之起源，对民国考古学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sup>①</sup>但是，民国时期的考古学能否真正得出中国人种是土著居民的结论，恐怕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民族起源问题关系到民族的身份与认同，使得民族起源问题变得复杂，这不再仅仅是纯学术问题，而是牵涉到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充满了学术与情感的缠结。

本章将讨论两个问题：一是1930年代，在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还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土著说”如何得以确立；二是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认同的建构特征。清末民国时期，对“中国民族”的认识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清末，“中国民族”主要指汉族；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指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或指汉族。本文在

---

（《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韩子奇《从时间的差序到空间的差序：晚清民国时期的“西来说”》（载孙江主编《新史学》第8卷，中华书局，2014）中亦有涉及。上述研究主要是对清末“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研究，对民国时期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关注不多，也没有将整个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放在一起讨论。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对中国民族起源进行了探讨，但对中国人种外来说未多论及。这方面的研究中，当推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该书从考古发现方面对中国人种外来说进行了分析，对理解中国人种起源很有帮助。但陈书主要关注中国考古活动，讨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

①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13页。该书指出，中国史前考古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史前文化的源流问题，这个问题贯穿整个中国史前考古学史。

使用“民族”一词时，是根据其当时语境下的含义来使用的，不再另行指明。<sup>①</sup>

## 一 中国人种起源作为问题的出现与“西来说”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传统的汉文文献少有记载，也鲜有中国民族（人种）由来的说法。中国古代学者对历史的叙述，仅是记录较为可靠的事实，对于上古传疑之世多阙如。西汉末年的纬书中偶有涉及中国民族由来问题，但那是出于道家的想象，其说被认为荒诞不可信。<sup>②</sup>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中西交通后，西方人于17世纪首先提出的。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加深，惊异于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文明，热心中国古史的人，开始探讨中国人种的起源，提出了中国人种起源的问题。<sup>③</sup>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传入中国，引起中国人自己的关注则是在19世纪末年。清中叶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中国人意识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和中国一样的国家，“中国人种起源”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开始出现。“汉族自有史以前久居其土乎？抑自他处迁来，其迹尚有可考者乎？此近人所谓‘汉族由来’之问也。昔人暗于域外地理，即以其国为天下，此说自无从生。今则瀛海大通，知中国不过世界列国之一；远览他国史乘，

① “人种”与“民族”含义不同，但清末民初教科书中常常用“人种”来指称民族，本章根据教科书用法，“人种”与“民族”意思相同，二者互用，使用时不再指出。

② 刘紫萍：《中华民族起源之神话及学说》，《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1集，1937年8月。当代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区，即“一源中心说”，其依据是《史记》等书。“传统的汉文文献，是相信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被流窜于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司马迁综春秋、战国各说，在《五帝本纪》中这样叙述：由于共工、驩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不仅影响及于《史》、《汉》以下，一直到近现代也还有一些专家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54页。

③ 参阅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1月。

其民又多非土著；而读史之眼光，始一变矣。”<sup>①</sup>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和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人种来源上有多种说法，如“巴比伦说”“非洲说”“澳大利亚说”“亚细亚北方说”“美洲说”“帕米尔高原说”“埃及说”“印度说”“东方海岛说”等，<sup>②</sup> 其中以“埃及说”“印度说”“巴比伦说”“中亚细亚说”为主。<sup>③</sup> 在中国人种来源的诸种说法中，以“巴比伦说”影响最大，此说以法人拉克伯里为代表，<sup>④</sup> 他在 1894 年出版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又译《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中，列举了中国和古巴比伦在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科技发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近百种相似之处，从而断定中国文明是从古巴比伦东迁而来的。

奈亨台（Narkhunte）者，即近世 Nai Hwang Ti，与爱雷米特 Elamite 历史所称之 Kudur Nakhunte 相同，于底格里士河边有战功，当纪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谓当纪元前二十四世纪至二十七世纪）率巴克（Bark）民族东迁，从土耳其斯坦，

①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 7 页。

② 参阅观云（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 35～60 号，1903～1905 年。蒋智由在该文中列举的几种说法，基本上包括了中国人种起源上的大部分提法；何柄松在《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中提及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民族起源的 9 种说法；缪凤林在《中国民族由来论》（《史学杂志》第 2 卷第 2 期，1930 年 5 月）中提到了包括“土著说”在内的中国民族起源的 10 种说法。

③ 关于这些外来说，一般的中国民族史都有记载，可参阅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 50～67 页；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第 29～33 页；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 30～36 页。

④ 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法国汉学家，生于香港，后去英国，在伦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创办《巴比伦与东方纪事》杂志（*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人东来之前的中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 2300～公元 200 年》（*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BC to 200AD*）。对拉克伯里的介绍，可参阅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第 150～151 页；孙江《拉伯克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经喀什葛尔 (Kashgar) (即疏勒), 沿塔里木河 (Tarym) 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其一族者, 与其本族分离, 向北方近烟尼塞河流域旅行。今日于河边, 发现其用当时文字所成之古铭。而同时又有未达东方者, 与北西藏之民族, 结合而为一部族。此东迁之首长, 以中国古史证之, 即黄帝也。又曰莎公 (Sargon) 者, 于当日民族未知文字, 为记事实, 用火焰形之符号 (案中国古史称神农用火德王, 以火命官, 故曰炎帝), 是即中国所谓神农也。又曰但克 (dunkit) 者, 近世 Tanghieh 迦勒底语为 Dungi, 亚多人 Chalden, 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 是即中国所谓仓颉也。巴克者, 本当时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 而西方亚细亚一民族, 用以为其自呼之称号。今此语之存于西亚细亚古史者, 即巴克之国 Country of Bak, 此民族其后有东迁者, 是即中国所谓“百姓”。昆仑 Kuenln 者, 即“花国” (Flowery land), 以其地之丰饶, 于后世子孙之永不能忘, 既达东方, 以自名其国, 是即中国所谓“中华”也。<sup>①</sup>

拉克伯里的这种说法“之果是与否, 未敢强定。要之, 其说既崭新精辟, 而其证据则又凿凿可凭, 若尽目为无稽之言, 不得也”。<sup>②</sup> 此说一出, 即有附和。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著《中国文明史》, 对拉克伯里的学说做了引介。<sup>③</sup> 对“中国人种西来说”做了详

① 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 转引自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7号, 1903年9月5日。

②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 竟化书局译, 竟化书局, 1903, 第28~29页。

③ 在《支那文明史》(又名《中国文明史》)中, 白河等人列举了中国和古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政治信仰、传说上的70种相似之处, 证明中国文明来自古巴比伦。在汉族的来源上, 白河认为:“从西方亚细亚之加尔齐亚来, 黄帝率之而自帕米尔, 东横断新疆之大平原, 而入于黄河流域, 自呼曰‘百姓’, 称曰‘夏’, 伏羲、神农先黄帝而入黄河之两岸, 夙种文明之种子。自黄帝入此流域, 百姓更大蕃殖。”“支那文明的中心和建立国家者, 是汉族。”但白河又断言:“(汉族)即黄帝所率来之巴古族。支那之文明, 直视为巴古族之文明, 亦无可。”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 第5页。

尽发挥的当属蒋智由。1903~1905年,《新民丛报》上连载了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长文,对拉克伯里的“汉族西来说”做了介绍,并从中国古史记载中为之论证。《中国人种考》影响甚广,“关于汉族由来,‘西来说’最盛行。此说始于蒋观云,蒋氏因我国古史传说,把一切文明的原始,集中于黄帝,疑惑不解,适见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说黄帝是从巴比伦来到中国的一个酋长,他才相信中国文明是由巴比伦来的。后来国人再依《山海经》、《穆天子传》、《遁甲开山图》等伪书加以附会,‘汉族西来说’遂盛行”。<sup>①</sup>中国的一些学者,亦从中国古籍中搜罗证据,为之证明。“中国史书,皆始于盘古,而三皇继之,伏羲、神农、黄帝又继之,并无言他处迁来之事。自光绪二十年(公元[前]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法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引据亚洲西方古史,证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间亦实有民族东迁之事。于是中东学者,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sup>②</sup>

中国文明源自巴比伦说经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著述而得推广,在国人蒋智由等人的倡说下,被较多的中国人所认可。<sup>③</sup>清末民国前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多采用此说。

## 二 1930年代前教科书中的“中国人种西来说”

清末民国前期(1930年代前)中国历史教科书多注意到了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大多采用“中国人种西来说”。

① 朱翊新编著《朱氏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6~7页。

② 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转引自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88,第4页。

③ 20世纪初中国一些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黄节等人对“西来说”都有论述,参阅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章太炎等人后来否定了西来说。

清末，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和市村瓚次郎的《支那史要》采用的是“中国人种外来说”。《东洋史要》认为汉族远古时从巴比伦移居中国内地，栖止于黄河两岸，然后繁殖于四方。该书详述了黄种人东迁情况。黄种人自西北巴比伦来，“一循江水而下，止于蜀，其国以绿色别之。近人考汉族西来，凡有三道：其一从西藏北部青海境；其一从四川之打箭炉厅而入中国，然路均稍险隘，由此抵蜀而入长江之流域；其一即沿黄河而入，属沿江而下之一支，到达蜀”。其中黄帝率领部族东迁，到达黄河流域。“黄帝长于姬水，盖即今底格里士河，约直西历前二千二百年八十年间，有王名廓特奈亨台者，属丢那尼安族，用兵平莎公后，诸国寻率巴克民族东迁，从土耳其斯坦横断亚细亚中部山脉，由此东向，经新疆莎车府疏勒府，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出土鲁番、哈密二厅之边，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桑原列举了中国、巴比伦的一些相似之处：“奈亨台，盖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巴克，本民族之号，而中国之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以此地丰饶，示后嗣毋忘。既达东方，遂以名国，即中国，之所谓中华也。又有人名，但克者，亚尔多人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之所谓仓颉也。其余同处尚多。”<sup>①</sup>桑原引述了拉克伯里的说法，论证中国人种来自巴比伦。《支那史要》认为，“汉人来自西北，渐及繁殖，遂逐渐之于南方。汉人既斥苗人种，遂占有势力于支那本部”。<sup>②</sup>市村虽未明言汉人来自巴比伦，但认为汉人是从外面迁入的。

清末自编的教科书基本秉持了“外来说”。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明确服膺“西来说”：“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称‘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之转音，厥后逾越昆仑（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今中亚细亚），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故西人

①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卷1，第14页。

② 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卷1，第4页。

谓华夏之称起于昆仑之花国。(西人谓‘华’字起源,由中国开基祖东渐时,途经昆仑山下,有雄大之邦名曰‘华国’,心醉其隆盛,因记而传之子孙;及后人继先祖之志,遂称为‘华。’)”刘师培列举了盘古和天皇、地皇、人皇氏等人,“皆汉族初入中国之君也。(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庇伦迦克底亚相同,所引者共数十事,今不具引。)”<sup>①</sup>刘师培的说法与桑原鹭藏如出一辙,论说方式也基本相同。

章嶽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坚持“汉族西来说”。章嶽在讲述“人种”时,认为“华族”“即泛称为汉族者是,由西方迁入本部”。在“华族西来说”一节中,详述了华族来源诸种说法,如“高原说”、“东方说”和“西方说”。关于“西方说”,书中写道:“主是说者,为欧洲学者拉克伯里(Lacouperie),谓古代巴比伦,为华族祖国。当西历纪元前二二八二年,有那苛黄特(Nakhunte)者,率巴克民族东迁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盖即中史黄帝其人也。”作者列举了“纪时相同”“文字相类”“庶政相符”三个证据,认可中国人种来自巴比伦。<sup>②</sup>此书在民国成立后出了修订本,对中国人种起源还是坚持先前的“西来说”。

民国建立后,新编或重新修订的教科书也多坚持“中国人种外来说”。1912年赵玉森在重订《新体中国历史》中论述“汉人种”时写道:“此人种太古自西北而来,渐次移殖于东南方,蔓延中国内地。”谈到“人民的繁殖”时,认为“中国内地,人民繁殖之始,邈不可考。然约距今五千年前,即栖息黄河、扬子江之人民是也。是等人民,即苗人种和汉人种。汉人种由西北而来,居黄河沿岸。

<sup>①</sup> 刘师培:《中学历史教科书》,载《刘申叔遗书》(影印本)下册,第2178页。

<sup>②</sup> 章嶽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文明书局,1908年初版,1911年3版,“绪言”第9、11页。

苗人种由南而来，栖息扬子江沿岸，后渐繁殖。汉人种蔓延各地”。<sup>①</sup>中国人民是指居住在黄河和长江一带的人，这里的居民，不论是苗人还是汉人，都是由外地迁来的。《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写道：“华种起于西北方。五千年前，移居黄河两岸，渐次南徙，而繁殖于江河之间，分众部落，各戴酋长，无君主也。先华种而居中国者，为苗种。自华族移入后，势力不竞，日渐凋落，今湖南、贵州山中，尤有苗种之遗裔焉。”<sup>②</sup>这里虽未明言汉族来自何处，但非中国土著居民的意思是明显的。



图 9-1 汪楷《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1912

清末民初教科书中，在中国人种来源上大多持“西来说”（见表 9-1）。

① 吕瑞廷、赵激璧编纂《新体中国历史》卷 1，第 6~8 页。

② 汪楷、华绍昌编《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第 1 册，中华书局，1912，第 1 页。

表 9-1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种起源说

书名	编(著)者	相关叙述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丁保书	中国于黄河经流之处,有肥沃之地。太古汉民,由西北方移居于此。
中国历史教科书	陈懋治	汉人种亦客民也,其先来自西方,占有黄河近岸之地,渐驱逐苗种于南方,遂蕃[繁]殖于中国。
中外豪杰史读本		黄种之祖,厥推黄帝,名曰轩辕,生而灵异。帝本西夷,来自特亚,战争蚩尤,入主中夏。惟帝尚武,习用干戈,弹压土著,土客以和。
普通新历史 <sup>[1]</sup>	普通学书室	中国之文化,距今大凡五千年前,来自于西方而繁殖于黄河沿岸之汉始。
中国历史教科书	周世棠	吾汉族开化之早,距今已五千余年。近人考求其起源,谓来自西方亚细亚,越帕米尔之高原,游牧而入中国,先居于黄河一带,而渐次繁殖者也。
初等小学历史教科书	钱宗翰	中国距今五千年前,国民由西北移居黄河流域,人口渐繁。
高等小学历史课本	赵征铎	我中国为世界文明最古之国,文化之开,去今已五千年。而首创我国文化者,则为华种。太古时代,此民族由西方东迁,自黄河上游,次第繁殖于黄河沿岸。
中国历史教科书	陈庆年	汉族于上古最远之时,次第自西北方而移入中国内地。
共和国新历史	傅运森	太古之时,中国为苗族所居,其后有自西方来者,迁居中国,文化日兴,后世称其种类曰华,是即今之汉族也。中国曰中华,亦因于此。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	潘武	汉族移植黄河流域,起初纯为部落之制,厥后部落渐繁,互相吞并,其强有力者,遂结合诸部落而为之主,国家制而由此立矣。
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 <sup>[2]</sup>	章嶽、丁锡华	华种起于亚洲之西北方,当民国纪元五千年以前,自西而来,移居黄河两岸,渐次南徙,而繁殖于江河之间。
新制本国史教本	钟毓龙	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同出一原[源],皆由西而移于东。以今考之,其自帕米尔高原蕃[繁]衍于黄河两岸者,羲、农、黄帝之一支也,汉族也。由卫、藏入川、陕者,为氏、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为鞑靼,其后为匈奴、突厥等,回族之祖也。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相关叙述
中国历史讲义	沈颐	近世学者,研究亚洲人类之所自,计分二派:一则自美洲渡白令海峡而西,一则逾昆仑山而东也。前说即有所征,而去吾中国甚远,未必即与中国人种有关。故欲究中国人种所由来,毋宁从后说为可信。
历史教科书	杨喆、 庄启传	中华位于亚洲之东南。太古之民,略分二种:苗种初居本部,华种起于帕米尔高原,次第东来,渐繁殖于黄河流域。
注释白话中国历史教科书 <sup>[3]</sup>	冰壶主人	上古时候,首先据有中原的,是那苗族。我们汉族,是从西方帕米尔高原来的。沿了河流,从东西下来,拣那黄河两岸肥壮的地方,就此居住呢。起初人口还少,到后来慢慢的[地]繁殖;那么分了许多部落,大家推戴一个“酋长”,做他“渔猎畜牧”的事业。这是汉族入中国的起源。
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蒋维乔	太古之世,我国本为苗族所居。其后,汉族西来,占据黄河沿岸,日渐强盛,苗族渐徙于南方。
新撰初中本国史 <sup>[4]</sup>	陆光宇	汉族——其先来自帕米尔高原,沿黄河流域,渐次繁殖,吸收之种族为最多,代握我国文化之中心。

注: [1] 是书为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 1915 年版叙述相同。

[2] 另一种《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叙述相同, 见章嵒、汪楷、华绍昌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 1 册, 中华书局, 1913, 第 1 页。

[3] 会文堂书局, 1923 年 2 月初版, 7 月 4 版。

[4] 商务印书馆, 1925 年初版, 1928 年 48 版。

“中国人种西来说”在 20 世纪初年最为盛行, 1910 年代以后渐渐沉寂, 但是这种沉寂不是意味着“西来说”的消失, 而是得到了更多的认可。1920 年代教科书中, “西来说”的影响依然存在。1923 年的《白话本国史》就坚持了“汉族西来说”。在谈及汉族由来问题时, 吕思勉说: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著述, 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最为详博。”但是吕思勉认为蒋观云在《中国人种考》里所列举的证据还不是很可靠, 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吕思勉和前人一样, 从中国古籍中找来证据, 为之论证。吕思勉提供了两条“证据”: 一是关于“昆仑”的考证, 认为即今于阗河上源一带, 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 汉人西来之后, 还祭“昆仑之神”; 二是“汉族”的名称,

古称“夏”或“华”，“夏”在阿姆河流域，古代汉人，居住在葱岭河帕米尔高原一带，这里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吕思勉认为，“这两条证据，似乎都还严谨的”，“其说自极可靠”。<sup>①</sup>

1926年印水心的《评注国史读本》也对“汉族西来说”持肯定态度。该书对中国民族以及“西来说”的叙述，与钟毓龙的《新制本国史》相同。针对当时人们对“汉族西来说”的不同看法，印水心指出，“汉族西来之说，世人颇有疑虑，然研究古史与地质学至有关系。近世西人有潘伯赖者，在中亚细亚发掘地层，证明纪元前八千二百五十年前，该地土质膏腴，当为古代文化散布之地。后经地质上之大变动，骤变为干燥之沙漠。其地居民，不得不纷纷迁散，移殖于世界各地。此可为汉族东迁之一确证”。<sup>②</sup> 这里，不仅汉族来自西方，甚至整个“黄种人”都是来自西方。

“中国人种西来说”在清末民国前期被广泛认同，但到了1930年代，则被“土著说”代替。

### 三 1930年代后教科书中的“中国人种土著说”

“中国人种土著说”出现甚早。<sup>③</sup> 清季，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就采用了“土著说”：“支那开化甚古，较之亚细亚西南诸旧邦，最在其先。唐虞之世，距今四千一百余年，先于我邦纪元一千六百余年。汉人之祖先，既为土著之民，号称‘华夏’，本业稼穡，树艺五谷桑麻，织布帛锦绮，制陶器漆器，冶铸诸金，雕琢珠玉，

①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第14~15页。在《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中的表述基本相同，参阅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第1页。

② 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第1册，第5~6页。

③ 1862年法国人罗苏尔（Leon Rossomy）就开始倡导。1916年，英国人洛斯（G. Ross）著有《中国民族之起源》（*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一书，赞同罗苏尔的说法，认为中国人种为土著。英国人罗素（B. Russell）和韦尔斯（H. G. Wells）也认为中国文化为自己发生，独立发展，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参阅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61~62页。



营宫室，作舟车，设市场交易百货，有文书历算、律度量衡，诸大族各据城邑而为君长，谓之‘群后’，即‘诸侯’；而小者也，其数甚众，号为‘万邦’，而戴一帝以为宗主，谓之‘元后’，又称‘天子’，礼乐刑赏之制皆略备。”<sup>①</sup> 那珂明确指出汉族是土著居民，开化很早，较周边民族为先，汉族礼乐制度自成一系，文明发达，已经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但是那珂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中国人种土著说”才逐步确立。

在1920年代，部分教科书就怀疑和批评“西来说”，倾向于“土著说”。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在分析了“东来说”与“西来说”后指出：“两说都不免牵强附会。东来说取材于不可凭信的讖纬传说，更不可靠。西来说较为近情，然也不能必验。不过我们总得承认中国的民族一定经过了許多变化，受到外来的影响一定很多罢了。”<sup>②</sup> 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在“汉族之定居”中写道：“我国以汉、满、蒙、回、藏五族组成，均为东亚大陆黄色人种，其有史最早者，实为汉族。据可考之上古历朝都会所在地——如伏羲之都陈，神农之都曲阜，黄帝之始居有熊，继都涿鹿，可知汉族在立国之前，即定居于现今中国本部之黄河流域。平原沃土，乃资以发达其文化焉。”<sup>③</sup> 这里没有提及中国民族来源，但“土著说”的意味很明显，暗示中国民族是黄河流域的居民。在该书参考书中，金兆梓提及“西来说”，对之持明显的反对态度，认为“西来说”本身的立论就存在问题，而以中国的传说来附会，更不可信。<sup>④</sup>

① 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卷1，第7页。

② 顾颉刚、王钟麟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11页。

③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上册，第1页。

④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参考书》上册，中华书局，1926年初版，第2页。该书写道：“至汉族究是否为外来民族入居此土，抑为中国本部之土著民族，说着纷纷不一，而以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之说，最为近人所信。”金兆梓认为，“汉族西来之说，其持论殊嫌穿凿。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屈原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杨朱、屈原去古未远，言犹如此，可知尧舜以前，即中国固有之传说，且多附会，至以巴比伦为汉族所从来，尤不可信。惟汉族先居昆仑而后东下，繁殖于黄河流域，案之载籍，或可差信”。

在1930年代后，教科书则大多否定“西来说”，而肯定“土著说”。在《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中，金兆梓认为中国人种是土著居民：“由新石器时代遗存来说中国文化或民族由西亚传来，还不如说汉族是黄河流域的土著，中国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产物，比较上倒说得通。因为就算安特生的说法可以成立，也只有着色陶器还可以比附，但是要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要由这种远古文化来推断民族的由来，不能单由一样两样史料来比附，要将所有的史料综合起来看。照我看这些地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证明这种文化由汉族自行发展的证据倒比较的多。”<sup>①</sup>《陈氏高中本国史》否定了“西来说”和“东来说”，认为中国人种是土著居民：“因为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颇使学者有‘北京人’三字的结论：在冰河时期，中国已有人住着，中国民族的产生，并不比其他地方为迟——那么，西来说和东来说，便可付之一笑了。”<sup>②</sup>应功九的《初中本国史》比较了“西来说”与“土著说”，认为“西来说缺少真实凭据，还是土著说较为可信。现在发现有中国石器时代遗物，更是土著说强有力的证据”。<sup>③</sup>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认为“中国民族西来说”“不可靠”：“三十年前，西洋学者，有倡中国人种来自巴比伦者，国人喜其新异，多从其说，因谓中国民族，来自亚洲西部。其实西亚人士，自昔且有人民来自亚洲东部之说”，这些说法，“皆可反证中国民族西来说非实有证”。<sup>④</sup>罗香林与前面反对“西来说”的学者基本相同，即认为“西来说”存在着问题而不可信，根据考古发现而相信中国民族是出自本土。卢文迪的《历史》认为，中华民族是黄河流域的原始居民，确信汉人在史前就居住于黄河流域。<sup>⑤</sup>

① 金兆梓编《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上编，第30~31页。

② 陈登原原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8页。

③ 应功九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10页。

④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正中书局，1935年初版，1945年沪1版，第41页。

⑤ 卢文迪、丁绍植编《历史》第1册，中华书局，1941年12版，第6~7页。

1930年代后，教科书关于中国民族起源大多否定“西来说”，而主张“土著说”，见表9-2。

表9-2 1930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种起源说

书名	编(著)者	中国民族起源的叙述
初中本国史	朱翊新、 黄人济、 陆并谦	汉族在有史以前，早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的呢？这个问题，至今却还是没有解决。大概根据东西学者的推测，以“西来说”最为盛行，但因中国考古学上发掘事业极为幼稚，所以没有充分的证据，仅有国人的附会古书，西人的穿凿武断罢了。确实的证据，尚待未来考古学家的切实研究。 <sup>[1]</sup>
新中华语体本国史	郑昶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最初本繁殖于黄河流域，所以这里就从黄河流域一带的居民说起……
开明本国史教本	周子同	构成中国历史的七族，是否同源，是否由他处移植，在现在都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就汉族而言，欧洲的学者根据中国古代的文字、纪时、庶政等的考察，以为汉族的祖国或是巴比伦，而主张“西来说”；日本的学者则根据《山海经》、《述异记》等神话传说的记录，以为汉族从东方而来，而主张“东来说”。这两说，都不免于牵强附会，而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价值。最近在河南仰韶村及其他各处所发现的陶器，虽可为“西来说”的证据，但在考古学家没有一致的决定以前，也只好暂时存而不论。 <sup>[2]</sup>
高中本国史	吕克由	中华民族，到底是久居其土，还是从他处迁来的，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一时还不能回答。但是就使他处迁来，到三皇五帝时，亦为时日久。近来有人，因古史上载着黄帝时的文化特别发达，便说黄帝是从他处迁来的；又因古史上载着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而蚩尤与三苗，古书都说他是九黎之君，遂把古代的三苗，附会现今的苗族，说苗族是中国的土著，黄帝是客族，把他驱逐。这些话，都是不可信的。
初中本国史	何祖泽	中国的民族，是否最初就住在中国境内？这个问题经过许多人的聚讼。有人以为中国的民族，从他处迁来，尤其以从西方巴比伦迁来的一说，为最有力量。但近来经中西学者的详细推论，已知道此说是毫无根据。因而对于中国民族由来的问题，也渐多放弃外来说，而倾向于土著说。不过还待研究罢了。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中国民族起源的叙述
初中本国史	李云坡	关于汉族来源的问题,向有“东来”“西来”二说:“东来说”出于日本学者冈本监辅,他的根据出于中国古代的纬书小说,其荒诞无稽,自无一驳的价值;“西来说”出于欧洲学者拉克伯里,他以为西元前二二八二年,由巴比伦国中,率领巴克民族东迁的那苛黄特,就是中国的黄帝,所以中巴两国古代的典章文物,颇多相同之处:不知以中西年代相考,黄帝的时代尚早于那苛黄特西迁之时四百多年,则其余一切验证的均不足驳,自不待言。
高中本国史	钟月秋	中华民族,土著欤?外来欤?此问题在中国旧史界,甚鲜人注意。由近世欧洲人之越俎代庖,始成为问题。然各据一偏之见,揣测臆度,终无一至当不易之说,足令吾人满意。(该书列举了几种外来说,认为“谬种流传,不值一辩”)
初中本国史	姚绍华	组成中国的民族,称为中华民族,系由汉、满、蒙、回、藏、苗、瑶等族组合而成,其中有历史最早的,当推汉族。汉族的起源究在何处,现在尚未有定论;但是最早繁殖在黄河流域,这是事实
复兴教科书本国史	傅纬平	伏羲生在西方,都建在东方,后人因此做汉人西来说的证据。但是神农生歿都在南方,而建都在北方,难道不能做汉族南来的凭据吗?所以汉族究竟发源何处,无从知道,不过伏羲神农建都概在大河以南,可见那时黄河流域,已是汉人势力之区了。
余氏高中本国史	余逊	中国民族的来源,以前的历史学家,没有人注意到这点。自从明末耶稣会士掇拾汉族一二细微征像,与其他民族相比附,而有种种不同的推断。……异说纷纭,不能遍举。谨慎的学者,多不置信,其中惟[唯]巴比伦一说,最有势力。我国学者崇信此说,为文以牵合佐成之者甚多。但这说本身缺乏科学的根据,欧人早不置信。最近因河南甘肃新石器时代着色陶器出土,有几个欧洲学者研究它的花纹,认为与西亚所出土者相像,于是重将中华文化西来之说提出;但论据还不能认为健全。
新生活初中本国史	梁园东	住在黄河流域中部的,古代称为“华”或“诸夏”……这部分民族,可认为是中国的基础民族;传说的炎帝黄帝,都是这种民族。他们的来源,有说是四千二百年前从巴比伦迁来的,有说本是黄河流域的土著,更有说是东海岛民;这些都已不能确定。总之在上古时候,黄河流域曾住有独立的一部分民族,被称为“华”或“夏”,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不同,这是有的。

续表

书名	编(著)者	中国民族起源的叙述
高中本国史	白进彩	汉族究自何地迁至中国,则有东来西来二说。……东来说既取材于不可凭信之濛纬传说,自难确信。西来说虽较为近情,然无确证,其说亦不足恃。 最近西人在北平周口店发现人牙,定为五十万[年]前之人类。又在鄂尔多斯一带,发现旧石器时代之石器,定为五万年之人类遗物。足证有史以前,中国民族已生息于东亚,则凡主有史以后,外来说者,不攻自破。
高中新本国史	孙正容	(批驳和否定了西来说)我们现在为审慎态度起见,对中华民族起源问题,暂作[做]了这样的断语:在太古的时候,中国境内即适宜于人类的生长,“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可为明证;不过那时候的人,是否即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则不得而知。旧石器时代,华北一带已有很复杂的人类活动,但这些人 and 国族有无关系,也不得而知。至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据步达生博士研究,则和国族确属一派,这种推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了。
初级本国历史	宋延庠、 蒋子奇、 刘祖泽、 聂家裕	中华民族在什么地方起源的呢?无疑的是在中国本土,最早的发源地即在黄河流域,无论从考古学上或古史上记载,都有很确切的证明。

注: [1] 1933年朱翊新编著《初中本国史》持论相同。

[2] 在1934年《初中本国史》中,周予同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930年代后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人种土著说”得到了广泛认同。这个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兴起,特别是北京猿人的发现,使多数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 四 考古发现与“中国人种土著说”的兴起

1930年代“中国人种土著说”兴起的一个原因是1920~1930年代的中国史前考古发掘。史前考古发现,特别是旧石器时代遗迹的发掘,将中国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大提前。

1921年和1923年瑞典人安特生与师丹斯基(O. Zdansky)等人

发现仰韶文化，使中国文化研究延展到新石器时代。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在河套发现旧石器，把中国历史进一步延展到旧石器时代，使人们相信中国境内有旧石器时代人类寄居。1921~1923年，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附近发现人齿化石，称此种人为“北京人”。1928~1929年，步林（B. Bohlin）和国人裴文中又在这里发现了牙齿多枚和猿人头盖骨，称为“北京种之中国猿人”即“北京人”，时间推断为100万年以前。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发现，为人类起源于中国的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3年，发现周口店山顶洞，发掘人类化石很多，已可确定为真正之“人”，其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山顶洞的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发掘的第一处真人和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sup>①</sup>至此，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初期、中期及晚期，都有了代表者，为史前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sup>②</sup>

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成为“土著说”的基础，使坚持“土著说”的人找到了“科学”的证据。教科书中反对“外来说”和坚持“土著说”，基本依据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考古发现成为教科书一个叙述内容，“北京人”成为叙述重点。<sup>③</sup>一些教科书详细介绍了“北京人”的发现过程及其意义。《陈氏高中本国史》讲述了北京人的发现：“中国本不被人认为原初诞生人类的地方，所以论中国的民族，先有‘东来’‘西来’的聚讼。自从公元一九〇三年，德人在北平药铺中，购得化石，便决定这为类人猿。公元一九二五年，奥人某君，又在北平附近的周口店地方，掘得臼齿两枚，亦认为中国最古人类的骨殖。公元一九二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又在周口店掘出臼齿一枚。经专家断定，此是最古人类之一。于是人类学上变有了‘北京人’的名词。不但证明中国原有人种，而且决定以‘记载’

①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第186页。

② 参阅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第4页。

③ 参阅表8-1。

‘语言’聚讼‘东来’‘西来’之可晒了。”<sup>①</sup>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认为：“近世西人于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现人牙，定为五十万年前之人类遗迹，而内蒙古鄂尔多斯，亦发现旧石器时代诸器物，为五万年前人类遗迹。民国十八九年国人裴文中君等复于周口店，发现一百万年前之猿人头盖骨化石，学者称之为‘北京人’，更为世界人种始于亚洲说，增一有力证据。”<sup>②</sup>

一些教科书将“爪哇猿人”与“中国猿人”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猿人较爪哇猿人为早，从而认为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李云坡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北京人”至少是一百万年前的人骨化石，世界现所发现的无更古于此者。“由此看来，则中国北方各地，在数十万年或百万年以前，即有人类栖息，已有很确实的科学证据”。<sup>③</sup>蔡沔因在《初中新本国史》中写道：“原始人的遗骨，发现的以‘爪哇猿人’为最古。民国十年，我国北平西南房山县周口店地方，也发现了一种原人遗骨，定名为‘中国猿人’，比较爪哇猿人还要早哩。又在同地层中发现许多石器骨器，和用火烧过的动物骨骼和灰烬等。从这些研究起来，似乎火的发明，已在中国猿人时代以前了。经这回发现以后，一般学者就认定我国本土为人类发祥地之一，而且说他的骨骼和现在的北方人也有些相像。”<sup>④</sup>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认为：“北京人的年代较爪哇猿人还早。故谓中国成为世界人类的发源地。又步达生（Davidson Black）曾研究新石器时代甘肃史前人种的头骨，谓这种头骨和现在华北人种相同，叫做中华原始人，或即有史人民的始祖。”<sup>⑤</sup>缪凤林的《高中本国史》断言：“人类最古之北京猿人遂为科学界所公认，而中国且几进而为世

①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8页。

②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40页。

③ 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第6页。《新标准初中本国史》中表述相同，参阅李云坡编《新标准初中本国史》上册，第6页。

④ 蔡沔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第23~24页。

⑤ 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30~31页。

界人类之发源地。”<sup>①</sup>

和坚持“土著说”相联系的是，在一部分教科书中，中国人种起源已经不再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教科书先论述中国的史前考古发现，然后直接论述黄帝的建国，到尧舜和夏商周的历史，中国人种是中国原始居民之意是不言而喻的。这从教科书中的内容安排上可见，即在上古史的叙述上增加了史前史一节，从石器时代开始讲起，如前引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就用了一章的内容来介绍“太古之文化与社会”，分为“人类进化之程序”“中土之猿人时代”“中土之旧石器时代”“中土之新石器时代遗迹之发现”“中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社会”几个部分，从文物、考古、文献等方面来证明中国人种为土著居民。金兆梓在1930年代后出版的教科书中谈到“中华民族之起源”时，一般都是从“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开始叙述。就中国历史书写而言，史前史实是1930年代以后的新事物。教科书中新增的考古发现一方面拉长了中国历史，为历史书写增加了新内容；另一方面，其意在说明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此举实则是为因应同样以考古证据为支撑的“新西来说”而行的一种叙述策略。

然而，这期间的中国考古发现是否能够说明中国人种就是土著居民，还存有一定的疑问。正是因为此时的考古发现又产生了“新西来说”，引发了所谓中国彩陶文化与中国民族起源的争论。1921~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河南仰韶、辽宁沙锅屯和甘肃、青海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遗址，根据中国史前期的陶器与西方相似这点，认为是由西方传来。“仰韶陶器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安特生认为，“花纹样式，固不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属。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以为两地艺术彼此流传，固未可知也”。东西文化之相同，亦有可能是由东方流传到西方的，但是

<sup>①</sup> 缪凤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2页。



安特生断言是由西方传入东方的，“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著采之陶器，当由西来，非由东去也”。安特生由陶器的西方传入，推论中国文化亦来自西方，“陶器之术来自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输入”。<sup>①</sup>此说一发表，引起了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讨论。<sup>②</sup>

尽管安特生的“新西来说”不久就沉寂了，但从这点上可见，考古发现给出的人种起源证据实际上是双向的，存在争议。在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尚不能确证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时，教科书就否定了“外来说”而采取了“土著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民族感情的影响。

## 五 “暂行断定”“土著说”：考古发现与民族情感

“西来说”从出现之初就有人怀疑和反对。1920年代，在“中国人种西来说”较为流行的日本，就有不同的看法。京都学派奠基人之一内藤湖南就反对此说，称力倡此说的拉克伯里为“怪论家”。<sup>③</sup>中国国内缪凤林等人也对“西来说”进行了驳斥。缪是柳诒徵的弟子。柳诒徵对“西来说”向来持否定态度，在中国人种起源上提出了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出自多元，二是认为兴于山岳。<sup>④</sup>柳诒徵“土著说”之意是存在的。“柳说虽不无可议，然其持之有故，

①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转引自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59~60页。

② 关于“新西来说”的论争情况，参阅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57~64页。

③ 参阅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册，夏应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4页。内藤湖南认为，欧洲文化很早就从亚洲西南隅和欧洲东南隅开发起来，然后有系统地向各处普遍扩张，这是比较明显的。而西南亚洲的文化有系统向中国方面扩展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想从这一模式出发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人非常之多。例如，著名的怪论家拉克伯里是最为致力于此的。但总的来看是毫无根据之说。向西北方面来寻求中国文化的起源，想以通过大陆中心而来的道路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学说，是想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但实际上很难成立。

④ 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上册，第4~8页。

言之成理，为吾民族起源说，另辟一格。”<sup>①</sup> 缪凤林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两次著文反对“西来说”。缪凤林认为：“（一）中国民族，今日已有数万年之遗迹可考，籍为外来，亦必在数万年甚或数十万年以前，决非最近数千年内之事；（二）西亚民族之历史，较中国民族为后。由年代、种族、文化及地理上之阻碍等考察，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sup>②</sup> 缪氏列举了中国文明与古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文学、宗教、建筑和艺术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来反证中国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不同源性。文章指出，“西来说”出现的原因，是拉克伯里、白河次郎辈“一知半解”，中土学者不能审思明辨“惟知巧为附合”，而中国人信奉“西来说”，则是背宗忘祖，“奉西戎为宗国，诬先民而不恤”。<sup>③</sup>

1920年代，反对“中国人种外来说”的力作当属何炳松的《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何炳松根据法国人考狄（Henri Cordier）的《中国通史》，列举了西方人在中国人种起源上的种种外来说，同时也给出了反对的说法，并分析了中国人种起源问题产生的根源，认为西方人开始探究中国起源的用心就属不正：“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新说蔚起，天花乱坠，直至今日而未尝或已。遂予吾辈以人类无知与科学未备所发生之痴愚一种罕见之实例。”何炳松认为这是西方人借学术研究而行文化侵略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学者对这种“别有用心”的“外来说”不

① 刘紫萍：《中华民族起源之神话及学说》，《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1集，1937年8月。

② 缪凤林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两篇文章为：《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中国民族由来论》，《史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30年5月、第2卷第3~4期合刊，1930年9月。两文观点相同，后文是前文的扩写。缪凤林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中分析了“西来说”的两种情况，一是东亚所有住民皆来自西亚；二是汉族西来，后来征服原住居民而成为东亚的主人翁。缪认为，第一种情况是相信“西来说”而变本加厉，从那时的路途远近和交通情况的推测来看是不可能的。对于“汉族西来说”，缪亦从时代、地理、人种等方面进行了反驳。

③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

明就里、随声附和表示惋惜：“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洋学者之意外；而各种新神话之兴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国学者对于西说，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吞。遂至堕入此辈学术界‘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sup>①</sup>何炳松把人种起源问题直接联系到民族感情与帝国主义侵略上。从民族情感上驳斥“西来说”，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20年代，“中国人种外来说”遭到了否定。<sup>②</sup>

但是，要真正地驳倒“西来说”，确立“土著说”，必须从“科学”证据上入手。这时的史前考古发现正好提供了这种支持。在当时，如果说通过考古发现就能够解决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还为时尚早。其实，坚持“土著说”的学者亦清楚地知道，要拿出充分的证据还有待新的考古研究。朱翊新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在考古学发达之前，还很难确定中国人种起源，确实的证明尚待未来考古学家的切实研究。吕思勉的《复兴高中本国史》中写道：“民族最古的事迹，往往史籍无征。我国开化最早，又无他国的史籍可供参考。掘地考古之业，则现在方始萌芽。所以汉族由来的问题，实在还未到解决的机会。”<sup>③</sup>《余氏高中本国史》表示应该对中国民族起源说“存疑”：“要想确实断定中华民族是否土著抑或是移殖，还须待地下材料的继续发现。”<sup>④</sup>高彦博的《高中本国史》指出，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证明这种文化由汉族自行发展的证据倒比较的多。不过要确实的证明汉民族是黄河流域的土著，中国文化纯粹是汉族活动的成绩，自然还须地下史料续有所发现。<sup>⑤</sup>

- ①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1月。
- ② 参阅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64页。书中指出：“埃及说沦于荒唐，印度说出于种族偏见，印度支那说已自行放弃，中亚说范围广泛，不专论中国民族，新疆说无确证，甘肃说亦同，土耳其说与实际骨骼之研究相反，蒙古说亦未得确证。”影响最大的“巴比伦说”也被多数人认为是妄想。
- ③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8页。
- ④ 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0页。
- ⑤ 高彦博：《本国史讲义》（该书为手写本，无页码）。

需要注意的是，史家明知考古学证据尚不足以解决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但还是在教科书中批判了“外来说”而提倡“土著说”。金兆梓的《新中华高中本国史》认为：“汉族究竟是外来还是土著，现在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不过按以河北周口店有猿人头骨的发现，河套一带已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似乎黄河流域早就有人类繁殖。虽在河套遗址中没有人骨发现，但遗址上层固已明明有属于仰韶期的新石器遗存，似乎也不见得没有关系，也就可推想汉族不见得是外来的人种。而况西亚细亚到如今还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西来说尤其可以不攻自破了。”<sup>①</sup>周予同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汉族的来源，“在现在虽还不能确定，但汉族最早就蕃殖在黄河一带，那是不能否定的事实。据古书上记载，说古都都在黄河流域，再就近来考古学上的发掘说，河南山西等处时常发见史前时期的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而这些地方所得到的人骨也和现在中国北部人民相近。根据这些记载的和实物的证据，那么汉族最早就定居在黄河流域是无疑的了”。<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罗香林与金兆梓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指出：“与其轻信中国民族来自西亚，毋宁先假定其为发生于吾国本部，而再搜寻证据，致力于人类考古之学，或从事地下发掘，以为正确谫定为较愈也。”<sup>③</sup>金兆梓则提出“暂行断定”一说：“在没有其他地下史料发见之前，可以暂行断定汉族在石器时代，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主人翁了。”<sup>④</sup>

在中国民族起源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教科书的叙述是“暂行断定”，即否定“外来说”，坚持“土著说”。这里，民族感情的立场是显然的，“西来说”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反对“西来说”的

① 金兆梓编《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上编，第33页。

②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第1册，第11页；周予同：《本国史》第1册，第10~11页。

③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41页。

④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5页。

缪凤林和何炳松就是如此。李云坡的《初中本国史》指出：“此等外来诸说的动机，全在东西洋学者‘抬高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攘夺他种民族文化’的一种卑鄙心理，所以他们所主张的汉族来源，全与他们自己的本国相近，这是一望而知的。”<sup>①</sup> 罗香林对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汉族土著说”甚为痛心：“惜乎自十五万年前以上，至一百万年前猿人时代以下，其间凡数十万年，尚以发掘未周，材料未备，无以论述，为可憾耳。”<sup>②</sup> 缪凤林相信中国的考古发现会提供更多的“中国人种土著说”之证据，对“土著说”满怀信心：“民族土著之说，虽未能十分断言，继自今人类考古诸学，日益发达，地下之发掘日多，史前之遗存日出，或不患无谫定之一日也。”<sup>③</sup>

对中国人种起源问题从“西来说”到“土著说”的转变，中国史前考古发现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一般在谈到这一转变时，也都强调考古发现的意义。民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尚不足以完全解决中国民族起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科书就认定中国人种为土著，与民族情感有相当的关系。1920年代前后，已有学者从民族情感上反对“西来说”，而这时的考古发现，正给予民族情感有力的支撑。“土著说”在民族情感和考古发现的共同支持下逐步获得广泛的认同。

## 小 结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经历了一个对“西来说”的肯定、否定到“土著说”确立的过程。这从吕思勉、孟世杰等人态度变化上可见一斑。在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努力为“西来说”寻找证据。约10年后，吕思勉却完全改变了对“西来说”的认可，转而坚持“土著说”：“（汉族）为居住在中原地区之主要民族。

① 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第5页。

②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49页。

③ 缪凤林：《中国民族由来论》，《史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30年5月。

其语言、习俗、文化等，皆自成一體。此族初居黄河、长江流域，渐向南北西方发展。”孟世杰也是如此。在1931年的《初中中国史》中，孟世杰认为中国人种来自西方：“中国民族相传来自西方，顺着昆仑山脉，散布在黄河流域上游，次第沿河域东下。其后更因人口繁殖与势力扩张，逐渐发展至扬子江流域。”<sup>①</sup>在1934年的《高中本国史》中，孟世杰认为人类最初的诞生地在中国：“最近西人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人牙，定为五十万年以前之人类。又在内蒙鄂尔多斯一带，发现旧石器时代之石器，定为五万年以前之人类遗物。足证有史以前，中国民族已生息于东亚；则凡主有史以后，外来说者，不攻自破。”<sup>②</sup>对当初服膺“西来说”，吕思勉感到遗憾：“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立证据，为《周官》郑注，谓古代之祀地祇，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则昆仑为汉族古土可知。自谓所据确为雅言，迄今思之，郑氏此注，原本纬候。纬候之作，伪起哀、平，本不足言。据此议彼，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sup>③</sup>对“中国人种外来说”的肯定、否定到“土著说”的建立，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并非矛盾；相反，它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变化正反映了中国在危机中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

从中国人关注中国人种问题的时间来看，正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充满了亡国灭种的忧虑，“保国保种”成了很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做法就是去发现一个伟大的始祖，希望借此增强国人的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清末兴起的黄帝崇拜正是试图建构民族认同与民族自豪感的一种努力。<sup>④</sup>“一种独特的思想线索把黄帝与西方人联系起来”，寻找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寻求一种民族上的平等，而这时的“中国文

① 孟世杰编辑《初中中国史》上册，第15页。

② 孟世杰编辑《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6~27页。

③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8页。

④ 关于清季兴起的黄帝崇拜，参阅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载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22页。

明西来说”正好提供了很好的论据，“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种族平等得到了拉可伯瑞关于两者在古代近东共同起源理论的支持”。<sup>①</sup> 将中国民族的来源定于西方，认可“汉族西来说”，可以取得与西方民族平等的地位。“西来说”“反映出中国历史学者在体认到民族危机与挫折时，重新诠释本民族的起源以期望民族复兴的努力”。<sup>②</sup>

对“西来说”的认同，是危机中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寻求自信与认同的努力。同样，怀疑或否定“西来说”而相信“土著说”，也是重建民族认同的表现，但是，最终抛弃“外来说”而确立“土著说”，正说明了民族认同的建构实质。清末民初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并非是因为“西来说”有多少学理上的证据，而是出于建构民族认同的需要，因为“西来说”在民族危机中能够给中国民族提供一种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sup>③</sup> “土著说”的确立，离不开当时的考古发现，但要说明民国时期的史前考古发现，就能够解决中国人种起源问题，还为时尚早。“土著说”是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暂行断定”的，而这样的“暂行断定”实则也是出于民族情感的需要。从民国前期时人对“外来说”的批评来看，即使没有后来的考古发现，“外来说”也会被彻底地抛弃。

选择“西来说”或“土著说”都是为了建构民族认同，从“西来说”到“土著说”的转变也说明了民族认同另一个方面：

①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109~111页。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75页。

③ 如蒋智由认为，东来的汉族的先祖，皆为俊秀之士，实为优等民族，黄帝率这些优秀人士东迁，故到中土后，即可打败土著民族建立国家。“黄帝为英雄之主。”就中国的始祖黄帝而言，其威名则远在西人创世的摩西之上。从东迁的路程与难度来看，黄帝民族的韧性、勇敢、胆识，都远远超过摩西，“夫以青史轰名之摩西，世咸啧啧称其率以色列族出埃及而建犹太之国，为不可及之事。然其徘徊四十年卒不越红海之滨，即近日欧洲诸国殖民全球，然亦因蒸汽船之制发明，与恃其器物之利用，而人类始得以增一层之能力，孰若我种人于上古四千年，世界草昧，舟车未兴，而超越千万里高山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一大国。是则我祖若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其事业之雄奇，又直为他人种之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概”。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7号，1903年9月5日。

正向的民族认同尤其重要。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差异”，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必须有着自己特殊的大众神话和传统文化，要区分“我们”与“他们”，从而使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可以“民族成员”的身份互相认同。“差异是民族主义的生存之本。”<sup>①</sup>民族认同内含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与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以安全感、自豪感和独立意识。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受到挑战或质疑，在民族认同方面就会产生危机，由此可能带来迷茫和消沉而失去认同，这不仅是一个民族衰微败落的征兆，而且孕育着国家的危机。<sup>②</sup>清末的认同西方，尽管在当时可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但它是中国民族信仰危机的表现，终究会导致民族的迷失，会危及民族认同。相信“西来说”，“是在极力提高民族光荣与自信，当是毫无可疑”，但是，“中华民族西来说的出现，并不能表示思想进步，实际反映中国民族自信心丧失。其值得注意者，不在于观念之合理与否，而在于中国文化自信之破产”，“这种附会西方文化源流，表达中国民族原是来自西方具有同等优越条件的一种学说，则是完全建立在西方文化最优的信念之上”。<sup>③</sup>承认中国人种来自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正与“民族”基本意旨相违背，终究是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要重建民族自信心，必须回到本民族的历史中，发掘本民族历史的荣光，建构一种正向的身份感。

① 罗伊德·克雷默：《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载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8页。

② 参阅徐迅《民族主义》，第39~40页。

③ 王尔敏：《中西学渊流说所反映之文化心理趋向》，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67页。



## 第十章

#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中国民族叙述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时，在中国民族的认识上就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紧张：一方面是中国境内多民族并存的事实，另一方面是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大民族主义”与“汉族”的分野，在清末立宪派等人看来，要达到国家独立，需要各族的共同努力，反抗外来侵略。在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看来，要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强，首先要驱除满人的统治，光复汉人的河山。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还是各族松散的总和，甚至就是仅仅指汉族？如何从多民族并存的事实中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则是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者较为关注的事情。本章以教科书中的中国民族叙述为中心略做讨论。<sup>①</sup>

在“中华民族”的诸多定义中，费孝通的很有代表性：“中华民族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

---

<sup>①</sup> 民族叙述包括民族起源说，前一章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sup>①</sup> 费孝通勾画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一段时间内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的基调。<sup>②</sup> 将中华民族分为“自在实体”与“自觉实体”两个方面，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重要路径。本章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方面，通过呈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的不同表述，来揭示中国民族认知的发展与“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整体认同的建构过程。这对理解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很有帮助。<sup>③</sup>

## 一 清末引译教科书中的民族叙述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很少出现“民族”一词，是以“人种”来指代的。清末史家们都把民族作为历史的重要因素，很重视对民族的叙述。市村瓚次郎的《支那史要》在论述中国民族时，列举了五种人种：苗、汉、蒙古、满洲和回回。“苗人种当太古时，栖

-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1~2页。
- ②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第10~11页。
- ③ 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的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中华民族作为整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可参阅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喜所《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确立的初步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息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自汉人来自西北，渐及繁殖，遂渐逐之于南方。汉人种既斥苗人种，占有势力于支那本部。汉、唐为汉人种全盛时期。元为蒙古人种全盛时期，清为满洲人种全盛时期。”市村认为是这些人种造成了中国四千余年的历史。市村的论述强调了各人种在中国历史上的对等地位，特别是曾经统治中国本部、建立自己王朝的几个民族。对于汉人种，市村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是在最后预测了“汉人种之将来”：“满洲一统中原，成为一大帝国，中间有与汉人之争，又西北则受俄国蚕食，东南则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支那境内之人种竞争不止，当至于世界各人种之竞争也。”<sup>①</sup>在市村看来，汉人种的将来难以确定。

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以“亚细亚种人”来指称东洋历史上的各民族。亚细亚人种“于东洋史中一切事变，恒居主动力之地者”。亚细亚种人也即所谓黄色人种，包括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两类。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及西藏、后印度一带地，更细分之为三族：曰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西伯利亚人种，从东亚的北部，繁殖于北亚，其中有影响的有四族：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汉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东洋史中重要人种，西藏族和中国交趾族不是重要人种。<sup>②</sup>

桑原鹭藏是从整个东洋历史出发的，他所判断人种“重要”与“不重要”的标准，显然是看这些人种是否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在中国各人种关系的论述上，桑原鹭藏和市村瓚次郎的看法相同，认为汉族在东洋史中与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是对等的关系。尽管桑原认为汉族是东洋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种，播东亚文化之先声，但并不认为汉族在中国历史中占有主体地位，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的这些民族依次统治中国的历史。

在清人改编或自编的教科书中，这种汉族与其他民族“对等”

① 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卷1，第4~6页。

②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卷1，第6~8页。

关系发生了改变。《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在叙述中国人种时，列举了苗、汉、蒙古、满和回回五种人种。“苗人种最古，始居扬子江及淮水间”，“性皆顽陋，在诸种中最劣”。“汉人种充满支那各地”，“实为开创支那者，后世虽时有盛衰，然历代帝王，大抵由此人种而出，故于支那内地，大有势力，以今日论，实比他人种为最进文化，且富于智识也”。蒙古人种“性质强悍，好杀伐，近世以来迷信宗教，渐柔弱不可用”，此人种“近日颇皆为俄人所愚”。满人种“容貌体格，与汉人种略同，性质亦颇活泼”。回回人种“今日与汉人无异，唯宗回回教”。该书认为，“以上所述五人种，皆与支那历史上，有重大关系者也。其他若西藏人种、犹太人种、几尔其斯人种，其关系较鲜，略不论”。<sup>①</sup>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是支那少年从日本《支那史》改编而成的。《支那史》为日人市村瓚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的六卷本中国通史，《支那史要》是其缩写本。作为改编之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所举的人种与《支那史》相同，但在叙述上却有了很大的差别。首先，市村对各人种只是介绍，未做评价；支那少年开始了褒贬，除了汉族和满族外，其他几族要么与中国历史关系不大，要么就存在缺点。其次，在各族关系的叙述上，市村认为各族是对等关系；支那少年则突出汉族的中心地位，支那少年对各族的评说是以汉族为参照的，对汉族的关注明显上升，认为汉族优于其他民族，是中国历史的重心。

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在清末国人自编的教科书中极为普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不仅列举了中国人种，还叙述了“历代人种之沿革”。书中列举了汉、蒙古、通古斯、土耳其、西藏和苗族六种。曾鲲化称汉族为“本族”，认为“支那历史就是汉人种之历史也”。“我国之所以有今日”，都是汉族辛苦努力而得来的。“汉族祖先自帕米尔高原东来，经过西北地方，渐渐侵入江河中央要地，

<sup>①</sup> 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第5~7页。

把苗族驱赶到南方，而传播文化。”“汉族蕃殖于中国内地全部，世握帝王之特权。”曾氏把蒙古等其他五族一概称为“外族”，对于把当时的统治者满族称为“贵种”颇为不屑：“以小部落，一统数千年数万里大帝国。爱新氏百万人奴隶四百兆神圣华胄光荣赫奕之汉族。”至于这六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汉人种为历史大主干，其余五外族，皆骈枝也。枝干相乘，得历史之全局”。<sup>①</sup>这里，曾鲲化将汉族提升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其他各族处于辅助地位。

尽管《中国历史》具有明显的汉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曾氏还注意到联合其他民族一起与外国竞争，没有将其他民族排斥在书写之外。在稍后出现的几本教科书中，这种汉族主义的立场越来越明显，中国民族的叙述又发生了变化。

## 二 清末自编教科书中的民族叙述

在近代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当推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其在“人种”叙述上就与时人不同，只是提及了世界人种分布情况，不再列举中国境内各人种。在讲述“地之各洲人之各种”时，列举了“五洲之种族”，其中“居亚洲者，为蒙古利亚种”，“中国位于亚洲之东，而属于蒙古利亚族。此族之史，为吾人本国之史，本书所讲演者此也”。在谈到“中国种族之原”时说道：“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曰‘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此与欧人之以蒙古概吾种无异，均不得为定名。至称曰‘汉族’，则以始通匈奴得名；称曰‘唐族’，则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实皆朝名，非国名也。诸夏之称，差为近古，然亦朝名，非国名也。惟《左传·襄公十四年》引戎子支驹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

<sup>①</sup>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第18页。

服，不与华同。’‘华’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欤！”<sup>①</sup>从夏曾佑对种族名称的考订来看，其所谓的“中国种族”当然指汉族。夏曾佑这里只是提到了汉族，没有提及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

稍后刘师培的表述基本相同。1905年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凡例”中曾言及编辑此书的“注意之处”，第二项为“种族分合之始末”，显然，刘师培也注意到除汉族外，还有其他种族的存 在，但在讲到“中国人民”时，依然只指“汉族”：“中国人民，近世称为汉族，与亚洲之民同属黄种。”<sup>②</sup>接下来刘师培详述了汉族从巴比伦东迁的情况，驱逐苗民占据中原，对其他民族未及一词。

这一时期，同盟会等革命派与康、梁等改良派正在就“民族主义”展开论争，尽管康、梁等改良派对中国民族——“大民族主义”的叙述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在当时，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汉族主义更深入人心。这一点从夏曾佑与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中可见一斑。夏曾佑与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几乎同时，就夏与刘的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而言，二者殊有不同，但他们对“中国民族”的认识却惊人地相似，都认为中国民族就是汉族，对“中国民族”的介绍只是提及汉族，对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略而不论。

清末，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在中国民族表述上依然可见，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是如此。该书改编自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陈庆年认为一本好的史书，应该“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而桑原的《东洋史要》都具备，所以“今回易数字，加足片语”进行了改编。在改编过程中，陈庆年剔除了桑原原书中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介绍，只保留了汉族。“汉族于上古最远之时，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国内地。是等之民，约在五千余年前，已繁殖于黄河沿岸，分无数部落。”对于中国境内各族，陈庆年放在周代

①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3页。

②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国学保存会（原书未见版权页），第1页；另见《刘申叔遗书》（影印本）下册，第2178页。

讲述，提及“苗、夷、狄、戎”四族：“上古与汉族首先争竞者，苗民也。苗民即交趾中国族之一种，似先于汉族而蕃殖江河间者”；“今安徽、江苏北部，有淮、徐等夷。周兴西方，其威不及，故东夷常谋作乱。……及春秋之际，齐、楚、吴强盛，乃为所羸縻”；至于戎狄，则“经常侵扰中国，每逢中国势力衰落之际，西北戎狄就乘机寇边，侵暴中国，甚至不复可制”。<sup>①</sup> 传统的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主从、正统非正统关系在该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sup>②</sup>

从上面的叙述可见，清末的“中国民族”表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第一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从日本引译的教科书中，后两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清人自编的教科书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各族关系的表述。这一时期尽管有些史家列举了中国其他几个主要民族，但也只是分别对各族做了初步的介绍，对各族之间的关系没有叙述。在教科书中，也很少出现“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一词。这可能正说明了一个问题：作为包容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清末产生时，最初只是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认识，是否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成为多数人的自觉，实则未知。梁启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sup>③</sup> “中华民族”成为多数人的自觉，成为中国各民族的认同，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完成的。

### 三 民初的中华民族“一源说”

民国时期教科书中，都体现了民初“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认为中国民族不是仅仅指汉族，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

① 陈庆年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第8~9页。

② 黄东兰：《“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载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第154页。

③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13，第68页。

族的总体。在中国民族的表述上，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特别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各族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正是这些民族形成了新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认同，是在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完成的。

民国初年出版的教科书明确强调“五族共和”，对以往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批评，如钟毓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写道：“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本书以五族平等为宗旨，不存畛域之见，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详述之；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轻，借联五族之感情，得以融洽一气，共图卫国。”<sup>①</sup>以“五族共和”为指针，中国民族的叙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潘武的《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指出：“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是编于统一国土、融和种族，特为注意。”<sup>②</sup>赵玉森在《共和国本国史》中列举了中国六种民族：汉、蒙古、东胡、突厥、唐古特和苗，在对这六种民族的介绍上与清末教科书基本相同，但特别强调了这六族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sup>③</sup>在赵玉森看来，正是这六个民族共同组成了国家。是书出版于1913年。在1922年的《新著本国史》中，赵玉森对这种民族叙述又做了进一步补充，突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源性”：“世界上的人种，本来是同出一源，不过支分派别之后，各地方的气候不同，那容貌和肤色，也就有些不同了。现在全国的人民，因为移殖地点不同，有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族的区别。但是读历史的人，须知道虽有六族的名称，却如同一家的兄弟，真个是瓜

①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编辑大意”第1页。

② 潘武、章嵒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第1册，中华书局，1913，“编辑大意”。《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等叙述相同，见汪楷、章嵒、华绍昌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1册，中华书局，1913，“编辑大意”；章嵒、丁锡华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1915年11版，“编辑大意”；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实用历史教科书》第1册，“编辑大意”。

③ 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本国史》卷上，第2页。



彪绵绵，异常的繁盛，差不多要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你想合四万万的同胞，结成这伟大的团体，不是最光荣最幸福的么？”<sup>①</sup> 赵氏认为，中国各民族，以前是同出于一源的，之所以有今天的民族区分，是因为各族繁殖的地点不同，才有民族的差别。这六族出于一源，实为一体而不可分割。

中国民族“一源论”在民国初年教科书中就已经出现。《新制本国史教本》指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于一原，皆由西而移于东，年远地隔，遂相睽异。以今考之，其自帕米尔高原而蕃衍于黄河流域者，羲、农、黄帝之一支，汉族也；由卫藏入川、陕者，人皇氏之一支，其后为氐、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为荤鬻，其后为匈奴、突厥等，回族之祖也；其在东北之地者，有息慎，移徙当在荤鬻前，其后为东胡、契丹，为靺鞨，满、蒙二族之祖也。”<sup>②</sup> 中国各族都是出于一源，都是从西方迁入中国的，由于东迁的路线与繁殖的地点不同，也由于相隔的时代久远，才有今天的民族差异。类似的表述在 1920 年代依然可见。印水心的《评注国史读本》在“民族之迁徙”一节表述与《新制本国史教本》相同，认为汉、满、蒙、回、藏五族起于一源，然后迁徙中国内地，分为今天的各族。<sup>③</sup>

“民族一源论”是中国人在民族起源上的传统观念，两千年来，大家信从中国上古帝系的说法，以为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国民族出于一源。这种从《帝系姓》《五帝德》中的上古世系发展而来的“民族一源说”，主要是指夏商周古代民族出于黄帝一支。<sup>④</sup> 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以致到了 1920 年代，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一个标准，就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

①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上册，第 2~3 页。

②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 1 册，第 3~4 页。

③ 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第 1 册，第 5 页。

④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王煦华前言”第 8 页。

观念”。<sup>①</sup> 民国前期史家重提“民族一源论”，用这种说法来指称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起源。强调中国各民族出于一源，对于中国各族的凝聚和共同建设民国，无疑有重要的意义，相较于清末各族独立的民族叙事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民国前期的“民族一源论”只是相对于民族起源而言的，强调各民族在起源上的一种亲和性，对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而各族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来的“融合”关系，对建构“中华民族”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 四 民族同化：部分民族之汉化

中华民族“一源论”，对于调和各民族的感情和维护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很有帮助。但这种“民族一源论”也并不是受到全部赞同，在清末，主张联合各民族成为一个大民族的梁启超就不赞同民族一源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sup>②</sup> 各族是否有个共同的起源可能并不重要，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才是关键。“民族同化说”成为民国前期民族关系的主要叙事。

民族同化在民初的教科书中即有表述。这里以“五胡乱华”叙述为例。魏晋时期，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氐、羯、羌等兴起，进入中原，灭亡西晋，建立自己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或“五胡之乱”。<sup>③</sup> 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历来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评价。《共和国本国史》谈到铸成中国伟大民族的几个最重要时期，将“五胡之云扰”列为第四期：“第四期以五胡之云扰为桔槔，匈奴虽服，终有玄黄必战之思，且款塞处边，于吾族中原之文

<sup>①</sup>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第14页。

<sup>②</sup>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饮冰室合集》专集41，第4页。

<sup>③</sup> “五胡乱华”是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较为普遍的称法，本书沿用这一习惯说法。

化，究多隔膜。自五胡云扰，于是黄河南北，吾炎黄列代所经营之区域，吾千贤百圣所制造之社会礼俗，举为此诸族所亲炙。就形式上言之，小部分良不免破坏；而就精神上言之，则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触而相为转捩相为化合。于是五族之发达，又增进一步。凡吾国民，对前历史当感先民铸成伟大民族之劳，而思所以光大者也。”<sup>①</sup>“五胡云扰”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破坏，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重大意义，促进了民族间的“化合”。《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同化和汉化”为题对“五胡之乱”做了详述：“魏晋而后，文字愈华，丧乱愈甚，满、蒙、回、藏诸族，迭起交乘。汉族失败始于此。五胡之混合，亦始于此。惟满、蒙、回、藏诸族，本无文化，一入中原，辄慕汉族之文化而效之，舍其尚武崇质之俗以尚文崇虚，其根据势力又本不如汉族之厚。故不久仍为汉族所并，而受其同化。此则其得失之林也。”<sup>②</sup> 尽管五胡入主中原，汉族暂时失败，但最终五胡为汉族所同化。朱翊新的《初中历史》认为，“南方自经汉代开辟后，中原的文化，渐渐南下。三国的吴，建都江东，愈见开明。一入晋代，经五胡之乱，北方文化，遭异族的蹂躏，北方人遂相率南迁。他们到了南方，虽有轻视南方人之意，不肯弃其郡望，侨立州郡，但江南文化，却因此大盛。又因异族居中原既久，渐染华风；而北方人士，留仕异族的也非少数：这样，异族便大受华族的同化。到拓跋魏时，一切模仿南朝；北齐、北周的治制，又多为后世取法：这都是同化之明证”。<sup>③</sup> 此期在谈到“五胡之乱”时，开始注意到北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对“五胡乱华”的评价，清末民国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清末教科书认为，五胡进入中原，给中原的汉族人民带来了很大骚

① 赵玉森编纂《共和国国史》卷上，第49~50页。

②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15年再版，第57页。

③ 沈味之、朱翊新、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第5册，世界书局，1930，第81~82页。

乱，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破坏。民国成立后，对“五胡乱华”是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的，既看到五胡进入中原后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和破坏，又注意到其对中国民族形成的重要影响，“五胡之乱”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同化，加速了中国民族的形成，而后者渐渐成为评价的主流。<sup>①</sup> 从对“五胡乱华”评价的变化，可见民族观念的变迁。

这一时期所言的“民族同化”，实是少数民族的汉化，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中，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这种民族同化是单向的。汉族所接受的少数民族影响，主要还是南下的少数民族带来的战争和破坏。就少数民族的汉化来说，也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接受了汉族文化，汉化的只是部分少数民族。

民族同化的情况早被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倡导的“大民族主义”，实则以民族同化为基础。梁启超已经注意到中国一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中存在着“同化”的事实，“中国同化力最强，为东西历史家所同认”，正是民族间的同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sup>②</sup> 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列举了“组成中国民族的最重要分子”的八个民族：苗蛮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和百濮族，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无复有异点痕迹之可寻，谓舍诸族外更无复华族可也”。<sup>③</sup>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各民族都与汉族有着各种联系，在民族同化上，“大抵北虏之同化于我也，稍难；而东胡较易”，<sup>④</sup> “东胡”多已同化于汉族。

部分民族同化思想，在民国初年的教科书中多有反映。1912 年校订的《新体中国历史》就坚持了这一观点。这本由清末教材改编而成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中国人种时，举出六种“有关历史者”，

① 参阅刘超《“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事件、叙述与认同》，《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年第 5 期。

②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 13，第 76 页。

③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饮冰室合集》专集 41，第 13 页。

④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 13，第 76 页。

即汉人种、满人种、蒙古人种、回回人种、西藏人种和苗人种，其中满人种和苗人种已经与汉人种同化。<sup>①</sup> 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中提及构成中国历史的诸民族为华、苗、东胡、蒙古、突厥、藏、韩七族，“七族之中，华族是主要分子”。顾颉刚认为，华族泛指汉人、唐人，里面包含无数历史上被同化的民族。苗族在改土归流后与华族同化。东胡族即通古斯族，先后包括肃慎、鲜卑、契丹、女真等族，建辽、金朝、清朝，多数与汉人同化。蒙古族在宋末崛起，建立元朝。突厥族起源甚古，历史上的匈奴、回纥都属此族，该族是土耳其帝国的始祖。藏族即图伯特族，在宋时建立西夏，就其居住地来看，或许与苗族同出一源。韩族即今朝鲜族，自古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简直是中国文化的外府。<sup>②</sup> 顾颉刚特别注意的是各族与汉族的关系，在其列举的除汉族外的六个民族中，苗族、东胡族多与汉族同化；蒙古族、藏族和韩族也多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汉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民族同化角度看汉族与外族的关系，是民国前期的一种普遍认识。如安徽省1934年度初中会考试卷中，就有“五胡怎样同化于汉族”的试题，给出的答案为：“或杂居内地，濡染华风，久而遂变。或君主（孝文帝）羡慕华化，变其国俗。或异族杂婚，混一血统。或延纳士流，教其子弟国人。或分官门阀，以修国政。而更易姓氏、衣冠、习惯、政教，则数世而后，已不可复辨矣。”<sup>③</sup>

民国前期对汉族以外民族的表述上，注意突出民族同化，也已经意识到北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这时的“同化”，主要是指“汉化”，部分民族同化于汉族之中，促进了汉族的发展。这种以汉族为中心而排斥部分民族的做法，显然不是“中华民族”叙述的最

① 吕瑞廷、赵激壁编纂《新体中国历史》卷1，第5页。

②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12~16页。

③ 沈仲龙编《中国历史》，1936，第42页。原书无出版社，书后标注“南京中央大学沈仲龙发行”。该书为试题集，封面标明“初高中会考及投考、审计试县长试及邮务考试、高考普考及检考”字样。

佳方式。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建构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抵抗日本侵略，显得尤为重要。

## 五 民族融合：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1920年代以前的“民族同化说”只是承认中国部分民族与汉族同化，193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的同化被认为是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存在于各族之中。金兆梓的《新中华高中本国史》认为，春秋以前各未开化民族均被汉族同化，秦以后和汉族竞争的西北与东北各族多有被同化而加入汉族的。东胡族因北魏、北周、辽、金的汉化，早有大部混入汉族。突厥族因和汉族竞争最久，同化也很多。藏族和汉族交通最早也最久，因氐、羌的汉化而和汉族混合不少。苗族分生苗、熟苗，熟苗已同化于汉族。金兆梓认为，汉族中实在早有其他各族的成分，便是其他各族也往往自以为和汉族同出于一源。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都曾建国中原，汉族和其他各族都要受其统治，种族上的界限更是没有的，所以由这些民族做主干混合而成的现在的中华民族，实是历史上一种自然的趋势。<sup>①</sup>

周予同等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开明本国史教本》认为，构成中国民族的，最重要的是汉、满、蒙、回、藏、苗、韩七族。汉族是产生东亚文化的主族，在政治上虽几次被外族征服，但结果，征服者每每反被他们同化。满族大多数被汉族同化。回族与汉族发生关系最早，除宗教外，风俗习惯大部与汉族相同。藏族与汉族发生关系很早。苗族旧居于中国本部，生苗不与汉族往来，熟苗大抵被

<sup>①</sup> 金兆梓编《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上编，第6~8页。另见金兆梓编《高中本国史》上册，中华书局，1948年第34、35版，第4~7页。

汉族同化。韩族与汉族的关系很远很密。<sup>①</sup> 在周予同看来，这七族互相影响，组成中国绵远灿烂的文化。朱翊新的《初中本国史》指出，中国民族中最大的是汉族，数千年来吸收同化了很多民族，“到现在，合汉、满、蒙、回、藏、苗等各民族，合成中国民族”。<sup>②</sup>

在各族共同缔造中国文化这一点上，梁园东的看法值得注意。梁园东与先前的钟毓龙、赵玉森强调中国民族的“一源性”有所不同。民族一源性注重的是中国各族在起源上的同一性，而后则由于种种原因，分散为诸种民族，这种一源性的观点还是承认当下现实里各民族的差异。在《新生活初中本国史》中，梁园东认为中国民族在最初不是一个民族，但是经过长期的同化，尤其是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到今天已经互相趋同，混成为一个民族而不可分割。“中国人”包括华族、夷人、荆蛮、越人、闽族、巴蜀、百粤和其他一些人。中国民族是经过长期的兼并同化形成的，“据旧日历史家讲说中国人是‘炎黄贵胄’，仿佛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从炎帝和黄帝演下来的，其实这是错的。中国在最初已经不是一种民族，也不止一种文化；后来经过数次兼并同化，才并为一国，变成一族”。“‘中国人’这一个观念，虽在古代，已经不是很简单的一种民族，而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混合成的。民族既不同，他们的文化，当然也不同。现在虽然都已同化，不可分别，但作历史的研究时，首先即须分别清楚民族与文化的混合性，然后才可知道中国历史是许多民族互相影响传播创造出来的。当然不可以狭隘的眼光，认作是单元的，只有黄河流域的文化。不过当时黄河流域的文化，可以认作中国文化的中心，这却是可以的。”<sup>③</sup>

与先前史家注重的民族同化有所不同，梁园东更强调中华民族

①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8~12页。

②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6页。

③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2、5~6页。

的融合。民族融合是指各民族融为一体，其他民族不仅同化于汉族，汉族也同化于其他民族，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这在孟世杰的《初中中国史》中有明显的反映。该书专有“民族的融合”一节，详细列举了各个时期融入汉族的民族：“太古至唐虞三代，汉族与苗族接触，行内部之融合。降至春秋战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加入。三国六朝时代，匈奴、乌桓、鲜卑、氐、羌血统加入。隋唐时代，高丽、百济、突厥、铁勒、回纥、沙陀、党项、吐蕃、契丹血统加入。宋元时代，契丹、女真、蒙古及西域诸国血统加入。清时代，满洲血统加入。”汉族正是吸纳了各民族的成分而形成一个大民族。“民国成立后，所有域内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一律平等，当更易铸成伟大的民族团体。”<sup>①</sup>

卢文迪在《历史》中的表述则兼有民族“一源论”与“融合说”两种情况，即不仅承认中华民族是各族融合的结果，也承认最初的中国各族出于一源。“向来说中国民族的，往往以为是合汉、满、蒙、回、藏及苗、瑶等族而形成一整个中华民族。好像所谓中华民族也者，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民族混合而成。其实这些民族，当初本来同出一源，不过后来因所住地方的地利关系，开化有先后罢了。”与民初一些教科书的看法相同，卢文迪也认为，各族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居住地方的不同，但民族起源与民族特性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从他对各族名称的介绍中可见：“汉本朝代名，不必说。所谓满族，本是汉代时东胡人的后裔，东胡人便是黄帝子昌意的子孙。所谓蒙古族，本由蒙古地方得名，其人本为室韦，而室韦则是契丹别种，契丹又本属东胡族，那么也是室韦的后代。回本宗教名而非种族名。藏族则以西藏地方得名，其人本与羌族同种，羌为有虞氏舜的后裔。而三苗则是舜时和共工、驩兜及禹父鲧同为不服舜的四凶之一。瑶则自认盘古为祖先。照这样看，所谓满、蒙、回、藏、苗、瑶等族，原无一不和所谓汉族同出于黄帝——所谓有虞氏、夏后氏、有扈氏都出于黄帝。不过汉人大

<sup>①</sup> 孟世杰编辑《初中中国史》上册，第6~7页。



部居于中原。开化较早；而此等人则因散处于关东、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山中，开化较迟而已。”清代统一后，仍以早开化的汉人文化为中心，融合为中华民族。<sup>①</sup>

从上述对“中华民族”的表述可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首先在指称上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指汉族，而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在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叙述上，都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与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中华民族”具有了现代意义，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

## 小 结

本章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民族认知不断发展的过程。单纯从字面上也可感觉到这种变化。在近代中文文献中，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民族”一词开始广泛流行。<sup>②</sup>但在清末教科书中，多以“人种”来指代“民族”，很少出现“民族”或“中国民族”一词。一般认为，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时，“种族”“民族”“人种”等概念是纠缠在一起的，成了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人们共同体。<sup>③</sup>其实，清末以“人种”来指代民族，实际上是恢复汉人统治的一种叙述策略。清末“人种”是最容易被广泛接受的认同符号，其根源则是或显或隐的“排满”种族民族主义。<sup>④</sup>清季知识分子也注意到中国除了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但是认为这些民族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是把它们作为中国历史

① 卢文迪、姚绍华、范作乘编《历史》第1册，中华书局，1936，第2页。

② 参阅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网络版）；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参阅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110页。

④ 参阅金观涛《创造与破坏的动力：中国民族主义的结构及演变》，载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第132页。

发展的次要因素。<sup>①</sup>现实中“排满”革命的要求又使长期被压抑的“汉族意识”抬头，尽管有改良派倡导“大民族主义”，但革命党人“汉族复仇主义”仍在清季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把汉族的历史看作为中国的历史的看法相当普遍。<sup>②</sup>

如果回顾一下“五族共和”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不同际遇，或许可以更清楚地感知民族主义的叙述策略。“五族共和”是与“中华民族”一词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一词是在清末出现的，可能都是梁启超首先使用的。<sup>③</sup>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就多次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及了“中华民族”一词，当时所指为汉族。1903年，梁启超针对当时的“排满”论，提出“大民族主义”一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其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为此，梁启超提出要联合中国各族，组成一个大民族：“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这是所有“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sup>④</sup>这里的“组成一大民族”，实为后来民国“五族共和”民族政策的渊源。在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多数民族长期同化混合而成的。梁分析“中华民族”的混合特性，汉族长期吸纳

① 参阅施继辉《清末国史教科书上古史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第22页。

② 参阅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③ 参阅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④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13，第75~76页。

了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大多融化进华夏族。<sup>①</sup> 这时梁启超的民族思想尽管还存在着汉族中心主义倾向，但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要联合其他民族，组成一个大民族。但在当时，“立宪派”和“革命派”就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展开了论争，立宪派的“大民族主义”的主张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批评的对象。<sup>②</sup> 在清末，对中国民族“自在实体”的认知更多倾向于革命党人一边。

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中国民族叙述发生了改变。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论述，正是在“五族共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清季立宪派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则承载了认同“对象物”的功能。“五族共和”从革命党人反对的“大民族主义”到民国的民族政策，其中变化不仅很大，而且很“突然”。如果说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的话，那么民国肇始，如何建构一个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内的新的国家认同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前的“汉族主义”，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在当时显然不符合中国境内多民族并存的实际，也不利于团结各民族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历史发展要求建立新的民族形象与民族认同。标榜“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以“中华民族”来指代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模塑民族形象，重建国家认同。如果说清末还在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的话，那么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是由各族融合成的“共同体”则成为在教科书中不证自明的“常识”。<sup>③</sup>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先前关于“中华民族”的种种讨论全部纳入到一个新的融合各族的“中华民族”的认知下，

①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饮冰室合集》专集40，第13页。

② 参阅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32~55页。

③ 一些教科书直接以“中华民族的起源”或“中华民族的建国”为题。如金兆梓的《高中本国史》就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起源”为题，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和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都以“我国民族”为题；直接以“中华民族的建国”为题的有傅纬平的《复兴初中本国史》、朱翊新的《朱氏初中本国史》、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等。

并迅即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建构起一系列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与观念。

“五族共和”作为民国的民族政策，在民国时期就遭遇了质疑。宣称其为民族政策的孙中山本人，在1920年代前后就对“五族共和”这一提法进行了反思，并在多个场合对之进行了批评。<sup>①</sup> 1930年代，顾颉刚也对“五大民族”提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自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其血统错综复杂，其文化亦没有清楚的界限而是互相牵连的。“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顾颉刚详尽论述了其出现的原因和所导致的恶果，认为这种提法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sup>②</sup> 顾氏此文引发了抗战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有论者指出，从西方传入的种族（民族）知识，属于一种应用型知识，它可以建构近代中国的认同；也是一种基础性知识，它能对世界进行新的科学理解，种族知识具有颠覆性与解放性力量。<sup>③</sup> 对“五族共和”这一提法的不同态度，可能正反映了种族知识的多重影响。

诚如前述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作为“自觉实体”，只是近百年才出现的。“民族不是一个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sup>④</sup> “中华民族”一词在20世纪初出现之后，到民国时期逐渐被中国各民族所认同，其含义也被不断改写。这一历程可能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自觉”

① 参阅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75~84页。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原载《益世报》1939年2月9日，又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中华书局，2011，第94~106页。

③ 沙培德：《梁启超与晚清中国“种族”之概念化》，侯艳兴、张仲民译，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清史译丛》第8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02页。

④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0页。霍布斯鲍姆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候是被发明出来的。”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页。

的过程。从最初的汉族到汉、满、蒙、回、藏五族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再到今天的 56 个民族的共同体，从 20 世纪初诞生时起，“中华民族”就不断地被建构着，不断调适自我认同。当建构成为一种特定的意识时，建构的东西就很容易成为想象者认为真实的东西，进入想象者的观念与现实生活并起着重要作用，即使那些一开始怀有一定目的来创造这种想象的人，自己也迷失于这种建构之中了。<sup>①</sup>

---

① 如“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是主要生活于中华地域内，以中华文化为主要纽带而构成的包括汉族等 56 个民族以及世界华人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参阅萧君和主编《中华民族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 3 页。

## 第十一章

# 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民国 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

中国有编写前朝历史的传统，如何书写前朝的历史，关系到推翻前朝统治的正当性与新政权建立的正统性，对合法性的确立意义重大。民国是在推翻清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民族关系与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国结束了清朝的“异族”统治，恢复了汉人河山；结束了清朝专制统治，宣布实行民主共和。对民国政府来说，如何看待清朝历史，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也关系到政权合法性的确立。清史书写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有着政治问题的缠结。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统治方式与政策都与北京政府不同，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考察民国对清史的叙述，是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很好的路径。

清朝是中国旧式王朝的最后时期，中国开始由传统的王朝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清朝推动了各族间同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但满族对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统治也成为清末“排满”革命的理由，满汉关系问题是影响中华民族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推翻清朝统治后建立的政权，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如何书写前朝历史，维护自己统治？这给

民族主义带来何种影响？本章尝试以民国教科书中清初内政措施叙述为中心略做讨论。<sup>①</sup>

## 一 教科书中的清初内政措施叙述与清史

清史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一个叙述重点，基本上占据了1/4~1/3的篇幅。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清史的讲述内容，从潘武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与1932年初中课程标准规定中大致可见。《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是民国第一部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清史放在“近世史”中讲述，计五章，即：近世史概略；外侮时代，分三节——清之统一、清之中衰、清之征服近邻；改革时代，分六节——欧势东渐、太平天国之兴亡、外交之失败、宫廷之变故、最近之外交、清之亡；地理与外族；近世文明史。1932年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有：中西交通之渐盛与西学之输入、清代之勃兴、清初之政治及武功、中华民族之扩大、清初之外交与中叶之政治、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与中俄交涉、中法战争与西南藩属之丧失、中日战争与外力之压迫、维新运动之始末、八国联军之役、日俄战争与东北移民、清代之政治制度与末年之宪政运动、清代之文化与社会概况、清代之经济状况、本期结论。<sup>②</sup>从《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和1932年课程标准规定来看，清史包括从满族兴起到清朝灭亡的历史，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等多个方面；具体内容上，一般都叙述满族兴起、清初内政、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及清朝灭亡等内部事件，以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列强侵略中国的对外战争。

① 关于清朝历史与政治认同的研究，参阅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②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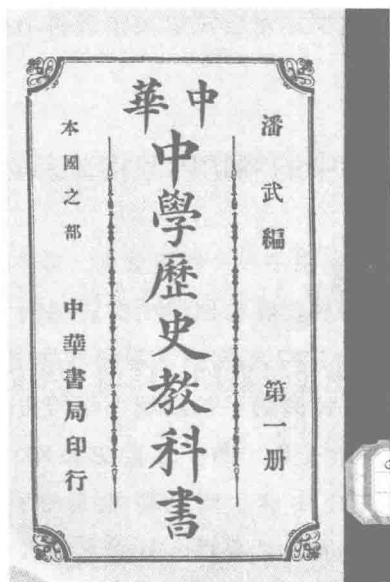


图 11-1 潘武《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1913

“清初”对清史有重要意义。民国教科书中，“清初”一般指从清朝入关到乾隆时期，其中又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主。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清朝稳固了在中原的统治，并且开拓了疆土，奠定了其后中国的规模。“清之创兴，自康熙至乾隆凡三朝，内平叛乱，外拓疆土，更征服四邻而定为藩属，斯为清代创兴之时，亦鼎盛之时。”<sup>①</sup>“清代以圣祖、世宗、高宗三朝为极盛时期，他们在政治上的设施，都影响于有清一代。”<sup>②</sup>

清朝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全盛，其后清朝的统治，与清初的政策密切相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三十余年间，是清代的全盛时期，亦是这种政策着着成功的时期。”<sup>③</sup>但是，在乾隆朝之后，清朝

①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3册，第67页。

② 杨人榘编辑《初中本国史》第3册，北新书局，1935，第42页。

③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1934年4版，第62页。



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有农民起义，外部有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国运开始了转折。“圣祖、世宗、高宗三世，正当清代极盛时期，政治上确有不少建设”；也正是在此极盛时期之后，清朝步入了“中衰”时期，“高宗一朝，为清代极盛时代，而祸机却已在那时潜伏”。<sup>①</sup> 清初各项设施对清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有重要影响，基本规定了后来清朝历史的发展方向。

民国教科书中关于清初的叙述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记述清初武功与疆域的开拓，如蒙古归复、征讨准噶尔、西藏和青海的内属、平定西南土司、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与俄国、西南诸国的交涉等；二是记述清初内政措施，主要是康熙、雍正和乾隆朝的内政措施，如清朝对汉人的政策，以及对蒙、回、藏等族的政策。<sup>②</sup> 清初内政措施直接关系到清朝的统治，与清初“康乾盛世”的形成以及其后的“中衰”、灭亡都有一定的关联，由于清初内政在清史的重要地位，大多教科书都有此方面的叙述。教科书对清初内政措施的态度，与对清史中其他内部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以及清朝灭亡等的看法基本一致，可谓反映了对整个清朝的态度。本章所讨论的清朝内政措施，主要集中于清朝对汉人实行的政策与采取的措施，讨论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 二 民初教科书中的清初内政叙述

民国成立后，一时没有大量适合需要的教科书，一些书局就对清末教科书进行改编，以供暂时使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的《新体中国历史》即是改编自1907年版。《新体中国历史》涉及清初的内容有“圣祖之经营内域”“圣祖之经营域外”“文字狱之繁兴”“西

① 陆东平、朱翊新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世界书局，1929，第189~190页。

② 有数种教科书讲述了清廷奖励黄教以安抚人心，如杨人樾编辑《北新本国史》下册，北新书局，1930年初版，1933年5版，第29页；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0页。

域之平定”“西南诸藩事略”“教党海酋及回部之乱”六节，清初经营主要讲述康雍乾三朝武功，内政措施集中在“文字狱之繁兴”一节中。书中叙述了三朝发生的文字狱，如明史之狱、南山集之狱、试题之狱、论史之狱、文评之狱、注经之狱、诗钞之狱等，特别提及清政府诛杀情况，如明史之狱：“《明史》为明朱国桢所著，庄廷铨购得其遗书，窜入己名，补崇祯一朝事，直陈清事无所讳。归安知县吴之荣方罢官，冀以告讦谋起复。事闻，戮廷铨尸，杀其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是狱株连共死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该书认为，康雍乾三帝为专制时代之雄主，钳制舆论，束缚士林，文字狱是清朝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三帝特兴用以制服国民巩固帝业者。专制进化，盖于斯为极端。”<sup>①</sup>

清末编写的教科书，主要叙述清朝的“仁政德泽”，没有对清朝的批评，也没有文字狱方面的内容。民初改编后，增加了对文字狱的描述，对清初内政的批评也集中在文字狱方面，视之为清朝专制统治的手段。1913年《增订普通新历史》《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改编本基本如此。<sup>②</sup>

民初新编教科书中，大多从压制与笼络两个方面批判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文字狱是叙述重点。《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从“满洲之崛起”“康熙之政策”“骨肉之祸”“文字之狱”四个问题讲述清初事迹，其中又以康熙朝为主。康熙“猜忌之心极甚，时明室遗臣著书立说，时流露其河山故国之思，帝竭力压制，遂构成文字之狱”。雍正与乾隆内政主要讲述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柟、曾静吕留良、胡中藻等文字狱。该书在批判文字狱之外，还讲述了清朝的笼络手段。如康熙知道人心终不可遏，乃设牢笼之术，开“博学鸿词”科，纂修《明史》，表彰理学。“于是逢时之士，争趋捷径，而士林皆靡然以一第为荣。”康雍乾三朝采取

① 吕瑞廷、赵激壁编纂《新体中国历史》卷6，第34、36页。

② 参阅普通学书室编纂，赵玉森增订《增订普通新历史》，第101~102页；陈庆年编纂，赵玉森增订《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下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1913年9版，卷7第14~15页。

这些措施，“以巩固君主权威”。<sup>①</sup>《共和国本国史》详述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认为文字狱是“专制积威之明验”，不仅“诛戮颇多”，而且限制了思想自由与学术发展，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当民国前三世纪至二世纪之间，正泰西各国各大宗学术昌明时代，我国国民则蜷伏于网罗机括之下，除词章考据外，不敢复有言论及思想之自由，而人才为之大绌。”<sup>②</sup>一些教科书专门叙述文字狱，从反专制角度进行了批判。<sup>③</sup>

民初教科书对清初惠民措施或有肯定。清朝入关后，取消明季苛捐杂税，废除一些行业的贱民身份，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这是清朝获得民众认可的手段，对巩固清朝统治有重要意义。《共和国本国史》指出康雍乾三帝“用宽猛互济之道”，示民宽大，减轻赋税，乾隆朝“一方豁免租赋，豁免赔累，增广赦条，起用废员，日下宽大之诏；一方又时惩治一二玩法大臣，通飭直省地方官，严禁四恶（谓盗贼、赌博、打架及娼妓）”。<sup>④</sup>《新制本国史教本》指出，康熙巡河工，减田租，除丁税；雍正减轻苏、松、嘉、湖重赋，将徽州等地世仆乞丐除籍为良；乾隆除广东、浙江渔户为良，“庶几仁政”。<sup>⑤</sup>《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中讲到，清初入关后，悉数取消明季加派，赋税征收以万历中叶以前为准，宫廷用度也很节俭，并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例。世宗整理盐课、关税，剔除火耗陋规。<sup>⑥</sup>清朝减轻

① 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2册，中华书局，1912年初版，1913年5版，第194、196页。

② 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本国史》卷下，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24年25版，第35页。在1922年《新著本国史》中，赵玉森也持同样看法，参阅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25年4版，第123~124页。

③ 参阅章嵒、丁锡华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9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1914年5版，第3页；潘武、章嵒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第6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1915年6版，第14页；汪楷、章嵒、华绍昌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6册，第1~2页。

④ 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本国史》卷下，第34页。

⑤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第3册，第79页。

⑥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第249页。

赋税、与民休息等措施，被视为清朝的仁政，得到肯定。

从民初教科书对清初内政的叙述可见，绝大多数教科书是从民主共和立场批判了清朝专制统治。一些教科书还叙述清初的惠民措施，表达了对清初内政的部分肯定。这种叙述立场，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生了改变。

###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清初内政叙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对清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金兆梓的《新中华初中本国史》有“满清盛时之控驭汉族”一章，从“猜防政策”“牢笼政策”“汉人满化政策”等几方面讲述清初内政。汉族不服满人的异族统治而时起反抗，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清廷使用镇压与牢笼政策两种手段来控制汉人。镇压方面，清政府在重要地点驻满洲八旗兵以防控汉人；大臣官吏多用满人，蔑视汉族；大兴文字狱，屠戮不满清朝统治的士大夫。为了永久消弭汉人的反抗之心，清朝竭力推行汉人满化政策，“清初剃发易服之令，最为严厉执行。汉人大为不服，大江以南，明之遗臣义士因人心之愤激，纷纷起兵反清”。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实行牢笼政策。康熙特开“博学鸿儒”科，奖励理学，编修《明史》，以消磨士大夫眷念故国之心。乾隆时搜求遗书，开《四库全书》馆，“而书籍之有民族思想，不利于清者，销毁之，其轻者则篡改之。及《四库全书》成，镇江、扬州、杭州各分一部，建阁贮藏，以便人民观览，实亦兼以范围江浙之人心也”。<sup>①</sup>《新中华初中本国史》从满汉民族关系角度对清初内政措施进行了批判，指出驻防、文字狱与剃发令等压制政策，以及开博学鸿词科、编修巨籍等笼络政策，都是为了控驭汉族，维护其统治。

从汉族立场批判清初内政措施，是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的基本

<sup>①</sup>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62、61~62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兆梓编写的数种中国历史教科书，持论与《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相同。

特点，以汉族为本的思想时有流露。<sup>①</sup>很多教科书以“满汉歧视”“满族之控驭”为题，从满汉民族关系方面批判了清初高压政策，如厉行剃发、诛锄明裔、诛戮降臣、摧残士气、仇视士绅、文字狱等，把这些政策视为对汉人的压制手段。<sup>②</sup>清朝惠民措施被视为清朝笼络汉人的一种手段，从汉族立场加以否定。《北新本国史》认为，清初“解放贱民，虽属三朝善政，然其用意，也就不外是一种怀柔的手段罢了”。<sup>③</sup>钟月秋《高中本国史》认为，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国，入关后之内政，自当以收拾人心为第一义。“故其所设施，俱不外乎减轻担负、俯顺舆情之筹络术”；“盖此时中原尚未底定，为缓和反抗计，故有此虚伪之举也”。<sup>④</sup>周予同的《本国史》指出，清朝通过惠民措施延续了统治：“清朝所以能够统一中国达二百六十多年，这也是重要的原因。”<sup>⑤</sup>对清初惠民措施，民初还有所肯定；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认为是为了消弭汉人反抗而采取的牢笼政策，其实质是控制

① 富兵：《1927～1937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初探（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1期。

② 朱翊新认为，清初政策为后来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这种措施，包含民族歧视的色彩非常浓厚，实为后来民族革命的因子。”（朱翊新、沈味之、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第6册，世界书局，1930，第25页。另见朱翊新编著《初中本国史》第3册，世界书局，1933年8月初版，9月再版，第19页）郑昶指出，“满清既然代替明朝统治中国，汉族多不服，几乎到处发生反动。清帝用种种政策来控制汉族”（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新国民图书社，1931年发行，1934年11版，第3页）。李云坡认为，清廷自入关以后，即想以刚柔并用、宽严相济的政策根本消灭汉人的反抗思想。清帝深知汉人为文化的民族，欲谋制服，亦须用文化的手段。所以清帝的提倡文化，是以怀柔汉人，巩固满族江山为目的（李云坡：《新标准初中本国史》下册，文化学社，1935年再版，第101～102页）。赵征铎认为，康雍乾三朝对于汉族猜忌防范之心很重，“既派旗兵赴各地驻防，又常借文字的细故，屡次兴大狱，以压制汉族的民气”（赵征铎编辑《初中本国史》第3册，民智书局，1932，第17页）。陈登原指出，清兵入关后，满汉民族不能协调。满族的文化本不及中国本土，因此实行屠杀政策与满汉同化，“以让汉人死心塌地”（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下册，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1935年5版，第160页）。

③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下册，第26页。

④ 钟月秋编著《高中本国史》，湘芬书局，1932，第359～360页。

⑤ 周予同：《本国史》第3册，开明书店，1947，第16页。

汉人，维护清朝的统治。<sup>①</sup>

对清初编修巨籍等文教政策，民初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完全否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吕思勉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态度可见一斑。吕思勉编著有多种教科书。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对康熙朝编纂《图书集成》、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们“与保存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sup>②</sup> 1924年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也持赞赏态度，“康雍乾三朝，敕撰书籍极多。乾隆时之《四库全书》，尤称近代之大观焉”。<sup>③</sup>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吕思勉态度一变，认为这是清廷控制汉人的笼络手段而予以否定。1934年的《复兴高中本国史》认为，清朝历代的君主，种族成见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倡尚文，一面表彰程朱，提倡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钳束天下；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屡次编纂巨籍，以束缚海内士大夫”。“但一面又大兴文字狱，以摧残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征求天下的藏书，写成六部。……看似旷古未有的盛举，然又大搜其所谓禁书，从事焚毁。”<sup>④</sup> 1935年的《初中教本本国史》指出，清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把明朝人的著述，涉及清朝的，都加以销毁。甚至涉及金、元的，也要追改。当时的禁书，共计有一万三千八百余卷，真是秦火以后，书籍的一次大厄了”。<sup>⑤</sup> 早先吕思勉肯定清修《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认为这是为了消弭汉人反抗意识，

① 参阅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3册，中华书局，1934年5月发行，6月3版，第13~14页；罗元鲲编著《高中本国史》第1册，开明书店，1935，第184页；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下册，世界书局，1934年修正版，1936年5版，第137页；孟世杰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226页。

②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33年国难后第1版，第255页。

③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第249页。

④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初版，1948年82版，第20页。

⑤ 吕思勉编著《初中教本本国史》第3册，中学生书局（原书未见版权页），第16页。

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摧残。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从汉族立场对清初内政各项政策都进行抨击，强调清朝对汉人的杀戮与压制，实际上对清朝统治持完全否定态度。

#### 四 共和政体与民初教科书 中的共和立场

从教科书对清初内政措施的叙述可见，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清朝可谓是态度一致而立场不同，都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民初从“共和”立场批评清朝专制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评清朝的民族压迫。民国教科书对清朝内部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清朝灭亡等的叙述，与清初内政叙述相同，也有着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转变。<sup>①</sup>这种叙述转变，对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演变有重要意义。

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同盟会成立时就宣称兴民权，创建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得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sup>②</sup>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强调去除专制政治，倡导民主共和：“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sup>③</sup>“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① 如教科书中“太平天国”叙述即是如此，参阅张希《历史书写与叙述政治——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1903～1952）》，载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历史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2版，第297页。

③ 《临时大总统誓词》，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完国民之志愿”。<sup>①</sup>《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民国废除帝制，宣布共和，是要摆脱“君权神授”的政治法统，通过“民主立宪”将国体从传统帝国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sup>②</sup>一时间，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帝制活动和张勋复辟等都因违背共和宗旨而失败。

民初在民族问题上注重五族共和。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位于边疆地区，国家统一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清末新政以来，部分民族就出现分离倾向。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与“恢复中华”宣传，使他们对民国抱有疑虑，蒙、藏等族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图谋独立。<sup>③</sup>为安抚蒙、藏等族，新成立的民国主张民族平等与五族共和。民国成立时，孙中山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起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sup>④</sup>《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五族共和与平等政策为北京政府所继承。《劝谕蒙藏令》宣称：“现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sup>⑤</sup>倡导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对吸纳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维护国家统一有重要意义。

民初教科书都强调“五族共和”。很多教科书叙述中国民族时，都

①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② 关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民族政治》，载陈理等主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第34页。

③ 参阅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77页。

④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⑤ 《临时政府公报》第52号，1912年3月30日，转引自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第106页。



列举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人种），认为正是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国家。养成共和国民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重点。民初修订的《增订中国历史读本》特地增加了民族团结的内容，指出中国各族“虽派别不同，而于历史上莫不有互相结合之关系，民国统一，一视同仁，将化除派别而达大同，无复种界之畛域”。<sup>①</sup> 赵玉森的《本国史》指出：“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sup>②</sup> 《共和国新历史》“旨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多，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民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民国肇建，合五大族为一家，故本书尤为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以资儿童观感。”<sup>③</sup>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写道：“本编成于民国建立之后，注重历史上之精神，一改从前之面目……而于专制之积弊，尤痛斥之不遗余力，务使已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于后生心目之中。”“绪论”进一步指出：“吾国从前之历史，乃君主专制国之历史，决不适于共和国民所研究者也。民国成立，历史革命，爰辑新历史，以供学者循诵焉。”<sup>④</sup> 民初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与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及教科书编写要求一致，都是持共和立场，突出共和精神的培养。

## 五 党国体制：政治认同与汉族立场

民国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变化时代，经历了从民初共和政体到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变更。国民党南京政权是在广州政权基础上，经过北伐推翻北京政权而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继承中华民国国号，但其政权性质与北京政府有很大不同。在广州、武汉时，国

① 吴曾祺编辑，赵玉森重订《增订中国历史读本》卷1，第1~2页。

② 赵玉森编纂《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43版，第2~3页。

③ 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新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20年72版，“编辑大意”第1、2页。

④ 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1册，“编辑大意”第2、1页。

民党就建立了党治体制，强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sup>①</sup>“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sup>②</sup>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党治，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sup>③</sup>党国体制的国体宣示是三民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政体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归属与国体所宣示的并不相同。这一政体的真实表达是主权在党的权力归属，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民名义上是主权者，实际却只能是被规训的对象。<sup>④</sup>

党国体制改变了国家、政府的属性，也改变了党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继承者身份成立，其正统性来源已非国会，而是革命领袖的遗嘱。<sup>⑤</sup>民主共和不再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党治”取代共和成为认同的中心。在党国体制下，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中心位置，国家成为党治国家，国民政府为党治政府。<sup>⑥</sup>党居于民族与国家之上，民族与国家处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在民族国家认同中居于首要地位，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成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为了维护统治，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党国体制“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2页。

②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其方略案》，载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658、659页。

③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80页。

④ 付春扬：《国民党党国体制：作为一种政体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72页。

⑤ 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63页。

⑥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3、167页。

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此前谈‘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sup>①</sup>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的诉求，都有可能引起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联想，危及国民党统治而不被政府提倡。共和立场不利于国民党统治而被放弃。

在民族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实行的是汉族同化政策。依“总理遗教”训政的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sup>②</sup>广州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孙中山反对民初的“五族共和”而主张“汉族同化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sup>③</sup>“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国民党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sup>④</sup>孙中山认为，北京政府实行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的政策，为一些民族分离要求提供了理由，这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也是国家不能真正统一的原因。从现实民族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民初五族共和的提法，实行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孙中山的汉族同化思想成为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

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更有利于维护国民党统治。孙中山反对五族共和，不只是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考量，一个主要目的是批评北京政府，以确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北京政府无法解决民族问题、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第531页。

② 参阅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82页；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第74～79页。

③ 《三民主义》，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页。

④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上的演说》，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4～475、473页。

无力维护国家统一，已经丧失了政权合法性与统治正当性；要维护国家统一，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实行汉族同化。孙中山汉族同化是以政治统合为目的，蕴含了“以党治国”体制的雏形。<sup>①</sup>汉族同化政策不仅与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紧密相连，也与国民党统治有很大关系，是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其全国统治的确立，国民党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这一政策。越是在国民党统治发生危机之时，南京国民政府越是会加速实行以汉族同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

党国体制下，维护国民党统治认同成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汉族同化因有利于国民党统治而受到重视，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实际内容。国民党统治与汉族立场兴起的影响，从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中汉族意识的不同态度大致可见。

## 六 民国社会中汉族意识的参照

汉族意识是清末“排满”革命的动员手段，对推翻清政府与建立民国有重要作用。民国成立后汉族意识还是否存在？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态度如何？考察社会与政府对汉族意识的反应，是认识国民党政权与民族认同关系的重要参照。

汉族意识在民国社会中一直存在。满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以来，推动了各民族间同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但其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满汉矛盾的确实存在。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与平等，清末“排满”的汉族立场因为不利于国家统一而被北京政府放弃。但是，清代以来的满汉矛盾记忆并未消失，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民众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的一个渊源。晚清的种族观念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就被注入教科书中，在民国成立以后渗透到更低的

<sup>①</sup>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81页。

教育层次，内化为青年学生的思想。<sup>①</sup>晚清种族观念给民国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人的爱国意识正是从种族革命出发，最早接受的正是反满种族革命思想。鲁迅在民国时代即大谈“排满”以改造国民性。<sup>②</sup>倡导民族统一的孙中山，一生基本未放弃汉族主义与民族同化思想。<sup>③</sup>清末的“排满”思想成为民国民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北京政府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与清史著述，也秉持汉族民族革命史观。<sup>④</sup>

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同时激发了汉族意识的兴起。当时中国遭到日本侵略，与明末汉族遭受满人入侵相比照，被视作自明末以来中国所受侵略的一部分。萧一山认为，近代史可将民族革命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清政府，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sup>⑤</sup>这三期民族革命有一定的连环性，其缘于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反满与反帝以及反对日本侵略是紧密联系的。1930年代的情势与民族主义者面临的任務，与清末颇多相似。面对日本的侵略与国内部分民族分离倾向，选择一个民众较为熟识的汉族立场，要比理论上论证中国各民族是一家更有利于唤起民众。晚清的“排满”思想与汉族立场重新兴起，用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排满”有利于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汉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觉醒”。<sup>⑥</sup>汉族立场由清

①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第147～148页。

② 参阅吴俊《论鲁迅的“排满”意识》，《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7期。

③ 参阅林齐模《从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④ 参阅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民国成立后，一些书局纷纷编写“排满”革命书籍，如《痛史》《大革命写真画》等，参阅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云五文集》第5集上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75～79页。

⑤ 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引论”第1～2页。另见萧一山《清代全史》第1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导言”第4页。

⑥ 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68页。

末“排满”工具转变为1930年代反抗日本侵略的工具。

在整个民国时期，汉族意识在民众观念中居于重要地位，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待这种汉族思想的态度截然不同。北京政府注重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在组织与文化上积极推进五族融合，对于社会与民众间的汉族意识，认为它们与“共和政体相违背”，伤害了“满汉间的团结情感”而将其废止。<sup>①</sup> 日本侵略与中华民族危机，要求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然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却强化民族同化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内民族分离问题与国家统一危机并未缓解，相反，随着日本的侵略却进一步加深。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抗战，关系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也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固。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加快汉族同化步伐，提出中国民族关系上的“宗族说”，认为中国只有宗族而无民族的差别，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宗族”：“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我们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sup>②</sup>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原先的一些边疆地区成为重要地带，国民党努力推行边疆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与地位，赋予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sup>③</sup> 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受到共产党的批评，这种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这种民

① 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322页。

②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载“国立编译馆”三民主义大辞典编审委员会主编《三民主义大辞典》上册，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第251页。

③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国立编译馆”三民主义大辞典编审委员会主编《三民主义大辞典》上册，第268、698页。

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sup>①</sup>

对待社会中的汉族意识，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态度明显不同：北京政府强调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抑制社会上的汉族意识；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叙述则采取汉族立场，利用和激发汉族意识，其中缘由，正与国民党统治建立、党国体制确立有关。政府的态度差异，在作为政府教育政策体现物的教科书中有明显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权更迭对民族主义的影响。

## 七 政治认同下的双重民族叙述

党国体制使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认同优先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改变了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为了争取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积极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将各民族融入汉族中；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历次会议和重要决议都宣称民族平等，扶持边疆民族自决。<sup>②</sup>这种方式使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存在一定的矛盾，影响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为了贯彻国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都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叙述。民国时期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民初以来就一直强调中华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苗等几大民族而成。《北新本国史》认为，中国“各民族大都为汉族所同化，其小部分未同化者，则系交通阻塞所致；他日建设事业发达，诸民族混为一体，同谋民族主义的完成，为历史上别开一新纪元”。<sup>③</sup>孟世杰的《初中中国史》将“民族的融合”作为编写的指针，认为各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中，已经没有区别，应同尽国民能力，以巩固国

①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47页。

② 赵学先等编著《中国国民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186~187页。

③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上册，第12页。

基，而发挥历史上的光荣。<sup>①</sup>何祖泽的《初中本国史》指出，中国民族的一个特点是民族与国家融为一体，“民族即国家，国家即民族”，汉族几千年来为同化他族的主体，所吸收的异族不下百数，从没有歧视他族的地方。中国在近代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自信力有些动摇，但是“只要扩充固有的宗族团体，组成民族的大团结”，将来的历史就会有进一步的光荣。<sup>②</sup>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多教科书直接以“中华民族”或“我国民族”为题来讲述。

1930年代的民族危机使教科书更加关注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叙述。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引发的中华民族危机，要求联合中国各民族共同抵御日本侵略。此时教科书中，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侵略的内容增多，注意宣扬各民族平等与融合，致力于凝聚全民族力量来抵御日本侵略。白进彩的《高中本国史》中写道：“中华民国，为六大民族所组成，即汉、满、蒙、回、藏、苗是也。……我国虽号称六大民族，而今已日渐同化，感休戚之相通，怀外患之日迫，泯除陋习，沐浴华风，中华民族之构成，是所企望于异日者。”<sup>③</sup>李云坡的《初中本国史》在绪言中特别强调，在中国民族关系上，“以为中华民族是个整个的，不可分析的，而特别注重其混合同化的史迹，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民族平等精神”。“今天中国六族”，“其间之混合同化，盖已无迹可寻，而成为一整个的中华民族。故在吾国今日，所谓汉、满、蒙、回、藏、苗，实不过历史上的方便名词，于民族实情，毫无所当，今日所益称者，只‘华族’二字而已”。<sup>④</sup>蔡沔因在《初中新本国史》的编写凡例中指出：“凡历代民族的融合，特别叙明，使知我整个的中华民族的由来，以启其团结一致的信念。”<sup>⑤</sup>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较为注重各民族团结，在1940年代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还将其

① 孟世杰编辑《初中中国史》上册，第3页。

②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上册，第7~8页。

③ 白进彩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6页。

④ 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编辑大意”第2页、“绪言”第4页。

⑤ 蔡沔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凡例”第1页。



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提出：“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之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sup>①</sup>

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叙述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叙述占重要地位，国家试图通过这种叙述来确立民众“整个中华民族”的观念；但需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叙述主要出现在“编辑大意”及“中华民族”总论部分中，在具体事件叙述上则持汉族立场。清史叙述的汉族立场，显然与中华民族要求产生了矛盾：不仅与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现实相矛盾，背离了融合中国各民族形成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要求，不利于加强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也背离了危机中的中国以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要求，不利于团结各民族以维护民族独立。汉族立场也与教科书自身关于中华民族的叙述相矛盾，背离了教科书中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教育要求。这种双重叙述与民族政策以及教科书本身的内在冲突，给国民党统治带来了多种影响。

这种叙述方式对维护国民党统治会有一时之效，但其中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双重叙述策略，将中华民族与汉族叙述混合在一起，以便模糊政党、政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造成一种复合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民众的民族认同转化为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是建立在混淆民族、国家与政党、政府概念之上的，当民族国家与政党政府产生利益冲突时，一般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就会与政治认同产生矛盾，民众会重新体认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质疑政府的民族政策，审视其制度依据，可能会连带地造成政党的统治危机。

## 小 结

关于前朝历史，民初潘武指出了可信度问题：“吾国历代史书，

<sup>①</sup> 《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77页。

大都修纂于一姓既亡、起而代兴者之手，故于前朝之失德，恒有指斥失实之处，而与其本朝有关系者，尤多讳而不书。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又曰：‘吾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信史之难得，自古亦然。”<sup>①</sup>类似的问题在民国编写的清史中可能也存在，相较于以往的传统王朝而言，民国时期不唯有内部的统治正统性问题，还牵涉到外部的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等问题，使得清史编写情况更为复杂。本章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清史叙述，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清史的叙述经历了一个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转变，这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有很大关联。梳理民国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还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内部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一般都注意到外国侵略的影响，从本章的讨论来看，更要关注国内因素。<sup>②</sup>政权变更与民族主义内部不同权力结构间的诉求变化，都会影响到民族主义发展。其中，国民党政权建立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尤为深刻。在共和政体下，民主共和是认同基础，共和国是认同对象，这时中华民族认同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在党国体制下，“党治”取代民族与国家成为最高的认同对象。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并未使国民党政府采取融合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政策，相反却强化了汉族立场以巩固党治认同。在外国侵略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上，外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往往转化为国内政治问题，内部政治问题的处理对应对外国势力影响起着关键作用。

① 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1册，“编辑大意”第1页。

② 内部因素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已为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参阅章清《“国难”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成长——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72页；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29页。

## 第十二章

# 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新文化运动叙述

发生于北京政府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深层次来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其影响及于文化与政治等多个方面。对于新文化运动，时人就有不同的认识。而同时期爆发的五四运动给新文化运动带来影响，人们对它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又有不同的看法。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很重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将之作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来源，试图将新文化运动叙述纳入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中。为此，国共两党都在重述新文化运动，赋予其新的含义。学界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国共两党如何叙述新文化运动？今天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本章尝试以民国教科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叙述为中心略做讨论。

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已有很多，一般是把新文化运动视为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既包括五四学生运动，也包括新文化运动。<sup>①</sup>相当多的研究都是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

---

<sup>①</sup> 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认识的研究，可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等等。

动当作一个已知量，较少注意到对两个运动及其关系的不同认识所产生一些问题与争论。实际上，人们对新文化运动有多种理解，对其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也有不同看法。探讨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理解及其原因，讨论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的关系，以及认识中国民族主义有重要意义。<sup>①</sup>

## 一 民国教科书中的新文化运动叙述

首先叙述新文化运动的，是1922年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这时出版的几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现代初中本国史》《初级本国历史》等，都述及新文化运动，影响及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 文学革命

1923年，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在“教育”一节中提到新文化运动。

民国五六年来，国内有一班学者提倡语体（白话）的文字，承认向来所谓的“官话”为“国语”，用他来著书作文，称为“国语的文学”。这个运动叫做“文学革命运动”。初起时，反对的人颇多；近几年来，这个运动日见胜利。各地用白话作散文韵文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后来教育部也命令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都用国语来代替古文。国民教育从此减少了一种文字上的绝大障碍；这件改革将来定可以促进教育的传播和效能；这

<sup>①</sup> 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不同解释，为一些研究者所关注，如罗厚立《历史记忆抹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读书》1999年第5期；耿云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但这些研究较少注意到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及其对新文化运动认识的影响。

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sup>①</sup>

从该书的章节安排来看，是将新文化运动视为教育领域内的事件。新文化运动即文学革命运动，也即白话文运动，发生于1916年或1917年，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国语代替古文的语体革命，这有利于教育发展，是教育史上一件大事。书中对文化运动的叙述较为简略，没有叙述其发生的原因。该书由胡适等人校订，也引用了胡适的说法，但没有提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陆光宇的《新撰初中本国史》也是将新文化运动视为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sup>②</sup>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些教科书也是把新文化运动视为文学革命。朱翊新的《初中本国史》即是如此。朱翊新将文学革命视为学术事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白话文运动的过程。科举废除以后，古文的残余势力还存在。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接着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提倡白话文，使用白话文遂成为潮流。五四运动后，“那时各地的学生团体，为便利宣传起见，所有印刷品，大都改用白话。应时出现的新杂志，也趋向一致。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地改变过来。文学革命运动，便宣告成功了”。<sup>③</sup> 新文化运动是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也即白话文运动。朱翊新的另一种《初中本国史》也持此论。<sup>④</sup>

文化学社两种的《高中本国史》都是从文学革命方面来叙述新文化运动。白进彩的《高中本国史》在“现代学术”一节中叙述了文学革命。“现代”学术以文学演变为最大，“文学上之革新，当托始于清末。当时之士大夫，略受西洋文学之影响，便打起‘诗界革

①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下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26年55版，第129~130页。

② 陆光宇编辑《新撰初中本国史》，第139页。

③ 朱翊新编著《初中本国史》第4册，世界书局，1930年初版，1933年订正3版，第95页。

④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91页。

命’及‘小说革命’之旗号。然所谓革命者，亦不过在文字中点缀几个新名词而已”。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此为提倡白话文学之第一声”。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他若钱玄同、周作人、刘复等亦均有声援之论文或通信，发表于《新青年》之上，而《新青年》遂为白话运动之中心。自后，白话之书报蜂起，逐渐普遍于全国，弥漫于文坛，白话不特为文学之正宗，且在中小学校中亦代替古文之地位”。<sup>①</sup>孟世杰的《高中本国史》指出，1917年胡适、陈独秀提倡白话文，《新青年》与《新潮》“皆以白话为文，文学上遂突起一种变化。八年‘五四’运动以后，各地学生团体，发行无数小报纸，内容全用白话。同时，产生了许多白话新杂志。九年，日报也采用白话。白话文传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随着教育部令国民学校国文改为国语，“国语教科书编辑大盛。国语运动，亦渐成熟”。<sup>②</sup>

民国一些教科书把新文化运动视为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主要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体改革，影响在教育或学术方面，其思想革命的意义则较少被关注。

### 思想革命：复兴传统文化

1923年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有“文化运动”一章，分“文化运动之动机”“新旧思想之冲突”“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社会问题”“欧美学术之输入与国故之整理”六节，把文学革命、国语运动、欧美学术输入、整理国故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新文化运动是清季以来文化运动的延续。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大背景是清季以来西方文化的输入引发文化的革新；直接原因是民国共和政体与国民精神不相适应。“中国之国民精神，二千年来本皆寄托于孔子。清季章炳麟以汉学健将，已将孔子之价值重新估定。

<sup>①</sup> 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57~360页。

<sup>②</sup> 孟世杰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604页。

青年学者对于孔子，本已不如前者之迷信。自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辅以钱玄同、胡适诸教授，遂致力于革新文化之运动，全国青年靡然从之。于时林纾以纲常名教之说责蔡元培，同时北京大学同学中亦有《国故》杂志，颇非难新文化运动。”<sup>①</sup>从金兆梓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来看，显然是指胡适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但就其过程来说，早在清末，就有章太炎重估孔子价值，并对青年的孔子信仰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革新国民精神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清末章太炎反孔的余续。

《初级本国历史》在关于文学革命、国语运动及整理国故的叙述中也持此论。如关于“文学革命”写道：

清代文学，本以桐城派古文为盛，末年更得吴汝纶为之后劲，严复、林纾出其门。严以之译西洋哲学书，林以之译西洋小说，然均尚词采，亦非方苞义法谨严之古文。梁启超矫之以流放，举古文之藩篱摧荡而无余，其文极有条理，清末颇风靡一时。民国初，章士钊出，以西洋论理学为基础，为文条理极精密，虽为古文，而实已欧化。古文之通变，于斯已尽其能事，然终以程度太高，不能普遍于民众。胡适、钱玄同等根本觉悟古文之不便于用，乃高张其文学革命之旗，以语体代古文，中国文学史上遂由是开一新纪元矣。<sup>②</sup>

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居重要地位，无论学界对新文化运动持何种看法，都相当重视文学革命的影响。金兆梓认为，文学革命也即白话文运动；不过，这种运动从清末就已开始，就文学革命所反对的古文而言，经过严复、林纾、梁启超与章士钊等人的改造，

①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下册，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1924年5版，第116页。

②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下册，第116~117页。

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已大不如前。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同样，国语运动的叙述也是从清末开始。白话文与国语运动的成功可能是文学与国语自身的自然发展，或者是朝野双方一致努力的结果。<sup>①</sup> 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在整个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并不特别明显。

金兆梓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书中介绍了欧美学术的输入情况，但更注重国故整理运动：

一方有人输进西方学术，一方又复有人整理吾国固有之学术。自清季杨文会尽力宣扬佛教，康有为复欲根据孔子为文艺复兴之运动，于是学者对于国故之整理，与清儒大异其趣。谭嗣同、章炳麟遂参合中印学术而立言。章氏所指尤深，实为承先启后之一人。自革新文化运动后，虽一方抨击中国旧有之思想，一方又实取国故而整理之，从新估定其价值。故老、孔、孟、荀、庄、墨等之学说，以至唐贤之佛学皆因以大明。将来整理吾东方固有之学术，参合欧洲输入之学术，本吾先民调和中印文化之精神，以成世界新学术，固非异人任也。<sup>②</sup>

新文化运动与清季文化运动的连续性，是理解金兆梓新文化运动叙述的出发点，而连接的途径则是整理国故运动。自清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输入西方学理同时并行的是整理国故，其中杨文会、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就采取新的方法整理国故，卓有成效。新文化运动以来重新评估中国传统，国故整理在前人基础上得以发展，倡导者认为借此中国文化将获得更大的进步，成就世界性学术。所以，新文化运动以新方法整理与研究中国

① 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

②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下册，第119页。



国固有学术，其本身不会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将带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些教科书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革命。姚绍华、罗元鲲借鉴了上述金兆梓的看法。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在“最近之学术”“最近之文艺”两节中讲述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与影响，持论与金兆梓相同，认为欧西文化的输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复兴：“自清末欧西文化的不断输入，我国旧有的学术文化，因受其激荡，量和质两方面，都有极大的进展。”<sup>①</sup>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中涉及新文化运动方面的有“新思想之发端及新旧思想之冲突”“文言语体之争论”两节，简要介绍了新文化运动的起因与经过，基本照抄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应功九的《初中本国史》也持同样看法。该书认为，学术界“以为复兴民族，必先检讨中国固有文化，以认识民族过去的光荣，并吸收西洋的科学文明以促进物质方面的创造力。于是有文化建设运动的发生”。“一面迎头赶上西洋的科学文明，一面将自己固有的文化从根本救起，以调剂中心文化，建设一种适于生之原理而适用于全人类的‘新文化’。”<sup>②</sup>

从上述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原因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新旧思想的冲突，内容不仅包括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还包括输入西方学理与整理国故，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 思想革命：反孔与民主、科学

与上述两种叙述不同，一些教科书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批判孔子儒学与旧道德、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革命。1923年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中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一章，文学革命即新

① 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4册，中华书局，1934，第85页。

② 应功九编著《初中本国史》第4册，正中书局，1936，第150页。陆东平《高中本国史》持论相同，参阅陆东平、朱翊新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160~161页。

文化运动。但是，这种文学革命不仅是白话代替文言的文体变革，而且是一次非孔、反传统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引起了思想界的新旧之争：

民国成立以来，国体虽早变更，而新旧思想的冲突，却处处呈露，不容讳饰。两度帝制的倏现，非法与合法的争执，便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不但政治界是这样，而且一般社会的思想也不免这样。各地人们的信念里还是尽量容留着祭孔、复古、扶乩等把戏，一朝有人出来高唱非孔、疑古、斥迷信的言论，当然要引起冲突了。新文学的运动，首先要打破因袭的思想，自更容易招人猜忌。所以那班反对的人，便狠狠地报以恶声了，于是激起了几度很激烈的暗潮，结果便有林纾与蔡元培的辩论。——这辩论便可代表一般思想界的新旧冲突。<sup>①</sup>

这里的叙述与同时期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有所不同。一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起因上，金兆梓认为是共和国体与国民旧思想的冲突，也即国民思想不合适新的国体而需要革新；顾颉刚认为是国民新旧思想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祭孔、复古、迷信与非孔、疑古、科学上。二是在内容上，金兆梓把文学革命、国语运动、欧美学术输入、整理国故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而顾颉刚只把文学革命视为新文化运动，把国语运动视为教育领域的事情，没有提及西学输入与整理国故。三是在方向上，金兆梓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顾颉刚认为是对中国传统和孔子儒学的批判。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些教科书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对孔子儒学

<sup>①</sup>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26年24版，第154~155页。王钟麒自编教科书的叙述基本相同，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29，第133~136页。

和旧道德的批判。梁园东明确揭示新文化运动伦理革命的性质。在《新生活初中本国史》中，梁园东指出：“最初为此改革思想运动的，为《新青年》杂志，《新青年》为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主办，每期最重要文字，多为批评孔孟及旧道德等作品，大为一般青年学子所欢迎，而诋他们的人直比为洪水猛兽。”白话文与新思想的结合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特征，白话文是一种形式，其实质内容则是思想革命：“按《文学革命论》的表面，虽仅为推翻古文学，建设新的白话文学的问题，然在一般人看来，尚不只是如此简单。”“主张白话文学的《新青年》杂志，带有推翻旧礼教旧道德及一切旧思想的色彩，斯为一般人所更形反对。而且实际上因白话文学的流布，使新的思想亦更为普遍，于是‘白话文’和‘新思想’，在当时几结合为一个观念。”<sup>①</sup>

吕思勉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民治”与“科学”原则。在《复兴高中本国史》中，吕思勉认为“新文学”与白话文的影响不限于教育，而及于思想：“此事于教育亦是很有利的。但其功用还不止于此。因为文学思想，本是人人所具。但是向来民众所怀抱的感想，因限于工具，无从发表，而埋没掉的很多。从白话文风行以来，此弊亦可渐渐革除了。所以最近的文学，确亦另饶一种生趣。”<sup>②</sup>在《初中教本本国史》中，吕思勉指出，新文化运动提倡民治与科学，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根本。“因为认识了科学的价值，所以肯埋头研究学问的人渐多，不再抱浅薄的应用主义。因为尊重科学的方法，所以有许多旧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因为认识了民治的价值，所以学艺要求普及于大众，于是提倡新文学、提倡语体文；又由教育部制定注音符号颁行；近来又颁布简体字，以求工

①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113~114页。何祖泽《初中本国史》的叙述也基本相同，参阅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下册，新亚书店，1932，第199~200页。

②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1946年44版，第249页。

具的简易。”<sup>①</sup>

罗香林指出“民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由他编著的《高中本国史》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为矫正国民意识起见，乃起而提倡以打破传统意识、建立科学精神为主旨”，“其初偏于破坏工作，而惟悬‘民治’与‘科学’二义为原则，其方法主张，先研究问题，后讲述主义。一时风起云涌，所提出研究者如尊孔问题、礼教问题、妇女问题、科学玄学问题、文学文字改革问题，浸假及于国学问题，皆有讨论，而其影响最巨者，则为文学革命之运动”。<sup>②</sup>正是因为提倡民主与科学，才有文学革命、国语统一运动、整理国故等运动。<sup>③</sup>

## 二 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

在民国教科书中，新文化运动是指1917年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并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教科书对新文化运动的“共识”；但是，对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却有三种叙述：文学革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革命；反孔反旧道德、主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革命。不同教科书在叙述新文化运动时，关注的内容往往不同，因而对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判断也不相同。如文学革命，或被视为新文化运动本身，或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手段之一；如国语运动，就有教科书不将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其中，又以对整理国故的分歧最大。对整理国故的认识不同，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吕思勉编著《初中教本本国史》，载《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下册，第1259页。这里依据1935年初版重印。1920年代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新学制高中本国史》都没有述及新文化运动。

②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正中书局，1945年沪1版，1946年沪28版，第285~286页。

③ 陈登原看法相同，参阅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27页。

1919年，胡适把新文化运动（新思潮）归结为四个方面：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sup>①</sup>此后整理国故迅速开展，胡适、梁启超等人参与其中，影响一时。但是，胡适、梁启超等人对整理国故的目的以及输入学理关系等看法不同，形成不同派别。<sup>②</sup>这在教科书中有明确反映。教科书或不述及整理国故，或侧重于梁启超一派，或侧重于胡适一派，形成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看法。

重视梁启超一派整理国故的教科书，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类教科书认为，整理国故从清末梁启超、章太炎那里就已经开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胡适的整理国故是清末以来整理国故的一部分，继承了梁启超等人的道路，目的是昌明国学，复兴中国文化。陆东平的《高中本国史》指出，新文化运动在输入西方学说的同时，“整理国学的工作，也极努力，而在哲学上的贡献尤多”。“实则自康有为尊崇孔子，为文艺复兴运动，学者对于国学的整理，与从前已大异其趣。后来章炳麟、梁启超又参合中、印学术立言，在国学上放一异彩。”<sup>③</sup>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在国学整理方面，“清末杨文会整理佛学，民国后，梁启超整理墨学，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其代表。<sup>④</sup>李云坡的《新标准初中本国史》认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胡适等人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吾国整理国故的热潮遂达高点，而旧有文化的渊海，乃得有点滴清理之望了”。<sup>⑤</sup>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注重梁启超与梁漱溟等人对中国哲学的整理：“今之治哲学者，或取中国旧有哲学而整理之，或就西洋哲学之精神，以介绍于国人。中国哲学——近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691页。

② 参阅曾平《“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不同路径》，《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刘黎红《“五四”时期两种整理国故活动的比较》，《东方论坛》2006年第3期。

③ 陆东平、朱翊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第160页。白进彩的叙述基本相同，参阅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59页。

④ 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85页。

⑤ 李云坡：《新标准初中本国史》下册，第196页。

今治中国哲学较有心得者，为梁启超及梁漱溟。梁启超以整理中国旧有哲学为主，梁漱溟则就中国、印度、西洋哲学，作比较的研究。”<sup>①</sup>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些教科书把传统文化的复兴联系到三民主义上，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助于确立三民主义信仰。1920年代以后，国民党将三民主义儒家化、道统化，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重要编辑傅运森（傅纬平）和金兆梓新编的教科书突出三民主义的文化革新意义。1933年傅纬平出版的《复兴初中本国史》与《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把新文化运动视为文学革命不同，增加了孙中山学说部分，并将之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国以来，西方文化和学术的输入，增进青年的思想，也让人迷惑，“只有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是斟酌中西古今，适合适宜，堪为青年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主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国固有的道德，必先恢复固有道德，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的地位”。<sup>②</sup>金兆梓1929年出版了《新中华初中本国史》，该书是在1923年出版的《初级本国历史》的基础上修订的，增加了“三民主义与固有文化”一节，把三民主义作为发挥中国文化真价值的寄托。<sup>③</sup>1937年的《新编高中本国史》指出在现代各种学术中，“至本其独到的见解，创为有体系的学说，以改正传统的‘知易行难’说及明儒王守仁‘即知即行’说，冀以矫正时人心理之趋向者，则有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sup>④</sup>前引陆东平、姚绍华、李云坡、应功九等所编著的教科书都持此论。

重视胡适一派整理国故的教科书，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批判旧道

① 罗元鲲编著《高中本国史》第3册，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1936年5版，第217~218页。

② 傅纬平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11月20版，第133~134页。

③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下册，中华书局，1931年25版，第122页。

④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12页。是书以1935年出版的《高中本国史》为基础编写，两书主要内容相同。

德、反传统的思想革命。王钟麒的《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认为，在当时地下发掘和科学方法影响下，国学整理的旗帜正式树起。对国学整理最有影响的，“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新发现”，如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和西域的简牍写卷、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以及史前考古发现等，这些使得国学“获有再造的生命”。<sup>①</sup>王钟麒把整理国故视为考古新发现与新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有一定的影响。《余氏高中本国史》也认为，“西学东渐，始于清朝末年，但中国学术界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利用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学问，则是最近十数年的事情”。书中介绍了当时的考古发现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活动。<sup>②</sup>《陈氏高中本国史》中特别提到胡适与顾颉刚等人用疑古态度来重订古史。“介绍民治、介绍‘赛恩斯’，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其余波且及于旧学的整理新探。”“旧学新估：综言之，旧学是在重新估量的程途上，非但是史学、考古学而已。重新估量的方法，不外乎整理与新探。前者如辑佚校勘，后者如翻案辨证，这方法在清季学者，虽曾开源导流，但胆大敢言，能信其所信，则系最近旧学中的特色。”<sup>③</sup>吕思勉的《复兴高中本国史》指出，近代研究者用科学方法整理旧学，所用的材料有时很旧，但结论与前人不同。“这才是中国学问的真进步”，“以补东西洋学术的不足，或者竟能别辟途径，出于现世界上所有的学术之外”。<sup>④</sup>这些教科书中所谓的旧学整理，实际上是对旧学与传统的批判。

在没有提及整理国故的教科书中，新文化运动往往被视为文体变革（文学革命），或对传统的批判。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周予同的

① 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下册，第141页。

② 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下册，第292页。1938年中等教育研究会编纂、华北书局出版的《高中本国史》，除了下册“现代史”“结论”部分不同外，其他照搬《余氏高中本国史》，其中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与《余氏高中本国史》相同。

③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30、329页。

④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1946年44版，第248~249页。

论述有一定的代表性。《开明本国史教本》指出，“当接受西洋的伦理思想之前，对于‘旧礼教’不能不有所攻击”，“从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继续发生以后，新旧思想的斗争随而激昂，西洋思想随潮涌入，其结果竟出于初期提倡的意料之外。到了最近，中国社会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不能闭关自守，就是思想方面也日趋于国际性”。<sup>①</sup> 朱翊新的看法与周予同相似。1933年的《朱氏初中本国史》与此前《初中本国史》把新文化运动视为白话文运动不同，重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整个的学术思想趋于新的动向；而对于解放女权，扶植妇女经济，打破一切不人情的陋习等事，尤为昭著。”<sup>②</sup>

整理国故是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关键。注重梁启超等人的整理国故，突出新文化运动与清末文化运动的连续性，就会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复兴传统文化。反之，不谈及整理国故，或只重视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多得出相反的看法，将其视为反传统的思想革命。对整理国故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也关系到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及其影响的理解。

### 三 整理国故与“反传统”：国民党 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认为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固有文化，一再批判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否定。<sup>③</sup> 胡适认为，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是由于国民党的专制及其民族主义。<sup>④</sup>

①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第171页。

② 朱翊新编著《朱氏初中本国史》第4册，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1934年再版，第83页。

③ 汪乾明、邹秀英：《论二十至四十年代初“五四”精神的认同与变异》，《史林》1999年第2期。

④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1929年9月。



胡适的理解总体来说大致不错，但对国民党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及其原因，尚需进一步讨论。国民党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因，不唯是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诉求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也不唯是西化与国民党民族主义的矛盾，更主要的是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言行与国民党把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合法性来源的矛盾。

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与国民党统治紧密相连。戴季陶把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相接，认为孙中山思想体系“不自西来，而发自中国固有之文化”，“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sup>①</sup>这种解释为蒋介石所认同。蒋介石声称“总理思想的渊源，实在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中国正统思想”。<sup>②</sup>三民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撑。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子儒学的批判，会动摇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基础，遭到国民政府反对。

新文化运动中，真正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基础的是整理国故。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民主与科学、“打孔家店”，主张重估一切价值，但是，这些主张与精神必须寄托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等具体行动上。如果说“打孔家店”这种口号与儒家化的三民主义相冲突，引起国民党不满的话，那么，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会从根本上动摇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基础，这是国民党不能容忍的。

胡适的整理国故与国民党尊重传统文化的要求背道而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从老子、孔子说起，不提黄帝和尧舜，把“三代”砍去了大半；同时，用“平等的眼光”来评判诸子，不

①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5，第36页。

② 蒋中正：《国父遗教概要》，载《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2，“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第123页。转引自陆宝千《中国国民党对总理遗教解释之确定》，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再版，第22页。

承认孔子儒学独尊的地位,<sup>①</sup>让时人觉得惊异。<sup>②</sup>稍后兴起古史辨运动,一个目标就是要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sup>③</sup>胡适与顾颉刚的国故整理与研究,与国民党所倡扬的三代“黄金世界”的观念相背离。

国民党反对胡适整理国故的一个表现,是在1929年查禁了由胡适校订的两种教科书:顾颉刚、王钟麒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和王钟麒的《新时代初中本国史》。<sup>④</sup>国民党查禁的理由是,这两种教科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sup>⑤</sup>这两种教科书反映了胡适、顾颉刚等人对古史的态度,也是他们整理国故的成果之一。国民党担心它们可能颠覆上古黄金观念而动摇民众的信仰,危及国民党统治。<sup>⑥</sup>

对于整理国故中的另一派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国民党也持反对态度。梁启超、章太炎等整理国故,被视为发扬国光,这正是把新文化运动当作复兴传统文化这种主张的立论依据。它与国民党保存国粹似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与国民党复兴传统文化的要求貌合神离。就国民党尊崇孔子儒学来说,章太炎、梁启超在清末都批评孔子与儒学,对儒家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后来陈独秀等新青年派反孔批儒,实为承续了他们反孔的传统。五四以后梁启超的儒学研究试图以儒家义理重构中国人生观,<sup>⑦</sup>与国民党尊崇孔子儒学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不唯如此,梁启超与胡适还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梁启超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解

①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序》,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5卷,第194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第53页。

③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01页。

④ 王钟麒:《新时代初中本国史》,分上、下二册。上册由胡适校订,1927年由新时代教育社出版;下册由胡适、王云五校订,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⑤ 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349页。

⑥ 参阅第十四章。

⑦ 江涓:《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放、思想自由等原则，并不独尊儒学，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sup>①</sup>梁启超等人的整理国故，在国民党看来，与胡适一样，也会危及国民党意识形态，因此遭到反对。

在国民党看来，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的整理国故，都可能会对其统治理论基础构成挑战。尽管新文化运动中存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解释，与国民党尊崇儒学孔子的做法相符合，是国民党利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途径，但是，复兴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整理国故，若承认新文化运动是复兴传统文化的话，就必须肯定整理国故，而这恰是国民党难以接受的。所以，国民党放弃了复兴传统文化的解释，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反传统的思想革命，尽管这与自由主义者及共产党的观点一致。

为化解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冲击，国民党需要对之重新阐释，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将之与五四运动放在一起，形成广义的“五四”认识。

#### 四 教科书中对五四运动及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叙述

今天的新文化运动，往往与五四（学生）运动一起讲述。因此，讨论新文化运动，还要联系到五四运动。本节即考察教科书中五四运动及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叙述。<sup>②</sup>

较早叙述五四运动的，是新学制时期出版的几种教科书。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以“五四运动”为题来加以叙述：

<sup>①</sup> 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sup>②</sup> 关于“五四运动”一词内涵的变化，参阅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本文使用的“五四运动”，在引述教科书时一般指五四学生运动；在指称一般“五四”观念时，指广义的五四运动，包含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

先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中国国民已大愤激，集合团体，不用日货；且倡救国储金，振兴国货以抵御之。海外华侨、学生亦电致政府拒绝。至是不得直于和会，群情益愤，五月四日，北京中学以上十三校学生，凡三千余人，以请愿为名，为示威运动；且请罢免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亲日派。全国学生先响应；商界继之，上海商店首先罢市，杭州、南京、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继之；工界亦有罢工者。政府知民意之不可侮，罢免曹、陆、章，日本亦知吾民气之不可侮，乃屡次交还山东权利诱我于直接交涉，国民复监督政府，不许堕其术中。<sup>①</sup>

《初级中学历史》是最早明确以“五四运动”一词来指称这次运动的教科书。该书对五四运动的叙述，与一般所言的五四运动基本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仅认为五四运动是反对日本侵略的运动，也是民众监督政府，内惩国贼，阻止政府卖国，即所谓国民外交的开始。1923年前后编写的几种教科书叙述基本相同。<sup>②</sup>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既注意到五四运动反对日本侵略的一面，又将之视为国民外交的开始，而后一点为很多教科书所强调。《北新本国史》认为五四运动后，“自是政府行动，屡受国民监督，而外交趋势为之一转”；“各地民众团体组织的发达与力量，更无形中形成为人民干政的趋势”。<sup>③</sup>《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中写道：“日本也知道我国民气很盛，加上美国方面对他的空气也很恶劣，仍旧想利用丧心病狂的北洋军阀，屡以交还山东权利的好听话，来诱

①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下册，第113~114页。1929年金兆梓《新中华初中本国史》中的叙述基本相同。

② 参阅傅运森编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高小）第3册，商务印书馆，1924，第38~39页；傅运森编纂《新撰历史教科书》第3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26年45版，第44页；张鸿英编《小学文体历史教科书》第4册，中华书局，1924年发行，1926年5版，第34页。

③ 杨人樾编辑《北新本国史》下册，第177、178页。

北京政府和他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国人也不像从前放任，群起监督着，不许再上当。”<sup>①</sup>何祖泽的《初中本国史》指出：“虽然山东问题，仍归失败，而国民外交能力的发挥，却从此发轫，在一部外交失败史上，实已放一线曙光。”<sup>②</sup>李清悚的《初中本国史》写道：“自后学生运动，屡次发生，为政治外交上有力的监督。”<sup>③</sup>

1940年代“国定本”《初级中学历史》中的叙述也是如此。《初级中学历史》中专门有“五四运动”一节：“当巴黎和会我国失败消息传来时，国人也晓得这次外交的失败，其原因不在代表，而在《二十一条》要求和北京政府与日本的借款换文，早上了日本的当，因此大家都集矢于主持《二十一条》交涉的曹汝霖、签订换约的章宗祥和经手日本借款的陆宗舆。”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以请愿为名，作示威运动，请求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同时抵制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全国学生先后起来响应，各省市商人、工人也相继罢市、罢工，援助学生。北京政府深知全国人民愤激异常，便罢免曹、陆、章三人来缓和民气，这就是所谓‘五四运动’”。<sup>④</sup>这里的叙述与前述教科书基本相同，五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政府罢免曹、陆、章的职务以及抵制日货，没有提及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的要求。

民国教科书对五四运动的叙述，把监督政府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五四运动只是反对卖国政府及日本的对华侵略，当时杂志、报章上的论文以及各团体所散发的传单，并没有明确提出‘打倒帝国

① 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第77页。

②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下册，第163页。

③ 李清悚、蒋恭晟编辑《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51页。一些教科书都有类似的表述，参阅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下册，商务印书馆，1926年55版，第134页；姚绍华《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41页；储祎编辑《北新历史教本》第3册，北新书局，1932，第30页；范作乘编《高小历史课本》第4册，中华书局，1940年108版，第9页。

④ 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辑《初级中学历史》第5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5年上海白报纸本1版，1947年75版，第36-37页。

主义’的口号。”<sup>①</sup> 其爆发原因，不仅是外国的侵略，还有本国政府的妥协卖国，因此，其意义不仅是对外反抗外国侵略，还有着对内的民主诉求。

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上，教科书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一是对新文学的影响。更多白话新刊物出现：“到五四运动发生，新刊物风起云涌，大都以语体撰著，文学革命遂普及于一般社会。”二是欧洲学术的大量输入与社会思想的剧变。“最初随文学革命的产生，偏重于西洋文学的介绍，易卜生、托尔斯泰、莫泊桑等作家的姓名流行于当时的学生界。其次，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哲学、教育学继续输入，杜威、罗素的来华讲演，尼采、柏格森的思想介绍，可为例证。又其次，随‘革命运动’的重兴，社会科学引起一般青年的兴趣，西洋各种社会思想都取得一定的信仰。”<sup>②</sup> 三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多教科书都持这种看法。

但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两个不同事件。从教科书中的叙述来看，五四运动是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二者明显不同。周予同指出：“在现在许多刊物中，每每将‘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而且说‘新文化运动’在领导着‘五四事件’，就当日客观的说，这完全是无意的错误或故意的欺骗。我们不能说‘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事件’，而只能说‘五四事件’扩大‘新文化运动’。”<sup>③</sup> 顾颉刚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五四运动，原是继续着前人反抗强权的步伐，并没有包含特殊的意义。”“在五四运动前，反抗强权是一件事，文化建设又是一件事，两者不生关系。……五四运动

① 王钟麒、宋云彬编《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下册，开明书店，1934年初版，1937年再版，第443页。

②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第169~170页。另见周予同《本国史》第4册，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1948年再版，第69页。

③ 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载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第178页。

后，大家知道反抗强权的基础是该建筑在文化上，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五四运动即与文化运动结了解不解之缘。”<sup>①</sup> 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亲历者，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鲁迅、周作人等也都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两个不同的运动。<sup>②</sup>

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对新文化运动有多种看法，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外交的开始，与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的事件。但是，在国共两党的阐释与教科书有所不同。

## 五 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阐释

关于国共两党以及自由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认识的研究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述。就本章讨论的新文化运动及其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来说，尽管国共两党与自由主义者在不同时期认识不同，但总的来说，第一，都是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反传统、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革命。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强调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共产党肯定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意义，“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sup>③</sup> 国民党批判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想，肯定其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就‘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精神而论，则当时所倡的所谓民主与科学，其要义绝没有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全部民权主义，就是讲民主政治的。”科学也是国民党一直重视和提倡的内容，“由国父与总裁的理论，可以知道本党如何重视科学，并如何运动科学”。<sup>④</sup> 第二，在新

①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3，第314~316页。

② 参阅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0页。

④ 中央日报社：《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载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第533~534页。

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关系上，两党都是以五四运动为中心来叙述。国民党认为，“‘五四’是一种思想运动，一种文化运动，也是一种爱国运动”。<sup>①</sup>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sup>②</sup>胡适有时也接受广义的五四运动的提法。<sup>③</sup>以上两点，实为一体两面，即一个广义的五四运动认识。

国共两党共同促成了广义的五四观念的形成。首先，突出五四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义。两党都把五四运动视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作为自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sup>④</sup>两党都突出五四运动反帝意义，忽略“国民外交”——监督政府的民主诉求。其中原因，一是与外国侵略的加深有关。1920年代，随着反帝运动的高涨，国共两党将五四运动与反帝救亡联系起来，重视其中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二是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有关。国民党以党治国，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统治，反对民众的民生诉求。<sup>⑤</sup>因此，忽视五四运动中民主的一面。其次，批判或忽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一方面，国民党要借助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抽象肯定其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诉求因为不利于国民党统治而被忽略甚至遭到批判。<sup>⑥</sup>共产党高扬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的一面，遮蔽与忽略其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意义，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遗毒”而遭到批判。<sup>⑦</sup>两党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扬抑，确立了五四事件在五四运动中的中心地位，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附属物，其思想启蒙意义被淡化。

① 中央日报社：《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载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第533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9页。

③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2卷，第283页。

④ 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67、15页。

⑤ 参阅第十一章第五节。

⑥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94页。

⑦ 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第26、31～35页。



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尽管一直肯定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但更多关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区别，强调政治运动与思想革命的差异。<sup>①</sup>但是，随着国共两党相继取得政权，在强大的国家话语面前，这种声音渐趋微弱。

国共两党的“五四”阐释，与教科书相较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上，选择了反传统和民主科学的解释。教科书中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多种理解，如文学革命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手段，被融入五四解释之中。复兴传统文化的解释，因为与整理国故的关系，被国民党政府放弃；主张反封建的共产党，更是突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意义，因此，这种解释被忽略。在国共两党的阐释中，新文化运动被单一化，其丰富性被遮蔽。二是在五四运动及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认识上，首先，突出五四运动的反帝意义，而国民外交民主诉求的一面被忽略；其次，将新文化运动纳入到五四运动之中，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附属物。教科书中关于二者是不同事件的看法被遮蔽。

国共两党的五四运动阐释，对今天“五四”认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种广义的“五四”认识，成为其后很长时间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认识的“范式”，很多关于这两个运动的研究都在此基础上进行。但是，这种认识只是表面上达成了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共识”，并没有消除人们的认识分歧。首先，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两个不同的事件结合为一体，使得这一名词本身充满歧义，造成了整个“五四”认识的内在紧张。其次，尽管新文化运动从属于五四运动，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其实际构成“五四”的核心：一方面，民主与科学——国共两党承认的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试图冲破帝国主义话语中“反帝”中心的压抑；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多样性解释并没有消失，随着社会形势变化而发挥影响。关于“五四”的诸多争论，实际上皆由此而起。

<sup>①</sup> 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序”第3页。

## 小 结

本章考察了教科书中新文化运动及其与五四运动关系的叙述，希望引起讨论的是，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与五四运动关系的多种叙述，如何被政、学各派诠释和运用，形成今天一般的“五四”观念，这种观念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研究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在国共两党以及自由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阐释中，整理国故都被忽略。一般认为，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不可逾越的一个步骤，<sup>①</sup>一开始就打上了新文化的烙印。<sup>②</sup>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等人，都强调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但整理国故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同：整理国故是梁启超等“保守派”复兴传统文化的基础，得到高度重视；对于胡适等“新派”来说，整理国故只是欧化的一个途径。因此，保守派或新派的整理国故，反映了其对于再造何种文明的认识。是否强调整理国故，强调梁启超还是胡适的整理国故，关系到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同一思路既可以支持从‘过去’中寻找思想资源的取向，也可支持反传统的取向。”<sup>③</sup>不谈整理国故的新文化运动，让人很难联系到复兴传统文化，自然倾向于反传统、民主与科学的这种认识。对整理国故的不同理解，是造成新文化运动认识差异的重要原因。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值得关注。

从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方面思考，可以增加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一是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下限。一般研究认为下限在

① 参阅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罗检秋：《“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第219页。

1920年代上半期。<sup>①</sup>如果把1919年兴起的整理国故视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话，那么，根据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情况，新文化运动的下限会推到1920年代末。实际上，这种看法也被民国一些史家所注意。<sup>②</sup>二是关于国民党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及内容。“反传统”被认为是国民党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原因，但如果进一步明确的话，国民党批判的“反传统”则主要集中在整理国故上。这从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的态度大致可见。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当初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等活动基本告一段落，而国语运动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此时整理国故正在进行，因对国民党意识形态造成了直接冲击而受到批判。因此，整理国故运动既是国民党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也是主要内容。三是关于整理国故运动衰歇的原因。一般认为，新旧两派以及新派内部的争论，影响到整理国故运动的深入，是其衰歇的一个原因。<sup>③</sup>其实，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值得关注，其反对是重要原因。

知识生产受到各派政治立场与利益诉求的影响，存在一种选择性。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把这种生产出来的知识作为不证自明的常识，从而影响到对认识对象的理解。现今的一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未对所使用的概念加以审视与限定，以致讨论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了解知识生产的选择性，还原和检视现今知识观念的形成过程，对自己的知识观念由“自在”转变为“自觉”认识，从而确立自己的立场，这是面对诸多“五四”争论可能采取的一种方式。

① 如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9页）、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第652~656页）、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6页）等。

② 参阅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黄山书社，2008，第4页。

③ 参阅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07页；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第127页。

## 第十三章

# 帝国主义话语与中国近代史书写

1840年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以武力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其后，美、法、俄、日等国纷纷来到中国，或以炮舰等军事手段，或以威胁诱骗等手段，强迫中国签订大量条约，中国被割占大片土地，支付大量赔款，损失了很多权益。对外国侵略与压迫中国的情形，时人有不同的认识，其中又以1920年代帝国主义话语兴起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帝国主义话语兴起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叙述的重点，使中国历史书写发生了变化，对人们的历史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章以帝国主义叙述为中心，考察帝国主义话语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帝国主义话语的意义及其对近代中国记忆的影响；二是帝国主义话语进入历史书写后，中国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变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关系到政权更迭与合法性的建构。<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中国帝国主义话语的研究，可参阅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王栋、龚志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马建标《冲破旧秩序：中国

帝国主义话语也改变了中国历史书写方式，对认识历史书写有重要意义。

## 一 帝国主义话语与历史教科书编写

“帝国主义”一词是近代以来的产物，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国家殖民开发时期出现的，指一国对他国进行控制与实行霸权的政策。1917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成因及其本质，其后，很多人使用“帝国”与“帝国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sup>①</sup>“帝国主义”一词输入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1895年中国翻译日本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一书，“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引起关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报刊上开始出现较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文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sup>②</sup>

中国帝国主义话语的兴起，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最早将“反帝”作为明确的政治口号与奋斗目标提出。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到帝国主义与军阀，认为二者互相勾结，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sup>③</sup>1923年中共“三大”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要求。<sup>④</sup>此后中共一系列文献均采用“军阀”

---

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尹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 ① 参阅温丽娟《国外帝国主义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1~2页。
-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57页。
- ③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36页。该决议案提出的要求共7点，此为前两点。另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8页。
- ④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8页。

“帝国主义”作为思想表述及革命动员的中心词，规定国内的革命对象为“军阀”，国外的对象为与“军阀”勾结的“帝国主义”。<sup>①</sup>

受到苏俄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国民党也将反对帝国主义作为重要纲领。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把反帝反军阀作为主要目标：“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sup>②</sup>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帝反军阀：“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sup>③</sup>在国共两党的宣传鼓动下，“反帝反军阀”成为国民革命与北伐的重要口号，“不平等条约”一词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被使用。<sup>④</sup>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指针。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编写的重点。<sup>⑤</sup>1928年金兆梓的《新中华初中本国史》在“编辑大意”中就特别指出：“研究本国历史的任务，在明了我民族种种过去之重要事迹、如何延续的演化以致有今日之现象，俾得根据之以努力于病的方面之补救、及好的方面之发展；故本书所取史材，一以关合于现今之时代精神者为准。”“自海通以来，吾国历史，几无一不受世界大势之影响，而创巨痛深者，

① 王建伟：《“反帝”口号与苏俄问题：1925年底的一场争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

②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代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8页。

③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代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11页。

④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第12页。

⑤ 在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中，“民族主义”就特别注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历次课程标准制订中都有明确的体现。参阅第三章。

尤其是帝国主义之侵略，本书于此等处，特为注意。”<sup>①</sup> 在 1932 年的《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中，金兆梓重申这一编写立场：“本国历史趋势的推移，实以国际上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其最重要之关键。”“本书下编则注重帝国主义势力之侵入及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术之影响与流变，以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及现代社会之趋势。”<sup>②</sup> 中华书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都注重突出帝国主义的侵略。

商务印书馆等书局编写的教科书也是如此。商务印书馆的《新时代本国史教本》认为，课文的撰集着眼于整个民族的立国精神，故对于历来朝代的界划和帝王的传统，并不受其拘束而依代表各时代的时代精神为指归。该书取材方面，在古代则注意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制度风俗的由来，在近代则注意帝国主义的侵入和国民革命的发展。<sup>③</sup>《北新本国史》指出该书的目标在于阐明中国政治经济变迁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者的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sup>④</sup> 文化学社的《高中本国史》在谈及编写方法时指出：“近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情形，叙述更详，使学者彻底明了我国目前之危机，借以研讨应付之方策。”“对于近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叙述不嫌其繁，使学者了解本国国民革命之背景，及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sup>⑤</sup> 世界书局的《初中新本国史》指出该书的唯一目标在于叙明中国历史演进的程序，并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性，借以引起学生研究历史的兴趣和爱护国家的观念。其中对帝国主义做了特别强调：“叙述历代受外族压迫的抗争情形特详，借以激起其爱国信念，使努力于雪耻工作，以谋我民族的复兴。”<sup>⑥</sup>《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指出该书一个目标为：“现代史与吾

①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 1 册，新国民图书社，1928 年初版，1932 年 13 版，“编辑大意”第 1 页。

② 金兆梓编《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上编，“编辑大意”第 1 页。

③ 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上册，“编辑大意”第 1 页。

④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上册，“编辑大意”第 1 页。

⑤ 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例言”第 2 页。

⑥ 蔡洵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上册，“凡例”第 1 页。

人关系最切，叙述亦较详，而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以及抗战建国事业之进行，尤着重申述，借以唤起学生爱国的热忱。”<sup>①</sup>

从上述可见，帝国主义话语兴起于 1920 年代，受共产国际与苏俄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与口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写，都很重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突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帝国主义话语在中国近代历史书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二 帝国主义话语与历史书写：以鸦片战争为例

帝国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有一个过程。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较早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是 1903 年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国与国文明相等，各不能肆膨胀之力，于是均以帝国主义，日经营组织于和平之中，吸彼文明，导我进步。”<sup>②</sup> 这里的“帝国主义”，主要是强调其经济属性，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民初的教科书，有的认为“吾国现势，有几全由近数百年之外交所支配，故本书于此等处特注重其所以失败之因缘”，<sup>③</sup> 但没有提到“帝国主义”一词，也未提及列强的侵略。1920 年代后，帝国主义话语开始在中国兴起，并影响到中国历史书写。本节以鸦片战争叙述为例，讨论帝国主义话语的兴起与中国历史书写的变化。

在清末，鸦片战争被视为中外交往中一个普通事件。市村瓚次郎的《支那史》以“鸦片烟之战”为题做了介绍：“英吉利国，明时即通支那。清圣祖世宗时，来广东贸易，自是输入鸦片烟颇多，流毒极大。高宗仁宗二朝，前后再烧其函，其输入益盛。宣宗时，输入三万四千函。湖广总督林则徐疏论其害，帝以则徐为广东总督。”林则徐广

①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编辑大意”第 1 页。

② 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第 2 页。

③ 金兆梓编《初级中学历史》上册，“编辑大意”第 1~2 页。



州禁烟引起英国人的不满，英兵遂进兵中国。英兵占领镇江后，南京大震，于是和英人议和。“帝初主战，至是知不可，乃起伊里布，与钦差大臣耆英，共赴英军议和，英等见英将，定条约七章，出银二千六百万两赔偿鸦片金，割香港为英国管辖，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港为互市场，互通俘虏，且约勿得擅刑英人。于是和议全成，两国均解兵。”<sup>①</sup> 这里提及《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领事裁判权等内容，但没有分析其影响。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中的叙述基本相同，<sup>②</sup> 中国自编教科书的看法也与日本教科书类似。<sup>③</sup> 清末教科书中大多认为鸦片战争是清初以来中国诸多对外交涉

① 市村瓚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第6册，桥本海关译，教育世界社，1903，第29~30页。

② 《东洋史要》对鸦片战争做了简要介绍。如江宁议和：“英索偿金二千一百万，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互市，割香港，用敌国礼，清诸帅闻英人扬言将攻城，皆胆慑，概许之。约禁鸦片章程，反一语不及。英人大喜，率船去。”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卷4，第77页。

③ 姚祖义的《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做如是描述：“英人自与互通商，其商货大宗，首推印度之鸦片，流毒日盛。道光时，林则徐上书，请申禁，宣宗嘉之，命林则徐任其事。则徐至广东，严谕外国商人，尽出所藏鸦片，焚之，且约后有犯禁者，罪至死。各国皆允。而英商尚有私售者，则徐以故禁其通商。于是英人愤激，突率兵舰犯广东。则徐战守甚固，英军不利，改犯他省。朝廷忽归咎则徐，竟革其职，更命琦善至广东议和。琦善尽撤各地之兵以媚敌，然其议仍不协。英人乘我无备，再犯江浙，东南大震。道光二十二年，复遣使至江宁议和，偿巨款，割香港，且开上海、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五口为商铺。是为《江宁条约》。”姚祖义编辑《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2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06年6版，第37~38页。姚祖义的高小《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叙述基本相同。

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林则徐禁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等为题来讲鸦片战争。如写南京议和：“复用伊里布、琦善驰援请和，遂令璞鼎查于江宁为盟书。其略曰：中国焚英鸦片，偿银二千六百万两，以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厦门为英国交易之区，香港永归英国。中英官吏，以同等交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下册卷7，商务印书馆，1909，第15页。

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把“鸦片战争”放在“欧人东渐”中。“欧人东渐”分三节。一是元代后欧洲人的东来，西方的算学、天文、炮术等输入中国，中国的罗盘针、印刷术等也西渡彼地，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荷兰人据台湾；二是与俄交涉，定《尼布楚条约》；三是鸦片战争：“欧人东来，与我通商，已非一日，然未有居留地也。迨英人得印度，欲扩商权于亚洲，苦心经营。康熙、乾隆间，屡遣使来，终不得要领。是时鸦片输入已多。”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订立后，“由是国势遂衰，内忧外患交迫矣”。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第217~218页。

事件中的一种，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民初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是“烟毒泛滥”。《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写道：“道光时复申禁令，英商勾通内奸，百计私售。宣宗命林则徐赴粤查办，以兵胁英商。”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于是法、美、俄等国，皆援例缔约，交涉始多，而鸦片之禁至咸丰时竞弛之，而征税焉。于是流毒遍中国矣。”<sup>①</sup> 这里注意到鸦片战争的影响，认为鸦片战争未能禁止鸦片，以至于鸦片流毒中国。《共和国本国史》中写道，《南京条约》“既公布，法美亦援例缔约。独是中国全权及内外大僚，对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均未只字争及，于是臣民吸用之习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及文宗奕訢时，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弊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清国人民风俗之代表焉。”<sup>②</sup> 这一时期教科书尽管谈及《南京条约》中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内容，也提及法美等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但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现代意义”，对战争可能引起的其他社会变革没有注意。在清末民初史家看来，鸦片战争的最大遗憾是未能对鸦片烟有个限定，以致烟毒泛滥，流毒中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开始把鸦片战争视为帝国主义侵略，把《南京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新中华初中本国史》即以“满清外交失败第一声：江宁条约”为题来描述鸦片战争，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南京条约》为“不平等条约”：“中国自清代后半期以至今日之局面，皆由清政府与欧美日本各国所定不平等条约有以致之，而首订此项条约者则为英国，其事则起于鸦片”；“且自此约定后，法、美等国，亦均援英例订约，于是满清之统驭力

①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第3册，第103页。

② 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本国史》卷下，第47~48页。陆光宇的《新撰初中本国史》和印水心修订的《评注国史读本》完全摘抄赵玉森的该段叙述。

失坠，中国门户洞开，实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第一幕”。<sup>①</sup>《开明本国史教本》以“帝国主义侵略的开端与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为题来讲述，称《南京条约》“实为中国与欧人订立的第一次不平等条约”。自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相逼而来，不仅清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即中国民族也随而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sup>②</sup>朱翊新和《初中本国史》认为，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外交史上插上一页损失的契券；而中华民族的身上加上了一根牢不可破的铁链，这是多么痛心呀！”<sup>③</sup>《北新本国史》指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第一步：“鸦片战争为我国外交失败之始，也就是帝国主义铁蹄加在我国人身上之始。”<sup>④</sup>《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认为，“我国传统的闭关主义从此被击破，迫而踏进了世界政治舞台；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亦由是加在中华民族的身上，使我国逐渐夷为列强的次殖民地”。<sup>⑤</sup>与民初教科书对鸦片泛滥深感痛心不同的是，

- ①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76、78页。金兆梓校、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也持同样的看法。该书分“欧人东渐”和“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两章来讲述鸦片战争。“一、中英鸦片交涉和江宁条约：第一个陷害我国于次殖民地地位、开不平等条约恶例的是英国人。（1）割让香港于英，五口为商铺，许英人居住贸易，并得派遣领事专事商贾事宜——这是各国在中国派驻领事的开始。（2）秉公议定关税则例——又开了协定关税税则的恶例，侵夺我国的关税自主权。这条约定后，法美等国也都在后援例订约。从此中国门户洞开，实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第一页。”“自从中英鸦片战争结下种种的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还是战败国寻常所受的辱；但如《江宁条约》中的规定的关税协定，使我国关税不能自主，天津北京两条约及芝罘条约，更增添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内河行船等规定，这一来却使我国的主权不能完整，帝国主义者便可以处处制我死命了。”郑昶认为，“种种不平等条约中，最可痛恨的要算片面最惠国条款的规定，各国利益一体均沾，中国如有什么举动，非得各国一致同意，而且此项最惠国条款，各国都是毫无条件的取得，可以坐享我的权利，不必向我尽任何义务，这真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了”。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第17、20~21页。
- ②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第75、76页。
- ③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第3册，世界书局，1930年订正初版，第42页。
- ④ 杨人榘编《北新本国史》下册，第55页。
- ⑤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开明书店，1947年2月初版，5月再版，第2页。

此时痛心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由此造成的中国贫穷与落后。

从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可见，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的一个普通事件；民初认为鸦片战争主要影响是烟毒泛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始，《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话语在教科书中兴起，帝国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一般性认识。

### 三 帝国主义侵略及其影响

帝国主义话语兴起及进入教科书后，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1932年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教材大纲把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教科书编写重点。该大纲规定初中中国历史教学内容为：①近世史部分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与中俄交涉、中法战争与西南藩属之丧失、中日战争与外力之压迫、八国联军之役、日俄战争与东北移民；②现代史部分有民国初年之外交、欧战后之外交、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内政与外交。<sup>①</sup>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为：①近世史部分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瑛珲条约》与《北京条约》、西北事变与中俄交涉、中法战争与西南藩属的丧失、中日战争、中俄密约与沿海港湾之租借、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远东之国际形势、日俄战争与东三省；②现代史部分有民国初年之外交与蒙藏问题、“二十一条”之交涉、参战之经过与山东问题、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五卅惨案与中国民族运动之进展、五三惨案与对日交涉、关税自主之交涉经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经过、中俄之齟齬、日本之侵略东北等。<sup>②</sup>

①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45页。这里只列举出帝国主义侵略的相关内容，下同。

② 《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53~54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基本都详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英、法、俄、日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如近代部分讲述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战、中日之役、八国联军等；现代部分讲述民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如俄国对新疆、日本对满蒙、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特别讲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等。这里以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1939年第9版）为例，对这一时期教科书关于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略做说明。



图 13-1 金兆梓《新编高中本国史》，1939

《新编高中本国史》的叙事止于1935年，书中对1840~1935年帝国主义侵略情况，如起因、经过、签订的条约、对中国的影响做了详细叙述。为了更清楚地呈现《新编高中本国史》中对帝国主义的叙述，这里将相关事件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开列如下（见表13-1）。

表 13-1 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中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影响的叙述

事件	影响	所在章节
鸦片战争	<p>(《江宁条约》订后)举中国数千年来岸然自大,夷视他国之陋见开始廓除,以后且因对外交涉屡次失败,民族自信心亦被摇撼,长敌志而生戍心,肇后来无穷之患。(香港)成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因而英国在以后对华之侵略,遂占绝对优势;(五口通商使)中国抵制外国货物的城堡便完全轰碎,外国资产阶级由此而得任意扩大其对华的贸易;(鸦片公然进口)人民受其流毒,国用罄于陋厄,遗害更无既极。(协定关税使)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中占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中国社会经济于是受尽外国经济势力之压迫和侵害。(领事裁判权)中国司法权于是也失其完整。</p> <p>《江宁条约》实为以后一切不平等条约之总根据地。</p>	<p>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三章 清代之内忧外患 第二节 鸦片战争</p>
英法联军之役	<p>(《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是中国和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第二声。从此以后,各国所加于中国条约上的层层束缚,大抵都以《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为张本,不过再行变本加厉罢了。</p>	<p>第三章 第四节 英法联军之役</p>
中俄《璦琿条约》与《北京条约》	<p>俄国不遗一矢,不折一兵,徒凭外交手腕,坐得了二百余万方公里的领地,实为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的创闻,中国东北方面从此处处受了俄国势力的威胁,引起后来无穷之患。</p>	<p>第四章 中国领土之日蹙 第一节 边疆及藩属的侵削</p>
西北事变与中俄交涉	<p>(《恰克图条约》使)中国在西北边疆无端又失去土地几达六十六万余方公里。</p>	同上
中法战争	<p>法国通云南的目的达到,中国西南边境的藩篱却因此而撤。</p>	同上
西南藩属之丧失	<p>(缅甸、暹罗、哲孟雄、不丹和中国断绝藩属关系)中国西南藩属除廓尔喀外,完全丧失了。</p>	同上
中日战争	<p>日得辽南,自是肘腋之患;(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实尤患及骨髓。各国都得利益均沾——都得在中国造货,且都得豁免税课,则中国之制造工业势不能和他们竞争,人民生计尽为所夺,其害盖尤甚于协定关税。</p>	<p>第四章 第二节 中日战争</p>

续表

事件	影响	所在章节
中俄密约	中国东北简直在俄国控制之下。	第四章 第三节 中俄密约与沿海要港之租借
强占租借地	自沿海重要港湾纷纷为外人所强占,进出门户洞开,中国于是益受外人之侵略而无法抵抗。	同上
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几乎要继非洲而被各强国所瓜分了。	同上
八国联军	订了这样一个无前例的城下之盟,总算免于亡国。	第五章 不彻底之清末革新运动 第二节 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
日俄战争	日本不但获得俄国在南满所得之利益,而且较之俄国所获权益更扩大,从此中国的东三省南部成了日本的利益范围,北部仍为俄国的利益范围。	第五章第三节
中俄蒙古交涉	蒙古俨然成了个半独立态度的国家。	第五编 现代史 第二章 民国成立后的内忧外患 第一节 民国初年之外交与蒙藏问题
中英西藏交涉	中国拒绝英人要求。	同上
中日东北铁路交涉	日本获得特殊势力于东三省南部,于是又进一步想染指于热河。	同上
“二十一条”	(日本)谋宰制全中国,将均势之局完全打破——简直以未合并前的朝鲜对待中国。	第二章 第三节 二十一条之交涉
日本侵略与国难	日本自从日俄战争后,早就本其大陆政策,以中国为牺牲,着着向大陆进展。自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日本深恐中国政治上轨道,将为其大陆政策之阻梗,遂往往不择手段,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国。 一、对国民革命的干涉。1928年五三事件。	

续表

事件	影响	所在章节
日本侵略与国难	<p>二、发动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p> <p>三、占领热河,签订《塘沽协定》。</p> <p>四、现阶段之国难。日本既退出国联,遂逐步破坏中国之统一以图实现其大陆政策,一面于1934年3月1日使伪国僭号称帝,一面则努力制造华北的离心局面。自《塘沽协定》后,跟着有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1935年11月25日利用汉奸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进一步割裂我滦东。最近更一面提出其所谓“对华三原则”,以压迫我国民政府,庇护浪人、鲜人走私,以为压迫之工具;一面高倡中日经济提携,图使华北为伪国之外府。所以现阶段之中日关系,已不是东北存亡问题,而是整个的华北存亡问题了。“寇深矣,可若何!”</p>	<p>第三章 国民革命之崛起及其成功</p> <p>第三节 国民政府之外交</p>

从表 13-1 可见,教科书把外国侵略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其叙述有以下特点。

其一,突出帝国主义侵略的危害。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多种多样,除了战争外,还输出资本,强占市场。朱翊新的《初中本国史》指出:“欧洲自实业革命以后,机器的利用日广,工厂日多,资本日厚,便发生两种结果:一是生产过剩,急需寻找推销的商场;一是资本过剩,不得不别求利用之途。于是各国互相争夺商场,向外投资。以武力为后盾,以侵略为手段,便是资本帝国主义。其中以英国的资格为最老,所以他们首先着眼于远东的中国,和中国通商。”<sup>①</sup>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利益,“其最显著者,约有五点:(1)关税不自主,(2)领事有裁判权,(3)驻外军,(4)租界及租借地,(5)内河航权。此五点政治上经济上,皆足以制我国之死命”。<sup>②</sup>日本帝国主义则以灭亡中国为目标。

其二,在叙述重点上,经历了从欧洲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变化。

① 沈味之、朱翊新、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第4册,世界书局,1929,第1页。

②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150页。



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中，清朝时期主要是欧洲列强，如英俄法等；民国特别是 1930 年代后主要是日本。自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日本侵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暴露，成为中国头号敌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成为叙述重点。“从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压迫，仍是有加无已；更其是日本，它的蛮横的程度竟出于常理以外。”<sup>①</sup> 1932 年梁园东出版《高中本国现代史》时，特别加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当本书发排之际，日人侵占我东北三省及上海事变，先后发生，事态重大，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现代史中，实为最可注意最可悲痛的材料。因附撰两章于第六篇《国民革命》之后，俾读者知所警惕，而共谋挽回我中华民族的厄运。”<sup>②</sup>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军阀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中国战乱与不能独立的重要原因。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要反对军阀。反军阀成为教科书的一个内容。

#### 四 军阀：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与帝国主义话语密切相关的是军阀话语，或者说，军阀话语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话语的一部分。一般认为，军阀是以武力为支柱，占据一定地盘的个人和集团，其中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其重要特点。<sup>③</sup>在 1928 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分析中

①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第 145 页。

② 梁园东编著《高中本国现代史》上册，世界书局，1932 年初版，1933 年再版，“编辑大意”第 2 页。

③ 关于军阀的定义，来新夏认为，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的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 18 页）。徐勇认为，军阀是社会政治转型期间军政关系失衡条件之下，逾越法制规则与文化道义而擅权干政的军事人物或其权势集团（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 505 页）。

国社会问题时，就多次明确指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情况。<sup>①</sup>

对于中国军阀的产生，教科书认为是由袁世凯造成的。《新时代本国史教本》指出，民国时期，袁世凯拥着多年积成的兵力，又有外债的帮助，日渐扩充，便成了北洋军阀。“及袁世凯死，他手下一班家将便支解了他的势力，各自出头，很像汉末董卓死后，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蜂拥起来一样的胡干。北方既然如此，南方虽是当初革命的根据地，然也因受了老军阀的压迫，一时支持不住，倔强的或死或逃，柔儒的便不免降伏了。从此以后，北方反革命的，成为大军阀；南方变节的革命党人，成为小军阀。”<sup>②</sup>《新中华初中本国史》认为，北方反革命之大军阀，志在把持中央，鼓吹“武力统一”；南方变节之小军阀，志在割据地方，标榜“联省自治”，各树势力。<sup>③</sup>中国军阀不仅包括北洋军阀，如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和曹锟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及其支系等，也包括南方军阀和其他地方军阀。

军阀给中国造成了重要危害。第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损害国家主权，获得帝国主义支持，以图扩充势力。《新中华初中本国史》中写道：“袁世凯在临时总统任时，已抱无限野心，不顾国权之丧失，务求与各国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俄国扶助外蒙独立，英国要求西藏自治，日本要求满蒙五铁道之建筑权，皆以承认民国为要挟，袁氏皆大致承认之。于是民国虽得列强之承认，而满、蒙、藏三区域，发生根本之动摇，是实民国成立史上之绝大国耻。然袁氏则以中华民国总统之资格，取得国际上相当之地位，可以一意图内。”<sup>④</sup>

① 参阅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4页。

② 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下册，第117~118页。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纂的《初中本国史》中的叙述与王钟麒完全一样。参阅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65~66页。

③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138页。

④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134页。

《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认为，军阀在国内树起势力，帝国主义者便来尽力诱致，引为侵略的工具；而军阀本身也就乐得外助，自然与他们勾结起来。所以军阀与帝国主义是相得益彰的，造成中国十多年的纷乱状态。<sup>①</sup>如日本对皖系和奉系的扶植、英美对直系扶植。“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的方法，不外是拿他过剩的资本借给军阀作战费，再又拿他过剩或破旧的军械来换回这些钱。经过这一下转手，他们过剩或破旧的军械销掉了，他们在中国债权者的势力也加厚了，而资本还是他们的资本，被残杀的还是呻吟于战神铁蹄下的中国人民。”<sup>②</sup>

第二，制造战争，使国内战乱不已，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军阀为争夺地盘与利益，发动战争，如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等。“十多年来，骄兵变乱，悍将互斗，生生地把中华民国弄得暗无天日，都是那班人做的成绩。”<sup>③</sup>《开明本国史教本》指出，北京政府虽完全为北洋军阀所成立，但他们因权力的争夺又发生分裂，从此暗斗明战继续不断，而黄河、长江流域的人民遂日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这长期的军阀战争，一方面可视为中国旧有封建势力由分化而逐渐崩溃，一方面可知帝国主义势力已由边境而深入腹地。”<sup>④</sup>李清悚的《初中本国史》认为，军阀派别众多，甚至一省之内有许多军阀盘踞，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全国酿成纷争割据之局。<sup>⑤</sup>军阀统治与混战是中国不能独立与强大的重要原因。

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的统治是中国混乱与贫穷落后的根源。“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经济即因列强的侵略而濒于破产；自入民国，益

① 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下册，第118页。在《开明本国历史讲义》中，王钟麒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自两度帝制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封建势力依旧没有削减，割据一方的军阀，各恃帝国主义为后援，明争暗斗，造成长期的内乱。”见王钟麒、宋云彬编《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下册，第443页。

② 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第80页。

③ 王钟麒编纂《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下册，第118页。

④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第145页。

⑤ 李清悚、蒋恭晟编辑《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37页。

以不断的军阀混战，遂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sup>①</sup>《北新本国史》指出，“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不外：封建势力的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村经济的没落；产业的停滞；学术的不振；生活的贫乏”。<sup>②</sup>因此，要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军阀。

北京政府已经沦为军阀控制的政府，也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解决中国问题，首先是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不仅关系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更关系到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确立。

## 五 国民革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 反封建与合法性建构

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苦难与落后的重要原因，那么，反对帝国主义就有了必要性。教科书对国民革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进行了详述。

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是中国国民党成立后确定的国民革命目标。《新中华初中本国史》指出：“孙文睹此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祸国之情形，预备北伐，积极整顿国民党内部，确定革命运动之方针”；北伐是“广州国民政府遵行孙文之遗嘱，领导民众，进行国民革命，以对内铲除军阀对外排斥帝国主义为职志”。<sup>③</sup>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规定的对外政策，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为制止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勾结。国民政府成立后，便本着这个方针进行。<sup>④</sup>北伐以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统一中国为主要任务。关于北伐的过程，很多教科书都做了详细叙述。国民革命与北

①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第192页。

② 杨人樵编辑《北新本国史》上册，第4页。

③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138、148页。

④ 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第88页。

伐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了国家统一，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重要意义：“辛亥革命以后，虽推翻了满清的君主专制政府，但十余年来军阀的割据与混战，不但促起日本对我国的加紧侵略，并且国家的元气也因此大受损害，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才使全国统一，才开始向建设新中国的前途迈进。这就是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sup>①</sup>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为，德奥俄三国旧条约在一战后已经废除，其余各国尚未更变。因此，修改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的主要外交任务。教科书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外交情况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叙述。

首先是收回汉口等租界。朱翊新的《初中本国史》对收回汉口、九江租界情况做了详细介绍，指出“我国人民，上下一心，无不决心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不愿和外交团交涉”。汉口等租界“完全由中国接收，打破现行租界制度，收回领土行政权”，“不平等条约的打破，在中国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sup>②</sup>何祖泽的《初中本国史》把收回汉口租界视为“革命外交的发轫”，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中，“中国对外交涉的坚强果敢，获得胜利，为鸦片战争以来所未有”。<sup>③</sup>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后，1930年，“又收回天津的比租界，和英国租借的威海卫。政府正要逐步交涉，收回其他租借地，不意国难骤临，把平日的经营，中途破坏”。<sup>④</sup>

其次是关税自主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新中华初中本国史》认为，南京政府外交当局乃根据民意，照会英、美、法、日、比、意、荷、葡八国公使提议修改条约，并根据华会关税条约，邀请各国参与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各国亦以中国民气之激昂，并为转移废约之要求起见，均派代表来华与会。中国代表所提出之关税自主

①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第165页。

②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87~88页。

③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下册，第180页。

④ 傅运森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113页。

案，由各与会国为原则上之承认。<sup>①</sup>朱翊新的《初中本国史》指出，1928年一年中，国民政府与外国订立了几种新约。中美条约、中德条约等12种条约都规定中国关税自主，并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关税上完全互相平等。其中中比等五条约，规定在特种条件之上，取消领事裁判权。<sup>②</sup>《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中写道，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才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宣言废止友好通商旧约，另订新约。“其对旧约中不平等各端，首从事于新关税条约的签订，以谋解除各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经济上的压迫。现在已经和各国订有新关税条约，实行国定新税则。八十年来最受苦痛的协定关税的束缚，总算解除。”<sup>③</sup>到1928年底为止，外交部与各国新订或修订条约的计12国。“在这些新约里，并未能将不平等各点完全废除，而只是集中于关税及领事裁判权两问题，以求国家经济的解放与司法权的独立。”<sup>④</sup>

最后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姚绍华的《初中本国史》中写道：“中国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向以取消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为主旨。”<sup>⑤</sup>《复兴初中本国史》指出：“国民党的政纲与中山先生的遗嘱，都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言语，所以国民政府的外交，就以改订平等条约收回权利为最要了。……中国自海通以来，丧失权利，真不可数计。国民政府努力交涉，迄于民国二十年，如改订商约，关税自主，收回法权，均已见有进步。”<sup>⑥</sup>《高级小学历史课本》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汇为一派，在国际上的地位日见增高。1942年，美英等国废除在中国的治外

①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150~151页。

②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89页。

③ 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第92页。

④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下册，第165页。

⑤ 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62页。

⑥ 傅纬平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第4册，第111~112页。

法权与其他特权，依平等互惠的原则改订新约。“百年耻辱，至是一笔勾销。”<sup>①</sup>《初级本国历史》指出，我国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已有百年的历史。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就在谋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进展不大，直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有局部的成功，九一八事变后陷于停顿。“‘七七’抗战以来，列强对于我国的认识，随抗战的发展而加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遂能顺利进行。”中国先后与英美等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的平等条约，“于是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桎梏，至此一笔勾销，而进于自由平等的新时代”。<sup>②</sup>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中国与美苏等共同作战，创建联合国，“中国国际地位由是提高，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在此期间，我国外交上的伟大成就，其一就是1943年中美、中英“平等互惠新约的签订，一扫百年来我国所蒙受的不平等条约的耻辱”。<sup>③</sup>

国民政府完成了反帝反军阀的任务，为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持。“国民革命”论述不仅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反映，也是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一种历史诠释。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建设一个近代化的新中国，而这首先要扫除不利于革命建国的障碍——帝国主义与军阀。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只能是国民党。<sup>④</sup>国民政府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职志，故于外交采取不妥协政策。国民政府在广州时，即因沙基惨案领导香港罢工工人，以与英帝国主义者做殊死战。<sup>⑤</sup>国民党“树起了反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旗帜，指出了国民革命的途径，并且由此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拥护；而

① 宋延庠、孙懋禄、蒋子奇编辑《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4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6年1月北京艳纸本初版，7月2版，第25页。

② 教育部主编，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辑《初级本国历史》第5册，第106~107页。

③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第185页。

④ 参阅林志宏《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及其诠释》，《思与言》第42卷第4期，2004年12月。

⑤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下册，第205~206页。

后来北伐的成功，就是由于全国民众的拥护的结果”。<sup>①</sup> 国民党政府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欲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废除鸦片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各类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民族的独立，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民族自信心。

## 六 光荣与苦难：民族史叙述与民族国家认同

帝国主义话语进入历史书写，不仅深刻影响了历史叙述的内容，也改变了历史书写的形式。帝国主义话语在中国历史书写形式上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近代史书写上，中国近代历史基本以帝国主义为主线，帝国主义话语贯穿于近代历史过程之中，如作为编写重要内容的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南京政府外交等，都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二是整个中国历史书写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古代中国创造的灿烂文明的光荣历史与近代受到帝国主义压迫与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其中近代史中帝国主义侵略是主要部分。

1930年代以后教科书叙述，相较于之前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突出古代历史的光荣。孟世杰的《初中本国史》就有“古史的光荣”一节，指出古史光荣有两点：一是中国立国甚早，“古籍所传黄帝的创制，远在4600余年以前；即尧舜的美德，大禹的丰功，汤武的革命，周孔的学术，其事迹亦多在数千年前：至足为国史之光”。二是中国有人类更早，“近十年来，中国各省，颇有旧石器时代人类遗物发现，证明中国有史以前，已有四五万年文化。更据外人之调查，且有谓在周口店所得之人牙，为五十万年以前人类所遗者。则中国之有人类，为更古远”。<sup>②</sup> 白进彩的《高中本国史》认为，“我国五千年来，已有完密之政治制度，及精深之学术，灿烂之文明，不但

①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下册，第153页。

② 孟世杰编辑《初中中国史》上册，第5-6页。



国内异民族，因深受其赐，由野蛮而进为文明，即国外如朝鲜、日本、安南等，其沐浴吾国文化之恩惠者，亦非浅鲜。故我国民族，在人类进化史上，实占一重要位置”。<sup>①</sup>《陈氏高中本国史》认为，中国“在过去，确曾建立不少的丰功伟业。即以‘四大发明’而论，中国人不知帮助了多少全人类的忙！纸与印刷，固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军事上用的火药，航海时用的罗针，何尝效力稀小？然而，这四者，都是在中国史上发现得最早呢！”<sup>②</sup>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认为，我国民族有光荣而悠久的历史，对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如发明磁针、火药、印刷术等。“我国民族自上古至现在近五千年，虽其间盛衰不常，而始终以汉民族为中心，在世界历史上，生存活动，未尝稍歇。与我国同时号为文明古国者，如埃及、如巴比伦，如印度，至今都是河山依旧，景色已非。”<sup>③</sup>中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有重要地位。

古史的光荣可以增加民族自信心。这对1930年代的中国来说更为需要。当时中国贫弱落后，民族自信心动摇，急需以光荣历史来激发民族信心。何祖泽的《初中本国史》指出，“中国民族，包孕宏富，根源深远；过去的历史，是非常光荣的。对于这光荣的历史，应当如何爱护维持，如何发挥光大，这都是我们后起者的责任。虽然中国在近代，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民族的自信力，有些动摇；但是我们民族，本来有很好的组织，很好的道德，很好的智识和能力，只要扩充固有的宗族团体，组成民族的大团结；再恢复已失的民族精神——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然后采取他民族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将来的历史，较过去有进一步的光荣，是毫无疑问的”。<sup>④</sup>

1930年代后中国历史书写的另一个变化是，近代史注重帝国主

① 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68页。

②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绪论”第4~5页。

③ 罗元鲲编著《高中本国史》第3册，第225页。

④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上册，第8页。

义侵略造成的屈辱。当时中国积弱，又陷于帝国主义国家压迫侵逼之下，先其所急，学者多致力于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外人在华特权利益、不平等条约、租界、治外法权以至种种丧地辱国之历史，颇以激励国人，唤醒民众为职志。<sup>①</sup> 研究近代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时人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把外国侵略视为帝国主义侵略。本节还是以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地位变化略做说明。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分期中，一般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清初（明清之际）的“西力东渐”，这个起点可以与西方历史发展同步，从而赋予中国历史以现代性。<sup>③</sup> 但是，这个近代史起点显示的是“世界”的中国近代史，而非“中国”的中国近代史，无法体现中国历史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以“西力东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无法为1930年代以来日趋高涨的反帝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性的“近代”起点与中国史家当初运用历史分期策略建构中国民族历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中国“近代”的起点需要重新确定，鸦片战争开始上升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930年代是鸦片战争取得重要意义的关键年代，鸦片战争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开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出现在多个史家的著述中。此时出现的几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如陈恭禄、李鼎声、蒋廷黻与李平心等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讲起，尽管他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对中国近代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或反侵略革

① 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0页。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第4页。

③ 参阅第七章。

命的历史。<sup>①</sup>李平心认为：“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将近代史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确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sup>②</sup>李平心的这段话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代出版的多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二是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此时的“鸦片战争”正是以反抗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觉醒的姿态出现在教科书中，它分欧人东渐后的“近世”为两个阶段：“近世史可分为两个小期：西力业已东渐，我国还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样子，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这前后两期的界线。”<sup>③</sup>北新书局的《高中本国史》也认为：“在近世期中，则以鸦片之役为划分时期的关键。鸦片之役以前，西力虽已东渐，但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尚能保守旧日的规模；鸦片之役以后，外力侵略日深，便不能不起到急剧的变化了。”<sup>④</sup>这些教科书虽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看法逐步彰显。

“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

① 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绪论》，载袁英光、桂遵义编选《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348页。

③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4页。

④ 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3页。

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sup>①</sup>把以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侵略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将之视为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根源，会给民众带来一种屈辱感与悲情意识，有助于激发民众的抗争意识，激励民众。<sup>②</sup>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民族的苦难与历史上的光荣同样重要。一个成功的民族史叙事，应该是兼顾光荣与挫折的双重叙事。一方面要发扬历史上的荣光，来形成民族的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善于注意历史上本民族遭受的苦难，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本国史是最能激发我们的情志的。往日的文物，可以增加我们的自尊、自信；无论是现在，或将来，就是过去的黑暗、创痛，也可以使我们得到警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亦即此意。”<sup>③</sup>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光荣也有屈辱，有征服也有被压迫。可是真正能够巩固成员的感情和认同的，绝对是屈辱和悲情。<sup>④</sup>而古史的光荣，正是相对于近现代史的屈辱而言的，对中国民族而言，帝国主义意味着灾难，也是现世落后与抗争的一个缘由，突出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确立民族国家的认同。

## 小 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帝国主义话语开始进入教科书，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近代史的一条线索，很多内容都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①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自序”。

② 如近代以来关于国耻的叙述以及国耻纪念，国耻纪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参阅熊斌《国耻记忆与民族自信：民国时期国耻纪念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③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绪论”第2页。

④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第153～154页。

的历史。<sup>①</sup> 不唯如此，整个中国历史的编写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梳理教科书中的帝国主义话语，可以看出这种话语兴起的意义及其对中国历史书写的影响。

帝国主义话语关系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1920年代帝国主义话语兴起，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开始高涨之时。帝国主义话语的兴起，标志着晚清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清末向内的“反满”转到向外反对外国侵略：“西方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苦难，给中国国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但同时，“西方的侵略与半殖民主义会唤醒中国人的新精神，培育出最终会结束以武力强加给清朝的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sup>②</sup> 反帝满足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同感，如果认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那革命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虽说是代价昂贵的）答案。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sup>③</sup> 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中国民族的独立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民族信心，确立民族国家的认同。

帝国主义话语关系到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帝国主义侵略被视为中国近代苦难的一个根源，因此，谁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谁就获得了统治的正当性。“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即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sup>④</sup> 国民

① 或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围绕着不平等条约而展开的历史。张建华：《晚清中国人的国际法知识与国家平等观念——中国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起源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1页。

②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8页。

③ 亨廷顿：《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第283页。

④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页。

党政府对内消灭军阀，完成国家统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赢得了民族独立，这不仅改变了近百年来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局面，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也为国民党政府赢得了民心。“北京政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向民众提供一个明确的民族目标，并借此有效地确立和实施其权威。相反，它的竞争对手及其他民族主义者，则成功地铸就了一系列划分政治群体的通俗概念，如‘军阀’、‘帝国主义’、‘爱国者’和‘叛徒’等，从而在中国文化语境里重新阐释了近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遇互动。”<sup>①</sup>帝国主义话语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提供正当性，有助于确立国民党政府政治认同。

帝国主义话语不仅为国民党所注意，也为共产党所关注。政党和国家控制下的历史学一次次对不平等条约做出新的诠释，谁一旦把持了民族历史的话语权，那么也就抢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借此确立合法性和权威性。<sup>②</sup> 政治斗争中各派都希望借助“帝国主义”这一工具来动员民众，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中共首先提出反帝反军阀的要求，在对“反帝”话语进行建构的过程中，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都进行了重新解读，“帝国主义”被建构为中国在19世纪所遭苦难的罪魁祸首与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权利的丧失都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已经支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sup>③</sup> 1939年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④</sup> 因此，反帝反封建（军阀）成为中共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①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第3页。

② 龚志伟：《国耻叙事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构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评介》，《史林》2011年第3期。

③ 王建伟：《“反帝”口号与苏俄问题：1925年底的一场争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页。

国民党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编写的教科书颇多相似，甚至其影响不止于民国，延续至今。今天在阅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实际上，现今相关的历史叙述与知识观念，大都来源于此。

## 第十四章

# 教科书案（上）： 《现代初中本国史》案

教科书是政府教育方针和政策的体现物，是根据政府的要求来编写的，政府希望通过教科书和国民教育，确立其统治合法性。为此，各个政权和历届政府都很注重教科书审查与管理，对不符合要求的教科书责令修改或予以查禁，以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清末民国时期，政府查禁一些教科书，有的甚至被起诉，形成教科书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现代初中本国史》案和《白话本国史》案。本章与下一章分别考察这两个案件。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查禁了两种本国史教科书：一种是顾颉刚、王钟麒合编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另一种是王钟麒所著《新时代初中本国史》。这两种教科书都由胡适校订，因为其中对上古史事特别是三皇五帝的叙述而被查禁。这次教科书案在当时引起了多方关注，是民国时期几个教科书案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本章拟对这次教科书案做一探讨。<sup>①</sup>

---

① 王钟麒著《新时代初中本国史》分上、下两册。上册由胡适校订，1927年由新时代教育社出版；下册由胡适、王云五校订，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封面标明1928年7月“经大学院审定”。《新时代初中本国史》主要观点与叙述方式与《现代初中本国史》基本相同，考虑到这两种本国史与顾颉刚、王钟麒二位作者的影响，本文以《现代初中本国史》为讨论中心。



1929年3月，《醒獅週報》刊出了署名“阿斗”的文章《一件比蔣桂戰爭還重要的事情》，指出最近的两件大事，“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为了湖南问题，蔣桂两方闹得空气万分紧张：行旅戒途，商市惶恐，箭在弦上，终必一发，现在姑且不必管他。但正在这个期间，所谓国民政府者，又闯下一个大祸。这件事情的性质，比较蔣桂战争还要重要。”这件比蔣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部对历史教科书的查禁。“原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近来出了两种历史教科书，一种是《初级中学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王钟麒编，胡适校；一种是《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王钟麒合编，也是胡适校。这两种书都是在蔡元培长大学院的时代正式经过审定的，最近由教育部禁止发行，并通令全国不准采用。”<sup>①</sup>

这次国民政府教育部查禁的“本国史”都是供初级中学使用的教科书。被查禁的原因是书中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尧、舜以前的历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由山东曹州重华书院院董从涟珠、院长陈三亚呈请禁止，山东参议员王鸿一据此提出专案，弹劾此书“非圣无法”。“这件事主持最力的是戴季陶，当国民政府十七次国务会议的时候，正是编遣会议结束的时期，戴季陶这一天容色仓皇，一手握着这几本教科书，一手抵在桌上，在会议席上，大放厥词，认定这两部历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其关系比编遣会议还要重要，非即刻禁止不可，并且提议要处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的罚金。”国民政府十七次国务会议决定由教育部查禁。<sup>②</sup>为什么此次查禁顾颉刚的教科书，会有人认为“比蔣桂战争”还要重要？《现代初中本国史》的叙述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本章通过梳理《现代初中本国史》与同时期其他教科书中黄帝叙述的异同，讨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sup>③</sup>

① 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348页。以下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

② 参阅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72页。

③ 关于此案的讨论，另可参阅李长银《一件关乎民国年间政、学、商三界的重大事件——1929年〈本国史〉教科书案新探》，《历史教学》2014年第5期下半月刊。

廣 西 教 育 公 報

又如直隸易名河北北京改稱北平等早經中央規定在案是以請凡沿用舊名已失時效之各種地圖及教本等自應一律禁售易於新書職會對此業經議決(一)呈請中央確定首都名稱(二)呈請中央通令全國各書坊所有各種舊史地書籍圖畫標本模型在未會改正前一律禁止發售(三)呈請中央令飭全國各學校不准再用十八年以前未經改正名稱及違反時代之舊式地圖及科本書籍等語在案理合呈請

鈞會仰祈迅賜鑒核施行實為黨便謹呈

中央執行委員會

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

教育部訓令第三六一號

令廣西教育廳

為令行事案准 國民政府文官處第一七六五號公函內開「國民政府第十九次國務會議關於蔡委員元培等審查商務印書館發行之初級中學新時代本國史教科書上下兩冊及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上下兩冊報告結果應請先交教育部即日嚴令禁止發行及學校之使用並附意見一案業經決議照辦等因查此案前據山東曹州重華學院學董叢澹珠等呈請轉飭重加審定等情到府當奉提出 國民政府第十七次國務會議決議交蔡胡戴王陳何李各委員古文官長審查教育方針併案擬議在案茲奉前因相應錄案並抄同原件函達查照辦理」等因並抄送審查意見書一份叢澹珠等原呈一件准此除令飭該館即將該教科書兩種停止發行並分令外合亟令仰該廳轉飭所屬各學校一體遵照不得採用此令

命 令

七

图 14-1 教育部训令禁止使用《现代初中本国史》与《新时代本国史》

## 一 《现代初中本国史》之编写

《现代初中本国史》由顾颉刚、王钟麒合编，胡适校订，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册于1923年9月初版，至1927年9月出了55版。中册于1924年2月初版，至1926年1月出了25版。下册于1924年6月初版，至1926年5月出了24版。<sup>①</sup>到1929年，已经发行25万册。<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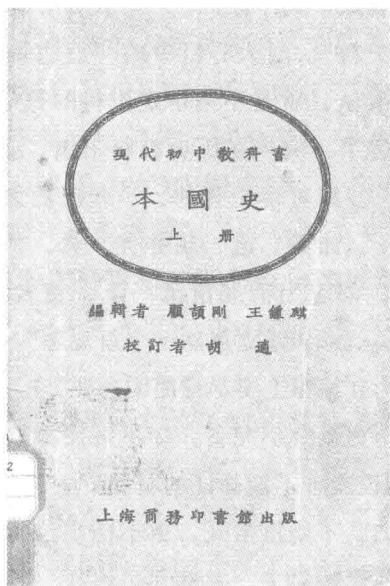


图 14-2 顾颉刚、王钟麒合编《现代初中本国史》，1923

《现代初中本国史》于1922年开始撰写。是年春，顾颉刚由胡适介绍，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该年4月，顾颉

① 参阅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第217页。

② 这里据顾潮《顾颉刚年谱》中的记载（第172页）。国务会议认为印了160万部，参阅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98页。

刚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具体表达了他对编辑历史教科书的看法：“教科书的篇幅不多，而读的人最多，所以我们更应当郑重，更应当扼要，更应当叙述的有精彩。”顾颉刚强调新编历史教科书“应当举出史学的真义来”：“普通的历史是记载全人类的活动的，应当各方面都要顾到，不能给任何阶级专利。所以我们希望的新史，是普通的而又精密的；并且割下的一肢——书出的部分——可一览而知其在全体中的位置。”顾颉刚指出以前历史教科书的种种弊端，如完全是政治史、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等观点，其中原因，“一半是由于不去寻求史料，一半是由于不去审定史料”。时人心目中的“好古而薄今”观念、“三代为黄金时代”的看法，就是不去审定史料的弊端的遗留，“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一层弊害了，应当在历史教科书里，把这观念改变过来，所有‘依托的学说’，如黄帝、管仲，‘理想的制度’，如封建、井田，‘混淆的事实’，如儒、道、墨并尧、舜，而取舍不同的故事，如想当然耳的故事，都应当彻底澄清一下，使大家弄清楚每一时代和每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形，建立成功一个新观念”。考虑到教科书的分量较小，顾颉刚认为在编写上要尽量简明扼要，“在剪裁上，我们的宗旨，总是：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对于那些传说或者不能确证的材料，主张不予录取。“在极经济的教科书上，我们既不能重形式，更不能妄信传说，所以在剪裁上尤应严厉。夏、商两代的君主，大都无可考了，我们尽不妨略去。历代皇家的私事，亦尽可不载，人名和零散事实，总要删减得越少越好”，“传闻，几乎没有信史的资格，我们更不能有丝毫的滥取，自盘古以至周公、孔子，都应该大删特删”。顾颉刚认为，这样做，“似乎过于阙疑，但要‘不自欺’，实在只得如此”。<sup>①</sup>

顾颉刚主张编书要与研究结合，对于正在编写的教科书，他准

<sup>①</sup> 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月。

备把它写成一学术专著：“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编撰教科书也要使得它成为一家著述。我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sup>①</sup>

就在准备编写教科书时，顾颉刚开始对中国古史进行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顾颉刚认为，凡是中国的古史都是不可靠的，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国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像尧、舜、禹等事迹都是后人之编造，只能以传说视之。

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和古史研究，给时人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我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sup>②</sup> 反对的一方从史料上与顾颉刚进行辩驳，同时也认为顾颉刚这个“翻案”，“很有影响于我国人心与史界”。<sup>③</sup> 古史讨论很快形成影响深远的古史辨运动。<sup>④</sup>

顾颉刚也注意到古史讨论的影响和教科书的特殊之处，对于是否将自己的研究写进教科书，他还是很慎重。“我当时曾向编辑部里史地部主任朱经农谈过。他说：‘现在的政府大概还管不到这些事，你只要写得隐晦些就是了。’我依他的话，不提‘盘古’，对‘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这样做法，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科书里早已有过的。

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51页。

②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陈引驰选编《学问之道：中国著名学者自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第61页。

③ 刘揆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52～153页。

④ 关于古史辨运动的讨论，参阅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我并不比他写得激烈。”<sup>①</sup> 这里提及的是 20 世纪初夏曾佑编著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该书影响极大，称三皇五帝时代为“传疑时代”。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顾颉刚在编辑期限内难以完成任务，商务印书馆就邀请王钟麒参加编写。“编辑教科书的期限已迫，成稿却没有多少，不得已去函辞职。承馆中史地部主任朱经农先生的盛情，邀请我到馆中任职，许由同事人帮助编纂。年底到沪后，和旧友王伯祥先生（钟麒）同居，他也是喜欢历史的，谈论间常常说到古史，颇有商榷之乐。”<sup>②</sup> 王钟麒为顾颉刚以前的同学，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供职，对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很感兴趣并极为支持。<sup>③</sup> 顾、王的合作使得这套《现代初中本国史》得以按期完成。

“郑重”、“扼要”与“精彩”可以说是顾颉刚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基本意见，也是《现代初中本国史》的一个特色。《现代初中本国史》叙述了从上古到民国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时期的历史，分“总说”“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六编。在“总说”中，叙述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社会演进的各方面、构成中国历史的各民族和史期的区分。作者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但在每个时期的具体叙述上，并没有局限于朝代，而是按照事件或制度来专题论述：“历史应当注意事实的因果，不能拘拘于朝家的更迭。所以本书的编次虽分时期，而叙述的单位却自为起迄，不依从前那样的断代。”如在“上古—秦以前”一期中，作者就分述了六个专题：①社会的进化与建国的雏形；②洪水的传说；③君位世袭与神权政治；④封建制度与家族主义；⑤诸侯兼并与当

①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陈引驰选编《学问之道：中国著名学者自述》，第 61 页。

②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 1 册，“自序”第 52 页。

③ 王钟麒，字伯祥，后以字行。1907 年入苏州公学，与顾颉刚、叶圣陶等同学组织诗社，出版刊物。1911 年毕业后任教，1921 年任北京大学中文预科讲师，1922 年任商务印书馆史地编辑，1932 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参阅王清华《王伯祥先生传略》，载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时社会；⑥思想的激起与贵族的倾覆。这样的叙述方式在同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尚不多见。在取材上，《现代初中本国史》注重与“时代精神”相关的材料。“时代精神是历史的主眼，如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的风尚、学术的嬗递。凡足以表现当时的特征而影响及于后世的，本书便取材于此，都为简单的系统的介绍，所以并不定什么中心。”<sup>①</sup>

《现代初中本国史》特别强调对“信史”的追求，亦即顾颉刚所说的“郑重”。所谓的“信史”，在顾颉刚与王钟麒看来，就是有史料确证的历史。对“信史”的追求，很自然地就将问题的焦点集聚到上古史事上。中国上古传说本身歧异纷出，又无可靠的材料印证，对于此，他们取存疑的态度而将之视为“传说”。正是这样的处理方式，直接引发了后来的“教科书案”。

## 二 《现代初中本国史》中的“三皇五帝”叙述

查禁《现代初中本国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该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那么，《现代初中本国史》是如何表述三皇五帝的呢？

在《现代初中本国史》中，顾颉刚与王钟麒在上古史第一节“社会的进化和建国的雏形”中写道：“自从地面上初有人类以后，一直到所谓黄帝时，都是鸿荒之世，实在的事迹，还是暗昧难明。只要看这黄帝的称号，便可与再前一点的炎帝一类同样看待，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来表示他。”作者认为黄帝以前是“鸿荒之世”，对炎帝和黄帝的真实性也不能肯定。由于对黄帝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那么对黄帝同时代的人，也表示了否定：“什么仓颉、隶首、大挠，都只是集合了无数无名创作者积成的成绩，才显出较有统

<sup>①</sup>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编辑大意”。

系的效用的，决不是突然而来的创始，更无所谓首出群众的圣人！”

在“洪水的传说”一节里，作者对“尧舜事迹”表示怀疑：“尧、舜的传说，为后人所崇信；我们看惯了，遂以为古代真有一个圣明的尧、舜时代了。”作者认为尧、舜的故事，一部分属于神话，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他们言必称尧、舜，你造一段，他造一段，越造越像真有其人其事了。”作者特别批判了后人的“黄金时代”观念：“后世称他为揖让之世，大家都看作‘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黄金时代，其实只是时势使然的自然结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圣明。”

对于上古“传说的帝王”，作者认为，这些理想人物，或许并无其人，只是当时社会背景里的一种精神。住民由聚居的时候慢慢扩大自族的领域，这国家的观念自然会跟着起来。那黄帝的传说便是代表这造成国家雏形的时期。“当时政治上的组织既渐有萌芽，而社会上的生活也逐渐完备，什么上栋下宇的宫室，什么上衣下裳的冠服，什么渡水行远的舟车，什么备敌防害的弧矢，在这时候都因时势的要求，自然而然地创作出来。但要认明，这是许多人心力之下的产物，自古以来，不知经过了几次试验，几次修改，才得互相仿效，推行尽利，决不是圣明御世便会同时产生许多贤辅出来，突然涌现那么多成绩的！后人事后追想，好像从前什么都有，或者是某一时代同时的创作了。其实我们应当承认那时确有此等由无至有，由简至繁的事实，却不能完全相信这班半神体的圣人！”作者认为，古代传说的帝王，都只可说是文化史上几个重要的变迁的象征。“近人说，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耕稼时代，黄帝代表政治组织的时代，每一时代也许有千年之久。这种见解最为近理。我们试看有巢氏是房屋发明的象征，燧人氏是火的发明的象征，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顾颉刚与王钟麒对上古史事并不是简单的全部否定，而是标明为“传说”，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给予解释：



“社会的进化确有一定的历程，从狩猎时代进为畜牧时代，又进为耕稼时代，一般人的生活便逐渐安定些。耕稼最重土地，于是土著的观念起了。要想扩大自己的地盘和防御人家的扩大来侵害自己地盘的事实，便应运而生。人事一天繁似一天，种种使用的东西，也就由‘感缺而求需要’的自然律，一样一样地逐渐添造出来。”作者的意思很明显，是人类的需要促进了文明发达与社会进化，如文字、算数、历法等，都是逐步发现的，到了黄帝时候，“那帮助精神活动的东西也似乎大体略备了”。<sup>①</sup>

从以上描述可见，顾颉刚、王钟麒对上古史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肯定了上古传说中的象征意义。《现代初中本国史》对上古的表述是比较温和的，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现代初中本国史》还是因为“不承认三皇五帝”被查禁了。为什么说不承认三皇五帝就是非圣无法，会“动摇国本”、于国家不利呢？这关系到上古帝王特别是黄帝在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与现实影响。

### 三 黄帝始祖地位与“共信”之国本

黄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春秋以前的文献如《尚书》《诗经》“其涉及前代之事，仅上溯及禹稷等而止”，春秋时的铜器铭文记载“皆止以禹为最高最古之帝王，黄帝、尧舜非所及也。《论语》、《墨子》、《孟子》亦惟盛称尧舜禹稷之道，黄帝亦尚非所及也”。<sup>②</sup>春秋以前以及春秋时期的书都上溯至尧舜而不提及黄帝，后者传说之大盛在战国时代。司马迁的《史记》把黄帝作为帝系之始，西汉以来一些朝代祭祀黄帝，黄帝逐渐成为王朝统治

①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3~25页。

②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189页。

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重要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sup>①</sup>“在19世纪中期以前，黄帝大体上只是现实政治权威的一个象征，只是皇统的一个组成要素。”这种情况在晚清发生了变化，晚清知识分子把黄帝“由数千年来历代相成的皇朝统系抽离出来，重加诠释，以之作为界定中国国族边界、区隔国族成员与非成员，并借以凝聚国族内部认同的表征”。<sup>②</sup>黄帝开始与民族国家建构联系起来，民族主义者力图使黄帝成为中国民族认同的符号和象征。

清末民国时期，黄帝的象征意义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有政府方面的祭祀活动，在民众教育中也注意黄帝事迹的宣讲。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比较重视黄帝。清政府试图讲述黄帝光荣事迹来确立民众爱国心，维护统治。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对黄帝事迹做了详述：“黄帝长于姬水，具英姿大略，欲统一天下，与蚩尤战而胜，以善战而代神农氏为天子，遂挟其余威，平定四方。生平未尝宁居，东至海，西至崆峒，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长处。以师兵为营卫，而邑于涿鹿之阿。于是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遂缔造一大帝国。是中国一统政治之始也。”该书不仅认为黄帝统一各部落为一大帝国，奠定了中国政治统一基础；还认为黄帝创制各种文化设施，为中国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设官、创制文字、制定历法、发明乐器、衣裳等，“凡后世养生之具，文化之程，大都肇端于是时”。<sup>③</sup>《东洋史要》讲述黄帝武功——统一国家、文治——文化创制两个方面的事迹，充分肯定了黄帝对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的影响。

清末大多教科书都是把黄帝看作国家与文明的奠基者，叙述

① 参阅王马克《作为民族认同符号的黄帝》，载刘风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册，第76~110页。

② 参阅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③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卷1，第14~15页。

了黄帝的武功文治。<sup>①</sup> 有教科书强调黄帝的汉族始祖地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认为，黄帝“发明诸种之进化，以陆军主义，交通四方各部落，而共吸其权于中央，为诸部酋长首领，建立一统帝国。于是，四千二百余年汉人种中国之机关始洋洋发轫。故我国历史，奉（黄帝）为开幕之第一伟人宜焉”。<sup>②</sup> 该书扉页上印有黄帝像，黄帝形仪威武，左手持巨斧，右手握宝剑，傲然独立：“黄帝者，我现今四万万汉种之鼻祖也。距今四千年前，以巨刀阔斧开辟中国，制造文明，凡我后人一草一木，皆受其赐。谨描肖像于书端，令我国国民作一大纪念，以发达我国伟大雄毅之种魂，扩张我膨胀纵横之国界。”许志毅的《简明新国史教本》也是将黄帝作为汉族的始祖。<sup>③</sup> 曾鲲化与许志毅都是留日学生，曾从事反清运动，书中将黄帝作为汉族始祖，有着反对清朝统治的意味。

民国时期，教科书比较强调黄帝统一中国以及黄帝在文化创制上的意义。<sup>④</sup>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写到黄帝平蚩尤、克榆罔等，“建造中华帝国”，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文化创制，“文化之进步，于斯最盛”。<sup>⑤</sup> 《共和国新历史》写到黄帝擒杀蚩尤，“统一中国。黄帝之制作，尤美备于前”。<sup>⑥</sup> 《新式历史教科书》写到黄帝统一中国：“部落政治进为国家政治，自黄帝始。”<sup>⑦</sup> 《初中新本国史》认为“汉族

① 参阅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卷2，第2页；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页；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8~9页；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卷1，商务印书馆，1903，第1页；姚祖义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第1~2页；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15~25页；章铤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第5页；陈庆年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2页。

②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第40~41页。

③ 许志毅编《简明新国史教本》，中国图书公司，1909，第7页。

④ 一些教科书改编自清末，其黄帝叙述基本承续了清末的方式，主要叙述黄帝的武功文治，如章铤的《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潘武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吴曾祺的《增订中国历史读本》等。

⑤ 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1册，第15页。

⑥ 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新历史》第1册，第2页。

⑦ 杨喆、庄启传编辑《新式历史教科书》第1册，中华书局，1916，第2页。

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黄帝开始的”。黄帝不仅武功显著，还有许多关于文化的发明，“很多东西都是黄帝时候造出来的”。<sup>①</sup>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认为黄帝统一是汉族由部落进于国家之始。“国家组织既具雏型，于是护卫这国家组织的一切制作，也随之而起，所以黄帝的制作，不但超迈前代，并且多为后世所因袭”，黄帝时代代表由部落演至国家组织，“黄帝前后政治转换的关键，也全在这一点”。<sup>②</sup>应功九的《初中本国史》认为，“黄帝是建立中国国家基础的第一人，说到中国国家的建立，不能不详述黄帝的历史”。<sup>③</sup>



图 14-3 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中关于黄帝的叙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黄帝叙述，与民初主要讲述黄帝文治武功不同，突出了黄帝的中国民族始祖地位。《新中华语体本国史》认

① 蔡沔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第1册，第11页。

② 杨东莼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33、35页。

③ 应功九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11页。

为，黄帝统一各部落后，“汉族总算有了个国家的模样；黄帝便成了开国的始祖”。中国文化创制没有一件不归功于黄帝。这样一来黄帝便成了个万能的超人。不但如此，连以后做各部落共主的大国，如夏、商、周三代，也说都是黄帝的子孙所建立的，于是黄帝非但是开国的君主，简直是汉族共有的始祖了。<sup>①</sup>金兆梓的《新编高中本国史》称黄帝统一中原，“召集诸侯，合符釜山；于是方制万里，划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乃置左右大监，以监理各国；置市立朝，备各国来朝聘。这一来，四方各部便都尊黄帝为天子，是为我们有立国规模之始，黄帝也便成中国人的始祖”。<sup>②</sup>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罗列了黄帝文化创制的九个方面，特别点明黄帝“创造中华帝国，后人尊为汉族始祖”。<sup>③</sup>《复兴初中本国史》联系当时中国受到外国侵略而引起的民族危机，认为黄帝打败蚩尤，是抵抗异族入侵的榜样，“汉族虽然历被异族侵略压迫，终有兴复而越发盛大的志望，黄帝就是最初的榜样”。<sup>④</sup>吕思勉的《初中教本本国史》详述了黄帝武功与文化创作，黄帝时代“出草昧而进入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建国，是到黄帝时代，而其规模确立的”。<sup>⑤</sup>黄帝时代是中国有国家之始，黄帝不仅为开国始祖，还成了大家共同信奉的民族始祖。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很多教科书都比较重视黄帝地位，或侧重黄帝文治武功一面，或侧重黄帝作为民族始祖的一面。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存在是由于民族成员的认同和某种共同的情感。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身上，这些事件与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形成一个民族凝聚力。民族的历史就是

① 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上册，新国民图书社，1930年发行，1932年8版，第8-9页。

②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上册，第18页。

③ 罗元鲲编著《高中本国史》第1册，第26页。

④ 傅纬平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11页。

⑤ 吕思勉编著《初中教本本国史》第1册，第14、8页。

根据共同体的需要建构出来的，其起源的神圣性不容置疑。黄帝和尧舜禅让等上古一些人和事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认同的符号和象征，其意义已然超越了学术范围，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了。“中国所以能够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sup>①</sup> 顾颉刚与王钟麒从学术“征信”角度的质疑与否定，自然遭到了以“动摇国本”为名的查禁。

#### 四 传疑与象征：其他教科书黄帝叙述之参照

此次查禁“本国史”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教科书。是否这种疑古的态度不能在教科书中出现呢？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是如何来处理这些没有确证的上古史事？本节将列举民国时期部分教科书对中国上古史事的叙述，从中比较《现代初中本国史》的叙述是否有特别之处。

在清末编著的教科书中，夏曾佑较早地将中国上古列为“传疑时期”。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夏曾佑将“开辟至周初”定为“传疑时期”，对黄帝以前的上古帝王，认为“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夏曾佑分析了上古神话产生的原因：“大凡人类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养生之事，次第而备，而其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备之后。其初，族之古事，但凭口舌之传”，对于这些开辟创制的故事，“不可以理求也。”<sup>②</sup> 夏曾佑的疑古思想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虽然疑古非夏氏独创，但此书将上古作为“传疑时期”，影响深远。<sup>③</sup>

192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包括黄帝在内的商以前的上古信史观念发生了动摇，一些教科书对黄帝其人的真实性表

① 戴季陶语，参阅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93页。

②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第14页。

③ 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30~537页。

示了怀疑。文化学社的《初中本国史》以“传说上的黄帝建国”为题来叙述黄帝事迹：“据古史的传说，神农氏后，初民社会，大概为多数散漫的部落。约当民国前四六〇八年顷，汉族有大英雄号黄帝者，以强盛的武力，威服各部落，并战胜炎帝于阪泉，擒杀蚩尤于涿鹿，各部落遂共推他为共主，俨然像后世的天子，中国民族正式建国的开始，或者就在于此”；“黄帝既为后人所推定的开国君主，故一切文物的发明，莫不喜托始于黄帝”。<sup>①</sup> 新亚书店的《初中本国史》分别写了黄帝建国的传说与黄帝时代开化的传说：“古代传说的帝王，到黄帝才稍有事迹可记，那时或以为已到铜器时代，或以为还在石器时代，这固然未能断定；其实黄帝有无其人，也还是问题，不过古史是这样传说罢了。”“古代史家，既然以黄帝为中华建国的始祖，于是许多文化上的传说，就集中于黄帝。”<sup>②</sup> 这两种《初中本国史》都对黄帝其人表示了怀疑，认为“黄帝”二字，系后世阴阳五行家附会“中央”二字之义所追加，不能与后世死后上谥的皇帝相提并论，所以将黄帝建国视作“传说的”较为妥当。

不少教科书的黄帝事迹处理方式与此相同，一方面叙述黄帝建国等事迹，另一方面标明其传说性质。有教科书讨论了黄帝传说产生的原因。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认为，从农业社会成立以后，自有拓辟疆土与组织政体的需要，于是产生黄帝武功方面的传说；又自有改善生活与防御敌害的需要，于是产生黄帝文治方面的传说。“他们先想象一位奠土建国的帝王，后将社会上逐渐改进的事物托始于若干突出的创作者，而这若干的创作者，又为体系的完整起见，应用君臣的名分，将他们集中于黄帝的名义之下。”<sup>③</sup> 在《初中本国史》中，周予同认为黄帝“史料仍是不足信的传说，因为古代社会一切事物的发明，都是为满足生活的需要，经过无数无名的

① 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上册，第14页。

②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上册，第20~21页。

③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21页。

创作者的试验和修改，然后产生出来。黄帝时代，经济上的生产方法已进步到耕种，政治上的组织形态已渐成国家，说社会上一般的生活工具到这时候逐渐完备，那是可以相信的；说这些都是黄帝和他的臣子突然发明，那是不足相信的”。<sup>①</sup>

一些教科书很少提及黄帝，不再突出黄帝事迹。《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简要提及黄帝事迹，把它作为上古传说，认为这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情况。<sup>②</sup>《陈氏高中本国史》简单提及黄帝与诸侯的战争，也述及上古文化创制，但未说明是何人所为。<sup>③</sup>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中黄帝事迹并未单列，而是放在“唐虞之政治”一章中，对黄帝事迹一带而过。<sup>④</sup>吕思勉的《复兴高中本国史》只是在讲述上古帝系时提到了黄帝，在讲述孔子思想时引用了《商君书》中的一段话涉及了黄帝：“《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可见炎黄之为治，是迥然不同的。”<sup>⑤</sup>这里对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未特别关注，与此前他编写的教科书有所不同。<sup>⑥</sup>朱翊新的《初中历史》只提及黄帝名字，未特别说明。<sup>⑦</sup>

从上述教科书中的叙述来看，对上古史事的处理方式，多把

① 周予同编著《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9页。

②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1册，第13页。书中写道：“中国古史，对于‘游猎时代’的传说甚少，而在所谓‘神农氏’以后，各家的半神话记载却很多；这正是从‘旧石器时代’转到‘新石器’的初期，从‘游猎’转到‘低级农业’时期，生活上发生许多可惊异而有趣味的变化，遂把他保存下来。”

③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上册，第43页。

④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上册，第58页。

⑤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第24页。

⑥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等教科书中对黄帝事迹是从史实出发予以介绍。

⑦ 沈味之、朱翊新、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第1册，世界书局，1929年6月初版，10月3版，第67页。



它们作为传说，肯定它们的象征意义，而怀疑它们的具体存在。史家对黄帝以前的史事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而难以引之为信史，就是对黄帝，也是标出“传说”字样，但认为像三皇五帝这些具体个人，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但集中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传说“合乎人类社会进化的程序”，<sup>①</sup>表明人类社会的演进程度。《现代初中本国史》对黄帝时代抱有怀疑态度，但还是将之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事情，肯定了黄帝时代诸种传说的社会意义。其所怀疑的只是作为个人的上古帝王，而对这些帝王所代表的社会进化阶段则没有疑问。《现代初中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是基本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sup>②</sup>

前引阿斗的文章也有这种看法：“平心而论，这在稍微明白中国学术史或欧洲近代史学界消息的人，决不会认为这是顾颉刚一种甚么了不得的创获，或者说这是一种甚么不稳的思想，实实在在，只是平平无奇。”但是就是这样普通的教科书还是被查禁了。对于这次查禁，顾颉刚意识到是当时形势使然：“时代不同了，他（指夏曾佑——引者注）的时代正是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来瓜分中国的时候，谁来管这古代历史的有无问题。我的时代则正是南北纷争，人民正在渴望统一的时期，国民党北伐号称成功，建都南京，各省设参议会，也要摆出一些‘民主’的架势。”国民党正是在统一的形势下，查禁了他的教科书，顾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sup>③</sup>

① 卢文迪：《历史》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第4页。关于三皇五帝的讨论，参阅第八章。

② 同时被查禁的王钟麒《新时代初中本国史》在上古叙述上则不同。王钟麒以“上古的传说”作为引端，明确宣称“三皇五帝唐尧虞舜都看作不可信的传说”，“没有信史的价值”，也没有单独提及“黄帝”。该书真正叙述从“夏商之交”开始，其根据是甲骨文和殷墟的考古发现。参阅王钟麒编《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上册，新时代教育社出版，1927，第1~5页。

③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陈引驰选编《学问之道：中国著名学者自述》，第62页。

## 五 国民党的思想控制

对此次《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案，一般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认识的，认为《现代初中本国史》否定上古史会影响到民族的自信心。如力主查禁的戴季陶就认为：“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与国家不利。”通过上文对《现代初中本国史》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理由都很难成立。把《现代初中本国史》放到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系列中考察，顾的表述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这可能正揭示了问题所在：以“民族国家”为名查禁顾著教科书只是一个借口，其背后有其他原因。

还是从教科书谈起。1929年世界书局的《初中历史》明确标明“三代”为“黄金时代”。对于“尧舜禅让”，作者写道：“尧、舜禅让，已能‘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那种民主的精神，颇影响及于中国数千年来的人心。后人因追慕此过去的黄金时代，才渴望大同之世的重现，作种种的改革运动。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常以‘天下为公’四字昭示民众，足见此黄金时代的故事，真是中华民族史中荣誉的一页。虽然尧、舜禅让，有许多疑心是春秋、战国时儒家的说法，原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孔子生于乱世，故特地宣传先王敝履天下的故事，欲借此劝勉周室诸侯，力行仁义之道，不要徒务霸术。此等见解，未尝没有琐屑的考证。但我们可不必拘泥去论断是否真有其事。即使出于假托，也可见中国在春秋之际，已有这样崇高的政治理想，未尝不可宝贵。当时的儒家距古较近，所述必有近似之处。”作者在该书注释中进一步揭示了其中原因：“近人研究中山先生的学说，谓其哲理可与孔子道统相接。孔子就是言必称‘尧舜’的人物。故中山先生的主义，也可说与尧舜禅让有关系。中山先生常将《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数语，书以示人，是其明证。”<sup>①</sup> 作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上古之事，已经超出了“信史”与“非信史”的学术范围，是当代政治理想的寄寓。

这里的“近人”，很显然就是指戴季陶。戴季陶以“道统说”来解释孙中山思想，把尧舜等上古人物视为孙中山思想的来源，构筑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基础。古代被儒家看作“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是既往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是个有圣贤出现的时期。1929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伦公开宣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sup>②</sup>

中国固有伦理道德与“黄金时代”观念不仅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依托。戴季陶曾说：“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于革命的事业。”<sup>③</sup> “国民革命的基础，第一是站在民族的自信上面。而民族的自信，更是由民族光荣的历史，发生出来。”<sup>④</sup> 黄帝的立国经历与当时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黄帝被视为救国保种的先驱而受到崇拜。1935年，国民党中央“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之灵”，祭文中除追怀先祖“创业之耿光大烈”外，反复强调“力排艰险，以复我疆圉，保我族类”。<sup>⑤</sup> 任何否认上古黄金时代的思想，都被认为有可能危及国民党的统治与民族国家的建设，遭到国民政府反对。

上古“黄金时代”观念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已经政治化。任何否认这一观念的思想，都可能对统治意识形态的挑战。近代以来，民主运动兴起，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

① 朱翊新、沈味之、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第5册，世界书局，1930，第20、22页。

②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1929年9月。

③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第8~9页。

④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第10页。

⑤ 张岂之主编《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第130~131页。

儒学是新思想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势必与国民党人形成严重的思想对立。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这一矛盾迅速上升。

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后，开始推行党化教育，加强思想控制。国民党中的一些人明显表示出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社会思想与风气的不满，把当时的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归结为陈独秀和胡适二人的罪恶；上古黄金世界仍然是他们的向往。胡适与顾颉刚开展的古史辨运动，实则开启了拆散“黄金三代”的工作，使寄寓古史的道德系统受到全面的挑战——因为这些道德不曾在上古“黄金时代”实行过，其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sup>①</sup>

疑古思想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反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顾颉刚古史讨论受到胡适的影响与大力支持。民国时期顾颉刚与胡适有着较密切的关系，<sup>②</sup>联想到稍前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上古史的处理，就可以看出顾颉刚与胡适思想的某种关联。<sup>③</sup>顾颉刚的古史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胡适的看法。对顾颉刚古史研究“会影响于我国的人心与史界”的担心，胡适认为：“否认古史某部分的真实，可以影响于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这事决不会在人心上发生恶影响。我们不信盘古氏和天皇、地皇和人皇氏，人心并不因此变坏。假使我们进一步，不能不否认神农黄帝了，人心也并不因此变坏。假使我们更进一步，又不能不否认尧舜和禹了，人心也并不因此变坏——岂但不变坏？如果我们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几千年的大骗案，于人心只有好影响，而无恶影响。即使我们的证据不够完全翻案，只够引起我们对于古史

①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295页。

② 顾颉刚与胡适之关系，参阅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顾颉刚与胡适后来学术观点有所不同，但在时人看来，顾颉刚依然属于“胡适派学人群”无疑。

③ 参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胡适在讲述中国哲学史时，对“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上古记录多不言，“截断众流，从老孔讲起”（蔡元培“序”）。顾颉刚与胡适疑古思想之关系，可参阅前引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

某部分的怀疑，这也是警告人们不要轻易相信，这也是好影响，并不是恶影响。”<sup>①</sup>对于古史讨论的意义，胡适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将来会在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sup>②</sup>

这种讨论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相悖。顾颉刚等人的教科书被控“有违党义之处”，如王钟麒日记所记：“大学院审定批回本，指摘处不惟不中肯，且竟有大谬不然者。如此滥竽充数，居然挟政治之力以临人”；“岫庐邀谈，谓《现代初中本国史》与《新时代初中本国史》被指摘已证实，纯为党争作用，大约广东方面颇不满于颉刚，故出此无聊之举耳”。<sup>③</sup>

由于古史辨运动的影响，由于胡适的身份与地位，国民党与胡适形成了思想上的直接交锋。<sup>④</sup>顾颉刚与胡适之关系，以及《现代初中本国史》和《新时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皆由胡适审订，为查禁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作为古史讨论的支持者和这两种教科书的审订者，胡适对此次查禁不无遗憾：“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胡适认为，“现在是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一个学者编了本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sup>⑤</sup>北洋政府不曾禁止的，国民政府却予以禁止了。对于此，阿斗的说法更为直接：“现在

①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90～191页。

② 参阅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

③ 王澐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第30、31页。

④ 关于此时胡适与国民党关系的讨论，可参阅杨天石《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载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⑤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1929年9月。

不同了，国民党既已握了政权，孙逸仙已成了半人半神的总理兼教主，他们希望一党专政传之无穷，因此不能不把他们先总理的‘道统’所自传的尧舜禹汤……等等，加以迷信的拥护！”<sup>①</sup>胡适从“思想自由”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可能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影响民族自信力”只是一个借口，其背后则是国民党的文教政策。

## 小 结

1930年，顾颉刚在讲述中国上古史时，对古史研究情况介绍说：“这一学期所讲的，是我们古史中的一个最大的症结。这个症结自从发生以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在信奉，就是对它怀疑的人想要攻击它，也因各方面的材料都给弄乱了，寻不到一个头绪，无法下手，攻击既不可能，于是编起古史来，虽明知它是荒谬，也不得不依声学舌，照钞一遍。一方面，又因帝系既是道统，而道统是国性国本之所系，所以这一个系统就成了国家的功令，伦理的中心。有不信的就是离经畔道，该在诛灭之列。因此，即使有人能想出方法去解开这个症结，但在专制时代也是不敢做的。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从王莽时代直到清代，这一千八百年之中，这个破绽甚多的系统却能安稳地维持下去，统一所有的历史书。”<sup>②</sup>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顾颉刚显得很无奈，显然是深受这次教科书案件的影响。

1934年，张荫麟在讨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时，对这次事件还记忆犹新：“课本的编纂，是学者的事，但它能否通行，权却在政府。以我们所知，好几年前有一位很适宜于编历史课本的人，编了一部至少在当时比较算是高明的历史课本，但因为其中有些意见和一位没有读过多少历史，也不大肯运用神经系统的达官不合，那部书便

<sup>①</sup> 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载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352页。

<sup>②</sup>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第8页。

在出版界中忽然绝迹了，而且替它出版的书店也几乎受累。这样的情形，是很足以使有志于编纂历史课本的人灰心的。”<sup>①</sup> 张氏此言，可谓是从学术立场表达了对顾颉刚等人的同情和对政府查禁政策的不满，也代表了一部分学者对此事的看法。

本章以 1929 年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案为中心，讨论了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中，政府和执政党通过民族国家的名义谋求自己的集团利益。在整个事件中，“1929 年”无疑是个关键词。<sup>②</sup> 1928 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实行一党专政的文化政策。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统一完成之后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控制，任何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言论都在查禁之列。<sup>③</sup> 国民政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新思想，试图将之纳入自己的言论轨道。由于《现代初中本国史》的编者与胡适等新文化人的关系，选择《现代初中本国史》作为查禁对象，当具有“最佳”的警示作用。而这一时期的民族国家危机，又给这一事件本身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更自觉地注意以学术来疗救时弊。时代变局使得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无法再坚持客观的学术初衷；处于时代变局中的知识分子，在现实需要与学术客观之间，不免有所偏倚。<sup>④</sup> 《现代初中本国史》试图坚持“信史”学术立场，多少显得“不合时宜”。

这个教科书案还涉及《现代初中本国史》中的疑古倾向与古史辨运动中的疑古思想是否相等同的问题。如前分析，《现代初中本国史》与古史辨运动的疑古思想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初中本国史》关

① 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第 2 期，1934 年 9 月 28 日。

② 参阅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 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参阅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④ 参阅彭明辉《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麦田出版社，2002，第 77 页；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自序”第 1 页。

于上古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基本一致。戴季陶力主查禁的是这样一种原是很普通的教科书。戴对《现代初中本国史》中疑古思想的恐惧，应是主要来自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运动，对《现代初中本国史》中的疑古思想可能危及上古黄金观念而动摇民众的信仰极为担心，所以主张由政府出面予以查禁。在该案中，戴等人将《现代初中本国史》中的疑古倾向与古史辨运动中的疑古思想相等同，认为会“动摇国本”，实是与古史讨论中反对疑古运动一方的言论如出一辙。对于顾颉刚、胡适等人来说，就是意识到了《现代初中本国史》与古史辨运动的区别，在强大的国家话语面前，也难以辩白。整个教科书案，实则是思想冲突下的一个政治事件，是国民党以“民族国家”之名来行“党化教育”之实。



## 第十五章

# 教科书案（下）： 《白话本国史》案

在中国历史上，岳飞有重要的地位。岳飞被视为南宋时期抗金的重要人物，在宋金对峙中，岳飞战功卓著，要求恢复中原而主战，被力持和议的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自南宋孝宗以来，岳飞开始受到朝廷的肯定，其精忠报国的形象开始逐步确立，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与英雄人物。岳飞抗金之忠义和含冤而死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激励着国人，在国家历史与民间记忆中都有一定的位置。清末以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都有与岳飞相关的叙述，但对岳飞的评价存在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白话本国史》因为岳飞叙述问题而被南京政府责令修改，引发教科书案。本章承续上一章，继续讨论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案，通过考察《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以及政府对英雄人物的态度，讨论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一些学校将其用作教科书或辅助教材。1935年3月，南京市政府责令商务印书馆修改《白话本国史》，原因是该书“丑诋岳飞，推崇秦桧”，有人以此向法院控告商务印书馆及吕思勉，形成影响一时的教科书案。关于这一事件的过程，学界或有关注，但对其发生的原因及其所显

示的意义，尚需进一步发掘与讨论。<sup>①</sup> 本章拟从事件的发生与处理方式入手，结合当时的历史教科书来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增加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 一 《白话本国史》之编写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编写的一部历史教科书，标明为“自修适用”，1920年吕思勉拟定写作序例，1922年完成全书的编撰。<sup>②</sup> 该书叙述了从远古到1922年间的历史，分为五期，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统一到唐全盛时；近古史：从唐中叶以后到南宋；近世史：从元到清中叶以前；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全书也相应地分为五编，共四册。该书出版后，得到较高的评价，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的通史”。<sup>③</sup> 据张耕华的研究，该书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以来被用作大学的教本，也是青年自修读物，对当时的史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sup>④</sup>

揭示历史真相是吕思勉治史的一个目标。求真史是史学的应有之义，但史学往往受“以史为鉴”等影响而失真。吕思勉反对以史为鉴，坚持追求真相。<sup>⑤</sup> 在1916年《关岳合传》一书中，吕思勉介绍关羽和岳飞的事迹，希图对关羽与岳飞等英雄人物的真相加以说明。

① 关于此案讨论，参阅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第142~149页；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8~465页；王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等等。

②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前言”第2页。或认为《白话本国史》第1册初版于1920年，参阅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571页。

③ 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86页。关于时人对《白话本国史》评价，参阅该书第286~289页。

④ 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第92页。

⑤ 参阅虞云国《论吕思勉的新史学》，《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



图 15-1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1923

吕思勉认为，英雄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社会上也崇拜英雄，但是需要弄清楚英雄的真相，不可盲目崇拜。“凡一军略家之出世，实能为全社会之人捍御外敌，使克保守其前此之所有，又能为此社会树立声威，巩固基础，使获若干年之平和，益致力于他种之竞争，以图自存之计，其功可谓大矣。其受人之崇拜，亦宜。虽然，是亦可以误其真相乎？则所谓画虎不成非徒无益，且又有害者也。”<sup>①</sup> 当时民众崇拜的英雄莫过于关羽与岳飞，但对关羽与岳飞事实真相，已很少有人知道。不知道英雄真相，“则亦终不能崇拜英雄，模拟英雄，而真英雄终无由出世”。<sup>②</sup> 揭示英雄人物的真相是吕思勉编写此书的目的。

吕思勉认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更应坚持求真立场。近代中

① 吕思勉：《关岳合传》，中华书局，1916，第4页。

② 吕思勉：《关岳合传》，第42页。

国的民族危难，使得历史教科书自清末出现起，就担负起振发国民志气、拯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对利用历史教科书激发爱国精神的做法，吕思勉表示反对。其在编写的数种历史教科书中，都秉持客观的态度。1924年，吕思勉出版了《新学制高中本国史》，该书与《白话本国史》几乎同时出版，有助于了解吕思勉对《白话本国史》编写的思考。关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的编写，该书写道：“本书力矫旧时历史偏重政治方面之弊，然仍力求（1）正确及（2）有系统。须知道偏重政治方面固然有弊，然而矫枉过正，拉着什么书就抄，不管他正确不正确，而且都是些断片的事实，并没有系统——单独的事不论属于那一方面都是没有意味的——其流弊亦很大。”<sup>①</sup> 该书以中华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历代政治治乱兴衰以及中国文明的发展与变迁为线索，注重社会学的思维方法。<sup>②</sup> 求真自是该书的基本要求，吕思勉指出：“研究科学，贵在注重客观的事实，减少主观掺杂的成分……编纂历史教科书，则更甚一层。因为倘将编者的意见参入，不但减少学者研究的精神，而且教者与编者，意见不同，便生窒碍。所以本书只叙事实，不参议论。”<sup>③</sup> 在1934年的《复兴高中本国史》中，吕思勉再次强调“史事叙述，最宜忠实”，“编教科书，自不宜羸入议论”。教科书在激发国民爱国精神时，很可能会发空论或有偏激穿凿之谈，影响学生对历史真相的理解，“利用历史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等等，亦为有失忠实之道”；在激发学生爱国精神与书写历史真实之间，吕思勉认为首先要书写真的历史，学生“读了某种史实，自然会感动发愤的”。<sup>④</sup>

《白话本国史》的编写坚持了求真立场。在序例中吕思勉指出，

①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例言”第1页。

② 张汉林：《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

③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例言”第7-8页。

④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上册，“例言”第3、5页。

近来出版的一些历史书不能揭示历史的真相：“（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的主观臆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白话本国史》在编写上，“把中国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又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抄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sup>①</sup> 吕思勉特别指出，历史研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对史料进行甄别与使用，以求得历史的真实。<sup>②</sup>

在编写《白话本国史》前后，吕思勉受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影响，强调科学治史，重新估定一切价值。<sup>③</sup> “我们现在的学术界，是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呢？是处在无论哪一件事情，都要重新估定其价值的时代”；研究历史，不论何种史书，“都可以拿它当作史材。不管它是古代曾经重视的而现在不重视的，或者是古代轻视的而现在重视的，都该一律平等看待”。<sup>④</sup> 《白话本国史》“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可谓是吕思勉整理国故的一种实践，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打破陈说，提出新看法，“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条”。第二，注重考据，要把《白话本国史》做成“一部《新史钞》，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钞出来给大家看看”。<sup>⑤</sup> 第三，平等地对待各种材料，如关于宋金和战的叙述，所依据的材料有《宋史》《金史》《廿二史札记》《文献通考》等，吕思

①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序例”第1页。

②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绪论”第9页。

③ 参阅王刚《时势与理路：“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的史学道路》，《史林》2014年第2期。

④ 《乙部举要》（2），载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497~498页。

⑤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序例”第2、1页。关于《白话本国史》的编写情况，参阅康桂英《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李波《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勉不迷信《宋史》，特别指出：“《宋史》中的议论，全是一偏的。须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sup>①</sup>因此，其宋金和战叙述多取材于《文献通考》。

《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出版后，多次再版。据张耕华的研究，1926年重印《白话本国史》第4版时进行了一次修订，主要是修改了关于义和团评价。<sup>②</sup>九一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要求作者对宋金和战的论述进行修改和删节，改褒秦桧贬岳飞为贬秦桧褒岳飞，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至1935年4月，修订本发行到第4版。<sup>③</sup>

## 二 《白话本国史》中关于岳飞的叙述

1935年，南京市政府要求修改以及被人指控的《白话本国史》都是1933年版。这里就该版中的岳飞叙述介绍于下。

第一，关于宋金和议时的形势。宋金双方的形势是整个和议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对岳飞与秦桧的评价。吕思勉认为，从实力对比来看，和议对南宋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宋朝南渡之初，没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军队：“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地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sup>④</sup>“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足所至”；“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

①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第49页。

② 张耕华、朱伟明：《〈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

③ 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第144~145页。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记为，《白话本国史》第1册1926年第4版，1935年国难后1版（见该书第571页）。

④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第76页。

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sup>①</sup>这样的军队毫无军纪可言，不足依靠。宋金对峙中所取得的几次胜利，不足以抵御金朝的进攻。宋对金取胜的几次战争，或事出偶然，或被后人夸大。《白话本国史》认为和议是无奈之举，这实为评价岳飞与秦桧确立了前提。

第二，关于岳飞的战功。岳飞的战功是岳飞评价的关键，英勇抗金、力图恢复中原是岳飞被视为民族英雄的依据。吕思勉认为，岳飞出身于群盗，受政府招安，并非忠勇无敌，只在郾城打了一个胜仗，郾城以外的战绩，全是莫须有。如“郾城大捷”，吕思勉写道：“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稀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潞、汾隰、晋绛，皆期日与官军会’、‘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真是说的好听，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sup>②</sup>岳飞出身盗贼，看不出其战功，也看不出其忠勇，表现的是一种自私与畏缩。从此叙述可见，岳飞不仅不是民族英雄，甚至也不能称作一个称职的将领。

第三，关于秦桧的评价。秦桧因为主持和议、杀害岳飞而一般被视为奸臣，但吕思勉认为秦桧是爱国的忠臣。秦桧反对割让三镇，反对金国立张邦昌才为金人所执。对于有说秦桧是金人暗中放回以图和议的，吕思勉反问道：“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

①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第83页。

②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第83页。

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宋，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挾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吕思勉为秦桧辩护：“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然而主持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sup>①</sup>

第四，关于岳飞被杀与和议的评价。宋朝南渡之初，最窘迫的是诸将的骄横。当时诸将主战，不是真正关心国事，而是想通过战争来把控兵权。“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关于一般常言的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掉岳飞，吕思勉指出，张宪谋还岳飞兵柄，并不是莫须有的事。宋朝兵由朝廷节制，帅臣不得节制。“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对宋朝构成重要威胁的，不仅仅是外面的金朝，还有内部的武将，不收拾诸将兵柄，“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杀掉岳飞、解除武将兵柄后，“江左得以稍安”。<sup>②</sup> 岳飞骄横，拥兵自重，威胁到朝廷；秦桧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坚持和议。

《白话本国史》认为南宋与金和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收回武将的兵柄，宋朝才可以立国。这里，岳飞成为骄横军阀的代表，既无特别的御外军功，又无真诚的爱国气节；而秦桧是爱国忠臣，为了和议承担了很大的冤屈。这里的叙述，与民众对岳飞、秦桧的印象有很大不同，引发了国民政府的查禁。

<sup>①</sup>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第81页。

<sup>②</sup>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第86、88页。



### 三 《白话本国史》案

《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南京市政府要求查禁《白话本国史》，二是社会上有人起诉商务印书馆与吕思勉以及相关人士。这两个部分都是由《白话本国史》中的岳飞叙述引发的，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视为一起事件。

1935年3月，南京市政府查禁《白话本国史》，认为《白话本国史》于“宋金和战”持论反常，训令社会局严禁该书在未删正前在本市销售，同时函请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进行查禁。训令写道：

查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第三编，近古史下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第一节“南宋初期的战事”内称：“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地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内称：“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挺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又称：“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都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的追逐”等语。按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该书上述各节，摭拾浮词，妄陈瞽说，于武穆极丑诋之能，于秦桧尽推崇之致，是何居心，殊不可解。际此国势衰微，外侮凭陵，凡所以鼓励精忠报国之神，激扬不屈不挠之意志者，学术界方当交相劝勉，一致努力。乃该书持论，竟大反常理，影响所及，何堪设想。除函请中央宣传委员会，严飭该书著作人，及商务印书馆将上述各

节，迅即删除改正，在未删改以前，禁止该书发售外。合亟令仰该局，即便遵照，严禁该书在本市销售，并通飭各级学校，禁止学生阅读，以正视听，而免淆惑。切切！<sup>①</sup>

南京市政府公報 公牘

五〇

「案查前經公布尚未施行之森林法，現奉 國民政府明令，定於本年三月十二日起施行，其施行規則亦經本部於本年二月四日以部令公布，各在案。所有各地方以前頒布之各項林業單行法規，凡與森林法及其施行規則抵觸者，當然無效，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法修正，送部查核備案。除分咨外，相應檢同森林法及森林法施行規則各一份，咨請查照，轉飭遵照。」

等由，計送森林法及森林法施行規則各一份，准此。合行抄發原件，令仰遵照。

此令。

市長石 瑛

禁止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於未刪正以前在本市銷售案

▲訓令社會局：為商務印書館發行之呂思勉著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於宋金和戰，待論反常，令仰嚴禁該書於未刪正前，不得在本市銷售由。

訓令第二三一五號 廿四年三月五日

查商務印書館發行之呂思勉著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第三編，近古史下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戰，第一節，南宋初期的戰事內稱：「大將如宗澤及韓岳張等，都是招草寇而用之，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就自然騷擾起來，其結果反弄成騷擾卒情的樣子。」第二節和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剷除內稱：「我說棄槍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膽力負責任之處，能看得出慙慙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除韓岳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後世的人，却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歎了。」又稱：「岳飛只郾城打了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都是莫須有的，最可笑的，宗炳渡江的時候，岳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等語。按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為千秋定論。該書上述各節，摭拾浮詞，妄陳贅說，於武穆極醜詆之能，於秦檜盡推崇之致，是何居心，殊不可解。際此國勢衰弱，外侮憑陵，凡所以鼓勵精忠報國之精神，激揚不屈不撓之意志者，學術界方當交相勸勉，一致努力。乃該書持論，竟大反常理，影

圖 15-2 南京市政府查禁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

① 《禁止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于未刪正以前在本市銷售案》，《南京市政府公報》第 151 期，1935 年 3 月，“公牘”第 50~51 頁。

责令删正《白话本国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书的岳飞叙述与民间关于岳飞、秦桧的记忆有很大差距，一般民众难以接受。训令指出：“按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白话本国史》丑诋岳飞，推崇秦桧，颠覆了民众心目中的岳飞“忠臣”、秦桧“奸臣”的印象，会造成民众历史观念的混乱。二是不利于激发国人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际此国势衰微，外侮凭陵，凡所以鼓励精忠报国之精神，激扬不屈不挠之意志，在学术界当方交相劝勉，一致努力。”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处于民族危机之中，需要借助民族英雄事迹来激发国民志气，挽救民族危亡。《白话本国史》说岳飞出身盗贼、不抗金、没有战功，有损于岳飞的民族英雄形象，不能振发民族精神。

有人以“媚日”与“外患罪”控告商务印书馆和吕思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意见，引发了社会上对《白话本国史》的讨论，甚至有人指斥吕思勉为“汉奸”。1935年5月，《救国日报》报人龚德柏认为《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的议论，谓岳飞、韩世忠为军阀，秦桧为大政治家、大爱国家，是赞扬秦桧而贬岳飞等以趋时媚日，向法院控告商务印书馆及吕思勉“犯外患罪及违反出版法”。江苏上海地方法院宣布不予判决。法院认为，《白话本国史》不依据确定正史推崇岳飞等，乃称根据《宋史》本纪、《金史》、《文献通考》、赵翼《廿二史札记》以褒秦桧而贬岳飞等，其持论固属不当，无怪人多指摘。该书出版较早，“在我国东北之地未失以前，与现在情形不同，自非别有作用，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以法律言，即非破坏我国三民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妨害善良风俗”。该书没有犯外患罪，也不违反出版法，决定不予起诉。<sup>①</sup>

<sup>①</sup> 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62页。另参阅王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

《白话本国史》1923年出版，1935年才被起诉，与1930年代的形势有很大关联。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很快沦陷，此后，日本继续扩大侵略，成立伪满洲国，准备侵占华北。日本侵略激起了中国民族意识，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御外侮；日本侵略也让一些人背弃祖国，投靠日本，成为可耻的汉奸。《白话本国史》中贬低岳飞的叙述，被认为不利于利用民族英雄来激发国民志气，抵抗侵略；其中褒扬秦桧的叙述被认为是为投靠日本的汉奸、卖国贼辩护，不利于弘扬民族正气，反对卖国求荣、投降日本的汉奸行为。南京市政府的指斥与龚德柏的诉讼，都是从当时的情势出发，认为在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下，《白话本国史》的叙述不利于民族国家。

民族危机是引发该案的重要原因。吕思勉所编教科书被认为难以激发民族精神。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在国民教育中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历史教学中尤其注重近代中国所受的外国侵略。吕思勉所编的教科书被指为民族观念薄弱，这从时人对吕思勉《高中本国史》的评论中可见一斑。《高中本国史》“事实叙述方面，似乎纯取客观态度，对于进化观念、现代观念、民族观念，都异常淡薄，离开事实所发出的议论，又过于‘不落边际’，不足以教学生激发民族思想，明了先民伟绩，探讨现代问题”。这里特别提到教科书的作用。教科书为学校教学上一件重要工具，以复兴民族相号召，以民族复兴为努力。但《高中本国史》很少有鼓动民族精神的材料，“民族英雄故事，民族胜利战绩，民族文化发展，民族之大发明，民族悲痛牺牲，民族壮烈诗歌——或略而不谈，或述而不详，或详而不加宣扬，反而曲解”。像岳飞、韩世忠、刘琦诸将“还我河山”的民族之战，“都是在轻描淡写中过去了”。<sup>①</sup> 吕思勉所编教科书坚持求真立场，对民族问题叙述简略，不能够激发民族精神，难以完成历史教育的任务。

<sup>①</sup> 熊梦飞：《评吕著高中本国史》，《教与学》创刊号，1935年7月。

“自南宋以来，岳飞在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爱国的典型，受到无比的崇敬。尤其当国家处于忧患时期，为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遂以‘精忠岳飞’作为教育人民的题材。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抗战胜利，岳飞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称颂的民族英雄。”<sup>①</sup>《白话本国史》的叙述背离了民族危机中的中国借助民族英雄叙述来激发国民志气、反抗日本侵略的要求，但该案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 四 民族英雄叙述的尺度：南京国民政府对历史人物的扬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生了多起教科书案。1929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查禁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和王钟麒的《新时代初中本国史》。相较而言，国民党政府对《白话本国史》的处理较为温和，法院则对控告不予起诉。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待岳飞等民族英雄的矛盾态度。

南京国民政府极为尊崇岳飞。1928年，南京政府为强化国家意识，开展“反迷信”的社会运动，整顿各地庙宇神祠，清理各种神人崇拜，在“先哲类”规定了四条原则：促进民族发展、促进学术发明、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忠烈孝义。符合这四条标准的有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岳飞、关羽等12个人。南京政府对岳飞的评价是“精忠报国，富于民族精神”，<sup>②</sup>对岳飞非常推崇。193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更加重视岳飞的影响。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岳飞、秦桧为例说明要团结御侮：“宋时岳飞之厄于金人，并非岳飞战斗能力薄弱，实在是见忌

① 王德毅：《岳飞的历史地位——兼论民国以来的岳飞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70年第2期。

② 岳军：《岳飞思想研究动态的回顾》，见岳飞网 <http://www.yuefei.net/bbs/thread-2943-1-1.html>。

于当时在后方的奸人秦桧，以致功败垂成。当岳飞在前方苦战胜利的时候，在后方忽然发了十二个金牌，命他班师。我们想到这里，便觉得我们中国国民党要立志救国，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尤其在后方没有秦桧那样汉奸来掣肘或中伤，才能达到御侮却敌的目的”；“为救亡御侮而牺牲，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sup>①</sup> 蒋介石将岳飞视为民族英雄，称秦桧为“汉奸”，希望借助岳飞英勇抗金的影响来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但是，南京政府对岳飞的尊崇有一定的限度。南京政府将岳飞视为民族先哲与英雄，却取消了民初的国家祭祀岳飞活动。1914年，民国陆海军部呈请北京政府建立武庙，合祀关、岳：“时方多难，宜右武以崇忠”，“关壮缪翊赞昭烈，岳武穆独炳精忠。英风亮节，同炳寰区，实足代表吾民族英武壮烈之精神”；“诚以忠武者，国基所以立，民气所以强。当此民国肇兴，要在尚武”。北京政府将岳飞等人视为民族之楷模，列诸典礼，“庶振袍泽之气，用臻强盛之庥。凡我国人民皆当知崇厥武祀，实以壮军志而固国维”，<sup>②</sup> 以达到扭转“多难”时局的目的。“右忠”“尚武”是北京政府祭祀关羽、岳飞的政治因子，关羽、岳飞的神圣化，就意味着“武治主义”的神圣化，它可以从文化层面上论证北京政权的存在状态和运作机制的合理性。<sup>③</sup> 民初国家祭祀关、岳，与军阀政权有一定的关联。军阀政权的支柱就是军人，它需要培养效忠于军阀的武装力量，这是军阀政府极力提倡尚武教育的重要原因。<sup>④</sup> 军人政治和军阀们所崇尚的尚武精神，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不利于国家统一，也是当时军阀混战与社会动荡的一个原因。以反帝反军阀为号召的北伐与国民革命胜

① 《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载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史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9、60页。

② 《政事堂礼制馆呈遵拟关岳合祀典礼乐谱呈请核示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1035号，1915年3月27日，第53册283页。

③ 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第151页。

④ 参阅韩玉霞《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

利后，1928年，南京政府通令取消国家祭祀关、岳。

南京国民政府要消除军阀政治，加强中央权力。1928年，南京政府宣布完成国家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南京政府内部派系丛生，在消灭了北洋旧军阀之后，又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地方实力派名义上加入国民党，拥护南京政府，实际上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动员全民族力量，但一些地方实力派以保存实力为主，不服从中央命令，甚至以军事实力威胁中央，以致蒋介石认为，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sup>①</sup> 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指出：“救亡图存，有赖于国力之充实。而欲求充实国力，则必先谋全国真正之统一和平。中央与地方彻底树立互信共信之基础，推诚扶掖，同循政治正轨，实为达到和平统一之惟一途径。”<sup>②</sup> 南京政府强调剪除军阀，以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侮。

民族危机与加强国家统一的现实要求，在对岳飞等民族英雄的评价上有所反映。在民族危机下，南京政府尊崇岳飞为民族英雄，突出的是岳飞抵抗外族入侵的事迹，以养成国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在反对军阀割据、加强中央权力的要求下，南京政府对岳飞的叙述有一定的选择性，即把岳飞叙述限制于抗金事迹中，淡化岳飞“武将”身份，“武烈”形象不再彰显，甚至被有意地加以掩饰，以减少“军阀”影响，维护国家统一。<sup>③</sup>

① 参阅吴贤辉《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

② 《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载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244页。

③ 这两个方面可见：一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行的历史教科书，参阅金兆梓《新编高中本国史》，徐映川、傅纬平《复兴历史教科书》，周予同《本国史》，余逊《余氏高中本国史》，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初级中学历史》，等等。二是一些宣讲民族英雄事迹的出版物，参阅范文澜《大丈夫》，开明书店，1930；易君左《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镇江江南印书馆，1933；裴小楚编著《中国历代民族英雄传》，大方书局（原书未见版权页）；等等。

《白话本国史》中的岳飞叙述，有着明显的反军阀意图，又为南京政府所需要。一向反对“以史为鉴”的吕思勉，在这里表达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否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吕思勉将宋金和战时期的人物联系到现实中的军阀：“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sup>①</sup>吕思勉对岳飞和秦桧的这种叙述，“用意不过是深感当时军阀势力之祸国殃民，加以南宋史料中对当时军人的拥兵自重确有反映，才据以抨击当时军阀”。<sup>②</sup>《白话本国史》的叙述，实际上表达了对当时军阀政治的不满，是对军阀政治的一种抗议。

《白话本国史》中的岳飞叙述，不利于在民族危机中动员民族力量以抵抗日本侵略，但有利于南京政府反军阀政治、加强国家统一，所以政府责令其修改。该案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南京政府对民族英雄叙述的尺度：突出他们反抗侵略的一面，而弱化他们的武将身份，警惕他们对军阀政治的影响。

## 余 论

《白话本国史》案的影响究竟如何，或许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他历史教科书中的岳飞叙述可做参照。

<sup>①</sup>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册，第89页。

<sup>②</sup> 卞孝萱：《吕思勉自述治学》，《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岳飞叙述，出现多样性的态势，此前关于岳飞的几种叙述方式在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还保持着。<sup>①</sup> 此时期大多数教科书都采取了肯定岳飞的叙述，有的称岳飞为民族英雄；<sup>②</sup> 但是，对岳飞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一是贬低岳飞的叙述。北新书局的《北新本国史》与文化学社的《高中本国史》即是如此。《北新本国史》说到当时宋金实力对比，认为宋朝内部不安定，和议有道理：“桧之杀飞，实别有苦衷。”“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浚、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廩稍为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债

- ① 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的看法值得注意。该书对宋金和议的过程未做具体叙述，也未提及岳飞与秦桧之名，而是侧重于和议的必要性以及忠奸之辨方面。“宋朝尚未甚衰，盖忧国之士，以和议为污辱，故有以身许国之人，要击金之偏队孤军，以博一时之胜利。当此时以和议保国者，亦无理由以答主战保国者，不待言也。然战则能复中原否？此时尚不可料也。盖南宋之初，河南、陕西等地，尚为己有，及其入金，则实为主战之结果也。毕竟南宋之命运，战亦败，不战亦败；然则我挑战，则败急，自彼来战，其灾缓。”田口认为，当时主战的一些人主要是从气节方面考虑，没有注意到宋金双方的实力对比。从实力对比来看，战争南宋必败，因此和议有必要。

《中国文明小史》对涉及和战的忠奸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书认为和战问题不涉及忠奸问题，主战派不了解形势，而主和派也不被人理解。“当此之际，非有非常之达见者，必主战而非和；是故主和执政者，即令为卓越之人，然其行为言语，亦不能得忧国者之心，何则？民间之志士，多暗于事情，于是不当局面者，怒主和执政者之举动，吐非常激烈之语。而执政者怒论客不通事情，妄害其政略，互相目为奸邪。于是乎，志士试暗杀，执政者利用狱禁，此必然之势也。而后世历史，皆由当时民间志士之举，采寻而成，有因其语气相殊褒贬大异而误事实者，南宋之事实是也。”

《中国文明小史》认为主和之人“有非常之达见”，主持大局，不顾众人反对坚持和议：“此人以身许国，不顾世之谗谤詈骂，惟求其国家之安，固易睹之事也。然南宋之国事，至于议和者，则又非因此人之势力，实因其数数败北，其势不得尔尔，无可疑也。”尽管没有提及岳飞、秦桧之名，实际上叙述的正是岳飞、秦桧之事。相较于视秦桧是奸臣的认识来说，这里是在为秦桧辩护。参阅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刘陶译，广智书局，1903，第114~116页。

- ② 如“国定本”《初级中学历史》叙述了岳飞的战功以及秦桧一日以12道金牌召回岳飞，认为岳飞“抱恢复中原的大志”，以莫须有罪名将之杀害，“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就此冤死了！”参阅宋延庠、蒋子奇、刘祖泽、聂家裕编辑《初级中学历史》第3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5年上海白报纸本初版，1946年95版，第33页。

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沮弊，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sup>①</sup>《高中本国史》认为当时宋处屡败积弱之余，盗贼满野，金兵不复南侵，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江淮以南得以稍安，此时北上击金，不会成功。秦桧和议是因应时势的表现，秦桧受到后世误解实是“义理”作祟：“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议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剀切动人，其文字又激愤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这里为秦桧辩护，“后世因多谓桧主和误国，殊不知正未必然也”。<sup>②</sup>

二是淡化岳飞的影响。一些教科书在叙述宋金和战与岳飞事迹时较为简略，刻意回避讨论岳飞的身份和地位。《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中写道：“高宗南渡之后，虽也曾交战频年，勉力支持，到底还只得屈服请和。”<sup>③</sup>《朱氏初中本国史》中写道，金人“大举南侵。那时宋名将刘琦、韩世忠、岳飞等人，声势很盛，把金兵先后打败。但是当时宋国的国库已空，饷项不济；而群盗生心，更不能放胆直干。所以秦桧坚决主和，一日之间，发了十二金牌，把岳飞召回，请金和议”。<sup>④</sup>中华书局《初中本国史》中写道，岳飞抗金取得胜利，“正想乘胜追过黄河，只因那时宰相秦桧力主和议，连用十二道金牌，强将岳飞及其部队撤回。宋金两国于是订立和约”。<sup>⑤</sup>《新生活初中本国史》中写道：“金人南侵，然赖宋将岳飞、韩世忠、吴

①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上册，第177页。

② 孟世杰编著《高中本国史》下册，第36~37页。

③ 王钟麒编辑《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上册，第107页。

④ 朱翊新编著《朱氏初中本国史》第2册，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1934年4版，第29页。

⑤ 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1933年初版，1934年10版，第61页。

璘、吴玠、刘琦等的抵御，终未得再行渡江，且有规复河北之势。乃宋将秦桧，与岳飞等诸将意见不合，遂于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和议成。”<sup>①</sup> 这些教科书对宋金和议一带而过，没有述及岳飞被杀一事，弱化了岳飞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发生于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此案加强历史教育，以振发国民民族意识，查禁不利于民族救亡的相关叙述。但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来看，上述教科书在1935年后大多继续使用。由此可见，《白话本国史》案似乎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1950年代，吕思勉回忆《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时说道：“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sup>②</sup> 就吕思勉而言，他一直坚持求真立场，反对以史学来进行道德教化和激励民族精神；但是，他绝不是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而是深刻关注着民族国家的兴亡，是位热情但又不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sup>③</sup> 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中，如何处理历史真相与利用历史资源培养民族意识的关系，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①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第2册，大东书局，1934，第76页。

② 《自述》，载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5页。

③ 参阅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史林》2008年第1期；田亮《略论吕思勉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 结 语

本书是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主要讨论了教科书的编写及其民族主义叙述，希望能够深化教科书研究，引起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思考。结语部分从四个方面——教科书知识的性质：国家意志与个人观点；历史教科书的功能：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历史教育的本义：个人与国家；历史知识：建构与反建构——来总结全书。

### 一 教科书知识的性质：国家意志与个人观点

一般教科书研究，很自然地将教科书视为政府教育目标与要求的体现物，认为教科书反映的是国家意志，体现了政府的教育要求。这是注意到教科书编写中政府与编者“合”的一面，相对忽略了二者“分”的一面。本书的讨论说明，在教科书编写中，编者与政府有所分合，使得教科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政府的教育要求成为问题。本研究讨论教科书中国家意志与个人学术观点的关系，希望能够引发对教科书知识性质的一些思考。

政府与编者在教科书编写中既有共同的诉求，也有一些差异，

一起促成了教科书知识生产。一方面，编者与政府有一定的共识，这在利用历史教育来拯救民族国家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清末编者与清政府在依靠历史教育来“激动爱国精神”这点上基本相同，使得编者和清政府有着某种一致性。民初，政府注重“共和国民”的培养，希望通过历史教育来塑造新式国民，学者和知识分子也希望通过历史教育来养成共和国民精神。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在日趋紧张的时局与民族危机面前，编者与国民政府一起，利用历史教育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挽救民族危亡，“其中固有国难当头的原由，同时也是史家们主体意识觉醒，对民族前途命运担忧，自觉担当起历史使命的突出表现”。<sup>①</sup>近代中国特殊的时势以及国家富强的希望，使得在教科书编写中，编者在某些问题上会与政府的要求一致。

另一方面，编者与政府的教育目标又有所疏离，个人意志在教科书中有所表现。编者与政府在历史资源运用上的某种共识，并不能缩小或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首先，编者对教育目标的态度与政府未必一致。对于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一些编者就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也使得一些人不满。编者的这种态度，也会被带到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中，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其次，编者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也未必与政府一致，在一些问题上明确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培养新式国民、建立新的国家既是编者的目标，也是政府的希望，但是，编者与政府对“国民”与“国家”的理解不同。第一，在国民方面，清政府希望养成的“国民”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养成的“国民”是忠于“党国”的国民；编者的“国民”开始注意到个人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各项权利与义务。<sup>②</sup>第二，在国家方面，清政府

① 富兵：《1927~1937年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

② 参阅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

的“国家”更多是指朝廷，爱国首要是维护清朝统治，国民党的国家主要是指党国；而清末编者的国家观念显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朝廷意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编者观念中的国家不是党国，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具有现代的国家意识。此外，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岳飞等的评价，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中国上古史事、民族起源等的评价，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体现了编者的个人意志，与政府的教育要求有一定的距离。

笔者希望从教科书编写的讨论中，能够增加对教科书性质的认识。实际上，教科书体现政府教育要求的情况还有待具体分析。教科书是按照政府的教育宗旨和课程标准来编写的，这是教科书与一般历史著述的不同，也是把教科书视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物的主要原因。但是，对编者来说，编写教科书也是撰写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编纂的一种形式，编者很难去除自己已有的认识与立场。“从一开始，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回答的时候，就已经涉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面对一个时期的历史或一系列历史事件，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能否写出这段历史，实在是大可怀疑。”编纂历史的学者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解释。<sup>①</sup>从教科书编写过程来看，编者个人的认识还会以多种方式被带入到教科书中，使得一些教科书具有个人研究的色彩，也可以被视为一般历史著述。一些史家如柳诒徵、夏曾佑、刘师培、陈庆年、章铤、顾颉刚、王钟麒、吕思勉、金兆梓、缪凤林、梁园东、周予同、罗香林、杨人榘、杨东莼等编写的教科书，是他们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不同教科书之间有所不同，即便是依据同一课程标准编写的教科书也有差异。可以说，教科书是政府与编者共同编写的，两者的意见在其中都有所体现。

那么，教科书传授的到底是什么知识？一般认为，教科书传授

<sup>①</sup> F. A. 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2页。

的是大多数人认可的知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清末民国时期对教科书的查禁以及教科书案可以说明，这种认识需要具体分析。如果结合书局来讨论，教科书知识的性质可能会更为明确。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知识载体，同时也是一种商品。书局希望教科书这种商品能够给它带来利润。为此，书局从编者选择，教科书出版和发行，到学制与课程标准制订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系统，以保证教科书的推销。编者与知识精英通过对知识生产途径的控制，垄断对民族国家的解释权，将其利益与对民族国家的特定解释结合起来，使民众难以接触到不同的声音。<sup>①</sup> 例如，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就是以江浙人士为主，大多有着地缘与学缘上的关系，有可能会将某一地方或团体的知识带入教科书中，这提醒我们注意教科书知识是不是某种地方性知识或某一部分人知识。对此，民国就有人对教科书编写表示了不满。<sup>②</sup> “教科书的写作反映了某个时代、某个地区、某些人的历史意识，同时这种历史意识也透过教学的管道影响在校就读的学生。”<sup>③</sup> 从历史教科书编者情况来看，一小群江浙人的知识，通过教科书与学校教育的途径，成为影响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知识；那种看起来很普通很经典的知识，可能只是某些人的认识，它通过特殊渠道而被放大，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意识。

教科书知识生产的这种特点，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样性，无论是把教科书视为“整体”还是单本教科书，都存在这个问题。以孔子叙述为例。从整体来看，教科书中关于孔子儒学的表述，介于政府与思想界之间，类似于“中间立场”，这赋予了孔子形象以一种连续性，使儒学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中断；但是，在变动剧

① 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建构：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程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第4页。

② 参阅瞿骏《“民国范儿”的迷思——论清末民国教科书之“另一面”》，《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③ 张元、周樑楷主编《方法论：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的分析编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清华大学研究院，1998，“序言”。

烈的近代中国，民众通过教科书接收到的孔子形象，与政府及思想界的认识有一定的落差，会造成民众观念与政府、思想界的疏离。结合儒学在民间的影响来看，思想界激烈的反孔言论的实际效果，需要进一步的考究；结合儒学在历史上与政权之关系来看，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是否就意味着儒学与政权彻底分离而没有复活的可能，也得慎重对待。从单种教科书来看，一方面，其反映了政府与思想界对孔子儒学的某一态度甚至“极端性”态度；与之相连的另一方面，由于思想界的态度是多样的，使得不同教科书的叙述会有很大差异甚至对立。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上也会出现。这会导致使用不同教科书的学生形成不同的知识观念。由此可见，一般学生和民众通过教科书接受的知识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政府或学界的诉求，还要进一步讨论；政府希望通过教科书来实现其教育目标，实际效果也需要进一步分析。学生和民众通过教科书接受了不同的知识观念，反过来会增加某种不确定性。

对一些读者来说，遵照课程要求的编写过程以及政府的审定制度保证了教科书反映国家意志，其知识性质是无须讨论的。然而，对于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来说，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主要采取审定制度，但实际效果不容乐观。清末，政府努力加强教科书审定，但通过审定后的教科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学堂不采用审定的教科书，依然沿用旧本。<sup>①</sup>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加强教科书管理，到1930年代，教科书编写逐步趋于模式化，但此时不同的教科书中依然存在不同叙述，编者的观点还是有明确的体现。对此，各政府都有清楚的认识，以致试图编写发行“国定本”，以实现思想控制。直到1940年代后，国民政府发行“国定本”，民间书局不能再编辑教科书，全国使用一种教科书，编者的意图很难体现，教科书的多样性消失。教科书的审定与管理，反映的是国家对历史教育与教科书功能的理解。

<sup>①</sup> 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第293页。



## 二 历史教科书的功能：民族 认同与政治认同

教科书知识的性质问题，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这关系到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一般来说，历史教科书除了传授历史知识与相关技能外，还承载着思想教育的功能，是政府确立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而确立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显然是中国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和目标。<sup>①</sup>

确立民族认同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目标。近代中国的特殊时势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得历史教科书对民族国家问题尤为关切。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产生，正是新史学兴起之时。新史学提倡书写新的国民历史，“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sup>②</sup> 历史被赋予了拯救民族国家的重任，作为新史学的一种实践形式，“发挥光明正大之民族主义，激动爱国精神”，<sup>③</sup> 成为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一个自觉要求。清末教科书突出振发国民志气，民初北京政府注意培养共和国民，南京国民政府高扬民族主义。形成中国民族认同成为历史教科书编写的重要精神，也是历史教育的一个目标。

但是，对一些政权来说，形成民族认同只是历史教育的目标之一，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内部权力结构中，政府因为处于统治地位，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处于有利位置，会采取种种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府作为特殊的政治组织，不利用历史将自己合法化的统治形式是不存在的，即

① 这是针对一定时期、一定政治制度国家而言的。有些国家和地区教育独立，教育功能与目标就不同。

②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9，第7页。

③ 此为东新译社介绍《中国历史》的广告，《游学译编》1903年4月12日。

使建立在某种程序基础上的统治合法性，也需要历史的理由；如果缺少历史的因素，即使统治的合法性是神授的，也难以行得通。<sup>①</sup> 政府会借助历史资源来建构政治认同，并将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转化为对其统治的认同。政治认同优先于甚至取代民族国家认同，民族国家认同成为实现政治认同的工具。意识形态代替了民族认同。<sup>②</sup>

这在清末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教育中清晰可见。清末教育宗旨把“忠君”放在首位，历史教育强调为专制君主服务、养成忠孝国民。南京政府实行党化教育，维护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位，历史教育首在确立三民主义信仰。为此，清末教科书要求突出清朝“仁政德泽”，南京政府教科书要求突出国民党功绩。清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加强教科书审定，是否符合政府的教育要求是重要标准，政府对教科书中不利于其统治的言论进行删改，或审查不予通过，甚至予以查禁。此外，清政府和南京政府都试图编写“国定本”教科书，以统一思想认识，更有效地贯彻政府的教育方针。清末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统治的政治认同是政府对每一个国民（臣民）的要求，凡是不利于统治的东西，都在反对与禁止之列。

政治认同优先甚至代替民族国家认同时，会给民族主义带来很大影响。首先，政府往往会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掩盖维护统治的事实，因此，会采用多重叙述方式，有意识地混淆民族、国家、政府、政党等诸概念，把民众对民族、国家、政府、政党等的感情混合在一起，造成一种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sup>③</sup> 这带来一定的后果。第一，这种叙述方式会造成民众对民族主义的误解。民族、国家、政府、政党都是不同的概念，各自有不同的诉求，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使得民众难以对此有个明晰的区分，从而不能真正明确自己的认同对

①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17页。

② 金观涛：《创造与破坏的动力：中国民族主义的结构及演变》，载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第138页。

③ 参阅徐迅《民族主义》（修订版），第95页。

象。“民族—国家的历史教育学潜移默化地把我们的生活变为有关对国家的热爱、赞许，或对国家疏离或背叛的羞愧和愤恨等等态度的培养，而不明白能够问出这些问题的语法规则为何物。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变为掌握某种认同框架的教育技术。”<sup>①</sup>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教育，而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宣传。第二，这种叙述方式也有着内在矛盾，不仅会造成民众对民族主义理解上的混乱，也会在现实中产生不利影响。如民国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一方面在整体上强调全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叙述，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的叙述上持有明显的汉族立场，这种叙述方式不利于在部分民族有分离倾向时融合各民族以维护国家统一，也不利于在日本侵略所引起的中国民族危机中团结各民族来维护民族的独立。这种叙述方式有利于政府操纵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容易形成非理性的狂热，最终有损于民族国家。

其次，容易造成一个极权和强势的国家机器，侵害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sup>②</sup>以维护统治为中心的策略在短时间内会产生效果，以致让政府觉得目前的制度行之有效，甚至认为这是民众认同与选择的结果，从而忽略目前制度的弊端，不愿进行任何改变，忽视民众的其他要求。如南京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就突出民族主义，而淡化民权与民生主义。统治合法性来源可能是多个方面的，如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但“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政治价值体系就是民主，它是现代政治合法性最为重要的源泉”。<sup>③</sup>这类政府也会利用其他途径来加强统治，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也都是为维护统治服务的，伴随

①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235页。

② 王笛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中文版序”第4页。

③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第8~9页。

着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民众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民主权利，相反，政府会以此压制甚至代替民众的民主要求，进一步强化极权体制。当发生统治危机时，民众的政治认同就会动摇，连带地造成整个民族国家认同的迷失，从而给民族、国家带来灾难。

政治认同优先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教育，其效果究竟如何呢？从民国时期教育与政治发展情况来看，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各种政治势力在教育场域扩展影响，使得民国时期的教育在大部分时间里深深卷入政治与政局之中，学校风潮不断。教育培养的学生没有成为现有政权的维护力量，而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教育也未能有效承担起民族性知识生产和巩固政权忠诚感的使命。”<sup>①</sup>在政治认同优先的情况下，不仅政治认同很难真正建立起来，受其影响，民族国家认同也很难确立。这是所有致力于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编写的人应该注意与警醒的。

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提醒民族主义研究要关注内部因素，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注意到政权变更与政策变化，以及具体认同对象差异可能给民族主义带来的影响；二是要关注认同建构的实际效果，调适民族、国家、人民、政府等诸认同，建立共同的认同基础。

### 三 历史教育的本义：个人与国家

教育往往被当作合法性确立的一个途径，与民族国家及政治认同关系重大。教育的本义是什么？上节对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讨论，主要针对清末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2年新学制对个性自由的关注，与其他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对认识教育本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是政教合一的，教育服务于既定的政治秩序，

<sup>①</sup> 朱庆葆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0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9页。

教育自身的主体规律和价值的缺失与异化,开启智慧、传承文明、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价值被忽略。<sup>①</sup>历史教育向来被当作资鉴、资治的工具。近代新教育兴起后,这种认识依然根深蒂固。清末把教育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把历史教育视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新学制反对把教育作为政治的附庸。新学制不再宣示教育宗旨而立“标准”,就是希望解除对教育的外在干涉,回复教育本义:“施教育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不得视为人应如何教之研究。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sup>②</sup>对清末以来历史教育所念兹在兹的民族、国家,新学制则认为民族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达成个性发展、人民幸福的工具;历史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论证统治合法性,而在于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求得历史的真实。新学制从深层次上思考民族国家的出路,希望养成健全人格、培养共和精神,以固国本。<sup>③</sup>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学制形存神消。新学制主要有两部分:标准与学制系统,这两部分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南京政府建立后,对新学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继承其学制系统。1928年,大学院通过《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基本沿用了新学制的学制系统,保留了新学制“六三三”主体架构。<sup>④</sup>二是抛弃其标准。南京政府全面推行党化教育,1929年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制订新课程标准。新学制标准被废止。与清政府一样,南京政府又把教育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① 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第34页。

② 《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案》,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860~861页。

③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859页。该报告指出:“民国成立以来,祸患迭乘,究其原因,实由国民缺乏共和精神所致,故宜发展之,以固国本。”

④ 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第91页。

新学制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不唯关系到教育本义，影响到教育目标和教育政策的制定；也与民族主义密切相连，影响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后，伴随着近代国家观念而出现的。近代的国家理论，主要有“国家工具论”和“国家有机体论”。晚清至新文化运动前，“国家有机体论”有重要影响，认为国家由国民所组成，虽然个人有其内在价值，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国家作为国民有机体之整体，有其自身目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工具论”影响增大，认为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而国家仅仅是维护社会秩序、捍卫个人基本权利的工具。国家与国民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爱国的重心从国家下移到个人，救国首先要有独立的个人。<sup>①</sup>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有机体论”又占据重要地位，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民族国家居于个人之上的观念，一般认为与近代中国的时势密切相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从产生之时起，救亡图存就成为主要的历史任务。“20世纪中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的与外国列强较量和冲突的背景，因此，新的民族在很重要的层面上与以前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身份不同。”<sup>②</sup>为了与列强竞争，使中国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政府很重视民族国家的思想，以期养成国民的民族国家观念；与之相关联的，是对中国国民“一盘散沙”的批评。这一时期出现的“国民”意识，尽管强调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以及各项权利和义务，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条件下，国民始终无法摆脱“国家”的笼罩，只能成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而无法确立为一个自主的普遍性范畴，国民只能是“国

① 参阅许纪霖《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6~28页。

② 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建构：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第138页。

家的子民”。<sup>①</sup>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情形也与之类似，特别是国难深重时代，教育也卷入到民族救亡和政治变革的时代洪流中，民族危亡与政治败坏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原因，学生们表现出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sup>②</sup>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内部和外部情势，未必就胜于清末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但正是此时，新文化运动提出“救国要先救民、立国要先立人”，新学制废除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尚武”与“军国民教育”，而注重发展个性、养成健全人格。“国难”对思想界与民族主义有重要影响，但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的演化，是由多重因素主导的。<sup>③</sup> 新学制给我们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镜鉴。

教育本义与个人—国家关系是一体两面。一方面，从教育本义来看，教育是应该独立还是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态度，体现了不同的国家观。主张教育独立的，可能就会强调教育的本义是发展人的个性，国家是捍卫个人权利的工具；反之，主张教育为维护统治服务的，可能就会强调教育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民族国家的利益超越于个人之上。另一方面，从个人与国家关系来看，也能得出类似的对教育本义的认识。清末以来，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新政治文化一经形成，就迅速发挥巨大影响，泛化到我们关于社会、国家、文化、教育等的种种论述中。<sup>④</sup> 在近代中国，教育很自然地被视为拯救民族国家的工具，与之相联系的是，个人也随之成为维护统

① 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梁景和认为，晚清国民意识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救亡图存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是有识之士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认识与理解，还有西方文化的影响。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39页。

② 朱庆葆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0卷，第13页。

③ 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09页。

④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第316页。

治的工具，尽管往往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

今天，世界各国联系加强，世界似乎正在变为一个整体，教育本义与历史教学的首要任务面临着新的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应该是开启心智，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历史教学应该帮助年轻一代学会用一种公共的、平衡的观点去理解自我以及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历史，学会思考与做出独立的判断。<sup>①</sup>

#### 四 历史知识：建构与反建构

在本书的最后，讨论历史的反建构特征，希望政府与学界在利用历史资源时，能够对历史抱持一种温情与敬意，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

在民族主义研究的路向上，一般采取“根基论”或“建构论”立场，<sup>②</sup>而建构论正被越来越多研究者所采用。这些研究一般把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即不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反映”历史真实的文献，而是视为“表述”并规范社会实践的“文本”或意识形态。<sup>③</sup>如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或被认为是一种历史表述，或被认为是建立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技巧。<sup>④</sup>在民族主义的产生上，尽管存在着思想、文化、政治等多种解释，但基本上都注意到民族

① 孟钟捷、苏珊·波普、吴炳守主编《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上海三联书店，2013，“前言”第2~3页。

② 参阅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2年第3期。作者认为，根基论即通常依据若干根据性的判断标准如血统、语言、共同祖先、习俗、宗教等体质与文化的既定特质，认定民族乃是天然生成的人群区划方式，民族主义情感与运动也是随之俱来的绵延不绝的长期现象。建构论强调民族主义有其历史根源，本质上仍是一种近代情境下才出现的“人文文化产物”，民族主义兴起是和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发展分不开的。只有伴随着18世纪以来长期而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西方各国的人民才有可能被形塑成民族。

③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④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第11页。



主义是近代的发明，自然地将其与建构论或工具主义联系在一起。<sup>①</sup>民族是民族主义者的发明。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包括公开的民族运动，还应该包括各种民族观和民族叙述结构。<sup>②</sup>

民族主义的形成，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最初表现为收集和整理民俗，弘扬文化传统；其次是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再次是文化复兴转变为政治诉求，要求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sup>③</sup>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民族历史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天然依据，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首先通过编造历史来锻造和强化“民族”概念，从本民族历史中形成的共同的集体记忆是特定人群致力于建立民族国家的充分条件。<sup>④</sup>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是民族主义的中心环节。民族认同往往从历史中去追寻、去建构，发掘历史上的光荣，锁定一些事件或人物，作为认同对象物。至于这些事件或人物在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似乎并不重要，它可以是一种想象和建构，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当下所需要的一种共同身份和凝聚力。

历史是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资源，<sup>⑤</sup>它与认同一样，都是一种建构。历史是一种叙述，历史叙述文本是历史存在的主要场所，也是人们在意识中构成历史的主要思想来源。历史叙述是一个充满解释和建构的过程。<sup>⑥</sup>认同也是叙事性的，它不在我们之内存在，而是以

① 在民族主义产生上存在多种解释，如凯杜里的思想史解释、盖尔纳的经济文化解释、奈伦的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解释、布鲁伊利的政治解释、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解释等，基本都注意到民族主义是近代的发明，自然地将其与建构论或工具主义联系在一起。参阅龚志伟《国耻叙事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构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评介》，《史林》2011年第3期。

②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8页。

③ 徐迅：《民族主义》（修订版），第11页。

④ 徐迅：《民族主义》（修订版），第55页。

⑤ 在后现代史学中，一些习见的词语意义都发生了变化，诸如“历史”等，在使用时都需要做意义上的界定。这里的“历史”一词，采用的是一般的常用的意思，即为过去发生的或过去发生对现在有影响的事情。

⑥ 陈新：《论历史叙述中的理解和解释》，《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叙事的方式存在。<sup>①</sup>这在清末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有明显的体现。历史教科书编写的过程也即建构历史的过程。从清末民国这一时段来看,像中华民族、上古史、历史分期、孔子、岳飞、清史、新文化运动等很多观念认识都发生了改变,甚至书写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正清楚地体现了历史知识的建构特征。这已为一般研究者所熟知。但是,在承认历史与认同是建构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历史的反建构特征及其对认同的影响。

历史的反建构特征,即历史/民族过去对民族主义产生一定的制约。历史是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资源,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首先,认同的建构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认同的建构不是凭空的,认同对象物须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当代的制度正是在记忆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sup>②</sup>其次,历史的求真特性,使其必须有一定“史实”依据。再次,某种叙述与建构一旦完成,就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具有某种稳定性,反对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任意的修改。“历史研究总是在进行自我更新,然而它仍然不可避免地而且适当地受过去的制约。”<sup>③</sup>这些“历史积淀”会对新的建构产生一种制约,并阻碍人们对新秩序接受:“说社会是自我解释的共同体,就是指明那种(历史)积淀的性质;但是,重要的是要补充,在这些自我解释的最强有力者中间,是社会制造与保持的不断存在的那些解释本身形象。因为一个人对时间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延续的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该社会制造的这种延续之形象的意识”,以此,“我们应当把历史记忆与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活动区分开来”。<sup>④</sup>历史——民族的过去尽管是民族主义的发明,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对民族过去的不同记忆以及历史本身的求真特性表现出的

① 孟森:《后现代的认同政治》,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22页。

②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213页。

③ 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100页。

④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8、9页。

学理性，使之具有一种“反建构”特征，从历史中形成的认同，会产生双重作用：其建构一面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确立合法性；其“学理性”一面不断以质疑的方式削弱民族国家认同，动摇合法性的基础。

历史的反建构特征，在清末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有明显体现。如教科书编写中政府与编者之间的分歧，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反建构的影响。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清代满族统治及满汉矛盾的事实，给各族融合和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带来一定影响。同样，在儒学近代发展中，以往对孔子的不同认识都发生作用，使得处于传统与现实之中的孔子具有多个形象：大政治家、教育家或专制帮凶。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与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被查禁，一个原因是书中对三皇五帝或岳飞、秦桧的评价与人们已有的认识截然不同，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因而遭到很大的反对。这都说明，已有的历史知识对新的建构会有一定的制约，当建构的知识成为人们的知识观念后，对新的建构就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历史的反建构特征会对历史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以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为例。国家希望通过考古学来确立民族自信心，重建中国古史系统，回应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但从依据考古学所建设的古史来看，一方面考古学有助于确立民族自信心；但另一方面，考古学也会影响到民族自豪感。从考古学中建立的古史系统，未能回应人们对上古史事的怀疑，借助考古学来建设上古史的设想与行动，实际上加深了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的影响，也带来了考古发现建立古史系统的可能性的怀疑。国家借助历史来建立民族认同，试图从历史中寻求“学术”的支撑，而结果这种“学术”的支撑恰恰暴露了其建构的本质，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危及认同。

历史的反建构特征提醒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遵循历史自身的特点，以“史实”为依据，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尽可能呈现历史场景。但是，似乎这一题中应有之义，有时候却难以实现。对一些人而言，“书写近现代中国主要是为国家现实的挑战和决策的合法化找寻历史依据，而不是在追求真理，或是去如实再现历史”。<sup>①</sup>对他们来讲，历史真实与价值判断不可分割，阐发历史的真实并非终极目标，最重要的是，阐发出来的这种“真实”能否经世致用，能否对当下的社会实践有意义。<sup>②</sup>这样的历史书写，只是借着“历史”之名，实为某种政治目的的宣传。此举可能会收一时之效，但终究会暴露其片面与虚伪之处，适得其反。对此，民国时期一些人就表示了担忧。吕思勉主张书写真实的历史，反对为了激发学生民族情感夸大其词，认为学生明了历史真相，自然就会发奋爱国。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本有其大光荣，爱国者不必言过其实，只说实话，即足以达到它的目的。“我们应该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不是自大心），启发坚固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同时我们也应该借历史陶冶文化大同思想，使中国人为世界文化之继承者、促进者。如此乃是泱泱大国之风，不为岛夷，不为索虏。”历史教育不能夸大事实，那样既失去真实，又失去应有的作用。<sup>③</sup>钱穆指出，国民对本国历史不要“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不要“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sup>④</sup>这都不是历史的态度，缺乏对历史的尊重。

或许，任何叙述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撰写历史也牵涉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这个政治活动是所有的学术活动都要卷入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如何使叙述更少带有偏见和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

①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第1页。

② 张仲民：《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古腾堡在近代中国》（下），《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

③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61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2005，“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彩，而是如何在日常的多重诠释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确定我们自己的编史立场”。<sup>①</sup>如果说在历史叙述中某种偏见难以避免，那么，我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应该遵循基本的治学原则，至少不要为了某种目的而选择性地叙述历史、篡改甚至编造历史，否则，其行不远。

---

<sup>①</sup>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64页。

# 附 录

## 清末民国时期中小学的 历史课程设置

表 1 癸卯学制中的历史课程设置

学校	年级	历史学科(教学内容)	每星期钟点
初等 小学堂	第一年	历史(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	1
	第二年	历史(同前学年)	1
	第三年	历史(讲历朝年代、国号及圣圣贤君之大事)	1
	第四年	历史(同前学年)	1
	第五年	历史(讲本朝开国大略及列圣仁政)	1
高等 小学堂	第一年	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之大要)	2
	第二年	中国历史(续前学年)	2
	第三年	中国历史(续前学年)	2
	第四年	中国历史(补习中国历史前三年所未讲授者)	2
中学堂	第一年	历史(中国史)	3
	第二年	历史(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	2
	第三年	历史(中国本朝史及亚洲各国史)	2
	第四年	历史(东西洋各国史)	2
	第五年	历史(同前学年)	2

资料来源：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5~8页。

表2 壬子癸卯学制中的历史课程设置

学校	年级	历史学科(教学内容)	每周课时
高等 小学校	第一学年	本国历史之要略	3 <sup>[1]</sup>
	第二学年	本国历史之要略	3
	第三学年	本国历史之要略	3
中学校	第一学年	本国史 上古 中古 近古 <sup>[2]</sup>	2
	第二学年	本国史 近世 现代	2
	第三学年	东亚各国史 西洋史	2
	第四学年	西洋史	2

注：[1] 与本国地理合在一起，每周授课时数共3课时。

[2] 此处教学内容依据1913年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

资料来源：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0~12页。

表3 1922年新学制中的历史课程设置

学校	年级	历史学科(教学内容)	每周课时
初级中学	第一学年	历史 <sup>[1]</sup>	1
	第二学年	历史	1
	第三学年	历史	1
高级中学	第一学年	文化史	3
	第二学年		—
	第三学年		—

注：[1] 初中历史编制取混编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

资料来源：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历史卷》，第14~20页；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第338、339页。

表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课程设置

依据标准	学校	年级	历史学科(教学内容)	每周课时
1932年	初中	第一学年	本国史(上古 中古)	2 <sup>[1]</sup>
		第二学年	本国史(近世 现代 综论)	2
		第三学年	外国史	2
	高中	第一学年	本国史	4/2 <sup>[2]</sup>
		第二学年	本国史(第一学期)外国史(第二学期)	2
		第三学年	外国史	2

续表

依据标准	学校	年级	历史学科(教学内容)	每周课时
1936年	初中	第一学年	本国史(上古 中古)	2 <sup>[3]</sup>
		第二学年	本国史(近世 现代 综论)	2
		第三学年	外国史	2
	高中	第一学年	本国史	4/2 <sup>[4]</sup>
		第二学年	本国史(第一学期)外国史(第二学期)	2
		第三学年	外国史	2
1940年	初中	第一学年	本国史	2
		第二学年	本国史	2
		第三学年	本国史(第一学期)外国史(第二学期)	2
	高中	第一学年	本国史	2
		第二学年	本国史	2
		第三学年	外国史	2
1941年	中学 <sup>[5]</sup>	第一学年		—
		第二学年		—
		第三学年	本国史(上古 中古)	2
		第四学年	本国史(中古续 近古)	2
		第五学年	本国史(近代 现代)	3
		第六学年	外国史	3
1948年	初中	第一学年	历史 <sup>[6]</sup>	2
		第二学年	历史	2
		第三学年	历史	2
	高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历史 <sup>[7]</sup>	2
		第三学年	历史	2

注：[1] 每学期2小时，三学年共计12小时。

[2]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为4课时，其余五个学期均为2课时。

[3] 每学期2小时，三学年共计12小时。

[4]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为4课时，其余五个学期均为2课时。

[5] 此为六年制中学。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做出决议，设六年制中学，不分初、高中。1941年教育部公布《六年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

[6] 外国史混合于本国史内讲习，不另行专习。

[7] 自第二学年起共4个学期学习历史，以3/5讲授本国史，2/5讲授外国史。

资料来源：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历史卷》，第43~103页。



# 征引文献

## 一 教科书

(根据教科书初版时间先后排序。多册教科书，  
只注出第一册版本情况)

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东文学社，1899。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金为重译，商务印书馆（原书未标注  
出版时间）。

市村瓊次郎：《支那史要》，陈毅译，广智书局，1902年初版，  
1903年再版。

柳诒徵：《历代史略》，江楚书局，1902。

《普通历代史》，世界公学，1902。

张肇桐编辑《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2年初版，  
1903年再版。

市村瓊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桥本海关译，教育世界  
社，1903。

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刘陶译，广智书局，1903。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竟化书局译，竟化书局，1903。

富山房编辑《支那史教科书》，唐秋渠译，上海东亚译书会，1903。

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东新译社，1903。

萨幼实编辑《东洋文明史》，上海支那翻译会社，1903。

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年初版，1906年20版。

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广智书局，1903年初版，1906年3版。

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周同愈译，文明书局，1904。

汪承镛编辑《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4。

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4年初版，1908年18版。

姚祖义编纂《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小），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10年22版。

姚祖义编辑《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06年6版。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05年订正3版。

澄衷学堂编辑《小学本国史教科书》，澄衷学堂，1904。

吴葆诚编辑《东西洋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5。

张肇桐编辑《中外故事读本》，文明书局，1905。

普通学书室编纂《普通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06。

李培鐸编纂《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新教科书》，乐群书局，1906年再版。

富光年编辑《简易历史课本》，商务印书馆，1906年3月初版，4月3版。

周世棠编著《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新学会社，1906。

徐念慈著述《中国历史讲义》，宏文馆，1907。

吕瑞廷、赵激壁编纂，赵玉森增订《新体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1912年15版。

赵钰铎编辑《高等小学历史课本》，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初版，1910年7版。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金为译述，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1914年7版。

章崧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8年初版，1911年3版。

沈恩膏编辑《本朝史》，中国图书公司，1908。

张运礼编辑《新编中国历史全书》，商务印书馆，1909。

许志毅编《简明新国史教本》，中国图书公司，1909。

陈庆年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1年5版。

汪荣宝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1年4版。

吴曾祺编辑，赵玉森重订《增订中国历史读本》，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1915年5版。

陈庆年编辑，赵玉森增订《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1913年9版。

李岳瑞编《国史读本》，广智书局，1912年修正初版，1922年11版。

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年初版，1913年5版。

潘武编辑《历史教科书》（讲习适用），中华书局（未见出版时间）。

普通学书室编纂《增订普通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15年再版。

章崧编著《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13年修订版。

章嵒、丁锡华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高小），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1914年5版。

潘武、章嵒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高小），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1915年6版。

叶维善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1913。

沈颐编纂《中国历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22年9版。

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新历史》，商务印书馆，1913。

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1924年25版。

赵玉森编纂《新教科书历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1920年8版。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15年再版。

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20年16版。

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实用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1921年29版。

杨喆、庄启传编辑《新式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1922年49版。

吴研因编纂《新法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0年初版，1923年57版。

吴研因、王钟琳编《新法历史教授书》，商务印书馆，1920。

汤济沧编著《新式国史课本》，国光书局，1920。

傅运森编纂《新法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23年21版。

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23年3版。

金兆梓、洪璜编《新小学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23。

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26年90版。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25年14版。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1925年14版。

金兆梓编《新中学本国历史》，中华书局，1923年发行，1931年25版。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33年国难后1版。

张鸿英编《小学文体历史教科书》，中华书局，1924年7月发行，7月再版。

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27年4版。

胡朝原著，江起鹏、周世棠、江起鲲等订正《第一简明历史启蒙》，新学会社，1908年初版，1925年45版增订。

杨喆、朱翊新编辑《新学制高级历史课本》，世界书局，1925。

陆光宇编辑《新撰初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1928年48版。

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世界书局，1926年1月初版，9月再版。

金兆梓编《初级本国历史参考书》，中华书局，1926。

金兆梓编《新中学本国历史参考书》，中华书局，1926年发行，1932年7月6版。

蒋维乔编《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1927年33版。

李直编《新中华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27年发行，1931年30版。

朱翊新编《新主义历史课本》，世界书局，1928。

金兆梓编《新中华初中本国史》，新国民图书社，1928。

王钟麒编《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商务印书馆，1929。

王钟麒编《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1932年国难后第17版。

陆东平、朱翊新编《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29。

朱翊新、沈味之、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世界书局，1929年3版。

朱翊新、黄人济、陆并谦编著《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0年初版，1930年3版。

杨人榘编辑《北新本国史》，北新书局，1930年初版，1932年6版。

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中华书局，1930。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1934年7版。

吕克由编辑《高中本国史》，民智书局，1931。

缪凤林编著《高中本国史》，钟山书局，1932。

钟月秋编著《高中本国史》，湘芬书局，1932。

梁园东编辑《高中本国现代史》，世界书局，1932年初版，1933年再版。

何祖泽编纂《初中本国史》，新亚书店，1932。

金兆梓编《新中华高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发行，8月再版。

李云坡编《初中本国史》，文化学社，1932年3版。

赵征铎编辑《初中本国史》，民智书局，1932。

徐映川编著《复兴教科书历史》，商务印书馆，1933。

姚绍华编《初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33年初版，1934年12版。

朱翊新编著《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3年8月初版，9月再版。

朱翊新编著《朱氏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3。

傅纬平编著《复兴初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2月65版。

谢兴尧编著《谢氏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3。

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3年7月初版，9月3版。

孟世杰编辑《高中本国史》，文化学社，1934。

梁园东编著《新生活初中本国史》，大东书局，1934。

余逊编著《余氏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4年7月修正，9月再版。

罗元鲲编《高中本国史》，开明书店，1934年初版，1946年16版。

吕思勉编著《复兴高中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2月初版，10月10版。

周予同编著《初中本国史》，开明书店，1936年5版。

周予同编《本国史》，开明书店，1934。

李云坡：《新标准初中本国史》，文化学社，1934年4月。

高彦博：《本国史讲义》，手写本，封面标注为“北平市立师范学校，1934”。

杨东莼编《高中本国史》，北新书局，1935。

吕思勉编著《初中教本本国史》，中学生书局，1935。

白进彩编著《高中本国史》，文化学社，1935年3版。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

应功九编著《初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

易仁菱编著《初中本国史》，大光印书馆，1935年4版。

沈仲龙编《中国历史》，（原书无出版社），1936。

卢文迪、姚绍华、范作乘编《历史》，中华书局，1936。

卢文迪编《历史》，中华书局，1936。

孟世杰编辑《初中中国史》，百城书局，1931。

李清悚、蒋恭晟编辑《初中本国史》，大东书局，1937。

徐映川、傅纬平编校《复兴历史教科书》（高小），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39年126版。

蔡沔因编著《初中新本国史》，世界书局，1937。

朱翊新编著《初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39年新4版。

金兆梓编《新编高中本国史》，中华书局，1937年初版，1939年10版。

卢文迪、丁绍植编《历史》，中华书局，1941年12版。

·范作乘编《高小历史课本》，中华书局，1941年155~156版。

罗香林编著《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45年沪1版。

宋延庠等编辑《初级中学历史》，国定中小学教科用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5年上海白报纸本第1版，1946年第130版。

宋延庠、孙懋禄、蒋子奇编辑《高级小学历史课本》，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1946年1月北平片艳纸本初版，7月3版。

鲍文希编《中国史》（中学历史科补充适用），万叶书店，1946。

蒋子奇、聂家裕编辑《高级小学历史课本》，大东书局，1946年第2次修订本。

孙正容：《高中新本国史》，世界书局，1947年6版。

杨东莼编《高中本国史》，北新书局，1946。

杨东莼编著《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开明书店，1947年2月初版，11月4版。

周予同：《本国史》，开明书店，1947。

## 二 教育、出版史料及文集等

（按责任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下同）

### 1. 书目

北京图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



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王韬、顾燮光等：《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 2. 教育史料与教育法规

陈学恂、陈景磐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日本学术振兴会，1973。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教育部参事处编辑《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1936。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宋恩荣、章咸选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建国纲领宣传指导大纲》，衡阳区书刊供应处，1938。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纂《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商务印书馆，1928。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财政、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36。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出版社，193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朱有猷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3. 出版史料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北京出版史志》第8辑，北京出版社，1996。

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中华书局，2002。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

《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

石鸥、吴小鸥编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汪耀华编著《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02。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87。

朱联保编撰，曹予庭校订《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

#### 4. 志书、文史资料

<http://chinese.fudan.edu.cn/zhongwenxi/historynow/zhongwenxishi.asp>.

灌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灌云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

江苏省昆山中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昆山中学史（1946~2006）》，方志出版社，2006。

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9）·昔年文教追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第10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孙海林主编《湖南第一师范名人谱（1903~1949）》，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2003。

天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台文史资料》第5辑，1989。

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盐城市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政协江苏省常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文史资料辑存》第6辑，1966。

政协江苏省灌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灌南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

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萍乡文史资料》第1辑，1984。

政协天津市乐亭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乐亭文史》第4辑，1989。

政协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州文史》第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5. 近代人物日记、文集类

陈引驰选编《学问之道：中国著名学者自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5。

范文澜：《大丈夫》，开明书店，193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

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同心出版社，2012。

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增订本），同心出版社，2012。

裴小楚编著《中国历代民族英雄传》，大方书局（原书未见版权页）。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1。

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李济著，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

梁实秋著，张昌华编《槐园梦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刘百川：《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华文出版社，2012。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1997。

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

陆费逵：《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陆费逵：《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

吕思勉：《吕思勉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民出版社，195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商友敬主编《过去的教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王云五：《王云五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吴珮瑛等：《民国乡村小学生的日记》，华文出版社，2012。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易君左：《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镇江江南印书馆，1933。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6. 辞典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乔晓军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二编》，三秦出版社，2007。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王崇人主编《中国书画艺术辞典·篆刻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国立编译馆”三民主义大辞典编审委员会主编《三民主义大辞典》，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 三 报刊

《大公报》

《大学院公报》

《东方杂志》

《建国教育》

《教育部公报》

《教育公报》

《教育通讯》

《教育杂志》

《教与学》

《申报》

《史地学报》

《新月》

《新民丛报》

《学部官报》

《现代学生》

《中华教育界》

## 四 研究著述

### 1. 专著（编著）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

源, 1919~1937》, 翁贺凯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阿普尔等:《国家与知识政治》, 黄忠敬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龚维斌、良警宇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 叶江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 李金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叻人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毕苑:《建造常识: 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 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古伟瀛等译, 巨流图书公司, 2004。

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建构: 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陈程等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08。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 韩震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01。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 学林出版社, 2003。

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陈理等主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陈科美:《上海近代教育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文汇出版社, 2005。

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陈其泰:《中国史学史》第6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

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冬青书屋同学会编《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

F. A. 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方成智：《艰难的规整——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小学教科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冯春龙：《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广陵书社，2005。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的现代化道路：历史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龚延明、祖慧主编《岳飞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2004。

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清史译丛》第8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韩学儒、吴永涛主编《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亨廷顿：《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

黄昌勇、陈华新编著《老交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中华书局，2010。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贾逸君编《民国名人传》，岳麓书社，1993。

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

《近代以降的历史教学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研讨会论文集》，上海，2015。

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

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三联书店，2008。

莱斯利·P. 斯特弗、杰里·盖尔主编《教育中的建构主义》，高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

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李学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高明士等译，中华书局，1993。

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

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卢建荣主编《性别、政治与集团心态》，麦田出版社，2001。

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M. 阿普尔、L. 克丽斯蒂安-史密斯主编《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马建标：《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

孟森：《后现代的认同政治》，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孟钟捷、苏珊·波普、吴炳守主编《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上海三联书店，201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东方出版中心，1997。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彭雷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2版。

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麦田出版社，2002。

彭明辉：《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麦田出版社，2002。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秦榆编著《骚客的传记》，京华出版社，2006。

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苑出版社，2003。

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8。

孙江主编《新史学》第8卷，中华书局，2014。

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三联书店，2013。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孙文权：《柳诒徵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35。

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华书局，2003。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

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王笛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王栋、龚志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王锬：《孔子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齐鲁书社，2006。

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王淦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汪家熔：《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

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王久安：《我与开明 我与中青》，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吴科达：《臣民还是公民——教科书审定制度和思想道德教科书（190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黄山书社，2008。

吴少珉、赵金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

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萧君和主编《中华民族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萧一山：《清代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

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徐冰：《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冲突的轨迹》，商务印书馆，2014。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

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2。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徐迅：《民族主义》（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

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

袁英光、桂遵义编选《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1997。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

张君勱：《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张岂之主编《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

张卫波：《民国初期尊孔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张元、周樑楷主编《方法论：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的分析编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清华大学研究院，1998。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赵学先等编著《中国国民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

版社，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中华孔子研究所编《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朱庆葆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0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2007。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 论文（含论文集、报刊、网络等所发表文章）

卞孝萱：《吕思勉自述治学》，《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

曹琴仙、吴洪成：《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文教材》，《课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7期。

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陈新：《论历史叙述中的理解和解释》，《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储著武、汤城：《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的探讨》，《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崔玉军：《西方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

《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6月号。

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耿云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龚志伟：《国耻叙事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构建》，《史林》2011年第3期。

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5~60号，1903~1905年。

韩玉霞：《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何成刚、李美：《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运动”》，《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何成刚、李杰：《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风波述论》，《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1月。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台湾《新史学》12卷12期，2001年6月。

暨爱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纪奚：《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江湄：《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金兆梓：《历史教学的我见》，《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

金兆梓：《中学历史教材的商榷》，《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4期，1931年10月。

金兆梓：《我也来谈谈国定本教科书》，《新中华》复刊第5卷第4期，1947年2月。

康桂英：《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李波：《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李长银：《一件关乎民国年间政、学、商三界的重大事件——1929年〈本国史〉教科书案新探》，《历史教学》2014年第5期下半月刊。

李帆：《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

李帆：《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

李伟：《痛抚伤痕话当年——我在八年抗战中》，《文史春秋》2007年第1期。

李喜所：《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确立的初步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李孝迁：《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

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

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5期。

林静：《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教科书的出版》，《津图学刊》1994年第2期。

林齐模：《从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林志宏：《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及其诠释》，《思与言》第42卷第4期，2004年12月。

刘积英、张新华：《同人书店与商人书局——从融资方式看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发展》，《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刘黎红：《“五四”时期两种整理国故活动的比较》，《东方论坛》2006年第3期。

刘紫萍：《中华民族起源之神话及学说》，《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1集，1937年8月。

陆殿扬：《中小学国定教科书编纂之经过及其现状》，《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罗厚立：《历史记忆抹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读书》1999年第5期。

罗检秋：《“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

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马执斌：《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江南大学学报》（人社版）2014年第4期。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

缪凤林：《中国民族由来论》，《史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30年5月。

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1949年10月。

钱炳寰：《谈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出版史料》1992年第4期。

钱炳寰：《20年代教科书竞争二三事》，《出版科学》1997年第4期。

瞿骏：《“民国范儿”的迷思——论清末民国教科书之“另一面”》，《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3期，2002年12月。

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

石鸥：《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

舒习龙：《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改革与传统编纂优势的发扬》，《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宋军令：《商务印书馆对近代教科书出版的贡献》，《编辑学刊》2004年第4期。

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期，1934年9月28日。

孙江：《拉伯克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孙文阁：《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0年第7期。

孙正容：《中等学校历史教学漫议》，《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

田亮：《略论吕思勉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1991年第11期。

汪乾明、邹秀英：《论二十至四十年代初“五四”精神的认同与变异》，《史林》1999年第2期。

王德毅：《岳飞的历史地位——兼论民国以来的岳飞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2期。

王东杰：《“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王刚：《时势与理路：“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的史学道路》，《史林》2014年第2期。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史林》2008年第1期。



王建伟：《“反帝”口号与苏俄问题：1925 年底的一场争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 年第 3 期。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与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 年第 1 期。

王正瀚：《简论我国第一部中外史合编课本——〈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问题》2010 年第 4 期。

吴景贤：《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法与通史之检视》，《教与学》1935 年第 4 期。

吴俊：《论鲁迅的“排满”意识》，《鲁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 7 期。

吴小鸥：《近年来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综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吴贤辉：《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 1 期。

吴之光：《民国前黄小学前身史略》，<http://blog.cz001.com.cn/?uid-169018-action-viewspace-itemid-1272895>。

夏鼐：《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 年第 3 期。

夏晓虹：《〈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 年第 4 期。

肖群忠、张英：《先秦儒家气节观及其现代意义》，《深圳大学学报》（人社版）2007 年第 5 期。

熊斌：《国耻记忆与民族自信：民国时期国耻纪念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徐冰：《中国近代教科书与日本》，《日本学刊》1998 年第 5 期。

杨红波：《他们是谁 谁来选择 选择谁——论清末民国时期历史课程标准编写者的选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

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6年第2期。

杨人梗：《教育的滥用》，《新路周刊》第2卷第3期，1948年11月。

杨思信：《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历史考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杨思信：《拉克伯里“中国文化西来说”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反响》，《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杨天石：《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尹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3期。

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俞筱尧：《从编辑到编辑——宋云彬先生文化苦旅六十年》，《学林漫录》第15集。

虞云国：《论吕思勉的新史学》，《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

袁英光、仲伟民：《刘师培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

岳军：《岳飞思想研究动态的回顾》，岳飞网 <http://www.yuefei.net/bbs/thread-2943-1-1.html>。

臧嵘：《抗日战争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特点及启示》，《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11期。

曾平：《“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不同路径》，《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曾天山：《论教科书在亚洲教育中的作用》，《外国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

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功能论争的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张国荣：《“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生成与传播——以

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

张国荣：《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清华大学学报》（人社版）2012年第5期。

张汉林：《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

章清：《重塑“中国历史”——现代学科意识的提升与“专门史”的书写》（下），《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

张蓉：《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1年第2期。

张维屏：《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讲义所反映之当代古史观念的探讨》，《思与言》第41卷第2期，2003年6月。

张运君：《京师大学堂与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张仲民：《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古腾堡在近代中国》（下），《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

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

周朝民：《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周利荣：《文明书局考》，《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

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朱煜：《民国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的编制及其价值取向》，《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8期。

朱煜：《六十年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1期。

子冶辑注《〈蒙学读本全书〉卷端》，《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

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左玉河：《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 3. 学位论文

蔡诗慧：《百年史学经典的价值——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付春扬：《国民党党国体制：作为一种政体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韩立萍：《伪满洲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何宗旺：《蒋维乔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华晨：《民国时期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研究（1920~1936）》，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侯弈君：《杨东莼与〈高中本国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李波：《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林旦旦：《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探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施继辉：《清末国史教科书中的上古史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王愨：《近代商人出版家的成败——以沈知方与他的世界书局为中心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王双钰：《清末民初（1902～1919）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王伟：《格致新报与戊戌维新》，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王友军：《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徐佳银：《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张建华：《晚清中国人的国际法知识与国家平等观念——中国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起源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张梅：《文明书局教科书出版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索引

## A

- 阿里夫·德里克 237  
阿普尔 1, 6, 137, 189, 190  
安德森 4, 20, 460  
安东尼·史密斯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328

## B

- 白河次郎 45, 59, 285, 286, 302  
《白话本国史》 13, 14, 16, 17, 26, 91, 97, 124, 158, 164, 226, 263, 266, 291, 292, 305, 338, 360, 404, 420, 429, 430, 432 ~ 441, 444, 447, 463  
白进彩 112, 113, 143, 236, 245, 266, 297, 333, 348, 353, 354, 361, 379, 396, 397

- 百城书局 111, 177, 255  
保罗·康纳顿 462  
包天笑 50  
鲍文希 113  
北京教育图书社 79, 99, 243, 316  
北平市立师范学校 251  
《北新本国史》 203, 268, 333, 337, 347, 368, 379, 383, 392, 395, 445, 446  
北新书局 108, 110, 113, 114, 117, 143, 166, 168, 176, 203, 244, 332, 333, 369, 399, 445  
《本朝史》 59  
《本国史讲义》 250, 251  
毕苑 11, 62  
彪蒙书室 30, 41, 52 ~ 54, 97  
卜正民 70, 218, 219, 451, 458

## C

- 蔡沔因 113, 117, 129, 130, 141, 153, 203, 266, 267, 280, 299, 348, 379, 416
- 蔡元培 53, 73, 146, 155, 156, 177, 178, 206, 355, 358, 365, 405, 424
- 常埈璋 56, 138, 154
- 陈淳 274
- 陈登原 112, 142, 152, 153, 200, 245, 249, 265, 266, 278, 294, 299, 337, 360, 363, 397, 400, 420
- 陈独秀 86, 87, 207, 353, 354, 359, 360, 365, 366, 371, 424
- 陈懋治 52, 55, 138, 192, 240, 260, 290, 414
- 陈启能 308, 462
- 陈其泰 14, 271
- 陈庆年 16, 48, 56, 57, 59, 67, 68, 75, 80, 82, 139, 148, 152, 245, 262, 290, 314, 315, 334, 415, 450
- 《陈氏高中本国史》 153, 199, 200, 249, 294, 298, 337, 360, 363, 397, 400, 420
- 陈万雄 374
- 陈星灿 247, 248, 282, 284, 298
- 陈蕴茜 28, 343
- 陈毅 44, 229
- 陈志让 389
- 澄衷学堂 52, 55, 59, 69, 139, 140
- 《初级本国历史》 91, 92, 95, 122, 125, 165, 198, 220, 254, 293, 352, 354 ~ 358, 362, 367, 368, 395
- 《初级本国历史参考书》 165, 293
- 《初级中学历史》 92, 118 ~ 120, 130, 256, 368, 369, 380, 443, 445
- 《初中本国史》 115, 122, 125, 129, 132, 135, 162, 165 ~ 168, 184, 200 ~ 203, 212, 213, 224, 228, 233, 245, 249, 250, 255, 256, 258, 267, 294, 297, 299, 303, 305, 323, 327, 332, 337, 338, 348, 353, 357, 359, 361, 364, 369, 383, 388, 390, 391, 393, 394, 396, 397, 416, 419, 420, 446
- 《初中教本本国史》 124, 132, 135, 164, 338, 359, 417
- 《初中新本国史》 117, 129, 130, 202, 203, 266, 267, 299, 348, 379, 415, 416

## D

- 大东书局 90, 110, 112, 113, 118, 119, 121, 122, 126, 129, 131, 142, 166, 167, 171, 172,

- 175, 176, 179, 204, 244, 447
- 大光印书馆 114
- 戴季陶 208, 365, 405, 418, 422, 423, 425, 428
- 戴克敦 52, 53, 79, 80, 89, 139, 147, 172
- 《第一简明历史启蒙》 66, 75, 262
- 丁宝书(丁保书) 14, 52, 62, 63, 66, 67, 75, 79, 139, 150, 154, 160, 192, 263, 290, 380, 414, 415
- 丁绍植 294
- 丁锡华 79, 182, 290, 316, 335
- 《订正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 75, 161, 195
- 东亚译书会 45, 192, 240
- 东文学社 44, 47, 50, 239
- 《东洋史要》 13, 46~48, 50, 59, 75, 191, 192, 222, 227, 232, 259, 260, 287, 311, 314, 381, 414
- 《东洋文明史》 59
- 《东西洋历史教科书》
- 东新译社 51, 56, 61, 65, 66, 68, 75, 80, 155, 240, 453
- 东亚译书会
- 杜赞奇 8, 217, 218, 232, 461
- F**
- 范作乘 109, 113, 128, 233, 245, 325, 369
- 方维规 325
- 费孝通 282, 283, 309, 310, 328
- 费约翰 460
- 冯客 307, 344
- 冯自由 155
- 复旦大学 10, 11, 18, 61, 141, 143, 144, 146, 147, 153, 171, 188, 191, 274, 325, 339, 350
- 富光年 54, 141, 192, 262
- 傅国涌 28~30, 32, 33
- 富山房 45, 55, 59, 192, 240, 262
- 傅纬平(傅运森) 85, 108, 109, 112, 114, 121~124, 132~135, 150, 233, 245, 255, 268, 278, 296, 327, 362, 394, 417, 443
- 《复兴初中本国史》 122, 123, 132, 233, 255, 268, 327, 362, 393, 394, 417
- 《复兴高中本国史》 122, 124, 204, 226, 228, 230, 303, 338, 359, 363, 399, 420, 432
- 《复兴历史教科书》 109, 165, 443
- 《复兴教科书历史》 201, 202
- G**
- 《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 66, 262
- 《高等小学历史课本》 75, 192, 261
-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192, 260, 381, 414



-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 162, 165, 203, 395
- 《高小历史课本》 125, 128, 369
- 高彦博 90, 110, 250, 251, 279, 303
- 《高中本国史》 117, 122, 123, 125, 126, 129, 153, 158, 165, 168, 197, 203, 221, 224, 228, 231, 233, 235, 236, 245, 250, 254, 266 ~ 269, 294, 299, 300, 303 ~ 306, 322, 327, 333, 337, 338, 348, 353, 354, 357, 360 ~ 363, 379, 396, 397, 399, 416, 417, 420, 440, 445, 446
- 《高中本国现代史》 389
- 《高中新本国史》 203, 220 ~ 222, 245
- 耿云志 352
- 《共和国本国史》 162, 235, 264, 316, 318, 319, 335, 382
- 《共和国新历史》 79, 85, 182, 261, 341, 415
- 顾潮 151, 405, 407, 418, 424
- 顾颉刚 17, 26, 31, 89, 91, 92, 96 ~ 98, 141, 147, 151 ~ 153, 174, 175, 196, 197, 220, 223, 224, 227, 228, 230, 232, 238, 243, 249, 270 ~ 272, 274, 293, 317, 318, 321, 328, 357, 358, 363, 366, 370, 371, 404, 405, 407 ~ 413, 418, 421, 424 ~ 428, 441, 450, 463
- 关晓红 71
- 广益书局 45, 166
- 广智书局 44, 45, 49, 54, 56, 66, 76, 229, 240, 241, 445
- 国府种德 45, 285, 286
- 国光书局 89
- 郭沫若 237, 257
- 《国史读本》 69, 76, 263
- 国学保存会 56, 57, 160, 241, 314
- ## H
- 郝时远 325
- 何炳松 174, 175, 283, 302, 303, 305
- 何伟亚 401
- 何祖泽 111, 245, 256, 267, 277, 295, 348, 359, 369, 393, 397, 419
- 华绍昌 78, 79, 83, 182, 242, 261, 264, 289, 291, 316, 335
- 黄东兰 12, 13, 16, 58, 60, 71, 219, 315
- 黄人济 111, 138, 166, 202, 224, 245, 295, 323, 353, 383, 390, 393, 394
- 黄现璠 48, 51, 58, 62, 81, 90, 93, 102, 123
- 黄兴涛 12, 310, 326
- 会文堂 54, 88, 291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 51, 56, 58 ~ 61, 66, 69, 155, 230, 240, 248, 313, 415  
 洪鋈 88, 89, 96, 97, 108, 109, 164, 198, 261  
 宏文馆 57, 161, 230, 241  
 胡朝阳 54, 66, 75, 78, 89, 243, 262  
 胡适 17, 28, 31, 89, 90, 110, 147, 189, 207, 257, 272, 353 ~ 356, 360 ~ 367, 371 ~ 374, 404, 405, 407, 423 ~ 428

## J

季家珍 3, 11, 98  
 《简明新国史教本》 161, 415  
 《简易历史课本》 192, 262  
 姜朝晖 106, 457  
 江楚书局 56, 60, 148  
 江起鲲 66, 75, 89  
 江起鹏 66, 75, 78, 89  
 江沛 427  
 江宜桦 21, 400  
 蒋恭晟 113, 129, 369, 391  
 蒋介石 343, 346, 365, 441 ~ 443  
 蒋廷黻 395, 398  
 蒋维乔 38, 54, 75, 78, 80, 139, 146 ~ 148, 150, 154, 156, 161, 173, 177, 178, 195, 196, 241, 291  
 蒋子奇 109, 118 ~ 120, 128, 256,

280, 297, 369, 395, 443, 445  
 《教育公报》 74, 84, 92, 93  
 教育世界社 45, 381  
 《教育通讯》 159  
 《教与学》 69, 156, 218, 440  
 《教育杂志》 105, 116, 142, 408  
 竟化书局 45, 285  
 金观涛 3, 325, 454  
 金林祥 38, 86  
 金为 44, 48, 55, 65, 75, 191  
 金兆梓 89, 91 ~ 93, 95, 96, 108 ~ 115, 118, 119, 121 ~ 125, 129, 130, 141, 148, 150, 152, 153, 156, 157, 165, 170, 197, 198, 220, 226, 227, 236, 243, 245, 250, 253, 254, 256, 258, 259, 267, 268, 275 ~ 277, 280, 293, 294, 300, 304, 322, 327, 336, 354 ~ 358, 362, 367, 368, 378 ~ 380, 383, 385, 386, 388, 390, 392, 394, 417, 443, 450

## K

《开明本国史教本》 125, 126, 167, 212, 213, 220, 223, 231, 245, 250, 256, 268, 304, 322, 332, 364, 370, 383, 389, 391, 394, 419  
 开明书店 53, 56, 90, 108, 111 ~ 115, 117, 118, 121, 122, 125, 126, 129, 132, 140 ~ 142, 147 ~

149, 161, 164, 167, 168, 171,  
172, 175, 178 ~ 181, 187, 203,  
213, 259, 332, 337, 338, 362,  
370, 383, 410, 443

《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 168, 203

## L

来新夏 389

乐群书局 53, 54

《历代史略》 16, 58 ~ 60, 264

李帆 14, 281, 282

李华兴 10, 19, 87, 98

李怀印 464

李济 31, 246

李家驹 10, 63

李庆 13, 46, 47, 49

李清悚 113, 129, 143, 159, 167,  
369, 391

李培镆 53

李喜所 310

李孝迁 13, 15, 44, 46, 48, 60

李学勤 246, 270

李永圻 16, 429, 430, 439

李云坡 111, 112, 131, 201, 202,  
233, 245, 258, 296, 299, 305,  
337, 348, 361, 362, 419

李岳瑞 54, 69, 76, 90, 139,  
146, 152, 154, 235, 241, 244,  
263, 292, 317

李泽厚 211

李直 88, 108, 109, 128, 167

梁启超 48, 51, 64, 154, 179,  
248, 271, 310, 315, 318, 320,  
326 ~ 328, 355, 361, 362, 364,  
366, 367, 374, 453

梁园东 92, 110, 112, 121 ~ 123,  
126, 127, 130, 131, 142, 152,  
204, 244, 245, 296, 323, 359,  
389, 420, 447, 450

列文森 212

林惠祥 284, 292, 301, 303

刘风云 331, 414

刘龙心 12

刘乃晟 56, 139

刘陶 45, 445

柳诒徵 14, 16, 56, 58 ~ 60, 140,  
144, 148, 152, 264, 286, 301,  
450

泷川龟太郎 45, 49, 312, 381

陆费逵 1, 10, 78 ~ 80, 88, 89,  
108, 109, 147, 148, 172, 173,  
179, 181, 183, 189

陆并谦 111, 202, 224, 245, 295,  
323, 353, 383, 390, 393, 394

陆东平 110, 142, 197, 333, 357,  
361, 362

陆光宇 90, 112, 141, 144, 243,  
291, 353, 382

路康乐 346

卢秉征 89, 141

卢文迪 113, 143, 153, 167, 233,  
245, 279, 294, 324, 325, 421

罗梅君 237

罗香林 113, 132, 143, 152, 153, 221, 228, 245, 254, 279, 294, 299, 300, 304, 305, 327, 360, 420, 450

罗元颀 113, 114, 121, 122, 126, 129, 140, 153, 203, 228, 245, 266, 338, 357, 361, 362, 397, 417

罗志田 211, 234, 247, 356, 371, 374, 375, 425, 427

吕克由 111, 233, 244, 268, 277, 295

吕思勉 14, 16 ~ 18, 26, 88, 90, 91, 94, 95, 97, 112, 113, 115, 121 ~ 124, 132 ~ 135, 141, 147, 148, 152, 153, 158, 164, 204, 205, 222, 225, 226, 228, 231, 235, 236, 243, 245, 257, 263, 266, 275, 284, 291, 292, 303, 305, 306, 335, 338, 359, 360, 363, 399, 413, 417, 420, 429 ~ 440, 444, 447, 450, 463, 464

吕瑞廷 57 ~ 59, 76, 80, 82, 138, 194, 242, 263, 288, 321, 334

## M

茅海建 400

孟世杰 90, 111, 113, 123, 141, 152, 236, 245, 250, 254 ~ 256, 266, 278, 305, 306, 324, 338,

348, 354, 396, 446

孟森 461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62, 66, 67, 75, 160, 192, 263, 380, 414

缪凤林 111, 142, 152, 153, 244, 267, 277, 284, 299, 301, 302, 304, 305, 450

民智书局 111, 162, 163, 233, 244, 268, 337, 365

民族认同 7 ~ 9, 19, 21, 22, 24 ~ 27, 211, 212, 246 ~ 248, 251, 257, 259, 265, 270, 273, 281, 282, 306 ~ 310, 327, 330, 333, 344, 349, 350, 414, 417, 418, 429, 448, 453, 454, 456, 461, 463

## N

那珂通世 13, 16, 44, 46, 47, 49, 50, 60, 70, 191, 192, 225, 239, 260, 292, 293

南洋官书局 54, 57

内藤湖南 301

聂家裕 109, 114, 115, 118 ~ 120, 128, 130, 144, 256, 297, 369, 395, 443, 445

## O

欧阳军喜 219, 352, 398

欧阳哲生 222, 232, 351, 464

区志坚 16

## P

- 潘武 79 ~ 82, 138, 148, 162,  
196, 242, 261, 263, 290, 316,  
331, 334, 335, 341, 349, 350,  
415  
裴文中 251, 252, 257, 298, 299  
彭明 15, 374, 427  
《评注国史读本》 69, 235, 292,  
317, 382  
《普通历代史》 46  
普通学书室 44, 45, 56, 58, 67,  
75, 80, 195, 242, 263, 290, 334  
《普通新历史》 59, 67, 75 ~ 77,  
263

## Q

- 钱端升 342  
钱炳寰 147, 172, 181, 186  
钱穆 120, 464  
桥本海关 381

## S

- 萨幼实 52, 59  
桑原鹭藏 13, 16, 44, 47, 48,  
50, 51, 59, 70, 75, 191, 222,  
223, 227 ~ 229, 232, 240, 260,  
287, 288, 311, 314, 381, 414  
商务印书馆 4, 10, 15, 17, 23,  
28, 32, 41, 45, 48, 52 ~ 58,  
61, 63, 65 ~ 67, 75 ~ 80, 82,  
85, 88 ~ 92, 95 ~ 97, 99, 106,  
108 ~ 110, 112 ~ 118, 121, 123 ~  
126, 128, 130, 132, 138 ~ 142,  
145 ~ 149, 151, 160 ~ 165, 167,  
170 ~ 179, 181 ~ 186, 188, 189,  
191 ~ 196, 199, 202, 226, 231,  
233, 235, 240 ~ 243, 245, 246,  
255, 258, 261, 291, 333 ~ 335,  
338, 341, 345, 352, 358, 359,  
362, 363, 366, 368, 369, 379,  
381, 404, 405, 407, 409, 410,  
414, 425, 429, 434, 437, 439,  
447, 464  
《申报》 169, 181 ~ 184  
深町英夫 342  
沈恩膏 57, 59, 80, 138  
沈松桥 70, 306, 414, 449, 458,  
460  
沈味之 110, 138, 276, 319, 337,  
388, 420, 422  
沈颐 76, 79, 80, 140, 144, 147,  
148, 161, 162, 172, 195, 196,  
220, 241, 242, 264, 291  
沈知方 146, 171, 172, 185, 186  
沈仲龙 321  
市村瓚次郎 13, 44, 45, 49, 50,  
70, 225, 229, 240, 260, 287,  
310 ~ 312, 380, 381, 414  
世界公学 46  
世界书局 28, 69, 76, 78, 88 ~  
90, 97, 102, 108 ~ 115, 117,

- 118, 121, 122, 125, 126, 128 ~ 131, 141, 142, 149, 153, 163, 165, 166, 168, 171, 172, 175, 176, 178 ~ 181, 184 ~ 188, 197, 200, 202, 203, 224, 244, 245, 266, 319, 333, 337, 338, 353, 364, 379, 383, 388, 389, 420, 422, 423, 446
- 石鸥 2, 11, 19, 87, 91, 94
- 《实用历史教科书》 99, 316
- 宋延庠 109, 114, 118 ~ 120, 144, 256, 280, 297, 369, 395, 443, 445
- 孙江 1, 2, 12, 15, 16, 58, 282, 284, 286, 315
- 孙懋禄 109, 118, 395
- 孙正容 114, 115, 143, 153, 203, 220 ~ 222, 245, 280, 297
- 孙中山 (孙文) 28, 85, 156, 208, 230, 245, 328, 339, 340, 342 ~ 345, 362, 365, 422, 423
- T**
- 汤济沧 89, 138
- 唐秋渠 45, 192
- 陶希圣 211
- 田口卯吉 45, 445
- 田正平 82
- W**
- 万叶书店 113
- 汪楷 78, 79, 83, 138, 182, 242, 261, 264, 289, 291, 316, 335
- 汪承镛 52, 138
- 汪家熔 10, 46, 55, 58, 63, 117, 118, 170, 176 ~ 178
- 汪荣宝 58, 59, 140, 148, 154, 155, 231
- 汪向荣 43, 44
- 王笛 1, 15, 455
- 华尔敏 281, 308, 398
- 王汎森 246, 271, 409, 424
- 王建军 10, 41, 181
- 王明珂 20, 246, 281, 307
- 王奇生 342
- 王晴佳 15
- 王有朋 19, 37, 46, 55, 58, 62, 65, 76, 79, 83 ~ 85, 90, 91, 93, 109, 115, 120, 122, 168, 176, 178, 430, 434
- 王云五 (王岫庐) 10, 90, 108, 118, 119, 146, 147, 172, 345, 366, 404
- 王钟琳 96, 99
- 王钟麒 (王伯祥) 26, 89, 92, 96, 97, 110, 112, 123, 128, 141, 152, 164, 197, 220, 223, 227, 230, 232, 243, 256, 258, 276, 293, 321, 358, 363, 366, 369, 379, 390, 391, 404, 405, 407, 410 ~ 413, 418, 421, 425, 441, 446, 450

- 卫聚贤 275
- 文化学社 90, 110 ~ 113, 115, 131, 201, 236, 245, 250, 258, 266, 337, 353, 379, 419, 445
- 文明书局 48, 51, 52, 56, 57, 61, 62, 65 ~ 67, 76, 78 ~ 80, 139, 156, 160, 192, 206, 239, 242, 288
- 文通书局 114, 118, 119, 143, 187
- 吴葆诚 46, 52
- 吴科达 11, 41
- 伍启元 375
- 吴小鸥 10, 11, 19, 87, 91, 94
- 吴研因 88, 91, 96, 97, 99, 103, 141, 150, 163, 174, 175, 178, 261, 416
- 吴永贵 10, 132
- 吴曾祺 54, 55, 58, 75, 79, 138, 150, 152, 195, 263, 341, 415
- X**
- 夏晓虹 12
- 夏曾佑 15, 17, 18, 52, 56, 59, 62 ~ 64, 67, 75, 139, 146, 152 ~ 154, 177, 178, 193, 194, 206, 229, 241, 248, 263, 271, 272, 313, 314, 410, 414, 418, 450
- 《现代初中本国史》 16, 17, 26, 91, 92, 96 ~ 98, 158, 196, 197, 220, 223, 227, 230, 232, 271, 293, 321, 352, 357, 358, 366, 404, 405, 407, 410, 411, 413, 418, 421, 422, 425, 427, 428, 441, 463
- 湘芬书局 111, 244, 337
- 《小学文体历史教科书》 198, 368
- 《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192
- 《谢氏初中本国史》 266
- 谢兴尧 112, 143, 152, 266
- 《新编高中本国史》 122, 129, 130, 165, 236, 245, 256, 259, 267, 268, 304, 362, 385, 386, 417, 443
- 《新编中国历史全书》 59, 231
- 《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 162, 261, 316, 335
- 《新标准初中本国史》 131, 245, 258, 299, 337, 361
- 《新法历史教科书》 91, 95 ~ 97, 99, 163, 261, 416
- 《新法历史教授书》 96, 99, 163
- 新国民图书社 108, 110, 111, 128, 162, 227, 250, 337, 378, 417
- 《新教科书历史》 196
- 《新民丛报》 284 ~ 286, 307
- 《新生活初中本国史》 92, 126, 127, 130, 131, 204, 245, 323, 359, 420, 446, 447
- 《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 92, 123, 128, 164, 256, 258, 358, 363,

- 379, 390, 391, 446
- 《新式历史教科书》 168, 261, 415
- 《新体中国历史》 59, 76, 81, 82, 194, 263, 288, 320, 321, 333, 334
- 《新小学历史课本》 96, 164, 165, 197, 198
- 新学会社 54, 66, 75, 76, 78, 89, 177, 192, 243
- 《新学制高级历史课本》 97, 197
-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 91, 95, 97, 100, 101, 163, 199, 252 ~ 254, 352, 353, 362, 368, 369
- 《新学制高中本国史》 95, 124, 158, 164, 222, 226, 245, 292, 335, 338, 359, 420, 432
- 新亚书店 111, 256, 359, 419
- 《新制本国史教本》 83, 84, 148, 195, 223 ~ 225, 231, 232, 316, 317, 319, 332, 335, 382
- 《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 182, 245, 264, 291, 316, 335
- 《新中华初中本国史》 226, 227, 245, 336, 362, 368, 378, 382, 388, 390, 392, 393
- 《新中华高中本国史》 122, 245, 250, 258, 294, 304, 322, 379
- 《新中华历史课本》 128, 167
- 《新中学本国历史》 90, 93, 253
- 《新中华语体本国史》 245, 254, 337, 368, 369, 382, 391, 392, 394, 416, 417
- 《新著本国史》 91, 92, 95, 99, 162, 197, 222, 233, 261, 316, 317, 335
- 《新主义历史课本》 128
- 《新撰初中本国史》 353, 382
- 熊月之 10, 37
- 徐冰 17, 44
- 徐念慈 57, 59, 139, 148, 150, 154, 155, 161, 230, 241, 262, 381
- 徐映川 108, 109, 143, 165, 201, 202, 278, 443
- 徐旭生 257, 270, 271, 275
- 徐迅 2, 211, 308, 454, 461
- 许志毅 41, 42, 47, 57, 140, 150, 161, 415

## Y

- 杨东莼 18, 113 ~ 115, 117, 142, 153, 168, 203, 224, 228, 231, 245, 258, 259, 265, 269, 279, 299, 327, 380, 383, 391, 393, 395, 399, 416, 450
- 杨念群 218, 219, 235, 455
- 杨人榘 108, 110, 113, 143, 152, 156, 157, 168, 203, 244, 245, 268, 277, 332, 333, 337, 347, 368, 379, 383, 392, 395, 446, 450
- 杨喆 79, 89, 97, 168, 197, 261,



- 291, 415
- 姚绍华 108 ~ 110, 112, 113, 115, 121 ~ 125, 129, 132 ~ 135, 143, 148, 152, 167, 200, 228, 233, 245, 296, 325, 327, 337, 357, 361, 362, 369, 394, 446
- 姚祖义 52, 59, 64, 138, 193, 194, 206, 262, 264, 381, 414
- 叶维善 80, 139, 233, 263
- 易仁菱 114, 143
- 印水心 69, 76, 90, 140, 152, 235, 244, 292, 317, 382
- 应功九 113, 115, 123, 132 ~ 135, 143, 202, 245, 249, 250, 279, 294, 357, 362, 416
- 俞旦初 58, 248
- 《余氏高中本国史》 122, 200, 245, 250, 256, 259, 303, 337, 363, 443
- 余逊 112, 121, 122, 143, 153, 200, 228, 245, 250, 256, 259, 279, 296, 303, 337, 363, 443
- 约恩·吕森 20, 454
- Z**
- 臧振华 246, 259, 265
- 《增订普通新历史》 75, 195, 334
- 《增订中国历史读本》 75, 194, 195, 341, 415
- 《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 75, 82, 334
- 张耕华 13, 14, 16, 147, 429, 430, 434, 439
- 张光直 31, 246, 259, 265
- 张鸿英 89, 167, 198, 368
- 张静庐 38, 103, 148, 188
- 章岷 57, 62, 69, 76, 79, 80, 140, 152, 153, 182, 242, 245, 261, 263, 264, 288, 290, 291, 316, 335, 414, 415, 450
- 章清 4, 12, 95, 170, 181, 218, 219, 235, 350, 424, 459
- 章锡琛 147, 149, 171, 172, 185
- 张相 81, 88, 89, 108, 110, 148, 150
- 张元济 10, 51, 52, 54, 58, 78, 146, 149
- 张运君 11, 20, 71, 452
- 张运礼 57, 59, 231, 242
- 张肇桐 52, 66, 67, 140, 148, 154, 155, 239, 262
- 张仲民 11, 61, 328, 459, 464
- 赵激璧 57 ~ 59, 76, 80, 82, 138, 194, 242, 263, 288, 321, 334
- 赵玉森 58, 75 ~ 77, 79, 80, 82, 89, 91, 92, 95, 99, 139, 162, 195 ~ 197, 222, 233, 235, 242, 243, 261, 264, 288, 316, 317, 319, 323, 334, 335, 341, 382
- 赵钺铎 54, 75, 78, 111, 141, 162, 192, 261, 290, 337
- 郑师渠 205, 367

- 政治认同 7~9, 19, 21, 22, 25~27, 330, 331, 333, 341, 347, 349, 350, 402, 429, 448, 452~454, 456
- 正中书局 109, 113, 115, 118, 132, 135, 164, 167, 171, 176, 178, 180, 187, 294, 357, 360
- 支那翻译会社 52, 55
- 支那少年 56, 59, 66, 312
- 《支那史》 13, 44, 49, 51, 59, 66, 312, 380, 381
- 《支那史教科书》 59, 192, 262
- 《支那史要》 13, 46, 49, 50, 59, 229, 260, 287, 310~312, 414
-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 59, 66, 312
- 《支那通史》 13, 16, 46, 47, 50, 59, 60, 191, 192, 260, 292, 293
- 《支那文明史》 59, 285
- 《中等东洋史教科书》 48, 51
- 《中国历史讲义》 59, 76, 161, 162, 195, 196, 220, 230, 262, 264, 381
- 《中国历史教科书》 15, 16, 48, 59, 66~68, 75, 146, 156, 160, 233, 245, 261~263, 287, 314, 315, 381, 415
- 中国图书公司 54, 57, 78~80, 140, 162, 164, 192, 233, 415
- 《中国文明小史》 445
- 《中华教育界》 41, 118, 143, 156
- 中华书局 1, 10, 12, 13, 17, 28, 48, 78~84, 88~93, 95, 96, 108~118, 121~126, 128, 129, 132, 138~144, 147, 148, 150, 153, 162~168, 170~173, 175~179, 181~186, 188, 196, 198, 211, 218, 224, 225, 232, 233, 236, 242, 243, 246, 253, 282, 289, 291, 293, 294, 316, 319, 322, 325, 328, 334, 335, 337, 339, 355, 357, 362, 368, 369, 389, 415, 421, 425, 426, 431, 446, 464
-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 81, 82, 162, 196, 263, 331, 334, 341, 350, 415
- 《中外故事读本》 67
- 《中外豪杰史读本》 30, 52, 290
- 中学生书局 113, 115, 132, 135, 164, 176, 338
-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62, 69, 76, 153, 263, 288, 414
- 《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 76, 415
- 钟山书局 111, 176, 244, 267
- 钟毓龙 80, 83, 84, 140, 148, 152, 195, 223~225, 232, 243, 290, 292, 316, 317, 319, 323, 332, 335, 382
- 钟月秋 111, 244, 296, 337
- 周策纵 351, 374, 377
- 周其厚 10, 170, 184
- 周世棠 54, 66, 75, 78, 89, 139,

- 192, 261, 290
- 周同愈 44, 48, 51
- 周予同 59, 111, 112, 114, 121 ~ 123, 125, 126, 132 ~ 135, 142, 152, 153, 167, 212, 213, 220, 223, 224, 231, 245, 250, 255, 256, 258, 268, 271, 277, 278, 280, 295, 297, 304, 322, 323, 332, 337, 363, 364, 370, 383, 389, 391, 394, 418 ~ 420, 443, 450
- 周振鹤 46, 55
- 朱公振 110, 142, 166, 276, 319, 337, 388, 420, 422
- 朱联保 61, 90, 125, 171, 172, 179, 180, 186
- 《朱氏初中本国史》 122, 125, 130, 131, 166, 200 ~ 202, 245, 286, 327, 364, 446
- 朱翊新 89, 97, 102, 108 ~ 112, 114, 121 ~ 123, 125, 128, 130, 131, 142, 150, 165, 166, 187, 197, 201, 202, 224, 245, 276, 286, 295, 297, 303, 319, 323, 327, 333, 337, 353, 357, 361, 364, 383, 388, 390, 393, 394, 420, 422, 446
- 朱煜 10, 94, 99
- 庄启传 79, 139, 261, 291, 415
- 邹振环 15
- 《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59, 64, 65, 194, 264, 381
-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 64, 65, 193, 194, 206, 262, 381
-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14, 59, 62, 63, 67, 75, 153, 193, 206, 229, 232, 248, 249, 263, 271, 313, 410, 414, 418
- 左玉河 128

##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我近代中国教科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2002年我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2005年通过答辩，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其间，论文有数次出版机会，但我总觉得写得不满意而放弃。近十年来，我对博士论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一是补充研究资料，特别是教科书资料，可以说本书使用了目前能够找到的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二是扩展研究内容，注重民族主义演化中内部因素的影响，增加了内部因素对认同建构影响的讨论；三是压缩部分内容，本有十多万字的教科书人物研究，考虑到篇幅问题，没有纳入本书中，拟另行出版。本书希望达到的目标，一是系统地呈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情况，二是揭示通过历史知识与历史教育建构认同的双重影响。

本书的部分内容与观点，曾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包括《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光明日报》2005年12月6日摘登；《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

刊》2007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7年第12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9期摘登；《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历史学文摘》2010年第2期摘登；《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4年第6期全文转载；《貌合神离：近代中国新史学与日本史学》，《史林》201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2期转摘；《民族英雄的尺度：〈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书局的权势网络与知识生产》，《人文杂志》2015年第12期；《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复旦学报》2016年第3期。

本书的出版，是我教科书研究过程的一个标记，也是新阶段的开始。我的学术研究之路，离不开诸多师友的关注与指导。

1989年9月，我到六安师专（今皖西学院）政史系读书，徐开忠教授、王家骅教授、马育良教授等老师，都给我很多关照与鼓励，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9年9月，我到安徽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汤奇学教授。那时我已近而立之年，汤老师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汤老师不仅给我以学业上的教诲，在生活方面也给予了很多关怀。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教授、周乾教授、吴春梅教授、陆发春教授和张朝胜教授等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关照，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2年9月，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章清教授。我选择研究近代中国教科书，得益于章老师的指导。当时，我对近代教科书毫不了解，近代教科书研究也尚属于起步阶段。感谢

章老师为我指定这一领域，指导我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戴鞍钢教授、金光耀教授和陈新教授等老师都给我的论文写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年5月，我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导师为陈谦平教授。陈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师恩难忘，同学情谊也是如此。复旦大学的楚永全、张仲民、冯峰、孙青、周奇、王毅、汤水清、郜积意、刘海滨、陈文彬、杨禾丰等，安徽大学的胡尚元、方旭红、陈瑞、胡珍贵、方英、叶永胜、王传满、耿传友等，都给予我很多的支持与帮助。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携妻将子，楚永全给了我很多关照，张仲民为我的论文写作提出了很多建议，并赠送了一些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多年以来，老师与同学们一如既往地关心与帮助我，我很有幸能够遇到他们，每忆起，倍觉温暖。

2005年7月，我来到安徽财经大学任教，安徽财大各位领导与同事、蚌埠市致公党各位领导与同志，都给予我很多关照。安徽财大曹天生教授、张同利教授、黄爱军教授、周连春教授、丁进教授、周宁博士等，蚌埠市陶仪声、刘敏、张建平、张雷、朱光耀等诸位师友，对我的工作、学习与生活都给予了很多关心，特别是曹天生教授，给予我很多的鼓励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教授，上海辞书出版社王有朋老师、余岚老师、李永翔老师、高菊红老师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张振海老师，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多帮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的各位老师对本书的出版费心尤多，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有幸被列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由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家人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关怀。在我的求学过程中，妻子梁昌云给予我最大的支持。特

别是从 1999 年我离职攻读硕士学位以来，她一个人上班、带孩子，为支持我的求学付出了很多艰辛，在此衷心地道一声感谢。

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多年来关心、帮助我的各位老师、同学和亲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本研究只是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一部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一些思考尚不够成熟，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最后，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投入到教科书研究中来，重视与支持教科书研究，推进教科书研究的深入。

刘超

2016 年 3 月 20 日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书目

## 1994 年度

- 《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
-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
-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
-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
-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 1995 年度

-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
-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
- 《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
- 《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
-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
- 《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
-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吕昭义著

## 1996 年度

- 《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檀著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

《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 1997 年度

《〈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杜勇著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  
侯旭东著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陈爽著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刘正寅、魏良弢著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何平著

《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哈台、满、汉  
五件文书研究》，何星亮著

《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徐向群、宫少朋主编

### 1998 年度

《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著

《辽金农业地理》，韩茂莉著

《元代书院研究》，徐勇著

《明代高利贷资本研究》，刘秋根著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著

《晚清保守思想原型——倭仁研究》，李细珠著

### 1999 年度

《唐代翰林学士》，毛雷著

《唐宋茶叶经济》，孙洪升著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著

《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邵丽英著

### 2000 年度

- 《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制度研究》，印群著
- 《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华林甫著
- 《宋代海外贸易》，黄纯艳著
-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著
-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王宏斌著
- 《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张小也著
- 《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王跃生著
- 《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徐浩著
-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侯建新著
- 《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张昭君著
-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潘光、王健著
- 《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戴桂菊著
-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 年）》，李春放著

### 2001 年度

- 《〈礼仪·丧服〉考论》，丁鼎著
- 《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韩树峰著
- 《两宋货币史》，汪圣铎著
- 《明代充军研究》，吴艳红著
- 《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著
- 《清代台湾的海防》，许毓良著
- 《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
-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曹世铨著

### 2002 年度

-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任士英著

《王学与晚明师道复兴运动》，邓志峰著

《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马俊亚著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戴超武著

### 2003 年度

《西周封国考疑》，任伟著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司马朝军著

《部落联盟与酋邦》，易建平著

《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赵秀荣著

### 2004 年度

《后稷传说与祭祀文化》，曹书杰著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

《西方历史叙述学》，陈新著

### 2005 年度

《汉代城市社会》，张继海著

《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刘琴丽著

《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程龙著

《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李庆新著

《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赵克生著

《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金成修著

### 2006 年度

《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张丰乾著

《“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胡吉勋著

《清代的死刑监候》，孙家红著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张太原著

《德国 1920 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孟钟捷著

### 2007 年度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高江涛著

《秦代政区地理》，后晓荣著

《北京城图史探》，朱竞梅著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李恭忠著

《古希腊节制思想》，祝宏俊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宠波著

### 2008 年度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成一农著

《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樊铎著

《〈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陈晓华著

《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王东洋著

《初进大城市》，李国芳著

### 2009 年度

《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谢慧著

### 2010 年度

《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梁志著

《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陈丹著

### 2011 年度

《周道：封建时代的官道》，雷晋豪著

《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王建伟著

#### 2012 年度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唐小兵著

《卜子夏考论》，高培华著

#### 2013 年度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湛晓白著

《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改革与民主输出》，张晓莉著

《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尤淑君著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稿约

一、凡向本文库提出申请，经评审通过入选的史学专著（30万字以内为宜），均获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资助，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五年之内出版的海外华裔学者外文专著之中译稿本、港澳台学者专著之简体字稿本均可申请。博士论文经过至少一年的修改后可申请。

二、收入文库的专著，研究方向以中国近现代史（1840—）、世界近现代史为主，兼及历史学其他学科。

三、文库的学术追求是出精品。入选文库的专著，为有较高水平，或解决重大课题，或确立新观点，或使用新史料，或开拓新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尤欢迎博士论文，但须经过至少一年的修改。

四、入选专著，必须遵守学术著作规范，须有学术史的内容和基本参考书目，引文、数据准确，注释规范，一律采取页下注。请勿一稿两投。

五、申请书稿应为已达到出版要求的齐、清、定作品，申请人须提供两份作品纸文本。申请书稿、申请表均不退还。

六、每年3月1日至4月30日为该年度申请受理时间。9月，评审结果通知申请者本人。

七、欲申请者，可函索申请表，并提供作品题目、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B 座 1407#

邮编：100029

电话：010 - 59367256

电子信箱：jxd@ssap.cn

联系人：王珏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论著。在描述清末、民初、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的基础上，研究教科书的内容，探讨了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的关系，即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认同、政权统治合法性认同之建立的关系。书中把中国历史教科书看作一种叙述和一整套历史记忆，是根据时代需要制作的一种“文本”或“表达”，以创造民族的共同传统，形成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通过对教科书编写的研究可以看到，政府与编者共同促成了教科书知识生产，而二者既有一致也有疏离，从而蕴含了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通过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叙述、中国民族叙述、清史叙述、新文化运动叙述等可以看出，在历史书写建构认同的过程中，政治认同优先于甚至替代民族国家认同，真正的民族国家认同很难建构起来；而历史具有反建构特征，历史会冲击通过历史建构的认同，甚至动摇认同。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9121-9



9 787509 791219 >

ISBN 978-7-5097-9121-9

定价：128.00 元